常青藤译丛

Das Zusammenleben der Kulturen

文明的共存

——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德] 哈拉尔德·米勒 著

郦红 那滨 译



新华出版社

常青藤译丛

Das Zusimmenledender Kulturen

文明的共存

——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德] 哈拉尔德·米勒 著
郦红 那滨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共存：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德）米勒著；郦红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
（常青藤译丛）
ISBN 7-5011-5493-7

Ⅰ.文… Ⅱ.①米…②郦… Ⅲ.国际政治－研究 Ⅳ.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436 号
京权图字：01－2001－0462 号

文明的共存
——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德〕哈拉尔德·米勒 著
郦红 那滨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50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ISBN 7-5011-5493-7/G·2007 定价：21.80 元

编者序言

《常青藤译丛》是本社推出的一套思想文化类丛书。其名称和主旨皆受到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主体的“常青藤联盟”Ivy Leagne的启发。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学术盛名的联盟，该联盟致力于“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具体说来，多年来，它以追求理想的激情和探索现实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探求新思想、新事物、新价值，倡导自由探索、自由审视和自由创造。

《常青藤译丛》是一套力图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全球性的眼光推介外国前沿思想文化成果的丛书。我们将分辑出版，陆续为读者推出。第一辑共四本，它们是《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50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英〕约翰·雷契著、《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美〕劳伦斯·哈里森、塞缪尔·亨廷顿主编、《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德〕哈拉尔德·米勒著、《学术责任》〔美〕唐纳德·肯尼迪著。

《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50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是关于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性理论的一本书。作者约翰·雷契在书中介绍了当代极具影响力的50位著名思想家。其中包括尼采、弗洛伊德、德里达、利奥塔和卡夫卡等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各个时期思想理论及其影响，作者特在每部分前写有一个简

短的导言性评述。此书不仅是理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重要参考，而且对于希望更多了解本世纪最重要的知识革命的读者来说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是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亨廷顿参与主编的一部书。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州危机和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论证并阐述了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回答了文化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的。由埃通加·曼格尔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可以说是本书点睛之笔。

《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的作者哈拉尔德·米勒是一位极具权威的批评家。他不仅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亨氏文明敌对论的全球观，而且向我们警示，简单地渲染或者接受这种片面的世界观或敌对论是极其危险的。作者明确指出：不是文化的对抗，而是文化的共存与对话；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尝试进行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对抗；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善加利用。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以实现。虽然国际现实政治的发展似乎证明了亨廷顿理论的某种预见性，但哈拉尔德·米勒的理论仍然具有现实价值。我们不妨将塞缪尔·亨廷顿和哈拉尔德·米勒的看似对立的理论观点看作同一命题的合题——这样两位思想家就在智性和善性的目的上汇合了。

美国学者亨廷顿和德国学者米勒从“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的视角考察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提出了文明分析的世界框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讨论、关注和反思。“文明冲突”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动力，文明共存是融合各种文明不同的特质、扬弃不合适宜文明，形成多样化的新的文明体系。文明共存中必然有文

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中包含着文明的共存和融合。文明在产生同一性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多元性，两者密不可分并互为前提，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历史上每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形成文明共存与融合，而每一次经过文明共存与融合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会孕育着更为深刻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引发世界文明的变迁、演进、发展和多样化，不同文明在交融中发生碰撞而走向整合。

《学术责任》的作者在斯坦福大学做过多年校长。现在仍在该校执教的唐纳德·肯尼迪无疑是著述此书的最佳人选。他以学者和大学校长的双重身份，从学术责任的高度首先阐述了如何影响未来大学，如何恢复大学使命和忠诚的价值观的问题；其次，作者论述了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类提供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如果说，人类思想文化是智慧的结晶、进步的阶梯、文明的象征，那么上述四部著作就成为反映当代思想文化深度和成果的最好文本。

文化和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德谟克里特说：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告别了 20 世纪和经历了 20 余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给我们提出了更深层的课题，为了实现中国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与此同时，还要从多类文化的宝库汲取思想文化的营养——这就是编辑出版《常青藤译丛》之目的。

前　言

1996年12月16日，我有幸与塞缪尔·亨廷顿先生就他的大作《文明的冲突》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这次活动是由法兰克福的“美国之家”组织的，辩论结束之后，菲雪尔出版社的多姆扎尔斯基先生建议我将对亨廷顿观点的不同见解整理成书出版，我当然不会拒绝这个美好的建议，其结果便是放在诸君面前的这部拙作。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原则性批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的观点在第二部分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在第一章中我比较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差异，研究了现代社会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第二章则探讨了文化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分析了文化因素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会变成“政治问题”。第三章研究了暴力冲突的原因和进程，提出了关键的问题，即亨廷顿的设想在今天的战争中是否得到了证实。

第三部分则具体观察分析了国际政治的大地区：西方世界、亚洲、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边缘地区”。五章中的每一章都深入地分析了经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国际政治发展趋势或是进行了设想，或是进行了预测。

本书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描述了各地区之间关系进展的前景，阐明了可以想见的“破坏因素”——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大规模移民。最后一章则从这些分析中得出适合政治运作的结论。

本书从正面反驳了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地套入“敌我对

抗"的亨氏模式，它要求读者对发生在五大洲的几乎无法预见的复杂事件尽力做出评判。作者明确指出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主宰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但同时它也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使人类各民族之间的危险敌对性有可能得以调和；文明的冲突现象并非自然之力的结果，而是人为引起的，因此人类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逾越这个障碍。

一部涵盖整个国际关系的著作非个人能力所及，我谨在此对所有致力于地区政治研究的专家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正是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才能对今天国际关系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外，我也想借此对黑森州和平和冲突研究基金会的同仁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帮助。延斯·贝格豪夫、金喀·格尔克和阿希姆·施潘厄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瑞莎娜·德达斯第、莎毕娜·菲舍尔和基尔斯滕·威斯特法尔的博士论文对我书中一些重要观点的形成也大有裨益。延斯·贝格豪夫、乌娜·贝格和斯黛芬尼·索尼乌斯在调查研究方面给予了我很大帮助；当我的电脑不可避免地出现故障时，马克斯·缪尔曼就会像天使一样飞到我的身边。

我的夫人乌尔瑞克·米勒，尽管自己的工作极其繁忙，但是在我必须一吐为快时，总是乐意聆听我的倾诉，她平静地接受了我常常思想飘忽不定的现实，井然有序地处理了各种家庭琐事，使我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本书的著述中去。一如既往，她是我最感激不尽的人。

哈拉尔德·米勒

于 1998 年 8 月

文明的共存　　目　录

第四部分　展望

第一部分　批　　判

1
亨廷顿的世界

人类总是被深深的恐惧所困扰，因为生命如此脆弱，易受伤害并且时刻受到威胁。富裕的生活、社会保险、文化保护以及自我身份，凡此种种，皆因此而起。人类需要拥有自己的身份证明，他们希望并且需要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又将何去何从。确认身份表示划分界限，具有某一个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不会成为另一个人。在变革、危机和苦难的时代，这两种基本的现象汇合到了一起：随着恐惧感的增强，界限也变得愈加重要。寻找一个敌人，或是寻找一个替罪羊成为了某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则目标明确地针对那些所谓的“外人”。敌对势力是可怕的威胁，但是它们背后隐藏着一种同样可怕的东西，即对敌人的渴望，尤其当世道不好的时候。

《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缺陷中应运而生的。随着最大的敌对势力共产主义苏联的崩溃，西方政治社会的安全感较之以前有所增加，甚至感到安全了许多。他们不再受到战争的威胁，不会有核对抗直接在他们家门口发生，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常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安全。相反，很多事情却陷人了一片混乱，这并不是东西方对峙结束的直接后果，但它无疑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随着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和与此紧密相连的贸易、金融以及交流的不断融合和加速，也包括日益增长的

移民潮，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再是以前的模样，我们的未来难以逆料，我们再不能把一切罪责都归咎于可恶的苏联人了。

亨廷顿文明论的主要观点

亨廷顿向我们预示了事态发展的方向：根据民族的划分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推动，现在，世界历史各种文化正走向对峙，他所说的“文明”，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古代英语）中更喜欢用“文化”这个词来表达。各种文化将形成巨大的敌对集团，事实上这种对立现在也已经形成了。在地平线上，伊斯兰和儒教的联盟将直接威胁到西方社会的安全。在这里，“黄色威胁”（指西征至多瑙河流域的蒙古铁骑——泽者注）和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远征军”被富有创造性地结合到了一起，而这两种势力在西方各民族共同的记忆中，都曾留下过根深蒂固的创伤。

《文明的冲突》为我们重新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实际上是在极端雄心勃勃地追求一种对世界的重新规划：它试图使我们相信，文明间的对抗正是现在和未来世界格局的“最本质状态”；文化传统才是促使人们采取共同行动、形成共同思想的源头。亨廷顿对人类文明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划分，他试图通过对文化的决定因素，包括历史渊源、价值体系、生活方式、世界观和相应的社会、政治思维方式等等的深刻剖析，绘制出一幅世界新地图；同时，以文化为尺度，设计并构想未来的世界格局。有趣的是，亨氏文化划分的基点竟是宗教信仰。鉴于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教会世俗化趋势，这可能会令人感到吃惊。但是亨廷顿先生却将这种现代社会的“无神论”趋势搁置一边，而把宗教基础看做是更为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发展趋势，这显然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在这个基础上他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几大板块：

——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西方基督教文化；

——斯拉夫－希腊各国的东正教文化；

——涵盖中非、中东、中亚一直到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文化；

——非洲文化——尽管它纷乱芜杂，没有统一的表现形式；

——印度的印度教文化；

——日本文化；

——中国以及其东亚、东南亚周边地区的儒教文化。

另外，拉丁美洲文化是自成体系，基本上还是属于基督教——西方文化的范畴，亨廷顿对它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

亨氏认为，西方文化由于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并且凭借国家和军事的优势，长期以来一直在全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他各国正在奋起直追，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迅速超越这些西方国家。亚洲会赶超欧洲，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时，西方文化与其他各国文化发生过剧烈碰撞，并且积怨已久。现在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遭到质疑和批判，随着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其他文化的方向转移，西方文化受到的排斥将会不断加大。

随着人口统计学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准确、快捷地洞悉世界人口的增长趋势。统计资料表明，反西方文化的势力正显著增强。具体表现在非西方地区人口的迅猛增长上。世界其他各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都远胜于西方国家。非洲和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已达到或超过3%，在这些国家，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大多数。经济的停滞不前使这些生活无着的年轻人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丧失信念、充满失意和怨恨，不停地寻找可以发泄郁闷的对象。而宣扬反西方文化的自我认同观念，正好可以帮助

他们在生活中重新找回自我。年轻一代较之年长的父辈更具抗争性和暴力倾向。80 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苏，这些偏激的年轻人找到了反对正统基督教文化的理想场所，因此很可能存在一股巨大的反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动员势力。

文化的类别一般都围绕着某个核心国家进行划分：美国及其西欧盟国自然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化圈；不管承认与否，日本的文化有其特殊性，尽管它与中国文化有许多渊源；俄罗斯是东正教文化的核心国家；印度文化圈和其国家范围是重合的；而非洲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则缺乏中心国家。亨廷顿或许偶尔提及土耳其有可能起到对穆斯林世界的领导作用，因此假如有一天安卡拉最终决定拒绝那些雄心勃勃的欧洲伙伴，北约则应该宽宏大量地原谅这个昔日的盟友。

在亨廷顿看来，各种不同的文化都体现了所谓的"霸权意识"，尽管它们又有所区别，但都会无一例外地影响其文化范畴内的人们的行为。于是，文明间的相互碰撞在所难免，冲突自然不断。现在，各种文明的交界之处正是相互摩擦、争端频繁的地区。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如波西尼亚、苏丹、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都呈现出内在的裂痕，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激烈的暴力冲突，甚至内战的爆发，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流血边境"，那里的问题更为突出。正因为此，分裂是能够促进和平的惟一选择：结束多元文化，创造纯文化的国家；停止跨越文化界限或国界的传教布道，尽管这种行为在宗教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在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许多方而，都曾取得了重大成就，譬如人权保障、政教分离以及妇女解放等等。当一种政治处于文化的结合部时，只有减轻内部各种文化间的碰撞和摩擦，才有可能阻止由此而引发的全球性冲突。

如其不然，亨廷顿认为我们将看到儒教和伊斯兰教形成的反西方同盟，这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梦魇：文化间的战争，由于强烈的敌意以及冲突的多样化和突发性，很可能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从而最终将演变成全球性的核战争：那将会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景象，人类会因此丧失一切理想和希望，变得毫无前途可言。

出人意料的是，在得出这种悲观的结论之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为文化间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辩护，这和前面章节中表达的主题迥然不同。难道这是为了引导读者自由想像而采取的策略性写作手法？抑或是实事求是的理智终于战胜了教条、僵化的思维模式？不管怎么说，迪特尔·森哈斯的评论是相当中肯的，他就事论事地指出，《文明的冲突》写的是关于“一个和解的计划，假如我们一味地按着它的思路不假思索地进行分析，那我们其实不必把这个计划太当真。”[1]

世界格局与世界现实

今天的世界格局，是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世界新格局。它无疑是一种国际新秩序。我们曾经对它津津乐道，希望它会给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带来久违的和平。如同在冷战时代，我们对所谓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划分一样，今天我们对世界的划分同样也过于简单和草率。“文明”的差异固然给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但它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驱动，所以很难避免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我们很有可能像从前一样，

① Dieter Senghaas，“《文明的冲突》中的固执观念”，摘自《Blaetter fue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97年第2期215－221页。

为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况且，这种以文化为标准，重新规划出的世界格局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世界中的大量事实；同时，亨氏想要重建秩序的现实世界则更是不可预测和难以驾驭的。换一句话说：亨廷顿的理论包含了很多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观点肯定会使人不断产生疑虑，一种思想体系如果和现实严重脱节，它必将遭到激烈的批判，它对我们的意义也要受到怀疑。这种时髦的理论足以将理论家和实践者直接或者间接地引入歧途，需谨慎处之。世界历史上有足够的事例可以对此加以佐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曾风靡一时，但我们现在终于放弃了对它的追求。

我在此列举一些亨氏书中明显的错误命题，以及根据这些经过歪曲的事实所得出的高论，在这里，由于理论的需要，新世界格局的创造者们成为了牺牲品：

事例之一：亨廷顿提到"伊斯兰教的流血边境"，他试图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个论题。他指出，在最近发生的 31 起不同文化间双边或者多边的暴力冲突中，有 21 起，即有 2/3 冲突是在穆斯林的参与下发生的。[①] 照此看来，似乎穆斯林是特别好战的种族。但是我们只要变换一下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发现：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在"文化间的冲突"中，总是会有非伊斯兰教的对手。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就可以用以下的方式重新解读这些数据：在卷入文化暴力争端的 62 个国家或派别中，只有 21 个国家，大约 1/3 是伊斯兰教国家或派别。这听起来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眼地图册，并且仔细观察不同文化间的界限，我们马上会得出结论，伊斯兰国家远比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所拥有的外部边界要多得多。究其原因，是因为伊斯兰国家和民族

① 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21 世纪国际政治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Munich / Wien 1996，第 420 页

就像三明治里涂抹的奶酪一样，夹在其他的文化之间，而其他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大部分都被汪洋大海所屏障，例如“拉丁”文化只有惟一一处交界：墨西哥和美国。换言之，亨廷顿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早就知道的东西：互相接壤的国家，最有可能发展双方的贸易。假如经过彻底全面的思考（这也是人们对一个学者所期待的），我们不难看出，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好战性“远胜于他人”以及他们“流血的边界”，其实都是因为事先怀有某种偏见，错误选取资料，得出的不正确结论。那些数据不过是平均统计的期望值。

事例之二：为了论证伊斯兰—儒教联盟可能带来的可怕前景，亨廷顿严正指责了中国和北朝鲜向伊斯兰教国家出售武器的行为，尤其向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售。他还提到了中国和伊朗在核技术上的合作[①]。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向伊斯兰教国家出售武器的事实却避而不谈，后者出售的武器数量远胜于中国和北朝鲜的十倍之多，难道这表示会形成一个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同盟吗？如今，伊朗在民用核技术方面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俄罗斯，双方在完成两个动力核反应堆后，将再建两个新反应堆，并且在核技术的研究领域签定了多项合作条约，难道这意味着东正教—伊斯兰教联盟的形成吗？当今，在核技术方面合作最广泛的当属阿根廷和伊斯兰世界了。阿根廷在阿尔及利亚完成了一个供研究之用的核反应堆，在埃及也建立了一个核反应堆，并且和叙利亚也签署了类似的合作协议。阿根廷的核燃料运往阿尔及利亚和伊朗，如此一来，我们是否会受到“拉丁－伊斯兰教联盟”的威胁呢？

事例之三：在波黑冲突中，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西方国家偏

①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第387页

祖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而俄罗斯、希腊这些东正教国家则对塞尔维亚人提供了援助；伊斯兰教国家则一致支持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但这只是事实的某些表象，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在冲突发生的初始阶段，德国（新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和同样属于新教国家的丹麦支持克罗地亚，而天主教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圣公会教的英国则和塞族站在同一战线。而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激化，人类的同情心使事态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转而开始支持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他们终于决定使用武力介入这场冲突，向冲突地区冒险派遣了五万名士兵，去保护这个多元文化地区的非塞族居民，当然包括穆斯林自治区。俄罗斯的政策则只局限于保护塞族利益的最核心部分，而不愿意介入过多，它从一开始就同意继续对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实施经济制裁，也根本没有阻止北约对南斯拉夫采取的惩罚行动。假如这场战争是根据“文明间战争”的模式来进行的，那么西方和东正教联盟势力不仅应该赞许米罗舍维奇和图奇曼的设想，即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来主宰并划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同时它们也应该积极地促进这个计划的实现。果真如此，这对亨廷顿的论点将是一个有力的支持。顺便提一下，亨廷顿显然是“忘了”提及，希腊向塞族靠拢主要原因是为了对付反马其顿（同为东正教）联盟。因为正如雅典所担心的，某些势力对这个同名的希腊省份也同样虎视眈眈。这样看来，所谓的“文化战争”其实并未切中要害，最糟糕的是亨廷顿的理论在对战争的最后评价中所表现出的偏见：“在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东正教的塞族人进行了一场血淋淋的、灾难性的战争，并对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实施了血腥的暴力行动。”[①]这里完全颠倒

---

①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第 416 页

了黑白，混淆了刽子手和受害者的关系。但是由于亨廷顿是从“血腥的伊斯兰”开始谈及战争的，历史的真相便被抛到了一边。

所以，我们奉劝大家：当心那些夸夸其谈的“伟大理论”，谁若戴上有色眼镜，看到的只能是有色的世界，久而久之他会把世界当成是有色的了，而忘记了它的本来状况。如果我们在晴朗的时候仰望天空，并不会导致对现实世界判断的失真。但假如我们还是把眼光朝向地面，就会不由自主地根据感觉和印象，对东西的颜色做出错误的判断。亨廷顿关于“文化间冲突”的理论也是如此：但理论的眼镜改变不了无可辩驳的现实本色。[①]

世界观和方向性需求——《文明的冲突》畅销的原因

我所举的上述三个例子在《文明的冲突》中并不是个别现象，但是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这部巨著即有关“文明的冲突”的观点，在国际关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赢得了许多赞誉。美国外交界精英们的舆论喉舌——享有声誉的《外事》杂志根道说，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文献引发过如此巨大的舆论波澜，尽管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在德国，《文明的冲突》也同样引起了巨大轰动，该书非常畅销，作者塞缪尔·亨廷顿成为各种讨论会和争论节目竞相邀请的对象，甚至德国的联邦议院，也邀请他担任对外文化政治的顾问。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冲突”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我们政治和报章语言中的常见特定词汇，这种状况着实令人担忧。语言对我们思想的深刻影响力，与我们的思想对语言的决

① Dieter Senghaas，“《文明的冲突》中的固执观念”，摘自《Blaetter fue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97年第2期215－221页

定作用一样重要。我们使用某些概念的频率越高，就越可能突然之间成为它的信徒；一个概念的传播越广，它使人盲从的危险系数就越大。而《文明的冲突》宣扬的概念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它包含了一个世界观。

危险信号其实早已出现，我在上述事例中已经明确指出：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理论，具有严重而且是不可救药的先天缺憾。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思想和行为，无疑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审视。这个结论来自各方对《文明的冲突》一书及相关论文做出的不同反应，尤其是那些来自学术界和专业人士的评论。正如我们提到的，反响完全不是异口同声的赞同，事实恰恰相反，文化专家和地区研究专家向作者指出了无数的质疑之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向这些理论和概念发起了挑战。面对这些振振有词的批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对作者的论点表示赞同、欢迎抑或是有所需要的势力到底从何而来？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回顾一下导言中提及的一些注释。同样，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世界的各个角落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没有一个地方不会受到冲击，即使是发达的工业国家也不例外。人类历史上也一直不乏类似的阶段，芭芭拉·图赫曼在她的历史研究著作中，提到的“14世纪的谬误”便是一例。在那个时代，封建关系开始解体，资本经济替代了实体经济结构，一场触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风起云涌。世界末日情绪、宗派主义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1] 无独有偶，到了16世纪，世界贸易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首先在天文学上取得了突破，“地心说”遭到质疑，人类对宇宙有了更深的认识。欧洲的

---

① Barbara Tuchman，《远方的明镜－戏剧性的14世纪》，Munich 1982

宗教改革撼动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而到了离我们的时代相对接近的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西方社会。在宗教改革和反对宗教改革的斗争中，西方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基督教分化派生出两种信仰；而在工业革命中则出现了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

如今，世界在“全球化”的口号下正经历着一场伟大变革。[①]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变化过程，其中首屈一指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全面胜利。尽管它曾遭遇过诸多障碍。那些不久前在共产党国家还占据优势地位的计划经济，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盛行的保护和干涉经济体制，如今早已荡然无存，灰飞烟灭了。在这些国家，经济的传统形式——包括大型国企——即使还没有被排挤出局，也将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数以亿计的大众承担生活开支的方式，有了急剧的变化；同时，国际资本的流量和流速也呈激增态势。经济环境的变化速度也因此而比以前大大加快，情况变化之快，我们可以从1997年之前经济繁荣发展的亚洲国家那里获知。职位的稳定性，也就是我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现在几乎已经很少能得到保障了。便利的全球交通体系、通过互联网的全球化交流以及更大空间内的移民潮，使原本陌生、处于不同价值体系的人们可以更经常和更紧密地接触。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各自为政的日常实践都受到了挑战。

有些观察家在更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在单一民族国家的社会中——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新观点，他们提到了“第二种现代

---

① Lothar Brock/Mathias Albert，“国家世界边界的消失——国际社会发展趋势分析”摘自“Zeitschrift fue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2. Jg，1995年12月，第2期，259－286页

化”的概念，它和第一种有本质的区别。[①] 其他一些学者，包括我在内，则认为在全球化的实现上，需要由自然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联合促成一个新时代的觉醒。[②] 但这两种观点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这种变革背后的社会政治后果将是巨大无比的。

正确洞悉和把握这种变革的不确定性和巨大挑战并非易事，假如自我认同感发生动摇、物质生活基础出现问题，独立自主地完成自己的毕生理想就越显艰难。[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寻找新的方向，使自己有章可循，在这个千变万化、充满危险的世界能够找到出路。于是世界地图、价值标准以及行动指南便很受大家的欢迎。亨廷顿的书几乎完美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需求，他建议的世界观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编织模式，但却隐匿于深奥莫测的巨大背景中。他对历史、文化和哲学的大量描述、对世界各地无数事件细节的大量引用，使这个编排起来的模式变得非常有说服力而且具有权威性，对外行来说尤其如此。而书中无数的缺陷，例如我们前面列举的一些事例，或者被人忽视，或者被人排除；因为文稿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既真实可信，又严肃认真。这一点正是《文明的冲突》的精华所在，也是它的危险之处。

---

① Ulrich Beck，《何为全球化？——全球主义的误区》，Frankfurt a. M. 1997

② Immanual Wallerstein，《One World, Many Worlds》，New York 1988

③ DieterSenghaas，“在全球化和地区主义之间：为世界秩序辩论而书”，“Blaetter fue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93年第1期，10－59页

我们需要一种简单的国际政治理论吗?

奥克汉姆的剃须刀与理论的本来面目?

《文化的冲突》是用美国式科学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的产物。在美国，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中都追随一个取材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假设模式：理论的建立基于少数基本设想，它的内容应该简洁精确，以便能在现实中得到检验。但这些检验只能够暂时证明或者反驳这个理论，所有证明都是暂时的，因为不能排除将来某一个试验的结果可能会推翻这个理论。所以对科学家们提出的要求非常苛刻，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装点”自己的假设。因为只有不为诸多试验所推翻的理论才会被业界和公众认可，首先由卡尔·鲍伯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批评唯理论”，是从自然科学的经验演化而来的。①

就此看来，一种完美的理论应该建立在少量、简洁的基本设想之上，同时尽可能做到详尽的阐释。在审视各种不同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钟情于那些运用少量的假设就能涵盖同样内容的理论，简而言之：理论应该“言简意赅”。在科学史上，理论的简约性成为一种美德而得以广泛传播，这种科学精神以著名的后经院哲学家、现代科学的先驱——威廉·冯·奥克汉姆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奥克汉姆的剃须刀”。乌姆伯托·艾考（和肖·康纳利）在《玫瑰的名字》一书中，以其精湛的诠释永远纪念了这位大师。

不幸的是，现在许多美国的科学家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简约

---

① Karl Popper,《研究的逻辑》, Tuebingen 1969

这种美德的含义，他们将“婴儿和水”一同从自己的理论中泼了出去。在他们的理论中，不仅剔除了所有多余的东西，也同时丢弃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现实的理解认识，恰恰是必不可少的。世界政治的复杂性正在不断增长，然而这些情况在他们的理论和模式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和体现，而是缩减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对世界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变量和因素都脱离了我们的视野。

这种现象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实主义理论始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受人青睐的“宠儿”，它也正是《文化的冲突》这部书所宣扬理论的先导和原型。现实主义是以国际系统的无政府状态为前提，来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下面我们用现实主义模式来分析一下单一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竞赛。由于在这场竞赛中没有“裁判”，所以卷入其中的国家只能实施自救自保，以使自己能够在这种恶劣狭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积聚并增加保障权力的工具，其中军事力量的加强是最至关重要的。它们有时也和那些遭受同样威胁的国家结成联盟；或是加强彼此间合作，例如发展贸易关系以及相关领域的协作，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自己权力的资源。事实上，这样的合作不但是极少的，而且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冒险因素：因合作而产生的利益很可能在分配上存在差异。由于这些利益直接关系到权力的资源，每一次不对等的分配对吃亏的一方都是极其危险的：受益方很可能成为潜在的对手，经济上的有利条件将会为下一次交战奠定军事上的优势。同盟关系也只有在共同的威胁一直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持，今天的同盟者明天有可能成为危险的敌人。

“现实主义者”会用这个简单的模式来诠释整个国际关系，所有国家，不论它们是民主体制、独裁体制，还是极权体制；也

不论是福利和平国家，还是“严厉”的尚武国家，都遵循着同样的行动模式。影响国际体制的重要因素，即国家统治制度的对立性，都被简单归结为权力资源在各国间分配状况的差异。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根据以下模式：随着权力资源分配的改变，现存的平衡将被打破，有些国家因此而变得强大，而另一些国家则受到削弱；于是便会形成试图重建平衡机制的联盟。假如别无选择，这种“均势”的失衡便会导致战争。[①]

这个理论忽视许多其他因素，诸如国内政策、地区差异、国际组织——所有这些都被“奥克汉姆的剃须刀”无情地剔除了。[②]这里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与那些持批评态度和理性主义的科学学者的一个重大的不同，后者在生活行为准则和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中都得到了普遍印证：美国国际关系界的权威理论家们——从新现实主义者到塞缪尔·亨廷顿，虽然都竭尽全力挥舞着这把“剃须刀”，他们对持批评态度的理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即对经验进行考核的高要求还是远远没有当真。他们构造自我假设的努力似乎是中性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在尽力遵循律师的“游戏规则”：只收集对自己当事人有利的证据，至于棘手的不利证据，则总是视而不见。

所以在探讨理论的发展这个问题上，由托马斯·库恩阐释的历史进步论败给了科学革命论。[③]库恩认为，如果不能确定是否违背公理的经验判断明显地增长，科学世界观——包含各种范例——就会陷入某种危机。如果科学家们最初忽视了这种危险信号，那么他们就会努力使新的结论符合已经形成的判断。于是他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79

② Vgl. Robert O. Keohane (Hrsg.),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86

③ Thomas 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 Frankfurt a. M. 1973

们使支持这些设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公理再次得到确认，并对这些公理进行新的发展设想，同时使这些设想能够架设起与讨厌的经验判断之间的桥梁。理论中诸如此类的记号越多，理论也就越粗陋不堪。由此可见，一个充斥着帮助假设的“理论大厦”和“简约理论”模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正因为此，促使某些勇敢的先驱试图去改变那些基本的假设，在新的基础上尝试解释“不同的”试验数据。假如这种尝试令人信服地取得了成功，公理就会改变，这就是库恩的历史进步论。这个科学定律指出：在实践中对理论的缜密检验，才是科学进步的前提。假如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有进步，而这对旧公理的追随者来说也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于是，反对对任何既有公理进行修正的理论便具有了很强的免疫力。它导致的危险结果在于：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理论，常常是对政治行为具有某种帮助性的建议，或是为决策者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方针。然而，冰冷无情的“剃须刀”与不严谨的、受“律师意识”、党派影响的经验主义“眼光”相结合，却将他们坚决地扼杀了，然后自然而然地会将人们引向不全面的、带有缺憾的理论，这些理论的缺陷也就不会被发现以至于得到纠正。因为不包含在这个理论中的内容，将不会被提及；和这个理论相左的观点和依据，则会被置之不理。只剩下带有学院派色彩，庄严雄伟的“木雕精品”。受这些行为准则引导的政治行为将带有明显的反客观性且极具冒险性——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带来可怕的严重后果。

当然理论的极度简化，符合公众对经过详尽诠释、稍加理解就可粗知某种复杂“真理”模式的需求。恰恰是在美国，学院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领导者们有时甚至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在观看畅销书排行榜，以及那些被资助的电视谈话节目的收视调查。因

此，为了迎合读者和观众，简约成为一个前提。而用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眼光很难正确地解释现实存在的矛盾、突发的偶然性以及伦理和道德的灰色地带，更不用说世界政治现实的多样性了，因此这种从中间开始的“攀登”异常困难。于是“奥克汉姆的剃须刀”不知不觉中，从一个严格的科学器械变成了荣誉大厅里剪裁科学家们个人剪影的人为工具。

“我们”反对“他们”——过于简化政治理论的基本模式

不全面的理论无一例外地都遵循着同一个简单的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学摩尼教”。摩尼教徒是古代晚期某种宗教的狂热信徒，他们把世界分为对抗的两极。他们坚信，这两极之间的争斗——即光明和黑暗的对抗决定着世界的命运。摩尼教徒根据自己所拥护的派别分化为对立的两派，即“我们”反对“他们”。在政治学上，卡尔·史密特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将这一现象升华为政治学概念，并因此成为德国历史上该领域的著名人物。他也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王室法学家”，因为他为集权国家赢得了学术上的辩护。史密特认为，政治的本质是区分朋友和敌人，政治对内和对外的任务都是与朋友联合反对敌人。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为在对敌人不可避免的战争之中“磨快”政治工具，史密特推崇集权国家体制，因为他认为只有一个等级严格的国家才有能力在这个生存战争中幸存下来。[①]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也主张“我们”反对“他们”的思维模式，这首先表现在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中。阶级斗争被当作辩

① Carl Schmitt，《政治的概念》，Berlin 1963

证历史运动的必然阶段，在这个阶段，被压迫的阶级将彻底打碎旧的社会体系。从旧制度的废墟中将诞生新的社会结构，然后它们又会分化成敌对的阶级，相互斗争并继续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它将基本对立面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完全承袭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衣钵。当然，黑格尔把历史看做是“精神的”；对他来说，每一级通向前进的台阶都是先前对抗物的合成。与此相反，推崇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阶级斗争者则主张摧毁敌对势力。只有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才能引导人类达到共产主义的巅峰——只有当资本主义在这场战争中被置于死地，历史的进步才变得更有价值。从俄罗斯贵族被砍头正法到对“富农这个阶级进行全面肃反”，直至在喀图森林里波兰国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倒在苏联执行官的枪口下，这一切都表现出列宁主义理论运用的斑斑血痕。在斯大林主义者看来，东西方冲突是光明和黑暗的对抗，最后必将以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即使这场胜利必须借助原子武器才能取得。①

“对简单化的狂热崇拜”：美国历史上的“我们反对他们”

和上述由于理论简单化从而导致的血腥历史事实相比，迄今为止，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行为要相对体面得多。事实上，在世界历史长河中，还从未造就过这么一个对待弱小者相对如此“友善”，而且充满责任感的霸权主义者。这一点必然会在所有批评美国政治的言论中，受到支持美国基本潮流舆论的反驳，这在

① Sebastian Haffner,《剖析希特勒》, Munich 1978, 183－204 页

德国舆论的许多地方都显露出来。然而，“摩尼教”情结在美国的历史以及政治文化生活中确实有很深的根基。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国家，与不容异说、守旧、君主主义、宗教压抑感强烈以及受战争摧毁和蹂躏的旧欧洲对立起来，把自己装扮成罪恶世界里的“新耶路撒冷”。殖民地开拓者反对土著居民；北部各州反对南方各州；自由民主的美国反对野蛮的殖民霸权——这些都是美国历史上人们仍记忆犹新的时期，在这些时期里，不断暴露出“我们”反对“他们”的思想烙印。所有力量都被首先集中用于对付好战的德国皇帝威廉、然后是对付恶势力的畸形产物——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以及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日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使得美国很快熟悉了如何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历史任务和使命理解为：维护“正义”（诸如民主、人权），反对“邪恶”。

“冷战”的理论

二战后，伴随着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崩溃，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争端也随之而开始了，约翰大叔和战争中这个同盟伙伴的关系合乎逻辑地破裂了，在美国人看来，斯大林——这个红色政权的独裁者成为了希特勒的后继者。随着冷战的爆发和全面展开，差异很大的各种关于战后国际关系的论述，便被最简单的敌对论所取代了，这其中也包括外交官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在1946年至1947年间提出的，关于对苏联进行全面“遏制”的政策。凯南提出的建议是这样的，用政治和经济手段编织一个复杂的“网”，牢牢罩住共产主义扩张的“边界”以及“铁幕”后面的集权主义世界。但是没过多久，这种相对“柔和”的政策便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军事强权主义政治。

"冷战"理论和军事"遏制"政策的战略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①]这个理论对亨廷顿而言绝对是个楷模，因为它描绘出一张轮廓清晰的世界政治"地图"，随时可以给大家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为迷途者指点迷津。

"冷战"理论将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领导的"自由世界"；另一个是由苏联集权统治的共产主义阵营。其他一切世界事件都应该围绕这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垒展开。在"第三世界"，那些对跨国企业采取了国有化进程，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府，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以及一些社会主义政党——所有这些国家或政党都被视做带有某种错误的偏见并且走上了歧途，他们要么想成为第五纵队，要么沦为苏联共产主义所利用的白痴。而另一些反对共产主义的独裁统治者，例如西班牙的佛朗哥、菲律宾的马克斯，却被赞许为可靠的同盟者。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对于不结盟运动——即努力巧妙地穿梭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国家——则感到毫不理解。作为极端的例子，美国内部的反对派也同样遭到清洗：在 50 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那些被怀疑在某些方面同情共产党的美国左翼自由党人，受到了无端的政治迫害。其中牵涉人物之多、领域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从"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姆，一直到汉姆弗瑞·伯加特，无不在劫难逃。

事实上，作为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也曾经臣服于这种思维模式，于是当西方国家和亲美的第三世界（主要是拉丁美洲）在联合国占据多数时，美国就把联合国看做是一个可以利用摆布的工具。这种得益首先表现在朝鲜战争上，针对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这场战争，是美国及其同盟国在联合国的旗帜下

---

① Josef Stalin,《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Berlin 1952, 62 – 166 页

发动的。然而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反殖民统治浪潮的兴起，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中占据了多数，在投票表决中，它们越来越多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达成默契。从此以后，联合国便被美国视作国际政治反对派的势力范围，美国政治家们很快失去了对它的兴趣。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依然如旧。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 1997 年，美国国会表示，将拒绝逐步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高达 10 亿多美元的会费。这一点多么意味深长。

美国曾经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国际问题分析专家，他们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有时我们会对他们的独具慧眼拍案叫绝。然而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简单地将事物分为两类即“我们”反对“他们”的思想以及善与恶的较量等等观点，却一直在影响美国政界最核心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受人喜爱的罗纳德·里根总统，总是会给苏联戴上“邪恶王国”的帽子。在美国，对外政治中的简单化对政治精英们颇具吸引力，这也和美国政治文化及政治体制的特性有关。美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内引力”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美国拥有辽阔无际的国土，它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便会受到某种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极其有限。于是孤立主义的政治思潮一直占据着政治主流地位。假如一个总统想动员巨大的资源去加入一次世界大战，或是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对手进行旷日持久的争斗，或者在一个失去领袖的世界扮演领袖的角色，那么他就必须动用美国的国家财富——即在本世纪中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些财富。这对总统先生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难题，他必须有步骤地克服孤立主义的重重障碍，依次向衣阿华州的农场主、怀俄明州的畜牧者、德克萨斯州的炼油工人和芝加哥的女秘书们一一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缴纳的税款必须用于对外政策，而不是国内的福利；为什么美国

士兵必须为远隔万里的国家去冒生命的危险，广大公众有时甚至不知道这些国家究竟分布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很明显，这些艰难的说服工作只能通过粗略的简化才能得以成功地迅速完成。这样美国人面前便出现了一个危险、邪恶而且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像对付拳击场上的敌手一样，迅猛出击，置“他们”（敌）于死地——这种观念在美国的公众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在美国国际政治理论构成中追随“简单狂热症”，或是理论中表现出（对立两极的）摩尼教倾向，抑或是这些理论在政治精英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和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简单理论的高昂代价

“冷战”的理论在今天被认为是正确而成功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当人们在90年代高唱胜利的赞美诗时，却不得不尽力去排遣一些令人不快的“既成事实”，即这场“胜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过高昂。冷战中的许多东西其实是不必要的牺牲品，它们也成了那个时代的陪葬。造成这种后果的直接根源在于“冷战”理论的模式过于简单、行为太过极端。而由此带来的恶果甚至我们今天还能感受到。[①]

首先，由于美国把共产主义世界当做封闭的阵营，所以二战后，它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带有许多偏差，甚至完全忽视民族因素在中苏关系中的作用，眼睁睁坐视斯大林主义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因此它始终对中国遵循并执行最严格的各种“遏制”政策。在朝鲜战争和50年代中期的台湾海峡

① John Lewis Gaddis，“高级分析”，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1982

危机中，华盛顿甚至以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相威胁，受此影响，导致了两代中国人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以至于今天中国的杰出人士还是不断回顾中国19世纪的悲惨历史——弱肉强食，任人宰割的那些苦难岁月。他们的思想无不受到这种深刻烙印的强烈影响。所有这一切使得今天很难在亚洲地区通过和平的方式维持秩序。另一方面，印度的“中立主义”政策以及新德里谋求与莫斯科的友好关系也不为美国所理解和接受。这使美国和亚洲第二号巨人的关系至今还是烦恼不断。①

其次，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把苏联看做是封闭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所以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努力——艰难的“钢丝绳运动”产生了误解。事实上，面对领导层中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位苏联领导人试图通过内部的政治联盟来实施改革的举措。赫鲁晓夫实际上有兴趣缩减军备预算、控制军事力量，但五角大楼和白宫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假如美国能够少受限制地捕捉到苏联的这些变化，那么冷战的解冻应该可以更早一步实现；70年代的军备竞赛也许就可以得到避免。尤其是某些地区的人们不必为此而承担严重的后果，例如原民主德国（东德）的居民，在柏林墙建立以后，他们的自由受到了限制，而更可悲的是，在冷战结束的90年代，他们的生活水平仍停留在50年代，而所有这些都应该可以得到避免。②

最后，由于美国总是自然而然地将民族解放运动划为莫斯科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种错误的认识使美国政府严重扭曲了越南内战的性质：他们没有把战争看成结束殖民统治之后

① Richard Ned Lebow/Janice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1994

② John W. Lewis/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1990

的民族统一战争，而是把越南革命党人当做共产主义扩张的马前卒，是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这个根本错误的判断将华盛顿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无谓、血腥而失败的军事行动，越战的铩羽而归严重损害了美国在第三世界以及盟国年轻一代中的权威；同时也使美国社会遭受到深刻的创伤，以至于到今天大家还能感觉到这道深深的裂痕。这场无谓的战争使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和几百万东南亚平民丧失了健康甚至宝贵的生命，然而换来的却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新越南，西方彻底丧失了对印度支那半岛的影响力。但是理论家们预言的“多米诺效应”并没有因此而在这一地区出现：东南亚国家并没有一个接一个地倒向共产主义，相反，尽管它们当时大都陷入了危机，但是最终却成为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越南告别了共产主义，努力希望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赶超自己的邻国。①

结论：所谓成功的“冷战”理论由于其致命的缺陷，带给我们的其实是沉重的代价和难以短期愈合的伤口。因此把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胜利”归功于它，那简直可以算是一个笑话。其实，70年代早期的缓和政策使世界格局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尼克松通过对中国“改变世界的一周”访问，使缓和政策在亚洲取得了成果。美国因此得以继续推动这一地区的缓和，军事遏制才可能让位于军备收缩和经济合作，才可能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苏联的东欧盟国。缓和政策的作用加深了社会主义阵营里各个国家、团体的鸿沟，同时也使党派成员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在“第二次冷战”的插曲之后使“戈尔巴乔夫现象”成为可能。但这绝不是冷战理论简单化的功绩。

“假如不是文明的冲突，那又是什么呢?”亨廷顿提出了这样

① Oleg Grinevskij，《解冻时期》，《缓和、危机与新的冰河纪》，Berlin 1996

的问题：人们当然会批评他的理论中与事实和自然科学相悖的地方，他也坦率地承认，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解释一切——那么我们不仅要问：除了他的文明论，还有什么其他理论可供大家选择吗？——能用消除敌意和对抗的简单方法，自告奋勇地更好地解释这个世界。[①] 亨氏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假如说无法解释“一切”的理论是空洞无物的废话，但是同样，一种忽视大部分国际政治现实、不准确地信口开河和充满胡乱预言的理论也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因此寻找一种可以解释一切、同样简单的其他理论就显得多余，因为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存在，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寻找它。在“我们”反对“他们”模式的理论中——这出现在亨廷顿《西方和其他地区的对抗》一书中——，在阐述关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些理论时，无不以葬送真理为代价来维护其简约的美德。它们都简单朴素但同时谬误百出，它们总是在似乎令人信服、使人容易理解的指导原则中开始，而在军备竞赛、战争和屠戮中结束，这样的理论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应该给我们提供些什么？

“奥克汉姆的剃须刀”如果掌握在一窍不通的理发师手里，那肯定存在着随时滑落带来致命刀痕的危险；或者用亨廷顿自己的话说，一张简单的地图只有在可以通过它了解实际地形的情况下，才算是真正有用的。每一位登山者都知道，只有比例为1:25000的地图才会对自己有所帮助，在无路可寻、峭壁林立的

① Leslie H. Gelb, The Irony of Vietnam: The System Worked, Washington, D. C., 1979

地带（即在最坏的情况下），粗略比例的地图只会径直将人带人深渊。在国际关系中，理论的作用就好比地图，它对在现实的险峰上攀登的我们具有指导意义。

正因为此，国际关系的理论应该做到，将所描述和解释的内容与现实的广泛性相符。这当然不是说它应该将现实的每--部分细节都照实描摹下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现实的完全反映，而对我们毫无帮助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求，影响国际政治重要进程的所有因素和变量，在理论中都应该被考虑到。如果只用一种不恰当的标准比例将世界缩小，那是根本行不通的。[①]

我们应该期待这样的"全球化"的进程：全球性的资本大流通；现代科学技术的最广泛传播；内在依赖的全球生态系统得到保护；跨越国界的传媒浪潮的兴起。我们可以要求，政治组织的形式——国家和它们的国际组织——得到有效评估。国际关系活动家的队伍应该围绕着重要的非国家组织——例如跨国企业和非政府机构——进行展开。同时，历史性因素和文化决定的价值体系也最终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

国际关系的理论应该充分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今日世界的"非同时性的同时性"，它是由全球化的强烈过程而引发的。简单化和简约性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点金石——即使它们可以为美国的媒体或者政治文化生产出畅销的产品，然而对于国际政治分析来说，简单化则是一种不幸。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一个给我们带来危机和挑战的世界，当然也需要一个多元化的观察视角。

① Samuel Huntington, If Not Civilizations, What?, in: Foreign Affairs, Bd. 72, 1993 第5期，第186－194页

第二部分　理　　念



1

文化、文明、国家和社会

我们究竟对“文化”（Kultur）这个意义深刻的词该如何理解呢？首先我们会发现，在德语的习惯用法中，“文化”（Kultur）一词表达的意思，在英语或法语里也同时表达了“文明”（Zivilisation）这个词的意思。也就是说，德语中“文化”的概念区别于其他的这两种语言，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基本反映了在形成不同思想史的土壤上，由于吸收的养分各异，产生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我们的欧洲邻居以及美国人认为“文明”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用于克服生存问题的社会工具总和：包括经济方式、有影响力的社会关系、政治上的社交举止、移民体系结构、教育体系，同时也包括宗教、价值体系和美学。总之，文明是涵盖社会实践的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那些具有共同重要特征的社会实践体系，则应该被视做相同的“文明”群体。

在德国，“文明”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本土化”，其原因在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受到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对“文明”一词的概念和行为理解产生了偏差，并且观察的眼光也很狭隘。而正是这个社会阶层对“文化”（Kultur）这个词在德国的意义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德国，市民阶级的任务并不全是社会实践行为。除了参与政治和经济实践，他们还致力于秘密或半公开范围的“真、

善、美”行动[①]，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力量。因此在德国直到今天，只要提到“文化政策”这个概念就会使人立刻联想到歌剧、绘画、文学等等，而绝对不会是科学技术。奥斯瓦尔德·史潘勒曾著述过一部阐述文化和文明产生与消亡的重要德文著作，他把文明理解为文化的衰变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人口的城市化，人们致力于生活的实际状态，尤其是商业，而不再是精神、美德和艺术——一种非常独特的德国式理解方法。[②] 相反，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国度以及法国，这个阶段发展起来了解放的市民阶层，他们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力，成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主体。这儿人们只是从“文明”的概念上，来考虑一个时代的整个重要特征，而没有考虑各民族生活范围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在“文化”这个概念中的内涵。

很显然，对于该如何理解“文明”的意义这个问题，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传统思路比德国式的思路更具有说服力，它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的所有“保留剧目”，这种看法有利于在一种文明下和平相处的民族，在生活和生存问题上得到保障。它涵盖的意义远胜于德国传统上对于“文化”的概念。用这个更贴切的概念来理解描绘人类的“美好”行为是整个“保留剧目”的一部分，假如没有这一部分，这种“美好”行为就很难在历史事实中被人理解。

① Juergen Habermas,《社会结构转变——市民社会范畴调查》，Neuwied/Berlin，1968

② Oswald Spengler,《欧洲的没落》，《世界历史地貌轮廓》，Munich 1980；Bassam Tibi 开创了另一套体系，他认为文化体系具有地方价值，而文明的涵义更广泛，具有更一般的价值体系（例如存在埃及文化，伊斯兰文明）。而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似乎不太好区别，这里不太好理解。Bassam Tibi,《文明的战争》“理智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政治和宗教”，Hamburg，1995

动物依靠自己的本能努力生存下去，而人类在生物性的直觉方面确实不太灵敏。于是他们用“文明的仪器”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主要的表现是“集体概念”的产生。面对自然的挑战，人类如果要生存下去，就首先必须积累作为物质生活前提的生存经验，进行集体协作。它大体上是指社会分工的形式，诸如统治方式、抗御外界危险的安全措施、平息争端的方法、如何组织年轻一代参加某种社会活动等等——如果一个社会团体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准备好所有这些条件。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关系中要认清自己的方向，协调好自身的行为和人际关系，否则社会团体之间的团结就会被打碎。对于自己行为方式的意义，人们必须培养起相互一致的看法，使得这种关系协调得以成功。此外，我们不能每天只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面对各种不同的状况和挑战，我们需要随机应变。即使对于突如其来的事件，社会成员也必须能够迅速做出应对之策，而不会使整个社会组织有陷入瓦解的危险。因此为了使自己具备良好的、必要的适应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普及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文化传播）肯定是必要的。在此方面，经济方式和科学技术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发展到现代文明，都与这两个社会变量的不断变化息息相关。假如忽视它们的作用，人们无疑会在机器时代里束手无策。想象一下，19世纪早期的人们假如生活在我们今天的电脑世界里，该会多么吃力。很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地强调“物质”决定“意识”，无疑有些过于片面了。事实上，正如科技和经济方式对“文明”产生的作用力一样，人类的价值体系也同时影响到我们对待科学技术影响力的态度，这种相互影响绝不应该受到忽视。但是，假如不认真注意观察一种“文明”的技术水平以及它的经济发展过程，却

想要理解和评价这种“文明”，那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有些荒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德语里“文化”（文明）这个词概念的缺陷，它把物质当做阴暗的东西而摒弃，完全醉心于精神世界。

我们发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英文原版中，“文明”(Civilization）这个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与德语传统中“文化”(Kultur）一词的意义相同，这一点不禁令人大吃一惊。他对“文明”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价值体系，同时还把宗教作为举足轻重的划分标准，在这种有局限性的利用中其实隐藏着一个“秘诀”，它使我们相信他的理论与现实世界有这么多的相似点和适应性，而对于亚洲、日本和西方之间的所有共同之处都被悄悄忽视了——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地谈及这个问题。

其实从这种认识出发，我只能使用“文明”的概念与亨氏进行理论，但是这对准确无误的阐明我的观点毫无益处：亨廷顿的思想都是在“文化冲突”的标签下出笼的，要想忽视这个事实恐怕是愚蠢的。在语言惯用法方面，我既不能认可德语的传统用法，也不能同意亨廷顿的习惯用法。我在本书中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我指的是英文中“文明”（Civilization）的意义，我希望，这盘语言的色拉不要将读者搞得太糊里糊涂了。（因这是一本写给德国读者的书，所以牵涉到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东西，才会有作者的这番话——译者注）

假如我们想完整地描述一种文化，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到以下的各个方面：技术的发展水平、经济 方式、政权体制、社会阶层的划分、法律制度以及价值体系。在这个问题上，迪特·森哈斯提出了一个“六边型”理论——促进文明的六边型。他把这作为标准意义上引导社会前进的行为准则，这个六边型的六条边包括国家的权力垄断、法制体系、民主参与、非暴力矛盾文化、社

会公正和感情控制。[①]最后这个概念表明，教育和社会化也是一种文明不可抗拒的组成部分。

现在，只要我们看一看这些社会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影响，就马上会豁然开朗，这里并没有任何文化停滞不前的迹象：各种文化总是在不断地交汇前行，它们不断发展、不断改变各自突出的特性——大多数时候这种变化非常缓慢，但有时也会突飞猛进，产生质的飞跃——我们可以将它们理解为文化的重构和重建，这是一种自我完善的发展过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因为不同的文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而固执地将它们对立起来，预言它们的冲突和不可调和性。

现代化——文化的挑战

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对文化的相对静止状态进行研究的方式，或许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那时候大规模的移民现象既不普遍、也不频繁，各文化圈之间的接触和交流相当有限，它们之间的时空距离也非常遥远，当时，交通工具以及各种通讯工具不但少得可怜，而且传递速度也非常缓慢。所以文化间相互影响的机会也就极其有限，除非通过积极或者消极的征服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从相对静止的差异出发，根据这些差异大胆地对政治前景做出预测，可能会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然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人类社会在短短的几代中就变更了很多显著的文化特征，有时这种变化甚至发生在一代人之中。电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以铺天盖地之势进入我们习以为常的生

① Dieter Senghaas，《世界将走向何方？——论和平共存的未来》，第 20 - 34 页，Frankfurt 1994

活；它在许多方面为我们制定了新的标准——诸如知识结构、获得知识的途径以及知识的更新换代，面且它在短短几年内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通讯方式——所有这一切都属于重要的并且是新的文化特征。

电脑是迄今为止人类攀登的“冰山顶峰”，换而言之，它是已持续了二三百年的现代化革命的一个阶段。西方从文化的启蒙时期开始进人现代主义，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震撼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同时代的文化都是与这种宏伟的、历时几世纪之久的现代化过程进行“争辩”的产物。反对这种进程、梦想回到真正“黄金时代”的尝试，是所有倒退思潮具有的基本特点。它们或许激动人心，也可能惊世骇俗，但肯定是徒劳无益的。

现代化将深入到社会根基的一系列过程连接在一起，货币经济的凯旋队伍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这个链条上还包括技术时代的一系列成果，它们彻底变革了产品结构和生产系统。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使社会的基础领域产生分化，使人们突破地域和社会关系的限制形成专业分工：人们不再受土地的羁绊，也不再受他们的社会阶级、阶层、等级或身份的限制。政治统治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革，从宗教基础中剥离出来，政教实现分离。管理变得官僚主义化；法律“合理选择”了自己适用的社会范围。实用主义和适宜的礼仪成为得体的行为规范，人们行事的目的不再出于宗教教义的规定或是习俗的原因。现代化可以包括所有这些特征或者其中的大部分。而那些只是部分受到现代化冲击的社会，例如从前的殖民地国家，他们有的陷人四分五裂，在民族和种族问题上纠缠不清，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重新达到平衡。

现代化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挑战，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很难和这种快速的变化达成一致，这种变化在短时间内就铺天盖地地向它们袭来。社会统一和政治稳定可能会被这种挑战所摧

毁，现代化打破了缓慢的文化进化过程，促使它飞速前进。文化的惯性虽然很大，但它还是无法经受住现代化猛烈的、强制性的冲击。所有文化都被卷入快速并且是痛苦的转变漩涡之中。

现代化和文化的转变：以德国为例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价值体系以及它们和其他活跃的文化要素的相互影响，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坚持一成不变的文化概念不但不能使人信服，有时甚至还会产生灾难性后果。我们马上以自己的国家为例来检验一下：19 世纪的德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专制统治的国家，它的价值观念极其保守，勤奋、纪律、服从、承认权威、家庭责任感以及勤俭节约是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价值观念。[①] 当西欧和美国实施自由贸易以后，尽管魏玛时期有过短暂的放荡不羁的快乐时光，但德国社会的主流，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及中、上阶层的大多数人还是死死抱住传统的价值标准不放，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哲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等级划分，纳粹分子应运而生，魏玛共和国的立宪原则才没能形成深远牢固的影响。[②] 纳粹分子进一步利用这种价值体系演变出一幕可怕的恐怖剧（也因此而毁坏了战后的几代人），他们在凶残的行为中销毁了旧社会的根基和价值体系。

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在本世纪 20 年代，那时“西方”的

---

① Thomas Nipperdey，《1866－1918 年德国历史》第 1 部，“工作世界与市民精神”第二、四、十二章，Munich 1990；Hans－Ulrich Wehler，《德国社会历史》第 3 部，1849－1914，Munich 1995

② Heinrich August Winkler，《魏玛共和国 1918－1933》：“德国首次民主的历史”（第十、十一章），Munich 1993

概念还不包含德国，这种观念不仅在德国如此，甚至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里也存在这样的疑虑——德国究竟是否属于它们的文化圈。在德国本土，那些保守的知识界人士明确坚持自己国家和西方文化的距离性，他们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是堕落和非德国化的象征。第三帝国的建立更加深了西方国家的这种怀疑——西方文化制度能否在德国的政治、法律和价值体系中立足。英国在二战的战争宣传中将德国敌人称为“野蛮的匈奴人”，即以论战的方式表达出对德国文化背景的质疑。

二战后，英法美和苏联的军队分区占领了德国，在西部德国美国支持的阿登纳博士成为这个被战争严重摧残国家的领导者。阿登纳执政时期，西方世界逐渐消除了对德国文化的不信任感，西德成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亲密伙伴”。同时，阿登纳在国家内部进行了有限的部分文化修复工程。“旧的价值哲学”重新成为行动的表率，但作为对战后重建这样巨大工程的动员方式（思想准备），这种文化的部分复苏是绝对必要的。对于较年轻的一代人，由于经受了如此的时世变迁，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当然会出现问题，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为纳粹分子而变得名誉扫地。68 年的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对西方价值的反抗行为，虽然它披着政治的外衣。今天标志联邦德国文化的自由思想，就是根源于这个时代。当然，如果人们将“旧的价值观”统统抛弃，而没有认真考虑其中的某些部分是否对社会有益，换言之，如果我们将完成生存任务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不加筛选地全部摒弃，那么我们终将会为此而自食其果。在如今这个变革的时代，以前被人们所唾弃的“次要美德”可能现在变得有用起来了——但是这些美德能否得到恢复还成问题。

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尽管德国人的价值体系受其政治和社

会历史的密切影响，但在很短时间内却经历了彻底的转变过程，从而使德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坚实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判断并非是永恒的，而是受到时代的严格限制。

现代化和文化接近：以日本为例

第二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战败者，同时也是战后重建的胜利者。从表面上看很清楚，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毫无相符之处；日本在高度保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的前提下完成了现代化。然而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今天日本文化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并非是完全陌生和毫不相干的文化圈。

日本从江户时代（詹姆斯·克莱威尔斯在他的畅销书《幕府时代》中描写了德川家康这位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开始就决定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并且对与“其余世界”的接触实施了严密的控制。德川的目的在于保持日本社会独特的文化特征，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统治不受外界的影响。随着武士阶层转变成一种固定的、守纪律的官僚特权阶级，他们也同时奠定了一种对日后的现代化极其重要的前提。1853/1854 年，当美国海军准将伯利用武力强迫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日本敞开大门时，幕府制度终于陷入了瓦解。在这种经历的打击下，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即从上层开始，坚持不懈地实施现代化改革。由于这个过程受到统治者的操纵，所以日本政治体制遗留下来的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尤其是等级制度，包括最严格的隶属纪律、庇护关系和高级军衔嘉奖制度，同时他们对牺牲精神、勇敢无畏以及无条件服从的品格推崇至极。

当然，在明治维新时期或三四十年代裕仁天皇时期的日本，我们表面看到的只是社会变革的现代化迹象。贵族——尤其是武士阶层——和非贵族之间的严格划分被废除。在经济和管理领域的高层组成方面，它的体制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这一时期，经济活跃分子接近政治权力的通道不再被严密地封锁了，因为在现代化实现之前，只有政治和经营管理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变，经济现代化在重工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也就是统治学，当权者无法拒绝经济学专家们的鉴定，因此国家和社会不再适应"大和文化"纯粹血腥的等级理想。

地区性强国日本需要一支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平民百姓被培养起尚武的习俗，尽管这种风气只是盛行于极度守纪律的日本军队范围内。这样似乎终于可以消除日本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但这和一直流传下来的尚武贵族和无武器平民之间的阶级划分不能协调一致，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受到影响力持久的现代化进程的震撼，尽管它尽了很大努力，但是也同样无法完整无损地拯救"大和文化"。

由这种现代化决定的社会必将推陈出新，尽管统治阶层试图将日本的传统文化尽可能完好地挽救、存留于现代社会中，但却陷入了不可化解的矛盾之中。这种传统主义是从稳定巩固统治的目的中产生的，20 世纪 20 年代自由进化论在日本初露端倪，新闻自由和蓬勃兴起的工会运动危及了当时的政权，由此产生的日本社会的紧张形势，只有通过转嫁到外部才能得以缓解，于是近现代的日本成为一个对外拼命扩张的国家，忙于快速地将军事力量调往国外——朝鲜半岛、中国，最后扩张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借此来缓解紧张的国内危机。但是所有这些和日本没有遵循西方模式实现的现代化毫不相干，相反，日本之所以陷人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正和德国的好战势力一样，并不能表明是自己选择现代化特殊道路的一种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残酷事实，对日本文化意味着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军国主义势力因为战败而大大地受挫，遗传下来的“武士门阀”等级社会的重要特征也因此而名誉扫地，不再受到人们的拥护。在美国的促进下，保守甚至带有独裁色彩的多党派民主在政治上也得以引进。它虽然没有完全消除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但是却提高了它们的多元性和渗透性。“西方”文化的重要新元素“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被引入了日本国内，虽然论资排辈仍然一直是选举领导职位的主流标准，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较为年轻的中坚力量加入领导阶层，越来越多的女性精英也变得引人注目起来。长期以来，庇护关系成为日本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们却忽略了这种庇护关系只在大企业中起决定作用。而在中小企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是资本和劳动量的比例，这一点和西方模式没有重大的区别。现在，全球化似乎也要推动日本经济界的巨人们——那些大型企业——逐渐把这种庇护关系转移到它的雇员和职员身上。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日本还没有完完全全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欧洲和美国产品渗入日本市场的时候，还始终存在着“文化”壁垒，尽管这道栅栏并非绝对存在，并且可以通过目标明确和设计周密的市场策略得以逾越。很久以来，以普遍存在的工业部门的集约管理为代表的政治行政管理体系，和大康采恩之间的共生关系一直存在，假如我们将150多年前幕府时代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日本和今天的民主化日本依次和西方社会进行比较，我们看到的是这两者日益缩小的差异。当然，今天的日本绝对不属于欧洲社会，但是文化特征方面的共同之处却比过去增加了许多，今天还行之有效的现代化进程仍迫使日本向西方文化接

近，虽然它会因此做出巨大的牺牲。①

现代化和多元化的开始：以中国为例

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却令西方文化圈倍感陌生的巨人当属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拥有 5000 年的文化传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现在还一直处于共产党一党体制和中央集权统治之下。许多人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惟一的真正可以和西方社会抗衡的力量。在亨廷顿看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证明：一个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家也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他认为，中国在 21 世纪将是一切冲突的中心。

中国再也不可能像日本或者前苏联那样进人现代化社会了，这两个都是在重工业占据优势的时代完成了这一进程，那一时期为中央分配和严格的等级划分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世界已是今非昔比，人类已进入后工业时代。假如中国希望变得具有竞争力或者保持自己的某些优势，希望在将来仍能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就应该努力适应电子商务时代的要求。② 今天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秘诀无疑是通讯，假如不能融入信息交流的电子网络系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参与这场竞争。中国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痛苦地并且是被迫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尽管在许多领域所采取的政策与它的政治体制格格不人，比如说互联网的信息自由与新闻的检审制度难免会有冲突。但是，今天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科学家参加了电子科技方面的专家论

① W. G. Beasley,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1990; Manfred Pohl, Japan, Munich 1991

② Vgl. Kap. III, 2

坛，无数大学生和科学家从互联网中汲取了大量的有益信息。

中国正坚定地实施经济私有化的战略；划分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并采取了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勉强开放了全球电子交流的信息领域，这三个过程迫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不断受到挑战，尤其是统治方式。[①] 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中国的变化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而且还将继续保持这种变化的过程，尽量以与 5000 年古老社会相适宜的速度向前行进着。日本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过程是不断增加的某种压迫所致，同时通过激发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抗争来稳定国内政治统治，但是这在中国却行不通。今天外部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必须建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与外界的广泛联系沟通基础之上，所以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它的市场，否则其现代化进程就会遭受挫折。

我们可以对中国做出这样的预言：文化特征将逐渐和西方文化接近。当然，我们无法预言的是，这个进程是否可以毫无困难、毫无冲突地完成。现在我们不得不提到由各个国家组成的世界。

文化和国家世界

“文化”是怎样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活跃因素的呢？这个问题自然马上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国家”这个概念。20 世纪末，以领土划分为标志的国家是最主要的政治组成，并因此而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活跃分子”。即使国家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它们也以惟一的方式和权力元素相结合，这种组合是它们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 - 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1985

的“竞争者”——那些跨国大企业、国际组织、有组织的国际犯罪集团——所无法比拟的：来自税收源源不断的财政资源、训练有素的军队和警察资源、秘密警察的信息资源、户籍管理机构、公安调查机关和统计机构、立法权、执法权和判决权等法律资源以及国家行政组织资源。这些权力潜能随着国家的大小以及其组织机构的效能而变化，它存在于每个国家的“核心”之中。统治者可以有效进行使用，如果国家不希望听任自己的政权坍塌或者毁于内战的话。①

基于此种原因，行使权力并想赢得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必将促使军队及其相关的政治活动迟早要掌握国家权力。它们或者夺取现存的国家权力，或者参与国家的权力核心，或者把领土分裂出去，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事实上所有重大的武装斗争，不管它们从本质上是出于伦理、宗教、社会还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但都会遵循这个模式。

相反，文化因素绝对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它在国际政治方面不能直接发挥作用，所谓的文化冲突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罢了，它描述的并非是司空见惯的政治现实。政治世界无疑具有一种有形的特征，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国家的领土疆界的划分上：国家以地理的事实而存在，由统治者及其国家机器的存在来体现，如果有谁忘却了国家的有形存在，那么维护国家权威的警察和军队会很快提醒他，让他体会“痛苦”、付出代价。

如今，国际关系理论中时兴的后现代主义，在学术讨论中努力将国家的概念减少到一个纯粹的结构形式②，当然，根据各种

① Yale H. Ferguson / Richard W. Mansbach, The State, Conceptual Chao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oery, Boulder / London 1989

② John her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1959; Robert jervis,《合作与安全的两难境地》, World Politics, Jg. 30, Jan. 1978, 167-214页

公约和条约而形成的现代国家格局，其疆界也可以另行重新划定。但作为现代政权国家具体存在的客观事实，必然要求国民的大多数在日常生活中承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这并非后现代主义的构想，马克斯·韦伯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国家明确的、有形的存在，对于试图改变它概念的思潮则显得非常“抗拒”，因为国家的这种特性是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绝对必要的前提。

与此相反，文化却缺乏这种有形的特征，它的确存在于人类社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中；并且不受一定的领土或种族的束缚。操纵人类行为的文化标准完全没有写进任何一部法典，即使那些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宗教圣经，也只是包含了极小的一部分文化内容。所以文化和政治适用性之间的桥梁完全是“体现”之路。就像某些传说和童话中描述的，幽灵或魔鬼必须附着在人体上才能在有形的世界中有所作为。

亨廷顿对这一点也很清楚，为了赢得观众，使自己的话具有说服力，他找到了一个“诀窍”，即给每一个好战的文化区域都提名一个核心国家，使无形的“文化幽灵”附着在有形国家的躯体上。属于同一个文化形态的其余国家都聚集在这个核心国家周围。虽然亨氏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概念，但是这里显然有一个传统的霸权国家联盟的设想，其中的核心国家——比如美国在北约中的地位——扮演着政治领袖的角色，而同文化的其他国家则或多或少地自愿成为其追随者。随着这种轴心和周边的布局形成，文化终于能够获得自己的领土主体和参与国际政治的能力。但是亨廷顿使用的这个高超腾挪手段真的能令人信服吗？

国家世界的能动性

事实上，各个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和风格，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国家世界是以特定的、结构上的前提为特征所组成的集合，这因此限制了各个国家及其政府行动的“自由自在”。这种结构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安全的困境”。由于国家世界体制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法官可以对国家间的事务进行裁决，判断国家的行为是否公正合法。每个国家必须自己负起保持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责任，并使自己有能力免受外来压力、勒索和威胁。现在的问题在于，国家自身的防护措施往往会被其邻国看做是一种威胁，并因此而做出对应的举措。但是假如它们放弃这些自我防护的措施，以表明自己和平相处的意愿，那么一旦邻国中不幸出现了好斗的“强盗国家”，它们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在挑衅性的扩军备战和“与人为善”的和平政策之间，国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它们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可能会推进毫无必要的军备竞赛、引发军事危机和率先发动战争，或者也有可能引起强大邻国的进犯，而自己而对强敌却无力自卫。[①]

“现实主义者”认为：只有自救才是惟一的出路，各个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顶多有时为了对付特别危险的侵略者，而与别国结成暂时的同盟。所幸的是国家世界体系已发展起完备的可供选择的各种解决途径，各个国家学会了分辨侵略行为和公正行为；学会了对和善的信号进行释义并表示理解；学会了用控制

① 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1500 年至 2000 年的经济变革和军事冲突”，Frankfurt a. M. 1989

军备摆脱安全困境的有效方法。而另一些国家出于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而努力推动一体化进程，希望借此彻底解决安全隐患问题。

当然，“假如好斗的邻国不喜欢这些可供选择的途径”，那么这些措施也就无法实行。因为实行这些措施需要必要的前提条件，即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国际法的平等原则能够真正得到普遍认可。否则，具有威胁性的霸权行动会直接将国家世界带回“自助”的老模式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地区强国试图赢得对其伙伴的优势，夺取领导权，那么所谓的合作安全政策很快就会陷人死胡同。如此一来，假设的“追随者”会感受到威胁，“均势”理论的合理性“无情”地开始生效:受到威胁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自以为是的霸权者。如果它们共同的力量还是无法与这个强国的权力抗衡,人们就会在这个地区以外寻找合适的同盟者。

至于为什么在感受到威胁状况下，均势原则会将不同文化间的壁垒打得七零八落，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原因可以解释清楚。翻开人类历史的长卷，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它基本上是和国家世界的“历史经验数据”有关，若文化想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就必须借助于它。在均衡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国家组织（联盟）的行为准则，而在各个国家身后所代表的文化则放弃了本身固有的规律性，假如不是如此，坚持文化规则的那些国家，在国际力量竞争中将很快变得束手无策，败下阵来。如果说文化的“相似性”可以使均衡规律失效，我们目前还无法找到充分合理的论据。历史上，均衡体制和对内联盟将属于同一文化圈的国家相互对置起来。[1]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要一一谈及。事实上，所

[1] Helmut Willke,《国家魅力的丧失——关于社会控制理论的思考》, Koenigstein 1982;《国家的讽刺——多元化社会国家理论的基本路线》, Frankfurt a. M. 1992

有亚洲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迹象都表明，这个不变的政治规律在那里正起着关键作用。

然而，亨氏关于文明的“核心国家”的论述还是不具有说服力，按照他的思路，每个文明的核心国家除了在行为上应该代表它所属文化圈的文化外，同时它还必须具有统治文化圈内其他国家的能力。假如国家范围和文化界限不是像印度那样完全重合，是在同一块领土上，那么要达到上述目的则只能依靠下列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其一，通过一个相对“友好的”、而同时又不太具有威胁性的“霸权者”，来实施这种控制。这位“霸权者”必须在周边地区占据绝对的优势，对它而言，反抗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个规律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在北美洲的地位。其二，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由于所谓的文明“核心国家”都相对不是那么强大有力，如果要达到控制目的，就必须通过施加压力的办法，必要时甚至需要使用武力。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国家间的联盟，共同反抗自视甚高的文明核心国家的管辖和控制。这种联盟会使其所代表的同一文化出现裂痕，进而恰好阻碍核心国家实施对文化“大有裨益”的政治事业。更糟的是，假如在这个文化圈内各种势力分配不均，不能达到一种均衡，那么有些国家很有可能会超出文化的界限与该文化圈外的国家形成同盟关系。

按照“文明的冲突”这个理论思考下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在这个系统中，只有在某个文明中占据优势的核心国家周围形成文化联盟的均衡状态时，这种演变过程才是可以获得系统认可的惟一过程，这是整个亨氏理论大厦的一块基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与此相应的反作用力肯定会促使产生对向运动，以阻止这种结果的产生。其后果是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上的作用受到削弱，因为在现实世界里极有可能形成超越文化范畴的

国际联盟，国家世界的“自我活跃”法则消除了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国家和社会

在最近的政治学研究中，国家这个概念的意义变化显然成了众人谈论的焦点。在今天，“国家”已是今非昔比，它曾经固有的许多品格特性早已荡然无存。意义的丧失、内涵的缩小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国家的新概念不再能带来人们所希冀的统治控制成果。与社会和国际因素相比，它的影响力骤然下降。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进程又加速了国家正在“丧失的吸引力”。[①]

毫无疑问，确实出现了这种“丧失吸引力”的状况，然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准确判断，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上，肯定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主权国家存放到历史的档案柜里，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和权利资源相比，“国家”不断“令人钦佩地”铲除可能对自己产生威胁的敌对势力。当然它现在的主权不再能与专制国家的主权相提并论，其全部的力量投人能力也无法和希特勒以及斯大林的集权主义国家相比。但是，现代民主国家作为单一的国际活动家也积极参与了一切重要国际问题的决策网络，包括在确定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在经济领域、金融领域；在教育事业和技术发展方面；在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当然，国家的这些活动中，并不总是处于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并且也不是永远造福于社会的。尽管如此，国家总能对社会产生其影响力，无论好坏利弊，也无论大小强弱。

---

① Ernst－Otto Czempiel，《变革中的国际政治》，第 2 版，第三章，Munich 1996

“国家”的意义一直集中体现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两个方面，每每提及这两方面，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国家”的孪生关系，它们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撇开国家这个概念大谈外交和安全政策，无疑是愚蠢可笑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的，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确实有逐步增强的趋势。尽管这些因素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实现国家世界的利益。今天的各国政府，尤其是一个以民主宪法为基础的政府，绝不会像马基雅维里（15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后马基雅维里主义”成为使用权术、政治上不择手段的代名词。）提及的封建王侯那样，为了谋求利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放任自由地行事。今天的各国政府必须深入研究非国家因素的作用：如果没有世界银行的参与，我们就根本无法制定国家的国际财政政策；如果没有产油国的共同参与，就无法保障世界能源的合理供应和调配；为了创建禁止化学武器的验证体系，政府必须参与到化学工业中去；在国际环保政策的制定中，一些科学组织或者国际生态保护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促进作用也不容忽视。通过这些我们发现：以各种“活动家”的身份和面目，“社会”因素——间接然而也是可能地——已经坐到了今天的谈判桌前，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在国际政治中，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影响力还可以通过第二条途径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公众和利益集团可以对政府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假如没有80年代对大规模裁军的舆论呼吁以及和平运动，可能就无法让固执的里根政府从“星球大战”的狂想曲中，这么快就回到裁军的谈判桌前；克林顿总统突然之间做出有利于北约东扩的决定，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归功于波兰移民的有效活动，这些波兰移民主要是居住在民主党的重要阵营之一的芝加哥以及附近地区；

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国家对国际生态环保采取支持政策，也主要与其国内存在着势力强大的环保组织有关。

换句话说，政府对外所代表的“国民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集体讨论的结果。通过公众辩论、国会决议和对决策者以及官僚游说等方式，社会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力。所谓政府对“外交政策的特权”已不再可能重现。①

值得一提的是，适合上述分析的完全只是民主政体，对于非民主政府来说，社会的作用当然不会这么强有力。不过，只有极度专制的政体，那些对社会完全实施铁腕统治的政权，才会置社会公众舆论于不顾，一意孤行地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但是，即使是专制独裁的集权政府，也会在采取违背公众意愿的强烈步骤之前，三思而后行。虽然独裁者们可以尽力左右“社会”舆论的导向、为我所用——往往这一着也很奏效——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对舆论的作用视而不见。

商业国家和舆论力量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和商业组织已经从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分工中被区别开来，“路曼系统”的理论中对此做了明确的解释，它指出：社会的从属体系——例如法制系统、教育体系、经济以及政治体系等等，都会遵循自己的系统规律，安全运行，并且在各自的体系内使用自己的系统密码进行交流，这些密码无法被其他的从属系统所“破译”。② 以此为开端，人们自然很难理解我们社会中各个团体相对顺利的协调关系，因为实

① Nuklas Luhmann，《社会制度——普遍理论概要》，Frankfurt a. M. 1984

② Uwe Schimank，《社会差异理论》，Opladen 1996

在无从下手，因为我们根本读不懂他们的密码。虽然这种解释难免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这个理论所强调的——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团体和商业组织的区别和专业化，则是非常有益的观点。①

假如这样一个体制可以行得通的话，就必须抛弃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方式，使“国家丧失魅力”的趋势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逐步形成，在经济不断增长，通过“互联网”可以快速进行信息传播和交流的电子时代，社会的各个从属系统的活跃性也不断得到加速发展。但是，如果摒弃对社会从属系统的中央集权统治就意味着：在新的体制中，这些社会从属系统必须赢得它们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以保障能够通过分散的网络系统来控制社会的整体流程。这种参与不仅是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而且也成为国家和社会作用的实质性“必需品”。②

现在，重心正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推移：必须保障社会团体对国家政策的参与和制定。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以及稳定性不再明显地取决于那些“忠顺的仆人”或者是“历来的追随者”，而更多地取决于国家和政府公开的、可测定的政绩，也就是对整个社会所提出要求的满足程度。这些要求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以及各个成员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于是国家的行动重点从强权政治统治和对外扩张转移到保障和提高整个社会经济水平上来。对于这种发展趋势来说，无论国家是否直接介入经济发展进程，还是国家采取措施，尽可能为私营经济活动创造理想的经济环境（也就像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那样）都是

---

① Fritz W. Scharpf，“20世纪末国家的行为能力”摘自 Beate Kohler - Koch (Hg.)，《欧洲的国家与民主》，Opladen 1992，第93－115页

②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86

无关紧要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目的并无二致。

同时，在对外政策上，各种因素的优先次序也发生了变化。领土扩张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安全政策也演变成了一个虽然重要、但却并非占据外交政策中心的边缘条件。相反，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因素在对外政策的优先名单上排到了前列。这个过程究竟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我想在东西方阵营的冲突彻底结束之后，一定可以得见分晓。

所以，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典型个体并不是霸权国家，而是商业国家。[①]它的特征包括：政府对经济要求的“诚挚态度”；利益集团对国事的参与和协作，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在对外政策的目标方面，与权力和安全问题相比，经济拥有明确的优先权；军备预算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准，对外贸易对社会财富的积累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闭关自守遭到唾弃，相互依赖不仅仅是一种事实，而且被看做成就而不是弱点；国家的对外政策极力加强国际法的完善和实施，如果在国际范围内法律安全得以扩展，那么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交往之间的摩擦就会相应减少。因此商业国家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组织体系情有独钟。“恐吓”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密切的民间外交。

现代商业国家对内政策的补充是民事力量，[②]在社会价值评估中军事处在相对较低的位置。社会表现出对军事的一种明显的保留态度，即使没有明确表示出对军事冒险主义的反感情绪，但对军备投入产生的巨大风险和巨额开支却表现得极其敏感。公众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股强大的和平主义暗流，为国际活动

---

① Knut Kirste / Hanns W. Maull, “公民权利与角色理论” 摘自 Zeitschrift fue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1996 年第 2 期第 283 - 312 页

② Harald Mueller, “合作的机会” 摘自《国际关系政体》, Darmstadt 1993

筹集和准备的大量资源主要被用于民事目的。法国人曾经惊呼的“德国的原子弹－德意志联邦央行”正好切中了这一历史现实的要害。今天，日本和德国被视做现代商业国家的典型范例；他们没有强大军事力量为依托而仅仅依靠经济实力以及民事力量，就赢得了巨大的权利和非同凡响的国际影响力。这足以令人叹服！

商业国家的活力

根据物理学力量平衡原则的逻辑，在现代国际政治体系里，商业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也产生同样的作用力——“活力”。它产生于国际间在相互依赖原则下的系统状态，这个概念描述了全球经济密切相关对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国民财富的增长，不再能够在封闭状态下独自完成。为了避免国际间恣意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合理的国际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很轻松，但这个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却很难达到。正因为各个商业集团和组织都急于最大限度地迅速提高自身的财富拥有量，所以国家的代言人在国际谈判中很难做出必要合理的让步，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就无法在贸易、金融、银行、电信、航空等领域达成国际间的经贸协议。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困难重重，但是几十年来国际贸易和交往还是不断增长，这说明相互依存的关系促使商业国家进行合作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

商业国家所具有的“活力”按如下规律运行：社会团体和组织需要获得利益，国家必须与之合作，于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国际谈判，制定国际规则，这种通常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协议，可以防止竞争中出现令人不悦的情况。一些国际组织往往受

到委托，来实施管理和监督这些国际规则的遵守和执行。通常会出现由于各自对这些规则诠释的不同而产生的摩擦，小小的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因此这些规则不断地得以补充和细化，并且日趋完善。于是调节国际间争端的方法得以制定，并且使用国际制裁来维护这些规则的尊严，因而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不断完善和发展壮大。除了力量均衡的逻辑之外，受到相互依存原则的驱使，国际间合作的不断扩大成为国际政治的第二个重要的活跃进程。

商业国家的局限

然而，上述两个进程并不是总能密切地合作，它们有时会背道而驰。虽然在目前的国际社会里，商业国家现象已普遍存在，但是霸权国家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头号世界大国——美国是这两者的综合体现，它不但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角，同时也是世界经济舞台上最重量级的角色。在过去 30 年中，美国经济受到相互依存原则的全面影响。在此之前，美国的对外贸易只局限于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其总额仅占国民生产总值不足 6%；而今天，美国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超过 20%，在主动性贸易和被动性贸易中，美国都处于领先地位。而同时美国还是全球惟一的军事超级强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如此成功地将自己的军事力量扩展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美国的军队掌握着“21 世纪作战”的战略主动权，这包括最先进的电子侦察手段、涵盖尖端电子技术的战略核武器、精确目标瞄准的“智能”导弹系统、电子干扰反侦察技术、反雷达（偷袭）技术等等。并且只有美国才拥有经过培训、可以有效使用这些军事技术的专业部队。欧洲和亚洲的商业国家只能在美国强大力量的阴影下待机崛起。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商业国家的理念还没有最终取胜，令人不快的突发事件依然存在，并随时可能发生：又变得不甚友善、变化无常的俄罗斯；雄心勃勃的中国；波斯湾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高傲自大的地区霸权国家伊拉克，——战略家们对诸如此类的危险因素进行了讨论，人们大都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消除危险、保障自身的利益和安全。

最近几年以来，在日本和德国进行的激烈辩论表明（指日德两国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切努力和舆论，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日、德希望承担与其国家实力相当的国际义务——译者注）：民事力量正在寻求某些问题的解决之道。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那种对这些问题简单地视而不见，只是悄悄地寄希望于华盛顿的“老大哥”的做法，已经显得不那么现实了。但是结论绝对不是这样的——建立自己的海军力量，以图和美国海军一样平等地整顿全球的秩序。确切地说，德国和持更审慎态度的日本，一直谋求通过受限制地参与多边军事行动，来证明自己是西方（或全球）国民卫队可靠的成员。维护多边体制和尊重国际公法是商业国家外交政策的两个支柱，同时也是安全防卫方面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只有和其他国家一起，得到联合国或一个地方性国际组织的授权，德、日两国才可能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这里所指的不是扩大国家的军备力量或者保持某种军事优势，而是指参与防御性的国际军事行动，最多可以参加维和行动，帮助武装骚乱的地区重新恢复秩序。当然所有这些都要有一定的限制，许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还有许多西方的战略家担心，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日本和德国军国主义的幽灵又可能会在核武器的点缀下，重新被推上国际政治舞台，死灰复燃。这种担忧毫无疑问是普遍存在的，在日、德国内，代表民众力量的社会团体对其政治体制提出的严格自律要求，从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

社会性世界的活力

下面我们再回到前面提到的话题，来谈谈社会团体和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问题。对于是否已经存在一个“世界性的社会”这个问题，人们长期以来，始终争论不休：各个社会团体和组织是否已经变得如此相似、走向趋同？它们之间因为长期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统一体，而不是处于完全不同个体的并存状态！塞缪尔·亨廷顿以及那些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和倡导者——他们都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社团的独立性、特殊性和可保留性——可能会强烈抗议上述提法。而那些对现代社会中贸易、金融、交通和通讯等问题做过大量研究的专家学者，则对“世界性社会”这个概念所持的怀疑态度要相对小得多。[1]

柴皮尔曾建议，用“社会性世界”这个概念来替代“世界性社会”。[2] 该提法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这表明，一方面被“世界性社会”的鼓吹者们所形容的“大融合”还没有出现，尤其是国际关系正处于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权利的切割瓜分时刻；另一方面，“社会性世界”这个概念还表明，在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世界之外，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第二个层面——各个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影响力不再仅仅局限于各自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面，而是游离于国家之外、独立并紧密相连在一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CNN 电视台、互联网以及非政府跨国机构都是这种发展趋势的明显迹象。

---

① Czempiel 1996

② Michael Dertouzos, 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 San Francisco 1997

如果你驾驶汽车穿行在德黑兰或者北京的街头，就会发现屋顶上有数不清的卫星天线。尽管这些半封闭式政体想方设法实行严密的管制，用以监控国内人民所能得到的信息来源，但是仍有大量无法检查的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卫星进入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可以在自己家里，无形中与其他文化以及它们的表现形式进行交流和对照。和过去几百年的闭关自守相比，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巨大的进步了，而席卷全球的“互联网风暴”将更猛烈地加速这一进程，成为把世界紧密相连的最重要因素。[①] 至于这种通讯方式目前的普及率还相对比较低（截止1997年——译者注），这并不重要。我们知道，被世人大加称颂、在西方文化中起到决定作用的两个运动——重新发现个性自我的人文主义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打破封建枷锁、实现思想自由化的启蒙主义运动，开始时都只是在少数社会精英中得到响应。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运动是以拉丁语为媒体进行传播的。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除了天主教士之外，拉丁语只在少数贵族和有教养的市民阶层中才有影响。而启蒙主义思想在早期则是用法语进行交流和讨论的，而法语在其他西方国家又是除了贵族之外，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士才掌握的语言。然而，这两次伟大的精神运动并没有因此受到局限，它们对我们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诺伯特·艾里阿斯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对文化“准则”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进行了生动描写：他列举了一个非常形象、令人难忘的例子——自从某些王室贵族在餐桌上使用刀和叉进餐之后，这种新的习俗首先被上层社会竞相效

① Norbert Elias,《论文明的进程》,“社会基因和精神基因调查”Frankfurt a. M. 1978, 1979

仿。接着天主教士和手工业者紧跟其后，直到最后这个“准则”在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中间也流传开来，或许这样的普及过程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① 假如这种观点可以站得住脚的话，尽管如亨氏所言，掌握英语的人口比率正在世界范围内缩小（亨氏的理由是伊斯兰世界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急剧增长，而西方国家的人口却出现了负增长），虽然实际的情况或许并不像亨廷顿试图宣称的那样，因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将英语作为学习外语的首选，在学校中，年青一代较之父辈对英语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例如在中国，但无论如何，想以此来否认社会世界的紧密合作对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则是行不通的。看来亨廷顿并没有拜读过艾里阿斯的大作，他持与我们相反的论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一提的是，非政府机构（NGOs）组成了介于国家、地区和文化之间的特殊桥梁。一般来说，这些机构没有明显的物质利益追求，尽管一些较大的国际组织时常会暴露出维护自身官僚主义利益的倾向，但是大多数时候，它们还是更注重于社会公益事业。其中很多地方性、地区性或国家级的团体组织，由于在自己国家无法单独达到目的，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于是不断加强和国外志同道合团体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跨国界的合作。诸如国际红十字会/红半钩月、人权观察、大赦国际或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性组织，他们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证实有2000个这样的地区和国际组织，致力于环境保护、人类和平、裁军和人权等各项公益事业。由于很难收集这个领域的完整数据，可能还有数目更大的“黑数字”。150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全部这些国家中80%的国家至少有一个此类的公益性组织，这一切表明：在我们面前正呈现出一个蒸

① Housman's Peace Diary 1998 and World Peace Directory, 1997

蒸日上的跨国合作的民间社会。①

民主化进程

在那些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里，以及在这些民主国家之间，民间社会的发展速度最快，力量也最为壮大。因为在这些民主国家里，言论和结社都是相当自由的，这为民间社会的活动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民主"不仅是一个非常普及的口号，而且成为一种习惯：今天，一旦社会危机转变成政治危机，一定伴随着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呼声。1974 年葡萄牙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变革，以此为起点全球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浪潮，最后以柏林墙的倒塌使这场运动达到了高潮。100 多个国家，即全球所有国家的一半以上都受到民主选举和民主议事等政治进程的影响。在那些非民主国家里，也不乏呼吁民主改革的反对派、社会团体、流亡者和地下组织。借助于新型媒体，不断壮大的跨国通讯将使这种"民主的时代精神"更加发扬光大。②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改变了早先的偏见——即只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富裕社会"才能实现民主"，而对于较贫穷的国家而言，通过专制的变革来实现艰难的民主进程，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观点曾经是"至理名言"，在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不可否认，生活富裕当然有利于民主机构的稳定，但它并非实现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今天，现代化对社会团体和组织进行了有

---

① Larry Diamond,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Trends, Types, Causes, and Prospects, in: Robert Slater (hrsg.), Glob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1992

② Doh Chull Shin, O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A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Recent Thory and Research, in: World Politics 47, 1994 年 10 月，第 135－190 页

力的冲击，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形成已经非常普遍，对民主的迫切要求和渴望也随之产生，在某些有利的特定情形下，民主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很可能顺利得以实现的现实。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认识：即在经济改革中，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治体制的高度灵活性和政治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在民主、市场经济占据优势的国家，和占有相同社会财富的非民主国家相比，满足民众基本要求的能力要强出70%。这在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其政绩的阶段，其意义尤为重大。①

伊朗又成为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例子：即使是这样的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正教合一国家——霍梅尼式的神权国家，也不得不在国家宪法中吸收民主的元素；现在这种僵化的体制也对改革敞开了原先紧闭的大门。由此可见，民主自由原则的全球影响力已经一直深入到传统主义者的阵营里。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文化的出口已经初见成效，因为民主政体无疑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的直接后果，虽然它的创立可能由于地方性和地区性的差异，会出现大同小异的微小区别。但民主思想的传播对于文化交流以及文化间的对话来说，即使不是最重要的标志，也绝对是最重要的象征之一。②

① 亨廷顿忽视了这种情况是惊人的，他本人于1992年著有关于民主化浪潮的标准化著作，但是其内容与《文明的冲突》大相径庭．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1992

② William A. Joseph (Hrsg.), China Brief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Change, Armonk 1997

文化的交流

相互影响作用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使文化交流具有“普及推广”的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世界的全球性交流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实施办法，并由此而产生了各个文化的不同标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竭力将这些新的变化尽可能地和传统习俗连接起来，而实施办法只有在非常必要时才进行改变；社会准则的改变则进行得更为缓慢。但是文化的变迁在年轻一代中通常比在年龄较大的人群里更容易一些，往往有时还带有某些主动的色彩。因此“现代化”在不同文化圈中的影响力也就不尽相同，但却都是集中在一个共同的核心领域。现代化过程愈是长久和深入，文化间的交流愈是密切，这个领域的涉及面也就愈广泛。

因此，新文化的归并企图和传统文化之间，文化的类同性和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之间，不断相互影响和作用。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认识：

第一：现代化过程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化的自我维护机会。现代化不能随意地用各种文化所熟悉的“手工艺工具”来实现；现代化要求特定的实施方法而排斥其他事物。要使现代化完全适应一成不变的文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适应性绝对是相互的，只有这样，各种文化间的共性范围才会不断增大。

第二：今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决定了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必然变得更加密切和多样化，这相对来说简化了文化间的相互适应、学习和接受的过程。

第三：各个文化内部和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受到众所周知的

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如国家世界的平衡过程；受经济利益左右的商业国家之间的合作约束；除国家之外的社会世界的联网。所有这三个因素都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首先，安全的困境促使国家之间产生相互的不信任，并由此增加许多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打破国家世界的平衡状态。其次，伴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经济的活跃性激发了我们关于“地球经济学”范畴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国家和地区之间全部经济和政治竞争力的意义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选择获得最佳利益方案的愿望要求消除政治上的限制，消除可能发生政治暴力的一切可能性，因为政治暴力无疑是经济发展道路上令人讨厌的绊脚石，有百害而无一益。最后，社会世界的活跃性促使与“外来文化”反向运动的内部对立因素的激增，并因此唤醒了它的防御本能，文化在交汇时产生激烈的碰撞，但同时这也增加了文化间自由交流的机会。

2 社会危机和政治统治

在什么情况下，文化差异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会左右广大民众的思想、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并引起国际冲突呢？毕竟亨廷顿的观点不是空穴来风的主观臆造，毫无道理可言，事实上，他的有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根据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谈到的关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东盟国家和西方国家就“亚洲”与“西方”价值观问题进行的激烈辩论；以及中美有关人权问题的不同见解和争辩，所有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客观历史现实。假如我们一方面避免从政治的角度过高评价不同文化的这些差异带给我们的客观结果，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否定文化差异的作用也同样是错误的。

用“文化的反思”来克服危机

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只有在深刻的社会危机时代才显现出来。当国家政权机构和社会团体没有能力满足对其寄予厚望的民众的基本需求时，整个社会的危机也就随之而生。民众的需求首先表现在物质层面上，包括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社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诸多问题。一个政府如果对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无能为力的话，那么可

能迟早会被赶下台。如果社会和政治体制长久不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便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难于自拔。

事实上，物质性绝对不是这种危机所表现出的惟一特性。确切地说，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广泛层面上的影响，它深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遗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以及所有的文化实践行为。它的触角无处不在，影响力也不断加强。危机侵袭了现实“生命世界”背后隐藏不现的“物质”——那些看来确定无疑和既定可靠的文化传统（包括知识、信仰、感觉以及思维习惯），在现实的“生命世界”里，通常情况下，日常行为是安全而受到思维支持的。当人们不能再继续保持自己的习惯，客观情况不再允许“传统的”生活方式延续下去，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就会变得相当脆弱、不堪打击。于是，来自文化外围的挑战愈是猛烈，文化内抗争的因素愈受激发，这时人们植根于传统的身份认同会变得非常重要。

现在身份本身的认同成为人们的一个基本需求，[①]它对大多数人的生活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们现在不再是“孤独的狼群”，而是一个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集体。但是归属感确定标准并不只是或者首先基于人们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脸型或身材），而是更多通过与文化有关的实践活动来进行判别。因此日常生活世界的行为、风俗习惯的保持都成为验证身份的方法。

我们可以想见，现代化的过程在最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种危机的产生，与现代化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全球通讯网络的建立、新一轮的移民浪潮无一不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巨大的变革迫使人们对世界观进行极端的、但还算合理的改进；同时它也使人们满腹狐疑地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许多现

---

① John W. Burton (Hrsg.), Conflict: Human Needs Theory, New York 1990

实情况已与传统背道而驰，传统文化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和外来者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文化间的对立在所难免，从文化内部迸发出显然是针对外来者的强大反作用力。这样看来，改变人们生活道路、威胁社会整体团结的因素无非是自我生存环境的变迁；不能完全预期的发展过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于是，人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偏差，往往借助于简单而错误的“权术理论”，将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归咎于“外界因素”——外来者；这样人们也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对应的全球性角色，第三帝国把全世界的所有灾祸都强加给了“可憎的犹太人”：在此种情况下，外族文化无疑成为危险的代名词，是一种威胁的象征。[①]

现代化过程在两个方面同时发挥其影响力：一方面，它破坏了人们习惯的物质生活方式，使人们为适应现实生活而不得不有所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另一方面，它使人们对后天获得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怀疑。在变革的年代里，人们突然感到无所适从，因为现代化破坏了生命的世界性原始背景，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托，今天的世界已变得不再可信了。同样，民族的文化价值和有效性也受到质疑。而这将导致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并孕育着巨大的危险。人类不像动物那样，他们缺乏对付危险状况的直觉应对技能，因此人类在危险来临的情况下，总是动用曾用于解决生存问题的文化工具。假如文化工具在全新的、根本不熟悉的新任务面前确实无能为力的话，人们就有如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借助自身的能量已无法摆脱困境、寻找到出路。在这种情形下，这头困兽要么表现得慌不择路、狼

① Bassam Tibi，《文明的战争》“理智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政治和宗教”，第三章，Hamburg，1995

狈不堪，要么会变得极具攻击性，或者它会在这两种可能出现的行为方式之间游移不定。如果在此类情况下，人类表现出相似的行为举止，我们应该不足为奇、见怪不怪了。事实上，在人们应对现代化带来危机的过程中，他们的行为肯定带有明显的文化烙印，它可能有五种不同的反应方式：①

其一，完全适应变革，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基于文化的影响作用复杂多变，这种行为选择只会发生在少数几个民族身上。在这些民族中，受过良好教育、具有高度感知和交流能力的年轻一代最有可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他们善于接受新生事物，背负传统文化的包袱也相对轻些，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也就相对较弱。同时更能成功“转型”的是那些社会精英分子，或者是那些自身文化素养已经适应高度个性化和灵活性的人们。因此对于这些文化而言，文化断裂只会产生相对较小的危险。于是在这些文化中，“新”的习惯和行为方式被清楚明了地展现出来。但“新”行为方式的代表往往会因此而成为正统文化卫道士发泄怒火的对象。

其二，寻找妥协的中间发展道路，使“新旧”文化之间达成某种动态平衡。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碰撞通常会带来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人们有可能会陷入某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知识分子和科技英才的代表们，必然会去努力寻求一种积极的、指引前进的解决之道，这些社会精英分子的目标相当明确，他们试图在新思维和旧传统之间找到合理的妥协折衷方案。伊斯兰教改革派知识分子，就进行了这样的、也令人瞩目的尝试，埃及人阿布·赛义德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在西方的文化史中，外来基督教与世俗社会的成功整合，应该算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然

① Thomas Meyer，“身份幻觉”，《文化差异的政治化》，Berlin 1997，

而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个理智的构想形成的基础条件有些苛刻，只有在条件允许而又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形成这样的文化合成体，并且使它完全按照大众化的特点去进行规划设计，以便能在政治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这种尝试没有成功，那么“新旧文化交融”的倡导者和上面提到的可以“适应新文化者”将被一起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相反，如果这种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阻止正统教派独揽大权、或者削减其权力的大好机会。

其三，身处危机之中，虽欲摆脱困境，但由于知识技能方面的限制，不可能主观进行克服危机的尝试，在随波逐流中被动适应周边环境的变迁，同样是尽可能地在学会的常规行为和新的事实压力之间寻找平衡点，并因此产生文化价值的转变。然而这是一种并非积极的、有意识的策略，而是在两极之间不确定的、勉强的摇摆不定。这种反应通常出现在受到现代化冲击的广大群众身上。他们竭尽全力尽可能地避开身份认同冲突的危险，但是一种不安全的感觉还是时刻笼罩在他们身上。精神世界的新平衡状态以及在不同文化间的身份认同都极不稳定，一旦周围环境发生突变，这些人很容易受到极端阵营的蛊惑影响，在偏僻陌生无助的环境中，这种“诱惑”会给人带来传统文化虚假的安全感。

其四，这种反应方式与前面三种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体会。人们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不是将传统文化一股脑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而是依托它作为保护自己的盾牌，用以反击来势汹涌的外来文化的侵害。在此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不再因为欠缺符合现代和未来要求的行为技能，而成为被批评的靶子，正是挑战者本身更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人们利用自己的文化遗产有力地反击外来入侵者，以此来证明和加强日益受到威胁的自我身份认同。由于这种反应方式对个人和集

体克服危机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在危机时期，传统文化的地位往往呈现出戏剧性的提高趋势，并且远远超过通常情况下它的影响力。民族之间频繁的交往联系受到指责，而几百年来各种文化的交融早已使明确的界限模糊不清。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的民族不断产生，无数次的民族融合和数以百万次的人口迁移早已将最原始的“正宗文化”演变成一种混合的新文化。在宗教方面，新的东正教的崛起，笃信传统宗教礼俗的再度复兴，但这绝不是旧文化的简单复苏，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早已经历了世俗化、本土化的过程，是一种文化融合后的新结果，神职人员和教派们也都经历了这个辉煌时代。人们往往会奇怪，在基督教徒中会有如此之多的学者、自然科学家以及工程师。我想事实很可能是这样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恰恰对“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者”冲击最强烈。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是更多地忙于解决与现实生存息息相关的问题——正如我们常说的，他们有自己关心的事情。人们期待知识界（社会精英）不仅仅从形式化的行为方式上复制文化，而且希望他们也能从反映文化面貌的讨论中传播文化的精髓。所以，假如知识界（社会精英）备受文化认同问题的煎熬，当然算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五，这种反应方式通常和第四种方式相伴出现：对外来文化具有攻击性的排斥行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挑战被拟人化地寄附在一个“外敌”身上，并通过它明确呈现出来——西方文化、美国、跨国康采恩、犹太复国主义、伊斯兰教、大量的外来移民等等都是“外敌”的具体形式。这里要说到一个滑稽可笑的事情。美国极端主义分子曾有一种假想：美国未来的敌人不是具体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而是联合国。事实上，找到一只替罪羊就意味着可以如释重负、开脱罪责。那些侵入自己日常生活的危险都变得非常明显，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反抗它，而对于改变日常习

惯、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认同感的必要性，人们就找到了回避的理由。那些极端主义者不仅捍卫、而且根本就是自己恢复了假定的“正统文化”，他们花费很大精力去寻找自己阵营中的所谓“叛逆者”，叛徒们被冠以通敌的罪名而遭受审判。他们背叛纯正的教义、歪曲正统的思想、亵渎神圣的信条，他们的叛逆行为着实可恨，因为他们较之“化外之民”能够并且应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更加透彻的了解，怎么能做出如此之举呢！这里涉及到一个古怪现象的原因——极端正统文化的牺牲品大多来自文化圈的内部、而非外来文化圈的成员。

所有这五种行为类型都具有一个共性：它们都出现在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碰撞中。事实上，传统的卫道士试图挽救或者恢复“正统文化”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对全球化浪潮的传统力量，是那些思想和感情都遭受到现代化的猛烈冲击，受到深刻影响的人的集合，这种人为的倒行逆施根本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文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确切地说，今天的情形应该用“全球地域化”（Glokalisierung）这个词来加以描绘。[①]

反犹太主义和种族大屠杀是克服危机的手段

人们对许多历史事实的认识总是模糊不清，实际上，任何偶发的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认识了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下面将要谈及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在西方的历史中，几个世纪以来似乎从未结束过反犹主义，犹太人有时甚至遭到直接

①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e Culture, London 1992

残忍的杀戮。我们曾经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自古以来都能长期和平相处，而这种和睦关系转瞬之间即被突如其来的恐怖暴行所摧毁。第三帝国对全欧洲犹太人实施的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政策，简直是史无前例。而事实上，针对犹太民族使用暴力的极端倾向，却是一个流传延续甚广的历史现象，在西方社会中，犹太民族始终代表着需要划清界限的外族人。如果社会运转“正常”，他们大体上被看作社会团体的合法成员，可以获得被保护的权利。但是一旦社会出现危机，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不易为人所察觉的“微小差别”便显现出来，犹太人变成了绝对的异类，他们是具有威胁性的敌人。于是，人们不必费尽心思（可能冒着动武的危险）在外界寻找可以嫁祸的“替罪羊”——对无法解释的现实世界的各种危机负有罪责——人们不用费很大周折、不冒任何危险就将其消灭在自己的社会中间。芭芭拉·土赫曼在《历史的折光》（Fernen Spiegel）中描写道，14世纪的欧洲社会，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是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瘟疫的流行而传播开来的。[①]19世纪后叶以来，反犹主义在欧洲得到进一步扩展，突出的例子是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犹太裔，1898年前后曾供职于法国总参谋部，因间谍嫌疑被捕入狱，为此，法国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反犹浪潮。最后发现充当德国间谍的是另一个人，德雷福斯获得了释放——译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帝制被推翻而代之以民主政体，战败的阴影、巨额的赔款、失意的退伍军人、大批失业的城市无产者以及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则更加剧了德国内部的这种紧张局势，为

① Barbara W. Tuchman,《远方的明镜－戏剧性的14世纪》，Munich 1982

转嫁矛盾、寻求出路，终于爆发了历史上最为凶残的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大屠杀。希特勒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了对全欧洲犹太人的集体灭绝行动，犹太民族经历了一次空前的浩劫。

屠杀犹太人的暴行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且具有代表性，类似的现象还有：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迫害；关于“邪恶女巫”的迷信；19世纪下半叶中国和印度对外族（主要是奴役和压迫他们的西方国家——译者注）的极端仇视情绪。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围绕文化主题的冲突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通过大量屠杀所谓的阶级敌人——即“富农阶层”，包括中农和富农，或者通过清洗布尔什维克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叛徒”的手段，把斯大林所讨厌的“人民公敌”、政治对手、权力竞争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统统施以无产阶级专政，轻者流放，重者杀头，用以克服严重的国内危机，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非命。这里所谓的“敌人”是完全依据意识形态标准来划分的。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也是如此，谁若不赞或或者表现出不拥护新兴的、社会主义的柬埔寨政权，就会被立即置于死地。大约有两百万无辜百姓成为大屠杀的牺牲品。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惨剧。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历史事件，尤其是反犹主义，涉及的都只是对原有社会某一个完整部分的排斥，而并非是与外来文化的对抗。

文化、民族、种族、阶级：危机时期应拒绝垄断性大动员

克服现代化危机的排斥方式无疑也是民族主义的直接后果，它在近200年来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引发的流血纷争胜于其他任何一种东西。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没有任何一个词汇可以像

民族主义那样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可以被国家用做达到自己目的的统治资源。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领土国家毋庸置疑是属于单一民族的国家，政治领袖们则像富有创造才能的艺术家，他们仅是把民族当做一件可塑的艺术作品，而毫无顾忌地忽视了自己的祖先所创造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①

根据亨廷顿的观点，在动员受到危机影响的大众时，文化绝不拥有垄断权，社会、伦理和民族的凝聚力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作用更大”。这个客观事实对评价在世界范围内未来文化的认同过程和剥离过程非常重要，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个动员过程所具有的影响力、冲击力和持久性，只观察社会个体的行为反应方式并加以论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整个社会来看，通过这种动员可以完成重要的社会使命。

社会性统一和大众动员

受到危机影响的不可能仅仅是社会中的少数个体，相反，构成整个社会的所有要素以及社会各团体的内在联系都会受到最危险的，也是最深刻的撞击：社会的统一主要是依赖“文化”的纽带连接作用，从而得到稳定结构的必要保障。如果把社会各要素联接在一起的日常行动链条，迫于新的、陌生的影响力而即将有断裂的危险时，整个社会的各个组成结构都会被牵涉其中。于是危机已不再是局限于小范围的个别现象，而演变成了社会危机。构成社会的成分越是错综复杂，这种全面危机具有的意义也就越是重大。

---

①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83; Oxford 1993;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as Vegas 1991

在这种情形下，大众动员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展开——人为地重新建立社会的统一。但新的统一方式迷失在生存必需的例行方式之中。有关宗教、民族、种族和阶级的思想与行为，成了可以将极大多数人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主导力量。社会中的少数人受到打击和压迫，但这并不妨碍其他社会团体在这一进程中的“得益”。这种新的社会统一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它和未来必不可少的平衡原则毫无关联，往往甚至是背道而驰的。造就它的方法也残酷而野蛮，尽管如此，种族灭绝、大屠杀、对邪恶巫婆实施火刑等暴行，还是一再被社会团体当做修补自己生存世界裂缝的常用手段。在危机时期，在共同的主旋律、共同的民族旗帜下，人们为反对共同的假想敌而形成的统一，形式上虽然过于简单，但却是非常有效的理念和解决之道，在人类历史上被广泛加以利用。当然，只是从一个时期成功与否来考虑现代化和全球化可能产生的后果，也是不恰当和不全面的。

战胜危机的代价：以德国为例

谈及这个必然的反应过程，德国近代的历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样板，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但读史使人明智，当我们能够正确回顾德意志民族所走过的道路时，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向成熟。整个19世纪上半叶，英法两国基本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国力大为增强并加紧向海外大肆扩张，基本取得了对整个世界的控制权。面对遥遥领先、咄咄逼人的西方社会，德国社会奋起直追现代化，19世纪下半叶，德国不仅在经济上赶上了英法，而且完成了国家统一，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崛起了一个庞然大物。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与德国的文化传统和保守思想密切相关。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给德国重重的一击，社会内部充满各种紧张关系，但过度的自我价值感却充斥在所有人的意识里，而它与灾难性的失败结果并不协调。于是，有人把战败原因归结为“背后一箭”——后方的背叛（指革命派领导的基尔水兵起义以及其他革命行动——译者注），正是可恶的“第五纵队”出卖了德国，使民族蒙受耻辱。这种错误的认识毒害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并直接导致了以后灾难性的后果。显而易见，革命的爆发绝对不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德国从1917年美国参战后便败局已定。但革命的后果却是将帝制从德国彻底扫地出门。尽管如此，德国从本质意义上讲，还是一个继续保持文化传统的保守社会。魏玛共和国民主的外套与这个社会的机体并不贴合，本质上仍然追求平静、安逸、纪律、秩序的德国传统社会与资本主义大量生产带来的非个性化趋势格格不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广泛性；对战胜国巨额的战争赔款；以及魏玛共和国物质上的不稳定性，始终困扰、压迫、折磨着脆弱的政治体制。从1922年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到1929年打击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大量的失业人口、整个社会的绝望情绪，使“金色的20年代”变成了一段幻想的美妙插曲。历史现实使脆弱的民主没有得到加强和巩固的公平机会，而实际上从19世纪以来，这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初露端倪。[①]

民族社会主义为了克服危机提出了容易被推销认可的简化理论：围绕着种族和民族的动员；排斥“异己的种族敌人”，特别是犹太人；通过强制一体化措施、军事化训练来重新培养面临崩溃的、维系整个社会统一的纪律性，如果两者并不奏效，那么就

① Heinrich August Winkler,《魏玛共和国1918－1933》:“德国首次民主的历史”（第十、十一章），Munich 1993

利用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系统。于是，生活在社会危机之中朝不保夕、深受战败和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屈辱的德国人，逐渐认同了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正是这种代表“统治种族”的设想，和50年来苦难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更好地满足了大众的需求。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为大多数充满攻击欲望的德国人提供了追捕和迫害少数人群的机会——包括犹太人、同性恋者、残疾人、共产党人以及社会民主党人。[①] 然而在民族社会主义汹涌大潮中，知识界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纳粹的理论家们如罗森伯格、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都是颇有建树的学者。希特勒本人则自嘲为“画匠”，把自己归入了无产者的行列，其实他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准“艺术爱好者”。纳粹的意识形态也对思想敏锐的知名学者如卡尔·施密特、持不同政见的诗人如戈特弗里德·本、深刻的哲学家如马丁·海德格尔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德国知识界的很大一部分人几十年来转向了其他阵营或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阵营。其余持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则保持了左派的立场。转向右派的人士有旧保守派如恩斯特·于尔根。虽然纳粹愿意给予他们慷慨的崇高荣誉，但前者还是抵御住了诱惑。

德国纳粹人为制造的重新统一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一个自由社会的内部组织——尽管还是脆弱的——遭到了完全的毁坏；一大部分社会和政治的杰出人士遭到杀戮——绝对不仅仅只是犹太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而且还包括普鲁士国家的传统精英们；最终第三帝国用不容置疑的逻辑把德国引向了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虽然在短期内赢得了社会统一的胜利（以灭绝少数民族为代价），但此后却导致了德意志全民族空前的灾难。

① Hannah Arendt,《全面统治的要素与起源》第3版，第3部分，Munich 1986

战胜危机和巩固统治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希特勒德国处理社会危机的所有手段，在深层就会发现：战胜危机、排斥异族的思想和行为与统治者希望确保政权稳定性的意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此之前人们谈论的是用何种方式能让共同的目标同时满足个体需求和社会内部组织职能的需要。现在必须注意到完全不同的东西：统治者以及那些环绕在他们周围的利益集团、现有政权的捍卫者。

对于当权的统治者而言，社会危机使整个国家处在时刻充满危险的非常时期。人民大众的美好愿望被沮丧失落的情绪所取代，而所有导致社会危机的责任则必须由那些当权者来承担，事实上，他们也或许确实应该为此担负责任。处在动荡中的人们变得惊恐不安而且——正如我们所见——凶猛好斗。在这种情形下履行政治领导是一件如履薄冰的苦差，统治者处心积虑物色可以将群情激愤的大众重新纳人控制的政治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排斥异族、反对共同敌人的全民动员，来引导民众情绪的宣泄，将所有不幸和祸害都归咎于内部或外部的敌人，所有这些无疑是达到政治目的的理想统治技巧。

同时，危机给野心勃勃的暴发户提供了争夺权力的机会。在这个阶段，“底层”和“高层”之间的权力阶梯从未变得如此短捷；丧失权力和获得权力之间的阻力从未变得如此薄弱。那些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具有蛊惑民心的非凡能力。使他们获得民众认可的关键因素和我们刚刚提到的确保统治的技巧如出一辙：即以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在价值体现、认同感方面而寻求统一，从而确定对敌对势力的划分，形成针对敌人的统一战线，并以此作为征服权力最快捷的途径。于是，在民众的骚动不安中聚集起来

的巨大能量，现在被那些暴发户所引导利用，朝他们希望的方向释放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权力甚至比保卫权力还要容易：因为后者需要顾及的东西实在太多，如对外政策是否令人信服；内部的联盟是否能经受住考验等等。而对于夺权者来说，根本没有诸如此类的“包袱”。

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不对这样的巨变过程有所畏惧。然而，围绕着统治的斗争才是最急迫的，也是最根本的。各种社会机会的获得完全是围绕国家统治而进行分配的。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是由各种体制交织在一起的复合体，它根据创造的社会价值产品分成不同的部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法制。政治虽然具有一言九鼎的威力，但是它对价值分配却不具备垄断能力。这使得西方社会面对危机造成的权力之争更具有抵抗力，但是，正如德国的例子所显示的，并非完全不受到伤害，只是这种伤害的程度较之其他社会形态要轻得多，因为在得到不断加强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市场经济中，对国家权力的争夺没有必要一决胜负，它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与此相反，在其他意识形态中，决定“受惠方”和“吃亏方”的控制旋盘位于权力中央，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但是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准社会主义国家、巨大的国家干预政策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杰出之士”把国家作为战利品进行争夺，以便将相应的利益馈赠给各个名门望族、精英骨干、某些种族以及宗教团体等等。[1] 即使是风靡世界的自由改革运动，也没有脱离这个老套路。相反，共产主义、宗教和民族原教旨主义者再三努力，使国家重新回到早先的中央集权统治模

① Hartmut Elsenhans，“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官僚主义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试验”，Frankfurt a. M. /New York 1981

式，这样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将社会价值分配的硕果尽数笑纳，并且在自己的利益集合中间分发。

在这种情况下，排斥异族和惩处异己分子的权术当然变得更为重要。在争夺政治和社会权力的竞争中，把对手称作“我们”（血统、民族、阶级、文明）阵营的叛贼而严加谴责往往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就是说，把对手描绘成异族、敌对势力或者是具有威胁的集团，如此一来，竞争对手的成员不但丧失了要求政治权利的资格，而且不能分享社会财富的份额；这样，“我们”分得的蛋糕就更大了。

统治利益、分配要求、文化认同等等都是权利之争的重要工具，并且这几方面密切相关。一个社会从来不会从自身内部自发地产生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的重大冲突，总是有那么一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利用和激化一些“小”矛盾，使之政治化，使之变成权力之争中对许多牺牲者来说，颇具杀伤力的致命武器。但假如这种对权力的追逐没有转化成个性化和社会化的文化动员功能，那么文化的差异就不会被充分利用到政治上。只有当“政治商人”出于自私自利的权力欲望而注重文化象征时，文化象征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1] 包括严酷的排斥异姓种族、“外来敌人”以及“内部敌人”的行为都遵循同样的逻辑：于是反映在无防卫能力的第三者身上的所有弱点和欠缺减轻了统治者应承担的罪责，否则他们自己就会遭到有关失败的责难。此外，仇恨释放了多余的能量，而从权力意义上看，这些能量应该可以被疏导出去。这就是确保统治和大屠杀之间可怕的辩证法。

---

① Meyer 1997

权力之争中的联盟形成

围绕文化主题进行的争斗可以被这样理解：它是利用共同利益对民众进行动员的多种可能性之一，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来战胜危机、争夺政治统治权。从总体上看，无论何种的原教旨主义者都只是少数派，只有通过结盟，即懂得吸引那些既不激进、也不极端的一部分人，他们才能获得胜利。

我们把一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分为五个集团：1）激进的改革派；2）温和的改良派；3）游移不定的中间派；4）传统主义派别；5）极端守旧派（包含原教旨主义者）。

根据对危机的理想典范反应方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出现的结盟类型。第一种：如果“激进派”和“改良派”，即两个首要的社会集团成功地结成同盟，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实行一种自由的改革政策。但实际上这两个社会集团往往力量过弱，无法掌握政权。于是，他们能否赢得第三个社会集团，即摇摆不定的中间“妥协者”的支持，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时后者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传统主义者（第四个社会集团）的影响力也非常巨大。可以想见的是第二种结盟方式：即前面的四个社会集团一起组成联盟，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可能会实施温和的、却独具风格的变革，特别是使传统礼俗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假如传统主义者和激进改革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实在太难以调和，那么就会出现第三种结盟方式：即第二、第三和第四社会集团将形成联合。这时可能出现的政治结果是：坚持传统的主旨、配以结合谨慎的改革，也可能会对第一社会集团的激进者采取强制性措施。这便形成了“保守改革派”联盟。

第四种结盟方式是这样的：第四和第五社会集团组成联盟，其结果将导致正统国家进入极端主义的境地。假如他们能使中间“妥协派”进一步感觉不安、使之极端化，那么这种联盟就有机会取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许多冲突原本可以通过妥协方式得以解决，但假如传统主义者觉得难以接受和新派妥协这样的苛求，毫无疑问，他们会站在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一边。于是只要存在取得冲突胜利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惜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政权的典范，他们不但纵容文化间的冲突（或者种族冲突、民族冲突或者阶级冲突），而且不断地寻求引发这样冲突的机会。

当然，上述结果对于其他的组合并不适用。第一个联盟会寻求和“异族”的友好接触；这里涉及的是成功的现代化进程。其他三个联盟更喜欢联合或排斥、相互依赖和保持距离等不同的组合形式。然而没有一种联盟形式会预先确定和异族冲突或者武力解决冲突，只有牵涉到其他的因素，例如国家世界的权力竞争，才能获得这样一个令人不悦的结果。变革联盟的形成可能是阻止原教旨主义化危险结果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处理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关系时，值得仔细斟酌应该和谁进行联合. 因为联盟类型和统治类型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伊朗发生的事对我们大有启发。20 世纪 20 年代，巴列维王朝在伊朗建立了一个世俗化的政权；整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现代“风格”强烈侵袭了伊朗，主要原因是随着石油工业的增长，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使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古老的波斯大地。年轻的巴列维国王在接管政权时必须面对由改革派、什叶派和温和的传统派组成的联盟，他们企图通过不流血的斗争夺取他的权力，建立一个以温和的改良主义为基础的波斯民族国家。这个实验因遭到军队、受美国保护势力以及巴列维王朝全体“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失败。重新登位的沙阿（伊朗国王的称号——

译者注）列扎从这件事中得出了教训，从自己方面进行了勉强的现代化尝试。他的追随者们则表现得像一些过分顺应潮流的杰出人物，而民主改革派、什叶派和温和的传统派则继续受到沙阿政权镇压政策无情的打击。伊斯兰教的教士不仅不喜欢巴列维政权推行的现代主义，而且他们自身的利益也不断地受到威胁，因为沙阿打算把伊斯兰教教士的权力基础和经济收入都占为己有。40年代后期，教士是不断带有世俗色彩的改革运动的合伙人，而由于伊朗秘密警察的清洗，7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除了原教旨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被排挤出权力圈外，其他什叶派如巴扎干、自由改革派如巴尼·萨德，都只是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配角（还是暂时的）。于是在完全多元化的伊朗社会里，极端主义合乎逻辑地取得了优势。[①]

在变革时代，当我们着手克服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文化主题（包括种族、民族或意识形态的内容）的政治动员将发挥三个可分辨的功能：1）它帮助社会个体重新建立自己的认同感，在习以为常的生存世界无法再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时，使迷失的自我重新找到前进的方向，并认清形势；2）它在相当程度上帮助社会支离破碎的各部分重新凝聚在一起，能够最有效地防止社会的崩溃（但是也可以推动进一步的多元化）；3）它帮助政界的杰出人物在与“旧秩序”以及权力挑战者的斗争中，获得并且掌握政权。因此，“文化的冲突”并非现代化危机的自然产物，根据各个国家特殊的问题和权力情况，我们更应该考虑到不同的统治方式，它们有的试图在文化界限之间架设桥梁，有的则利用文化间的排斥现象，将其作为统治的工具。

这种现象和这些功能，并不像亨氏所讲的是一种新生事物，

---

① Misagh Parsa, 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 1989

与此相反，历史上与之相仿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它的新鲜之处在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今天诸如此类的地区性事件也变得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了：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冲突，包括与之相邻地区的冲突，都存在着升级的危险。

3
现在的战争和冲突

历史上引发战争的原因

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各种部落之间的流血冲突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历史现象，许多研究都致力于探讨造成这段人类历史发展进人黑暗一页的主要原因。[①]然而，最终我们没能找到一个产生暴力的主导因素。发动战争的原因多种多样，一个或者多个因素的组合形成了部落、民族、城市、国家以及联盟之间流血冲突的基础。这些因素包括：

——领土争端；

——争夺短缺资源；

——掳掠财物；

——宗教狂热；

——意识形态的分歧；

---

① Evan Luard, Wa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Haven / London 1986; Michael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s, 2. . Cambridge (Mass.) 1984; Klaus – Juergen Gantzel (Hrsg.),《第三世界的战争》《战争原因研究的理论和教学问题－研究陷阱》, Baden –Baden 1988; Jens Siegelberg) Hrsg.),《1986 年至 1990 年的战争及其原因分析》, Muenster/Hamburg 1991

——种族/民族的对抗；

——引起军备竞赛的安全困境，可能会推动当事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非民主国家杰出人物和领袖的统治利益。

引发战争的这些多元化因素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事件而言，暴力冲突绝对不可能归咎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试图用单一原因来解释暴力冲突的理论，如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歪曲了事实的真相。如果必须要突出某一个论据的话，那么只能是老一套的地缘政治因素，因为战争最经常爆发在直接接壤的邻国之间。

当代战争和冲突的原因

亨廷顿意义深刻地写道：当代所有武装冲突中，几乎有一半发生在不同的文明集团之间。[①]当然，他从中为自己的命题找到了例证，但是在“伊斯兰的流血边界”中，他已经和统计学的基本规律产生了抵触。一个毫无任何偏见的读者可以从这些数据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半以上的内战和国际战争不是由文化的因素决定的；换句话说，这里还涉及到偶然分配的原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996 年有关全球战争以及冲突的统计数据。海德堡冲突研究会是一个专门定期对战争和暴力冲突进行统计工作的机构，根据它的统计数据，该年共有 27 起导致多人死亡的战争和暴力危机，其中只有 9 起发生在亨廷顿所认定的“文明断层线”上，而绝大多数，确切地说是 17 起，争端所涉及的双方同属于相同的文化圈。如果将种族因素也考虑在内，情况就

①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第 44 页

变成了这样：不同种族的成员，不同的部落、民族、种族或国家参与了21起暴力冲突，而在所有27起冲突中，总共只有6起与种族因素毫无关联。换言之：种族冲突占据暴力冲突事件的绝大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所有9起因所谓的"文明的碰撞"而导致的冲突中，种族因素也参与其中。"文明的冲突"是在冲突双方隶属于不同种族集团的前提下产生作用的，它是和已经存在的、严重的种族冲突一起发挥作用的。

亨氏"文明的冲突"作为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应该首先能预测未来的冲突，这样才会使我们看到他的理论的现实意义。在这一方面，海德堡冲突研究会的统计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统计了"潜在的冲突"，指两方或者多方之间发生争端，抑或是长期以来就存在某种分歧，完全有可能在未来某一时刻诉诸武力、但目前还没有爆发全面冲突的情况。例如在铁托时代就存在于南斯拉夫内部的那些矛盾冲突，它们在以极大的冲击力全面爆发之前，其潜伏期的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后期。在这个范畴内，我们这样推测，应该可以找到将来可能发生激烈冲突的地区，国际社会应对之密切加以关注，这样联合国和世界舆论就能采取一些调解措施。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及的总共52起潜在的冲突中，它们的情况究竟又是如何呢？其中只有18起，大约三分之一强，发生在"文明的断层线"上；而34起与此毫无关系。相反，这52起冲突中的36起，也就是说三分之二以上，是发生在不同人种的集团之间的。很显然，这里种族的因素还是占据了统治地位。[①]

① 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会，《世界冲突晴雨表》1996，Heidelberg

表 1：1996 年“文化”和“种族”因素在暴力冲突和潜在冲突中所占的比例（百分比）

名称类别	暴力冲突	潜在冲突
“文化”因素	32	35
“种族”因素	79	71

上述统计反映出：已经发生的暴力冲突与潜在冲突的类别划分并不影响统计得出的最后结论，文化因素和种族因素所占的比例关系没有因这种划分而变化。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潜在冲突中，多数情况下，准确地说有 30 起冲突是属于传统的领土争端类型，属于国际关系的传统规律。这一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 1996 年发生的 27 起暴力冲突中，只有 6 起是和传统的领土之争有关，相反，96 年的冲突大多数是为了争夺国家权力或者脱离联邦的“内部”冲突。而在潜在的领土争端中，也有较大部分发生在同一种族的不同成员之间（例如中国/台湾、南美、阿拉伯半岛），这使在潜在冲突中，种族因素所占的份额稍有下降，虽然这一点并不显著。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引发未来的潜在冲突的原因中，“文化”因素还是会落后于种族因素，并且和世界上不安定地区传统的国家间领土冲突相比，也绝对不会起到更重要的影响。

种族和民族作为文化因素

在世界近代历史上，“种族因素”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根本无须争辩，它常常变形为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以它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产生了巨大而深

远的影响。为了有别于这种泛泛的民族主义，我们把在美国、法国所形成出现的民族主义称作“立宪民族主义”。所有的事实都表明，民族主义不是“自然”遗传而来，也就是说它的产生并没有“生物基因方面”的根据。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与现代化的过程以及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民族的概念被“创造”出来，借助于这个具有超凡凝聚力的新概念，来开发工业化大生产和国内贸易所需要的广大区域。[①] 社会精英利用“神话传说”的强大力量，将流传于民间、本来并不相关的历史传说，经过精心缜密的演绎，塑造出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同一精神认同。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在强大且具诱导性的人文、社会理论的轮番“轰炸”下，世界各地都将“民族”这一概念构造成新时代国家的社会根基。贝内迪克特·安德森确切地将“民族”称为“想象的社会”（imagined communities），照此看来，民族既是文化的直接产物，也是文化认同的参考点。[②] 换句话说，在较小的范围内，民族只不过是被亨廷顿强调为社会中心的“文化社团”。

然而，在民族国家里，或许还存在超越民族界限的某种形式的种族认同感，这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是虚构出来的，它的形成是从历史上寻找一些断章取义的松散概念，人为加工拼凑在一起组合而成，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医学特征基础上的科学划分。因此，“把种族当作一种验证身份的特殊形式，并不是一直

①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1993

②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83

就存在的，而是必须先将它制造或者创造出来。"① 所以，种族团体或者部落也是“文化社团”，只不过其适用的范畴较之“民族”更为狭小。

适用范围的狭小和一览无余的种族特征正是产生下面现象的重要原因：种族社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文化杜撰的集合——被当成了认同的焦点，并因此而成为冲突中的一方，这相对于亨廷顿的文化社团，是更切合实际的恰当提法。东西方冲突——这种战后国际政治基本形式的瓦解，使得人们对“民族”的构想提出了质疑，欧勒·威佛、贝瑞·布赞及其同仁们提出的概念——“社会安全”涉及了更小范围的社团问题，它们的生存权益在广阔的民族国家（多半是帝国）的民族认同中根本没有被注意或者没有被足够地有所保留②。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安全和民族安全陷入了矛盾之中，这导致了民族基础上新的文化认同感的产生。在这些较小范围内的文化认同中，而不是在大范围的文化社团里，威佛和布赞预测到了未来可能参与严重冲突的“活跃分子”。

当然，这些学者把“社会安全”问题过分地局限于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也就是说主要归咎于民族认同感的作怪。他们错误地认为：在已经实现现代化和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社会化不再只是通过几代人之间的传统、伟大神话以及促成认同的文化遗产的传承而产生作用。他们的看法未免偏颇，恰恰相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因素今后还会继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

---

① Renate Kreile，“非洲种族政治化”，摘自“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9/1997”，第12－18页；Georg Elwert，“民族主义和种族”，“论我们集团的形成”，摘自“Kochlner Zeitschrift fue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41，1989

② Ole Waever／Barry Buzan／Morten Kelstrup／Pierre Lemaitre，Identity，Migr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London 1003

是，此外还会出现两个合理的社会化必然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功能性社会化和条约式社会化。

功能性社会化通过社会分工来实现，现代化不断推动并促进这种社会分工。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生活并产生影响的大众保证了再生产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巨大成就只能通过千百万人相互协作、分工明确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活动才能创造。人们必须适应这些社会化角色，按需要保留或者变更这些角色。这种现象被诺伯特·艾里亚斯称为“相互交错的行为链”，它是社会化的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条约式或法律式的社会化。法律制度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区分：什么是允许和禁止的、合法和违法的，并依此确定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国家的人，都应一视同仁，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法律在国家的社会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法律引导着法律工作者的行动，帮助他们进行社会协调。然而更易引起争议的是在发生法律争执时，所涉及到它的实际功能问题，是适用刑法、民法还是国际公法?[①]

身份、分配及权力：种族差异何时会导致冲突?

即使在我们有关冲突起因的统计数据中，被确认占据主导地位的种族差异因素，也不能作为导致有组织的暴力冲突的惟一起因，而且无论是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还是在那些正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中，情形都是如此。种族团体身份确认的关键并不

① Friedrich Kratochwil, Norms, Rule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1989

在于独特的生理标记，而在于其成员分享的共同精神遗产，这将他们与所有其他人区分开来。和其他团体相比，如果一个社会团体被政治因素造成的麻烦困扰越多，而且它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被区别对待，那么作为种族团体对其他团体的排斥感也就越激烈。优待和亏待一样，会促使相关的人员更强烈地意识到共同的利益和联系；相反，平等对待其他团体则会削弱这种集体意识的特性。①

除了种族差异，其他可以促使团体间发生冲突、最终引发暴力争端的因素包括：经济劣势；政治歧视；因移民潮加剧、对"自己"领土的事实占领而产生的人口压力；以及对自然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生态紧张"（饮用水资源减少、耕地面积缩小等等）。所有这些发展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严重威胁到有关团体的集体生存机会。并不是"身份"本身直接受到威胁，而是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即最急需的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受到威胁和损害。事实上，对身份的威胁和对物质生活需求的威胁总是相伴而来，它们往往一起推动受到威胁的团体和"侵略者"发生冲突。

在冲突的进行过程中，不同的威胁形式会引发不同的冲突形式和程度。例如，在最好的情形下，政治和经济歧视会引导遭受损害的团体争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而在最严重的情形下，则会演变成夺取国家政权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以期通过这种途径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对于人口压力和环境紧张这些问题，常常会成为要求区域自治的主要原因，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会导致争取独立的战争。

① Ted Robert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 C., 1993, 第3页

那么，在现代发生的战争中，文化因素和暴力争端的关系究竟如何呢？研究大量冲突实例的卓越学者特德·罗伯特·古厄和芭芭拉·哈尔夫，在他们的两份研究报告中仔细观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内部冲突，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不同种族政治和经济上的歧视性对待，应该对不断增加的暴力冲突负责。在已经确认身份的 233 个少数民族中，有 80% 的民族或多或少受到严重的歧视，尤其在那些民主国家，尽管他们努力追求参与政治生活和地方自治。在专制统治或者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少数民族则追求独立或者尝试夺取国家政权，然后由自己统治其他种族的权力竞争者。至于宗教所产生的影响，亨廷顿认为是文明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这两位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只有当传统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与世俗的价值观之间的裂痕，和种族分歧同时出现时，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才会倾向于激发种族间的冲突，例如在苏丹发生的长期内战。一般的规律是：如果掌握政权的团体企图将自己的信条强加于他人，那么宗教的差异会在冲突中更加加剧其紧张程度。但是我们对 233 个种族的观察显示：宗教的差异很少成为爆发种族冲突的惟一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相反，宗教差异通常和那些由少数民族、或阶级差别产生的种族冲突联系在一起……共同的宗教信仰就有点像将这些团体粘合在一起的'社会水泥'，然而，当今似乎只有在很少的一些社会，宗教差异才会成为团体间冲突的首要根源。"①

因此，迄今为止有关种族冲突最全面的研究，简单明了地验证了我对 1996 年有关冲突统计数据的解释：从亨廷顿的观点出发，"文明的因素"虽然可能激化由文明断层线产生的冲突，并

① Ted Robert Gurr / Barbara Harff, E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l., 1994, 第 25 页

因此而增加暴力争端的可能性，但是“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sations）极不可能成为暴力冲突的惟一原因抑或只是基础。只要浏览一下大规模暴力冲突或者当代带有暴力倾向的各种争端，这个判断就会得到证实。

前南斯拉夫的战争

二战后，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不同的民族团体处于一定的政治平衡状态之中，铁托努力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地方分权、经济平衡和地区代表制度，试图控制住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由来已久的潜在冲突根源。铁托大概希望通过时间的流逝来修复历史所造成的创伤。在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出现了不同地区间和平相处的大量事例，以及被世人津津乐道的超越宗教和种族界限的联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铁托的策略并非毫无成效。另一方面，铁托还尽力实施“分而制之”的政治模式、相互利用的政治策略、保持对抗的统治手法，以此来巩固带有很强个人主义和专制化的政权。作为一个平衡的伟大制造者，铁托本人一直是这架天平上的重要砝码，他一直是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

铁托去世之后，南斯拉夫没有出现理所当然的、并且是“合格”的后继者，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必须利用自己的某种“工具”才能登上国家权力的宝座。米洛舍维奇那时只是一个狂热狭隘的爱国主义者，直到1987年他才发现自己同胞身上所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是可以帮助他登上权力顶峰的合适工具。“塞尔维亚牌”给他提供了所需的“领地权”，米洛舍维奇得到了相对来说最强的民族团体以及一大批人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支持，这使他在面对可能的权力竞争对手时，先期赢得了优势。但是米洛舍维奇在施政中，严格地追求以塞尔维亚人为中心的集权

模式，这迫使其他的共和国，尤其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更加追随自己的宗教和民族利益。当米洛舍维奇取消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沃沃迪那的匈牙利人的半自治权之后，在普罗施蒂那和萨格瑞布立刻警钟长鸣。1990 年 1 月，一项剥夺地方政党权力、有利于贝尔格莱德中央集权统治的提案出笼了，这项提案甚至使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陷于流产。联邦军队发生了分裂，塞尔维亚的蒙特格林人拒绝接受一个克罗地亚总统在南斯拉夫与塞族轮流执政的设想，最终促使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走上了脱离联邦的道路——于是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假如铁托过世之后，南斯拉夫的继任领导者决定实施完全的民主化，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来设想一下：可能会形成一个多党派国家（也许会出台反对纯种族、宗教或地方性政党的法令）、联邦的两院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开放政策，也许南斯拉夫不会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局面会得到进一步扩展，文化的差异不至于蜕变成政治争端。这样，为了少数人的强权政治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独裁统治，相互敌对的种族形象又被重塑起来，它取材于那些过去的历史阴影，并被扩展得异常巨大。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暴力冲突，国际社会显得一筹莫展。英国和法国相信：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在地缘政治学上有其有利性；他们当然也考虑到另外一些因素，例如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是联盟关系，并且希望在巴尔干半岛存在一支倘若德国一旦出现不测事件，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俄罗斯也赞同这种观点。对于这个地区的重要国家希腊来说，塞尔维亚是其抗衡土耳其和马其顿的盟友。此外，英国害怕在巴尔干地区出现北爱尔兰的状况，人们对因干涉别国内战而使自身陷于无法自拔的境地，早就有充分的认

识。法国常常为科西嘉的分裂势力感到头疼，偶尔也为布列塔尼地区的分裂运动懊恼，所以这种脱离联邦的行为使他们大为不悦。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和意大利（南蒂罗尔州）也因为内有隐情而颇有同感。而德国则强调民族自决权，坚持对有目共睹的侵略者进行国际裁决。丹麦、荷兰和美国一样，对这种看法表示赞同。

试图通过对谋求独立的共和国给予国际承认，并运用国际法通则来解决这场争端的设想，被事实证明是过于天真的幻想。它打开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冲突的潘多拉魔盒，一场残酷的、持续三年之久的内战紧随而来，它比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为谋求承认的争端更为糟糕，波黑冲突在国际社会看来也是无法做出统一结论的，不同国家的人们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歧并没有导致欧盟、北约和欧安组织的解体。随着战争持续时间的加长，各种对战争的观点看法越趋接近，最终在美国的大力倡导下实施了共同干涉，虽然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经历了长时期的踌躇不决。这场冲突也具有其特殊性，原本是一个国家的内战，但却很快地转变成了国际干预下的地区冲突。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绝不是一场代表大国利益或者代表某几个文明的战争。几个党派互相攻伐残杀，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直到“西方国家”、“东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终于都忍耐不住了。在北约使用武力制服了波黑的塞族以及俄罗斯外交使团取得必要的调解成果之后，所有这三个文明集团都派兵参加了维持该地区和平的国际维和部队。

① Johann Georg Reissmueller，《波斯尼亚的悲剧》，Stuttgart 1993

海湾战争

1990年至1991年在海湾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引发这场战争的导火线实际上是一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对另一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粗暴占领，并企图将其吞并。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点却被亨廷顿先生忽略了。事实上，如果不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战争采取果断措施的话，那么会直接导致三个后果：1）禁止侵略行径的国际条约将被严重损坏，国际法也因此而遭到践踏；2）世界石油储量一半以上的控制权，可能会陷入一个专横跋扈的独裁者之手；3）在一个保持相对势力均衡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个霸权国家。这三个动因促使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的国家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不同寻常的联盟，在美国的坚决领导下，在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的明确宽容下，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终于用武力结束了萨达姆对科威特的侵占。

萨达姆·侯赛因在最后阶段（为时已晚），终于想起把伊斯兰社会的统一精神价值认同作为自己的宣传工具，他试图将伊斯兰与外部世界对立起来，以期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支持。然而他所呼吁的"圣战"只在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中（而不是政府）得到了一定的响应，而且这些支持也不是占据社会主流的声音。对于这种现象，人们不禁要问，伊斯兰宗教教义难道就是伊拉克获得某些国家人们支持的法宝？其实不然，更可信的推测是：几十年来，由于阿拉伯军队不断地在军事上遭受屈辱，这使得许多人在悲观失望之后选择了妥协策略。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帝国主义殖民时期的悲惨境遇、与以色列几次战争的连续败北之后，对于另一些阿拉伯人来说，现实已经实在无法被承受了，他们需要一位

阿拉伯的民族英雄。故而他们支持萨达姆·侯赛因这位强硬的阿拉伯斗士。事实上，参与对伊作战的阿拉伯政权（摩洛哥、埃及和叙利亚），在战争结束六年之后仍然稳居统治宝座；而对于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的另外一些国家，战争的结果则使他们摆脱了萨达姆的纠缠，他“星期五的布道”在那里没有得到响应。

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统的政治目标而发动的，对于地处该地区的参战国尤其如此：伊拉克企图通过武力确立地区霸主的地位，消除不幸的债务危机；海湾各个国家的反应纯粹是出于自我生存原则的本能反应。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各怀心腹之事”：叙利亚害怕日益强大的直接邻国危及自身的安全；埃及遏制了一个竞争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有力对手。值得一提的是海湾战争的作战技巧，以及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它证明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冲突模式的实践可能性：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虽然不是在其直接的政治控制之下。

近东和中东的冲突

海湾战争发生在伊斯兰国家近东冲突的边缘地带，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显然，在这种冲突中，宗教文化因素似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仔细地分析，就不难发现这里主要涉及的斗争形式，还是党派国家之间最常见的冲突类型：即为了一块双方都认为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进行争斗。此外，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争端，则是近东和中东地区极其复杂的冲突结构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徒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一个建立在犹太民族历史发祥地的民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到了英国政

府的支持，在今天以色列的国土上建立了在英国委任统治下的自治领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即所有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下，犹太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

以色列的建立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则是可怕梦魇的开始，巴勒斯坦地区聚居着大量少数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种，那里生活着犹太教徒、伊斯兰教的什叶派教徒和逊尼派教徒、基督教徒以及德鲁士人。他们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共同生活了几百年。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近代，阿拉伯世界一直隶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版图，但他们显然受到欧洲帝国主义的巨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一场伟大的解放运动，在英国军官劳伦斯的领导下，阿拉伯人奋起反抗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对最终打败奥斯曼武装力量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但是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人并没有实现他们所向往的国家独立，而是屈服于英、法两国打着国际联盟托管幌子的统治。阿拉伯世界被随意拉扯的分界线所切割。那时在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地区，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纷涌而至的犹太移民。

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不仅加速了这种移民狂潮，而且培养了这个年轻的以色列国家居民的一种举世独特的自我防卫意志。在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结束后，由于战败，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赶出祖传的聚居地，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对阿拉伯人的极度侮辱，于是他们致力于消灭这个新兴的犹太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出于各自的考虑，或多或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这个目标。在阿拉伯世界，领袖对于目标的确立往往起着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巴勒斯坦人的好战性，被以色列国家的民主体制（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的国家定义）所反证，虽然那里的阿拉伯少数民族获得了比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同胞更多的公民权

利，但是这些权利还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巴勒斯坦难民拒绝返回被占领土。

这个地区已经发生过五次较大规模的流血战争，1967 年的战争使以色列取得了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权；出现了更多的巴勒斯坦难民。此后，以色列开始执行对被占领土有争议的移民政策，围绕这块土地的冲突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它成为满怀希望开始的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最大绊脚石。不能忽视的是，在这场争端中，双方的宗教信仰的差异成为政治文化冲突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冲突的原因，而是冲突的结果。①

中非的战争

我们对发生在卢旺达、布隆迪和扎伊尔的种族残杀还记忆犹新，这是最近以来发生的最血腥的武力争端，同时它们也形成了最复杂的冲突类型中的一种，在这里文化因素只起到了非常次要的作用。②

几个世纪之前迁移到大湖区的图西族游牧民族，和在此之前居住在那里的土著居民胡图族农民在传统上一直关系紧张，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差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所以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社会阶层，而不是有据可查的种族归属。③ 在殖民时代，西方殖民者通过给予好战的图西族人以特权，有意识地充分

---

① Claudia Schmid，《以巴冲突及中东在东西方冲突结束之后作为安全政策地区的意义》，Baden－Baden 1993

② Colette Braeckmann，Terreur africaine：Burundi，Ruanda，Zaire，les racines de la violence，Paris 1996

③ Renate Kreile，"非洲种族政治化"，摘自"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9/1997"，第 16 页；

利用了这些残存的文化差异，用以巩固那里的统治。摆脱西方控制、获得独立，对于胡图族（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占国家总人口的80%）来说，意味着必须夺取国家政权，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对于图西族来说，掌握国家权力则是防止不可避免的复仇的必要手段。在这种情形下，在这两个国家，国家权力不断交替更迭，并因此而发生了不少大屠杀惨剧。在卢旺达，由多数民众选举产生的胡图族总理哈伯亚瑞玛那推行的是一种民族和解政策，国内局势还算稳定，但是当他 1994 年因飞机失事丧生后，形势急转直下。胡图族军队和胡图族民兵借机对图西族发动了近乎于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同时，受到乌干达政府大力支持的一支图西族游击队正赶往卢旺达，试图驱逐前胡图族政府及其聚集在扎伊尔难民营的武装力量。几乎在同一时间，布隆迪前图西族领导人布尤亚推翻了民选的胡图族政府，结果两个国家的图西族中坚分子和其远房“亲戚”——被选举出来的乌干达总统穆赛维尼组成了联盟。

扎伊尔是一个民族结构组成复杂的中非大国，各省份和部落追求地方分权，而金沙萨那些腐败的统治者，那些沉湎于优厚年金的官僚们则更倾向于中央集权统治，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一系列血腥的独立尝试，虽然没能取得成功。但由于金沙萨政府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情况日趋严重，地方力量终于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行动自由。

在位于大湖区的基伍地区，传统上存在一个主要由图西族组成的移民社区，卢旺达和布隆迪独立以来，这一地区一直保持着大量的图西族移民。这些经济上颇有建树的少数民族引起了当地人的忌妒。1993 年和 1994 年，在北基伍的邦亚旺达社区图西族移民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此后在 1996 年中期，南基伍省省长试图实施中央政府 1981 年公布的一项法令，根据此项命令当地

的图西族居民和邦亚穆楞格人将被驱逐出扎伊尔。正如人们所期待的，这些少数民族组织起武装反抗，借助于外界的援助，很快动摇了力量薄弱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自1996年开始，该地区出现了以下形势：成千上万的胡图族人聚集在难民营里，前胡图族政府的武装部队和民兵取得了这里的支配权，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开始实施游击战。试图和这两个国家的图西族政府相抗衡，扎伊尔政府支持胡图族懦弱的前中央政府；扎伊尔东部图西族后裔则奋起反抗扎伊尔中央政府，并实施了有效的抵抗运动。

此外还有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乌干达，一个本来健康而强大的国家，和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一起，资助南苏丹的叛军对抗喀土穆的伊斯兰政权。而后者则通过支持乌干达北部和其他两个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和正统派基督教派别的独立运动来进行报复。另一方面，对乌干达蒸蒸日上的经济繁荣产生不信任感的扎伊尔，在扎伊尔北部则为受到苏丹穆斯林政府支持的反乌干达组织提供了出击阵地。因为这个原因，乌干达对大肆削弱扎伊尔表现出浓厚兴趣。

这的确错综复杂，难道不是吗？其实我还没有提到法国和美国的矛盾，这一点对前面提到的那些派别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他们对这些互相残杀并没有给予决定性的支持，只不过提供了更多的武器装备、提供了更好的训练，也就是说帮助培训了更有效的杀人机器。当然，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政府也大量地资助了邦亚穆楞格、乌干达和卢旺达的起义者，在必要的地方还派遣了自己的军队。胡图族难民营遭到破坏，民兵被击溃，难民中的一大部分被重新驱赶回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图西族政府控制区，另外一部分人则被屠杀了。邦亚穆楞格人组成了一个日趋扩大的反叛基础，他们与独裁者蒙博托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一匹年

老的战马，一个前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反蒙博托主义者，尽管不是一个民主先驱——劳伦特·卡比拉视死如归地驰骋在满载“炸药”的马车之前。腐败的蒙博托独裁统治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在几个月内就轰然倒塌了。

中非变成了一杯易爆的鸡尾酒，跨越国界的种族冲突、国家冲突以及反政府的政权冲突层出不穷，政府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符合“好政府”的原则。大湖地区的巨大人口压力日趋严重，例如卢旺达的人口密度比地域辽阔的扎伊尔高出好几倍，这就使得种族冲突同时演变为争夺领土的生存冲突。苏丹所倡导的“文化”接触只能算是个别现象，同样，前殖民大国法国和现在的超级世界大国美国自吹自擂地介入，虽然也并非这一地区的主流现象，但无疑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于 1747 年建国，基本确立了近现代阿富汗的版图轮廓。然而，这个高原内陆国家始终被“地理”和“民族”分割得四分五裂，活像一块打满补丁的阿拉伯地毯。它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淫威下得以生存，保持有限的独立状态，完全应当归功于 19 世纪末的沙皇俄国和大不列颠帝国——这两个当时的帝国主义强国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势均力敌的“激烈争夺”。有鉴于阿富汗通行不便的地理条件和全民皆兵的备战意识，两个列强同意将这一地区作为权力真空区域，形成缓冲地带。那时穆斯林已经成为阿富汗惟一团结且具有凝聚力的整体力量，其余的都是一些不能走向联合统一的民族。阿富汗的民族组成主要包括巴什图人（Pashtun），今天约占总人口的 40%；（西方人习惯称之为“巴坦”［Pathan］，仍属土耳其－伊朗种族，也有学者认为他们

是以色列失落部落的后裔——译者注）塔吉克人，约占总人口的25%（塔吉克，意为农民——译者注）；蒙古族黑绍人（15%）、乌兹别克人（5%）和哈萨克人（5%）。对于这些民族的团结性，我们绝对不能给予过高的估计。他们又分成不同的、更加分散的、规模相对更小的一个个部落，甚至在山谷地带和丛林中也有各自的领袖。因此，阿富汗的国家政权总是建立在最低限度的中央集权与明显的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基础之上。20世纪以来，微小的现代化发展还是“解放”了一批对现状不满的有识之士，他们形成了阿富汗共产党的社会基础，而共产党又马上分裂为两个对立的且具有种族倾向的派别，一派主要由巴什同人组成，而另一派则主要是塔吉克人。1973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试图对国家实行集权统治，并将其世俗化。中央集权的努力使得地方势力开始反对中央政府；同时，喀布尔政府的反宗教政策又使得地方势力能够把伊斯兰教当成动员民众的工具。当“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苏联人，忠实的勃烈日涅夫教条主义者通过武力干预，帮助遭受反抗、受到极大威胁的阿富汗共产党保住并巩固其政权时，伊斯兰教的影响越来越大。

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之后，抵抗团体之间早已明显的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了。这种混乱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在反复的合纵连横之后，最后一任共产党首脑纳吉布拉终于取得了胜利，和塔吉克伊斯兰教徒领袖瑞巴尼组成了脆弱的联合政府，瑞巴尼和前共产党乌兹别克将军道斯坦、塔吉克伊斯兰教首领马苏德、海拉特省强权人物伊斯梅尔·汉以及哈扎瑞的什叶派领导人阿里·马扎瑞组成了广泛的联盟。野心勃勃的巴什同伊斯兰领袖海克马特亚曾反对这种安排，作为最强大少数民族的领袖，他要求获得权力的主要份额，并且很快得到重新倒戈的道斯坦的支持。当然，期间也产生了对海克马特亚形成威胁的敌对政治派别——塔

利班（古兰经学生派），他们大多在流亡巴基斯坦时，得到了神学和军事方面的培训，他们提出了和海克马特亚一模一样的政治要求：即只有自己才能代表真正的伊斯兰教和巴什同多数人的利益。巴基斯坦对过于独立的“学生”——海克马特亚非常不满，于是从军备和资金上对塔利班慷慨解囊。美国对这种援助也表示赞许，他们希望借此得到一条不倚赖俄罗斯而又可以连接中亚能源腹地的通道；况且美国的“死敌”——伊朗很不喜欢塔利班，正好可以借此削弱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此时道斯坦也站到了塔利班一边。这样，1996 年 9 月新的联盟终于在在喀布尔建立了政权，内战当然还在继续，尤其是在哈扎瑞什叶派领袖阿里·马扎瑞被刺杀（1995 年 3 月），使得伊朗更加坚定地执行反对塔利班的政策之后，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为伊朗认为什叶派阿富汗人的生存受到了逊尼派的威胁。

1997 年，哈扎瑞、瑞巴尼、海克马特亚组织的余部、马祖德以及多次变换阵线的道斯坦组成的联盟和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塔利班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塔利班极端教条主义的神权政体已经开始疏远极其虔诚的都市阿富汗人。就这点而言，目前塔利班的军事优势可能还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今天，塔利班已控制了 90％的阿富汗领土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取得了事实上的国家权力，但这个政权没有获得有效的国际承认，阿富汗内战并没有完结，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们拭目以待——译者注）

巴基斯坦－印度的断层线

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冲突至今已引发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战争、无数次小规模的边境争端以及这一地区的核军备竞赛。在殖民统治时代，英国殖民统治者为了尽可能地保障没有“任何摩

擦”的统治，考虑到南亚次大陆民族和宗教的差异，在行政上已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聚居区有所划分，两国最终也是以这样的划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原有统一的殖民政治体制里，穆斯林曾享有特权。二战结束后，该地区的独立已势在必行，穆斯林肯定担心在独立之后印度教徒占据多数的国家里失去这种特权。于是，穆斯林领袖合乎情理地提出建立自己国家的要求，而行将终结殖民统治的英国人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事实上，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民族迁移，是一段伴随着大屠杀的、具有某种戏剧性的苦难历史。

从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就形成了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两个根本症结：领土的争端和各自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矛盾。[1]领土冲突是指克什米尔高原地区的归属问题。在英国殖民统治末期，这个地区的归属就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该地区人口的大多数是伊斯兰信徒，但是当时信奉印度教的地区统治者必然更加亲近印度。在紧接着的战争中，该地区北部归属于巴基斯坦，而南部更广袤的地区则被印度所控制。联合国提出的在克什米尔地区举行全民公决的要求，遭到印度政府的坚决反对。但是克什米尔地区从来未能完全和印度联邦实现一体化，相反，当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更年轻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代人要求得到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力时，印度中央政府限制了该省的很多民主权利，采取了更多强硬的政治措施，以便将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可能出现的独立愿望扼杀在萌芽状态。就像我们所预见到的那样，反抗运动更加激烈了，并得到巴基斯坦秘密警察和阿富汗战争中老兵的援助。抗议行为明显出现暴力倾向和更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印度安全部队对此反应极为强硬。在该地区人权遭受损害的事例比比

① Sumit Ganguly, Kashmir: Between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1997

皆是。沙新冰川地区是一个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偏僻高原区域，那里从未解决过停战和分界问题，不断出现新的武装冲突，把两个敌对国家带到战争的边缘。

第二个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巴基斯坦认为自己是印度的穆斯林；而印度则把自己当做是所有印度教徒、包括一亿两千万穆罕默德信徒的世俗国家。从印度的角度出发，巴基斯坦就根本不应该存在；而从巴基斯坦的角度看来，印度的存在是对自己国家生存的根本挑战。这种矛盾又因为两个国家的多种语言文字和多民族特征而变得更为复杂尖锐，并迫使两国的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呼吁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从而将各方力量团结在一起。这同样也需要描述一个敌对势力的画像，将内部的紧张关系转移到外部敌人身上；可以不断当做统治手段用于对民众的动员；同时，它也衍生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功效，就是对政府而言，可以引开大家对自己无能和失败的注意力。[1]

改变越多…

当前其他地区的流血冲突都只不过是上述这些事例的变种。在土耳其和伊拉克，不同地区的库尔德人组织的争取领土自治或完全独立的斗争，也是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具有统一的民族基础，但直接引发这种反抗运动的真正原因多半是政治因素，有时也包括经济上的歧视。在苏丹，不同的民族和宗教团体相互对峙，北方穆斯林政权（国际承认的苏丹中央政权——译者注）力图对南部信奉基督教和自然拜物教的非洲居民进行有效统

---

[1] Raju G. C. Thomas, South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90s: The prospects of war and peace in South Asia, London 1993

治，因此而导致长期内战。在阿尔及利亚，世俗力量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进行了国家权力的争夺，然而这是一场发生在同一文化圈内的“政体之战”。同样，阿富汗海克马特亚和塔利班的争端也发生在巴什同少数民族之间。

总之，对于这些冲突的研究证实，对现代战争的起因，我们应该有更加广泛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是我们从统计分析中得出的结论。目前最危险的冲突和最血腥的战争发生在具有同一文化圈背景的中非、阿富汗、库尔德、阿尔及利亚和南北朝鲜等地区，发生在上述前三个地区的冲突具有非常明显的种族因素；此外，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中非和南北朝鲜的争端还属于政权之争的范畴。在朝鲜半岛和非洲的冲突中，边界的安全困境也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因素。

南亚、斯里兰卡、波斯尼亚和中东的冲突发生在文明的断层线上，然而它们全部具有强烈的民族背景。在斯里兰卡、波斯尼亚和中东，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歧视而加剧了冲突的爆发程度。所有引发这些冲突的原因都是传统的领土争端——即各争端方都认为某一块领土属于自己，要求对其实施控制权。此外在南亚和中东，地区安全隐患还对冲突的加剧产生了影响，由于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但是，暴力冲突从来不是简单产生的，引发它们的原因决不是20世纪后叶出现的某位学者的“新发现”。推动这些冲突和战争的原动力，自古以来也同样导致了民族内部为争夺权力而相互间进行的屠杀。“尘埃落定，皆是尘埃。”这句法国谚语告诉我们：改变越多，剩下相同的东西也越多。只有当人们对冲突的起因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之后，才会明白为什么寻找解决之道如此困难；同时，也只有当我们对冲突有了这种层面的认识之后，才有助于我们找到最终可以结束武力冲突的可行方法。

第三部分　分　　析

1

我们是谁——从“西方文明”的起源说起

匆忙宣布的胜利：不是“历史的结束”

什么是“西方文明”？对于西方“冷战胜利”仪式的典礼官、才智卓越的佛朗西斯·福库亚玛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楚明了、不言自明：“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征是人权、市场经济、现代化技术、典型的民主体制、公民权；“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是文化的多元化、政教分离、自由和宽容。福库亚玛认为人类已经走到了文化发展的终点，而自由主义的继续发展将是不可想象的。①

塞缪尔·亨廷顿对福库亚玛的“西方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哲学观点持谨慎的反对态度，因为他认为其他文明的威胁正在日益迫近。但是，他未加仔细思索就接受了福库亚玛对“西方文明”的诠释；在这方面，他惟一强调的不同点是有关多文化主义，亨廷顿认为多文化将会对西方社会产生有害的冲击。令人惊讶的是，在更为广泛的公开讨论中，也没有提出对“西方文明”本身的任何质疑，而到处充斥着的只是那些沾沾自喜的溢美之

① 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结束：我们位于何处?》，Munich 1992

词。而实际上，我们西方社会也同样面临着全球化大动荡的考验，这种动荡在世界其他地方已引起了令人不安的身份辩论和认同危机。①

因此，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我们有理由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西方文明和我们（西方）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它们之间的矛盾、危险的裂痕以及它们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革等诸多方面去探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我们能够领悟这种巨变（指全球化——译者注）给我们提出的重大使命，那么我们更容易理解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困难。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本身也是处在求索的途中，那么就可以从其他人的实践经验中有所借鉴。诚如此言，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更为坦诚的方式，与其他文明的人们进行对话，而不会以西方一贯的教导态度，去对待其他所有的文明集团或国家。

然而，决不能将这种坦诚和后现代多文化主义所倡导的随意性混为一谈。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过意不去”而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事实上，这与后现代文化哲学的趋势恰恰完全相悖，是对所谓“好战”的西方文明成绩斐然断言的清醒“拆析”。人权、男女平等、民主政体、法制国家、言论自由、理性的讨论以及市场经济秩序——所有这些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巨大财富，只要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新选择，就不应当不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而加以背弃。西方社会只是敷衍塞责地实现了这些原则中的大部分，然而在对外进行文化传播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却常常因此付出了牺牲政治或经济机会的代价，当然这些现象和西方的价值

① Hans-Peter Martin / Harald Schuhmann，《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社会福利的进攻》，Reinbek 1996

观并不对立，但是它绝对会有害于西方政治本身。[①]

法制国家和人民主权

像以前的许多学者一样，亨廷顿将西方民主和人权的历史，一直追溯到1215年英国签署的第一部基本法—《大宪章》。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西方文明”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异常复杂的过程，今天的“西方文明”较之其原始的雏型，其改变是彻底的，是脱胎换骨的新生，是质的飞跃。实际上，《大宪章》只不过是贵族、国王和高层天主教士之间订立的制度化法律约定，以便于他们尽可能没有摩擦、没有冲突地瓜分从劳动阶级那里掠夺来的财富。这一点我们在今天非民主的社会里也同样可以发现：例如独裁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也服务于同一目的。至于最终西方的民主法制国家是否发轫于《大宪章》，《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还没有明言。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些发生在人类蜿蜒曲折历史中的伟大运动一定起到了某种关键的作用。

巴萨姆·提比眼光犀利、思想敏锐，在德国，他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他以一种错综复杂和饱含经验的视角解释道：西方政治文化的最重要产物之一——民族国家，是被“硬凑合”地塞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因为那里的文化传统除了宗教君权之外，不允许存在任何其他的主权概念，所以这一概念不可能在当地的环境中扎根发芽。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的民族国家是从“主权在

① Bassam Tibi，“生活在安拉的阴影中”，摘自《伊斯兰教与人权》第六章，第337-351页

民”的原则出发的，而这一点对伊斯兰社会则是完全陌生的。[①]

但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并不是出现在近代国家发展的开始，而是在其后期，最初，没有人注意“主权”这个概念，它也根本不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让·伯丁在16世纪“发现”了主权，他向一位对内和对外都能完全独立做出决定的侯爵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很显然，“侯爵”地位的合法性归根结底也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这就是被公认的“君权神授”的概念，即上帝赋予某人统治的权力。从德意志民族建立神圣罗马帝国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观念都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无论是专制主义的法国，还是亨利八世提倡民族解放时期的英国，都不会拒绝这种上帝赐予的统治权威，至今英国君主在形式上还位居英国圣公会的首脑地位。现代所谓标准的西方民族国家，原先其实也只是个人化的武力垄断，直到后来才变成现行的民主政体。

民族和民族国家

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概念绝对不能等同起来。[②]如果我们说西方民族国家从历史上就已经形成了单一的民族概念，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实际上，这种变化开始于世界近代史的早期，那时民族国家的雏型以今日的道德水准观之，是一种令人极其不悦的政治构成。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精心的粉饰之

---

① Bassam Tibi，《文明的战争》，“理智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政治和宗教”，第一章，Hamburg，1995

② Bassam Tibi，《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体制》，“国际政治的地区从属体制”，第一章，Mannheim 1996；《文明的战争》，“理智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政治和宗教”，第67－74页，Hamburg，1995

后，我们对此却逐步形成了非常理想的诠释．在法国和英国，近代开始建立的民族国家，最多只能算是封建王朝的又一次改朝换代，而这次与以往稍稍有些不同，新王朝完全战胜了它的对手们，这些对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争斗中，要么被损耗战拖垮；要么被歼灭战清除；要么沦为新王朝的附庸，势力被大大削弱。最后，取胜的王朝把已经形成的领土国家当做了家庭财富，这样就形成了近代的法国和英国民族国家，尽管它们只是某一家族的私有财产。俄罗斯“恐怖的伊万”和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也同样是通过这种途径继承了各自的国家。

而在西班牙，这个过程是通过两个步骤完成的：首先，通过卡斯提廉大公国的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大公国的费迪南德的联姻，使得两个争夺民族国家战利品的主要对手以和平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当然联合是在这两个公国——卡斯提廉和阿拉贡用武力吞并了大量潜在的竞争对手之后才发生的。另一方面，针对西班牙南部的敌对势力，主要是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的埃米尔（伊斯兰世界对酋长和王公贵族的尊称——译者注），在征服者宗教的旗帜下，双方展开了激战，最后，在神圣的十字军东征的外衣下，战败者的领土合乎情理地归入了胜利者的版图，形成了近代西班牙的大体轮廓。

德国的情况也充分体现了“民族先于单一民族国家”的论断，但是这里也给我们带来了疑问，尽管可以肯定，在知识阶层、工商界、资产阶级中都普遍存在强烈要求消除割据状态的倾向，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小城市，人们还是对各个地方/地区的封建主保持着忠诚，这种情形遍及德国的整个南部地区，也包括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汉诺威地区和但泽自由直辖市，后来是“铁血宰相”俾斯麦依托实力强大的普鲁士军事力量，通过普奥、普丹和普法三次王朝战争，最终迫使“德意志民族”变成了

单一的民族国家。[1]

理性主义、宗教和政治

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具有很浓重的理性主义色彩，在这种作用下，自然科学、历史主义和法学论证替代了教条化的宗教神学；国家和教会、政治和世俗被分离开来。但这种发展和进步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在穿越过中世纪基督教野蛮统治的黑暗后，艰难地走到我们面前的。更确切地说，理性主义态度存在的历史相对较短。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一些过分虔诚的教徒、狂热的宗教追随者和披着宗教外衣的野心家，仍然潜伏在我们社会的理性表层下，窥测可乘的机会。

从13世纪一直到18世纪，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诠释教条化的基督教教义的争论，始终贯穿着这段西方历史，最后形成了一个基准点，而它在很多内容上甚至成为最血腥政治争端的中心参考点。当然，与之并驾齐驱的是——常见的、围绕政治利益的竞争游戏。但是参与争夺领土统治权的竞赛者必须把他们的主张紧密地和宗教争论联系起来，以便能够如愿以偿地获得其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在和阿比尔异教徒（阿比尔教派：起源于11世纪法国阿比尔的基督教派别，13世纪被诬为异教徒，遭到教皇和法国国王组织的十字军的镇压）的论战中，非常年青的法兰西民族国家在13世纪终于将政治权力集中起来。波西米亚地区的胡斯起义（15世纪捷克爱国

---

① ThomasNipperdey，《1800－1866年德国历史》，"资产阶级和强国"，第4版，Munich 1987；《1866－1918年德国历史》，第1部《民主前的强权国家》第一章，Munich 1993

者和宗教改革家胡斯的信徒为实现他们的宗教、社会和政治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做好了准备。随着基督教重新征服西班牙，伊比利亚王国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强国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从 16 世纪早期到 17 世纪晚期，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争论一直贯穿着欧洲上层的政治之中。最终日益强大的、建立在宗教信仰一体化基础上的各个民族国家站到了欧洲的政治前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因为领土和宗教问题，长期陷于分裂状态的弱小德国。

欧洲文明的曲折前行是以它们的竞争机制为前提的。民族国家之间严酷的强权竞争，迫使其统治者大力实施以科学和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谁若在这方面犹豫不决，就会坐失发展的良机，并且很快会被政治对手抛在后面，民族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都可能会因此遭到打击。

理性主义的传播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与此相反，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杀戮、鲜血和苦难。在启蒙运动时期，英国圣公会奥拉宁的威廉及其追随者，以最血腥的方式镇压了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法国，路易十四取消了对胡格诺派教徒的南特宽恕敕令；玛丽亚·特蕾西娅把成千上万勇敢的新教徒驱逐到西里西亚和普鲁士。在西班牙，宗教法庭残酷地折磨那些假想的异教徒；而在其他地方，包括北美洲，狂热的教徒们毫不怜悯地对被判为“巫婆”的妇女施以火刑。路德教派统治下的君主们使得大学里的无神论者惶惶不可终日，在瑞士、荷兰这些新教国家，教徒们狂热的原教旨主义一统天下；而在瑞典、丹麦和萨克森大公国，占据多数的是不宽容的“市侩型”路德派新教徒。

政治上的合理化改革，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治机构上的政教分离，然而这种变化也并非顺理成章。尤其在变革时期，这一进程随时会受到根本性的威胁和挑战。天主教会和普鲁士王国之间的

尖锐矛盾引发了19世纪所谓的"70年文化战争"，在前联邦德国，这种政治和宗教不可调和的矛盾，六七十年代在有关教会学校地位作用的争论中，还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然而宗教改革以及政治革新并不能解决欧洲大陆的一切问题，新教教会在这方面有时也是一筹莫展。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西方新霸权势力——看似经过彻底地合理化变革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过程中。看到这里人们可能会大吃一惊，那么睁大眼睛看看，千万不要忘记这样的历史事实：欧洲人移民美洲大陆的过程完全是在宗教的一手推动下完成的：正是那些勇敢的"朝圣者"取得了最初的迁移胜利。他们逃离欧洲大陆的首要原因并非政治压迫，而是宗教压迫。于是他们追求可以不受阻挠地信奉宗教的自由，尤其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各州，这种愿望表现得更为强烈。于是，在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里，许多定居者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一个全体教徒都能够参与政治决策的新教国家。

美国政治从未完全摆脱这种宗教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政治和宗教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以不可阻挡的力量重新回到了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事实上，新教原教旨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俘虏了保守的共和党——美国政坛最有势力的两大政党之一。共和党选民中有40%属于宗教团体，他们的力量在18个州中处于该党的主导地位，并且在其他13个州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从堕胎到社会福利，从经济发展政策一直到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等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宗教都一起在参与决定着美国国会的辩论。原先牢牢掌握在"理性主义者"手中的联邦政府，不得不对这种力量对比"付出代价"，而且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例如在媒体面前祈祷的总统），有时实质性的妥协也不可避免：例如当德国民主党对基督教科学会（Scientology）采取防御措施时，

美国政府在压力下却对他们提出了生硬的批评。[1]

今天，在整个西方社会里，基督教科学会教堂数量的普遍增加便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表明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对非理性的需求有所增长。80年代以来，“新时代”的神秘论也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说明占据优势地位的理性主义，已经至少不能满足一小部分重要少数人群的思想需求。结论很清楚：今天，推理式科学的、理性的裁判角色，在世俗、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不再是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理所应当的必然。正是在我们已经面临的重大变革时期，有识者应该重新为理性而战，否则看上去坚不可摧的西方理性主义大厦，很可能受到正统基督教的倾覆威胁。

自我个性的形成和集体主义

在西方文化中，个性解放的意义相当深远，使得“个性主义”成为这种文化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单个的人被看作是社会的基础，并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权”。个体的权益应该排在集体之前，这是西方社会和其他各种文化的本质区别，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这种思想无疑给专制统治设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强调个体使得个人可以不接受集体名义下的支配，而所谓的“集体”利益往往都是统治者利益的集中体现。这样，个人与集体的联系不再是单纯通过义务的方式，而是个体以“权利人”的身份为前提，融入到集体当中去。“他”个性的独一无二、“他”的尊严以及“他”身体的完整性，都不应该因为集体的要求而受到损害。

① Damian Thompson，《时代的结束》，Hildesheim 1997；Claus Leggewie，《America first?》，“保守革命的失败”，Frankfurt 1997

然而“个性主义”决非与生俱来，这一原则的获得也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备受非议。中世纪的欧洲还不存在这种个人主义，个人一方面是封建从属物，是封建地主附庸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基督教教会通过道德和宗教仪式所形成组织的一部分。教会以今天看来简直无法想象的方式，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那些反对当时这种主流社会意识、要求获得人类个性解放的“非正统派”，则被当成异教徒、女巫和渎神者加以迫害，甚至被毫无人性地剿灭，如在烈火中永生的杰出自然科学家乔达诺·布鲁诺。

即使到了近代早期，尽管城市化的趋势不断扩展，但这种状况仍然没有任何改变。人类依旧习惯于生活在集体农庄、城市社区、行会等组织中，个人的个性需求没有得到任何的重视。我们由此可见，文化先期烙印的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至今，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的广大农村和小城镇，这种集体主义所要求的高度一致性带来的对个体压力还明晰可见，甚至在美国这样的个性化自由的中心，也未能幸免。

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这种集体主义式的宗教背景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能将人们从固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尽管现代启蒙哲学强调了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但是它主要的成就还是“狂飙突进运动”和早期古典主义所强烈展现的个人主义以及由此而创造出的一些杰出的文学作品，如《少年维特的烦恼》、《强盗》等。最后，在法国革命中，得到法律明确保障的个人主义的凯旋队伍，走向了一个通往全新的、以极端暴力方式造就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国家利益。这种偏离个性的行为把很多人送上了断头台。[1]

---

① Francois Furet / Denis Richet，《法国大革命》第七章，Frankfurt a. M. 1989

很快，在许多地方民族主义用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创立了那些在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机构。这样，国家公民不再是存在于推理中的社团组织成员，而被看做是无所不包的“民体”中的一个成员。很显然，这种新集体主义思想比现代化之前在西方乡镇流行的、要求个人服从集体的观点要高明许多，亨利希·曼在《臣民》这部小说中不仅深刻揭露了当权者毫无顾忌地要求民众一致臣服的丑恶现象，同时也嘲弄了市民阶层惟命是从、竭力迎合统治者要求的虚荣心，这部意义深刻、具有警世作用的著作使作者赢得了很高的历史地位。这样，“新版的”民族主义席卷了所有“西方”国家[①]，同时，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也一直在数目相当可观的西方国家里蔓延。而事实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用以统治民众的集体主义观念，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很难达到我们已经看到的结果。我们可以说：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顺便提一下，它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产物！）的集体主义思想完全没有免疫力，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根本不可能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集体这个概念完全统治了单个的人。

人权和公民权在西方许多国家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事物，即使是在那些被推崇、标榜为西方自由民主楷模的传统西方国度里，对所有公民来说，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目前状况就是理想之态的话。实际上，直到19世纪，在英国还只有富人才享有选举权，而在世界上，妇女普遍获得选举权则是20世纪我们才取得的一项成就。同样，美

①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 London 1991; Barbara W. Tuchman, 《宏伟的钟楼》, “一战（1890－1914）之前的世界”, Munich 1962

国在血腥的内战之后才废除了奴隶制，而黑人的公民权虽然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权利至今还无法得到完全的保障。德国一直实行自己的公民权认定模式，德国护照的颁发和血缘关系密切相连(Ius sanguinis)，而不是根据所属的地域（Ius soli），于是，有成千上万在这里出生的人被剥夺了应有的公民权。

谁属于西方——“文化地理学”的变迁

今天，欧盟各国、北约缔约国（显著的例外是土耳其，文化纯粹主义者将它拒之“西方大门”之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北美国家（美国和加拿大），都毫无疑问地被人们归入“西方文明圈”，对于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归属还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波兰，还有斯洛文尼亚，都被毫无异议地划入西方的“大行政区范围”，然而对于波罗地海国家、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归属则多少有些争议。

但是，即使那些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是西方文明组成部分的国家，这种文化的认同也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们以德国为例：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右翼知识分子，主要是以著名杂志《Die Tat》为中心的文化圈，坚决反对德国的“西化”，他们把德国文化定位于介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独立体系；这种思想意识在德国的戏剧界也有所体现。20世纪初，对于汉斯·萨克斯在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著名的咏叹调以及《漂泊的荷兰人》中“德国式的痛苦”，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同样，这种特殊路线的意识形态在50年代社会民主党的中立政策中引起广泛的反响，此后在国家和平主义的和平运动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最近，在新右翼群体中人们也对这种特殊路线津津乐道。

从外部来看，德国和西方真正划清界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一种对德国人不太恭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摩根索计划，当时美国农业部长提出的一个完全认真的对德战略草案，旨在使德国重新回到原始的农业国家。他持有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德国人无法以调和的方式建立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以及民主国家制度，因为他们的文化，可能甚至是基因决定了他们不适合西方文明。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学术界曾就欧洲的南部地区是否适合建立西方民主社会制度有过相似的争论，有的观点认为：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国家不具备实现民主的能力，所以对蒸蒸日上的欧洲联盟来说，他们只是一种负担。欧盟核心国之一的法国虽然是个天主教占主流的国家，但是法国的天主教会在建国的关键时刻保持了远离罗马教会的“国教”立场，于是法国成了特例。很显然，对一个“完全天主教”的社会是否具备民主能力的怀疑，成为这种观点看法的基础。动摇意大利政府体制的日常危机以及政府的频繁更迭，更使批评家们坚信，天主教的欧洲根本无法“建立现代民主国家”。这个阶段当然早已成为过去，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伊比利亚半岛强权人物佛朗哥的下台，处于集权统治下的西班牙终于迎来了民主的曙光；而曾经奄奄一息的意大利则在变革中显示出令人敬佩的自愈能力。今天，它们无疑都成为成功的西方民主国家。

变迁中的文明——现实中的文明

在第三章中，我们重复了文明所具有的活跃和可变迁的特性，概观今天西方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便不难发现文明的这一特性。这种判断不允许我们今天仍然僵硬不变地看待历史旧照片中那些文明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我们应该可以注意到：在

西方文明的前现代化阶段，有许多特征是我们现在从伊斯兰教或者儒教中发现并感觉得奇特的，正是从这些特征中，《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得出了可怕的预言。

最近20年，西方国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无数源于日本的文化：一开始是无害的榻榻米式的“蒲团”(Futon)；接着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电子宠物（如电子鸡、电子猫、电子狗等）、Gameboy、Walkman等；然后是疯狂的充斥着大量暴力内容的电子游戏。我们从日本人那里接受了“袖珍化”的指导原则（如袖珍收音机、笔记本电脑等），物流和团队合作的工业组织形式也源于日本。很显然，目前西方国家正处于和其他文化频繁交流的活跃阶段，这是一段双向的对开之路，而非有去无回的单行线。①

历史主义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另外三个重要的事实：一、受基督教深远影响的西方文化根本没有把现代立宪国家和人权当做“自然的”最终目标。最初基督教文化和其他现代化前的宗教和文化一样，倡导集体主义和独裁统治。由于文献资料的不同，在基督教义中，有时因此而产生自相矛盾的说法，这为现代的诠释提供了某些出发点，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并无不同。最终在启蒙运动之后，思想史的发展也逐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所接受，因为他们在古老的教义中找到了答案。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虽然一直保持反对启蒙思想的立场，但是启蒙运动的目标却最终得以实现。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说明在具有其他宗教背景的文化中，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类似的结果。

二、欧洲的民族国家是几百年来不同种族和宗教派系以及社

① Marc Bosch, L'invisible 〈colonialisation〉 japonaise. In: Le Monde Diplomatique, 第25页, 1996年11月

会各阶层斗争的结果．实际上，直接导致这些斗争的主要原因是反对君权神授体制的社会普遍性要求——即反对基督教的普遍主义。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民族国家”的最初产生则并非如此，他们的产生方式有许多的不同，甚至至今还成为权利竞争的角斗场所，然而这在欧洲的历史上也并不陌生。这不能表明：这种制度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实施就一定不会存在多样化的选择。

三、回忆我们文化对现代化之前所产生的影响是绝对有益的，它可以提醒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维护自由的决心之外，对于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自由，我们别无任何其他依托。我们曾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否定，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正是在今天的民主社会中，我们可以保留启蒙思想的文化遗产，甚至将它发扬光大；但是我们也可以故意将它任意挥霍，就像德国在20世纪前半叶所做的那样。处于今天这样的变革转折时代，回顾一下我们西方文明所走过的历史，则更显得尤为重要。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绝对不会有一条直切后现代社会的捷径；相反，如果我们具有积极地对现代自由民主社会进行制度化保障的意识，就可以防止出现任何有悖于人类自由和尊严的行为的产生。承认其他的文化也会同西方文化经历过的历程一样，也在形成并且继续发展，并不妨碍我们保护自我文化的发展。对于文化间激烈的争论，我们大可不必过分担心，只要它是有利于人权、宗教和文化自由制度的。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遗产，它必须在每天的现实中不断地重新贯彻并加以确认，如果有必要，也需要保护或者改变。因为在现代化之前，我们文化的根基同样是古老而脆弱的，它清楚地表明：文化可以在变革时期重新开辟道路，但危机也可能再度出现并使之瓦解；事实上，我们的文化根本不像有些研究者认为

的那样，是坚不可摧的金石之物。

福利国家、公正、团结——西方文明的裂变

今天，我们有了这样的共识：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共同思想的既定原则基础上的一种价值体现。而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奉行的“温柔”霸权主义政策无疑进一步推进了这种价值观的统一，无论是从表面上所看到的商业“麦当劳主义”，还是从根本上推进的日益增长的个性化趋势，都反映了这一发展进程。尽管我们的耳边还时时存在着对“文化断裂”的阴郁警告。提请注意欧美间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忽视大西洋此岸和彼岸不同的价值的“侧重点”，便可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错误。①我们同样应该注意欧美间社会内部价值取向的差异，因为正是处在当前这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它很可能导致危险的分裂。那些我们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失望、贫困、绝望的人们，是否会坚定地支持西方的价值规则，他们当中或许只有积极的乐观主义者才敢于抱有这种希望。

社会成员、经济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正义、团结、责任这些价值观都和这个问题交织在一起。英国－美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主要是美国的观点一直和欧洲大陆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在欧洲大陆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性具有互补性，当抽象的平等理想不断丧失其吸引力时，现实社会凸显的不平等现

---

① Gebhard Schweigler，《大西洋共同体：命运、安全和价值观》，Ebenhausen 1997；Werner Weidenfeld，《美国文化断层?》，“跨越大西洋文化的结束”，Guetersloch 1997

象会被当做社会体系的一个缺陷。于是，对命运相对较为不幸的社会群体的国家责任、至少是对最低限度社会平衡的职责会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政策直到1934年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时，才在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声中，在美国得到贯彻实行。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在大洋彼岸从未像在欧洲大陆这样得到公认，而且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当美国的“拆卸工作”刚刚开始时，欧洲几乎已经完成了“安装工程”。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举例说明：在美国和法国，假如没有公共援助措施，将会有四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在美国，福利政策使贫困比例由25%降低到21%；而在法国，得益于这些国家援助，只有6.5%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这些观念上的差异至今还泾渭分明：在美国，一般所说的保守党人是指那些主张取消（从未完全实现的）公共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福利的人；而所谓的自由党人，却是指那些和欧洲相比更靠近右翼的左翼分子，他们想保留社会福利的基本原则，但是他们做出的过多让步已经等同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所做的那样。[①] 然而这些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张也并未涉及到完全取消福利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欧洲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总是对侵略国家予以谴责，对此全体欧洲国家已开始取得相当广泛的一致性。

从表面上看，这里只是单独涉及到了政治问题，但其背后反映的却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世界观上的差异，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美国文化在其形成的关键阶段，受到世俗化的加尔文教派宿命论的突出影响，于是，他们把社会个体的科学成

① Claus Leggewie，《America first?》，“保守革命的失败”，引言，第一章和第二章，Frankfurt 1997

就看成是上帝的特殊恩典，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种对每个社会个体的尊崇和重视，使个性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而这一点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人类的这种典型现象，最初是通过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教义得到充实的，它体现在所有信徒共同对更贫困的教友实施的帮助中，或者成功人士个人乐善好施的行为中。今天虽然追求成功的个人主义保留了下来，但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团结性却逐渐有所减弱。贫困被看成是个人失败的结果，或者甚至是遗传方面的缺陷；贫困不但不能唤醒集体的同情心和责任感，而且还为个体打上了屈辱的烙印。这样形成今天世界的鲜明特色：更多雅皮士经纪人希望成为非常富有的行善者，最好像安德鲁·卡耐基或约翰·洛克菲勒那样。

在欧洲，我们发现两种根据不同、但结论却惊人相似的观点：天主教福利学说和受到马克思主义启示、但经过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它们都要求社会将"团结穷人"作为一种职责。天主教徒论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根据基督教"博爱"的信条以及人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和相似物应具有的尊严。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这种观点和伊斯兰教的救济信条相比较，其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而社会民主主义注重的是：启蒙思想中"人的尊严"这个概念以及阶级团结性。天主教福利学说和社会民主主义学说两者也都发展出福利政策的非国家形式，即博爱行动与合作制。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两者具有非常一致的看法：国家作为社会的政治代表，具有不可推卸的公益责任。[①]

这种西方内部的文化争论在经济繁荣阶段毫无意义，尤其是在"罗斯福新政"将美国的福利政策引向了欧洲福利国家的方向

① Richard Pells, 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7

之后，也就是说西方社会体制似乎已经趋于一致。但是，今天世界现实正在发生一些变化，社会、国家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紧张压力，正在加深欧美间这道固有的“鸿沟”。

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大西洋两岸，而且也出现在我们自己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在欧洲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便具有其代表性。同时，社会的分化也在进一步加剧，贫富悬殊、阶层明显。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政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正试图用“社会妒忌”这个概念来替代“社会公正”，并且毫无顾忌地将这种理念予以实施。这样，控制欲望、消除贫困这些善良美好的提议还没有来得及传播开来，便遭到了某些人的猛烈抨击。于是，一方面对穷人的救济金数额大为减少，社会福利水准整体下降；而另一方面，有利于富裕阶层的国家政策却毫无顾忌地继续推行；例如，鉴于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削减“个人财产税”。这时我们涉及到的已经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问题[①]：倘如此行事，则无疑意味着社会责任感的完全沦丧，同时也表明价值的衰落。在这里，“文化”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了，政治主张也被“文化”所涵盖。于是，对引发“党派烦恼症状”的起因所发出的悲叹，就显得非常虚伪了。从人们日常的忧虑中，消除政治阶级化倾向的建议，则根本没有得到政客们的关注。今天在波恩，我们从各个党派的言论中，还能感受到1788年或是1988年那些陈腐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气息。

不仅是在政治阶层，而且整个西方社会分化的征兆也十分明显。对日常的贫困现象熟视无睹；对日益增长的犯罪行为置若罔闻；二者都是令人忧虑的社会现实。此外，那些反对整体规划的

① Thomas Eckardt，《德国的贫困现象》，“社会政治学的生存反应”，Munich 1996

地方主义，他们往往打着保护环境的幌子，实质上却是在力求保障自身的局部利益，同样，这无疑也是社会分化的一种模式。很多协会和公益组织都在抱怨——乐于从事义务活动和公益事业的人越来越少。保守的文化批评家虽然勇于指出这种社会裂变分化的不祥之兆，但却不愿正视其由来的深层原因——即市场经济的社会法则不受任何“价值”观念的影响，畅行无阻地得到了全面贯彻。然而，这种“发育不良的道德转折”终究是行不通的。

除了个人主义对团结性的破坏之外，集体主义也产生了变种——两种极其不同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和法西斯、正统派基督教的狂热信仰和国家社会主义。尤其在美国，有一部分知识界的所谓“先锋”摒弃了福考特和德瑞达设计的美国蓝本，用社会的各个片段编织出一套新的思想理论。美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社团都反对整个意义上的社会，要求得到拥有与众不同的自身文化和历史的权利，他们带有嘲弄意味地说：我们这是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的确，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免受美国“政治正确性”的语言审查，来逃避那些实质性的批评，这种倡导文化多元性类型的人，他们的行为大多是为了自己小团体的利益而别无顾忌，于是便推动了大社团的解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分化。

这一点虽然很难看清楚，但却是明白无误的现实。实际上，美国正统基督教派运动也从事了同样内容的行动：排斥任何其他的信仰、摆脱社会业已形成的公共道德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运动的特征也符合我们先前关于其他原教旨主义的有关论述。这个运动完全符合他们自身的道德要求，但无疑和福利国家的原则针锋相对。它需要的仅仅是“道德”国家的监督（而非世俗行政国家——译者注）以及社会对他们偏离行为的认可。这个运动藐视并且贬低所有不愿接受他们世界观的人。在 1992 年和

1996年的竞选中，佩特·布坎南和佩特·罗宾逊的应诉，实际上是知识型狂热信仰、排外情绪、反对福利国家和带有暴力倾向的专制主义的大杂烩，这种倾向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①

在欧洲，这种思潮还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文化崩溃。然而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右翼极端分子的排外性中发现集体的分化趋势。在排外的行动中，本国社会的失败者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到那些“外来”竞争者身上。最近巴伐利亚州提出了医药费、失业保险金应根据各州而异的要求，很显然，在消除国家一致性方面正在产生不同的地方观点。

危机正潜伏于我们的肘腋之下，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必须为自己的灵魂而战。启蒙运动的果实正受到变质的威胁，自由、民主、人权不仅仅是建立在法律的保障之上，它们还需要积极、活跃的广大民众的支持。假如我们不把宽容和团结当做是固定的、不能带有欺骗性的价值准则，社会和共和国就无从立足。西方文化的这些先决条件如果受到危害，那么漫漫前途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来自亚洲和伊斯兰国家对西方的尖锐批评，不能被我们简单地当做是他们对自己利益要求的恶意掩盖，是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因而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不要认为这种遣责只是在揭我们的伤疤，把它当做是非西方社会一贯行为的动机。当然，西方的这个伤疤是无法用原教旨主义和国家独裁来治愈的。尽管西方存在各种文化没落主义的思潮，但现代化的时代还远远不会结束，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对于现代文化价值的展望和求索，而不是光荣巡礼式的回顾。

---

① Claus Leggewie,《America first?》, “保守革命的失败”, 第五章和第七章, Frankfurt 1997

西方作为国际政治的希望使者

有关“西方”是是非非的争论当然具有广泛的批评性，尤其是在塞缪尔·亨廷顿先生对西方文化进行美国式的阐释，并把它树为一面旗帜展示给其他文化的人们之后。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西方文化存在的诸多“瑕疵”，而另一方面，我们更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事实：对于国际政治来说，恰恰是西方文明为国际关系的和平以及持续发展创造了最孕育希望的工具。这些制度不但促进了民主的复兴，而且对不同文化圈的国家和社会团体逐渐趋于一致，做出了最好的展望和准备。

现代福利国家要求政府对自己的对外政策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那些关心自身利益的国家公民，促使国家在对外政策上也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内公民的相关福利条件。开放的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则要求拒绝武力方式（因为它太具冒险性、代价也过于昂贵），倡导紧密合作。因为在今天，国际间经济、通讯和生态的内在关联早已超越了国界。如果无序蔓延的个人和国家行为所造成的欠缺和违背心愿的负面结果，不再能增加福利成效，那么只有达成国际规则才能对大家都有益处，于是与此相关的国际法协议、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便应运而生了。无疑那些典型的西方国家（如英、美、法等）是这些制度的先驱者和缔造者，也正是它们，比其他国家参与此类活动要积极得多。①

自 40 年代早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合作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国际关系的网络系统规则，这些原则包括自由贸易、共同管理、保障内政稳定和社会福利制度、法制化的国际关系准

① Harald Mueller，《合作的机会》，“国际关系中的政体”，Darmstadt 1993

则等。这些维护国际秩序有序化的原则不仅将日趋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引入了整个西方世界，使西方各国之间在东西方剧烈冲突的年代，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摩擦，直至冷战的结束；而且它还辐射到世界其他地区（如 ASEAN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等），并且进而影响到所有的国际经济组织。[①]当然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往往和全球化的后果步调不太一致。但是假如没有国际贸易组织以及有关电台和卫星频率达成某些谅解的整体框架协议，真正的全球化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会重新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上去，这个福利成效的天生杀手，会像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隐喻大难临头，源出希腊民间传说，雅典国王第奥许修斯命令达摩克里斯坐在悬于一根马鬃上的宝剑下，以示位高多危——译者注）一样使国际经济岌岌可危。

也正是西方国家，最大范围地发展了国际安全体系，西方国家间政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涉及到民族国家主权最深层的领域。这种形式合作的典型范例是北约的军事一体化。另一方面，军备核查的设想也源于西方，并且在东西方冲突中，他们大力推进了这种理念。在国际军备核查上的巨大成就，可以追溯到西方国家军备方面的逐步透明，即他们内部开放的外部表达，这一点绝对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验证原则的起点却是民族国家传统的保守秘密和自我保护的国家安全政策的要求。

我们到目前为止谈论的还只是国家的对外政策，而“社会的外交政策”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我根本不想为非官方组织（NGOs）歌功颂德。黑手党也是非政府组织，此外还有“国家步枪协会”，是一个企图制止国内和国际手枪检查的组织，而

① C. John Ikenberry, The Myth of Post－Cold War Chaos, in: Foreign Affairs, Jg. 75, Nr. 2, May / June 1996, 第 79－91 页

手枪是我们时代最危险的"屠杀武器"。即使谈到值得某些赞扬的民间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通过观察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一个国际官僚组织中，内部各方面的利益以及"筹措资金"的压力是如何使那些最初的崇高目标黯然失色的。

但是无论如何，非官方组织还是构成了国际政治大厦重要的新支柱。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转变的体现，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继续良性发展开辟了先河。尤其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中、高阶层的年轻一代，这些人受到了新的价值模式的普遍影响。参与、进取、团结这些价值观念排到了自我财富增加和物质消费之前，它所传播的是"后物质价值"。[①]在许多领域，非官方组织表现的是这种选择性的新价值观念，并由此引发了几代人生活态度的转变。

非官方组织有能力推进文化间相互交流的进程，例如在人权方面，与之相比，官方外交在这些方面只能导致僵持的壕堑战。前者能够在社会团体之间建立起网络系统，而在民族国家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认知的团体"（《Epistemic communities》）超越了各种界限，在专家、官僚和"政治企业家"这些社会精英之间形成。他们将国际事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解决全球问题而努力奋斗。[②]

当然，非官方组织只有在民主的自由空气中才能欣欣向荣地成长。但是它们光芒照耀的范围远远超越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① 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Princeton 1990; Wilhelm Buerklin / Markus Klein / Achim Russ,《后物质主义者还是人本主义的价值变迁？——对 Ronald Inglehart 和 Hans－Dieter Klingemann 观点的批驳》，摘自"政治季刊"1996 年 9 月，第 517－553 页

② Peter M. Haas (Hrsg.). Knowledg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Jg. 46, Nr. 1, Cambridge, Mass., 1992

的界限：东南亚国家联盟非官方组织的发展壮大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同时表明，一个首先在西方扎根的文化制度被显而易见地移植到了其他地区。

西方的自我反思

伊斯兰世界和亚洲社会对西方“缺陷”的抨击是猛烈的，而它们也正好切中“时弊”。我们的社会团体正在进一步走向分化，由启蒙运动和现代基督教运动发轫、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大厦正面临崩溃的危险，那些具有不可转让尊严、才能的个体正迷失在歧途上。

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和震动的行为依靠大康采恩和交易所便完成了。于是行政者把决策的重点转移到了国际交易场所，希望借此来弥补自己国内的权限损失；而被选出的人民代表也逐渐丧失了施加影响的机会，这样人们对党派和民主产生了厌恶情绪。但是，全球化和其他值得追求的国际合作迫使我们从民主身上汲取需要的养分[①]，而全球化本身却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社会问题，如形成了大量政治极端主义的拥护者，我们难道对 1929 年的黑色记忆真的淡忘了吗?

值得庆幸的是，民主和人权的观念还是这样深人人心：1993 年冬天，大约有 10% 以上的德国人走上街头，参加了反种族主义的烛光链活动——一次令人难忘的、表达希望人类之间宽容相处的民众自发运动。但是，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现代化目标，我们还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面对相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以及极端自由主义的沉渣泛起，我们终于意识到复

① Jean－Marie Guehenno，《民主的终止》，Stuttgart 1995

兴社会团结的重要意义，它是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使命，而这里所涉及到的“内部使命”和“外部使命”同样重要。①

西方最大的进步是对“国际关系”进行了重新的诠释。以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以及荷兰为代表的现代商业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它们首先追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经济上的社会福利。它们真正关心国际法的实施，履行国际组织规定的义务，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把谴责军事暴力手段视为“公民的责任”。

今天，国家行为逐步服从于涉及范围越来越大的国际间达成的规则，主权已改变了它的特性。西方政治大力推崇的民族复兴也屈从于这种已经结构化的现实。在这种国际规则的全球性扩展中，我们可以对世界的和平抱有最大限度的期望，但它的前提是，西方国家可以妥善解决好自己的内部问题。

这样我们或许得到了不十分令人满意的结论：西方文明并非完美的上帝之作，它也同样面临着潜在的危机，而且它也没有找到应对现实挑战切实可行的办法，但它至少是目前最适合寻找出路的选择，因为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它相对更具灵活性、更坦率诚恳、更自由和更具合作性。

① Bassam Tibi / Dieter Oberndoerfer,《政治和当代史》

2

"危险的黄祸?"——亚洲的崛起

20世纪末，长久以来一直充当世界历史客体的亚洲，似乎开始加快了赶超西方的步伐，甚至惟一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也对此流露出满腹疑虑，不知自己能否控制住从这个广袤地域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亚洲正在经历人口爆炸和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其普遍的年经济增长率高于5%，大多数国家甚至达到了10%或者更多。这个地区在技术创新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骄人成绩；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一地区隐藏着的高度危险的领土争端和毫不掩饰的霸权政治野心，也都交织于其间。①

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经济奇迹的光环剥落下来。同时它也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太平洋地区的理想主义者所创造的经济成就也有其不足之处。至于21世纪是否真的属于亚洲，看来也未可知。但是这场金融危机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路途上，已经走得相当遥远，它们是除西欧和北美以外最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由于历史的

---

① Werner Draguhn (Hrsg.),《亚洲的交界国家：第三个世界经济发展区?》, Hamburg 1991; Adolf Kimmel (Hrsg),《面临太平洋世纪?》, Baden - Baden 1996

原因，西方国家对经济增长和危机的周期也深有体会，我们不能因为这次危机而臆断亚洲资本主义的失败。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亚洲国家继续进行必要的改革，从长远来看它们一定拥有最美好的发展前景。

如果有谁认为“西方”和“亚洲”是冲突对立的，那么他应该首先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第一大洲的多样性。在东亚，日本、北朝鲜和南韩以及台湾地区与洲际大国中国和俄罗斯接壤；东南亚地区有重要性仅次于欧盟的地区性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度支那地区盘踞着曾经战火不断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泰国，其他还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这些岛国，同时印度和中国在此也有其利益所在。南亚次大陆蕴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最近，随着苏联的解体，形成了六个中亚穆斯林共和国，同时由于阿富汗的内战，使通往西亚石油产地的中亚又成为重要的战略地区。只有一个亚洲国家可以自豪地在此到处插手：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心之国”。现在，只有美国还有能力插手世界各个地区的事务，原先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的俄罗斯，现在早已在东南亚和南亚的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其原先具有的影响力。

亚洲国家世界的逻辑：对巨人中国的平衡作用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像亚洲一样存在如此众多的国家间领土争端（除了近东地区！）。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菲加纳山谷，其归属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这里已经变成整个亚洲最可怕的地区之一；50 年来，巴基斯坦和印度一直在争夺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控制权，并引发了两次印巴战争；孟加拉国和缅甸之间也存在着领土争端，缅甸和泰国之间也有边界争议；而泰国又

与其南面的邻国马来西亚存在着边界争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萨拉卡特省）、菲律宾（沙巴省）之间也有北婆罗州的争端，同时马来西亚和文莱（婆罗州附近的海外地区）也有归属之争，它与越南的海上边界也没有达成一致，和新加坡的矛盾则集中在普劳·巴图·菩提的归属问题，和印度尼西亚是就西里伯斯海的西巴丹、塞巴提和利吉坦岛屿的归属问题；越南和柬埔寨为陆地边界争吵不已，和印度尼西亚为纳图那岛屿（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及其周围的海上边界进行争夺；日本对俄罗斯二战后占领的南千岛群岛（即北方四岛，包括国后、齿舞、色丹、择捉及周围岛屿——译者注）有领土要求，日本和韩国都对连安山崖和南日本海的塔克多群岛提出了领土要求。

中国是东亚地区领土争端的核心，它几乎和所有的邻国都有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对俄罗斯，中国要求修正19世纪"不平等条约"划定的，从东西伯利亚一直到太平洋的边界；对日本，中国要求收回钓鱼岛；台湾这个发达、民主和经济成就斐然的所谓"国家"，被中国要求作为背叛的省份回归祖国，假如台湾人独立的浪潮掀得过高，中国则不惜使用武力使之屈服。中国和印度在喜玛拉雅山地区有几千公里的边界存在争端；中国不顾越南和台湾的抗议，用武力占领了帕拉塞尔群岛（某些外国人沿用的殖民主义者对我国西沙群岛的称呼——译者注）；最有争论的是中国声称，出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应该拥有对整个南中国海，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即南沙群岛）以及其周围海域领海的专属经济区权利：这样中国将在距其海岸1500公里的海洋上建立"水泡"，它横卧在东盟各国之间，占据了最重要的一条国际海上交通通道。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部分，或者说整个海域，也被台湾、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宣布为自己的领土，有资料估计说：该区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虽然这一点还

未得到证实。[①]

亚洲大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

亚洲的东部和南部地区有争议不断的领土冲突，这里有四个真正或者潜在的大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中国。然而确切地说，俄罗斯更应该算是一个欧洲大国，而非亚洲国家；苏联的解体削弱了它在太平洋边后继者的地位。短期内俄罗斯在亚洲的权利之争中充其量只能演奏第三小提琴。

日本在四代人之前就已经步入现代化行列，在20世纪前半叶，日本经历了武力扩张和帝国主义阶段，其灾难性的结局和德国极为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美国的监护下建立起民事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共性和本土文化的特性之间，日本社会达成了某种平衡，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②]它的军事力量虽然在综合实力上属于全世界最强大的兵力之一，但是在社会中并不占据主流地位，当然在政治上按照规定，它的防务经费份额只能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③]在这期间，日本的军队犹犹豫豫地参与了一些地区维和行动，但从总体看来，现有的军事力量并不能反映日本的国家实力，日本的国家安全主要还是依赖于美国的庇护。

至今，日本的近邻或远邻还未能摆脱其内心对它的恐惧情

---

① Paul Dibb, Towards a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As.a, Oxford, Adelphi Paper 295, 1995, P51; Mark J Valencia,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Oxford, Adelphi Paper 298, 1995

② W. G. Beasley,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1990, Capital 15

③ Bernhard May,《日本面临危机?》, "日本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对三巨头的挑战", Bonn 1996

绪，对于三四十年代日军残酷血腥的侵略政策，当地的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日本的文化决定了它对待过去的态度，这使得它的那些邻国依然保持着对它的某种猜疑。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从未对自己过去的军国主义行为进行清算，对以前犯下的罪行进行反省或是对受害国家人民进行正式、公开的致歉。在日本，对历史的批判则意味着对父母和祖父母那代人的不敬，而祖先崇拜是日本神道教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只要日本的高官显贵还在朝拜靖国神社的神龛，对历次对外战争的战死者表示敬意，顶礼膜拜那些战争罪犯，那么这种民族的愤恨情绪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当然，日本的邻国也密切注意到了日本所具有的经济和技术潜能，这足以使得东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建立反映实力的军事力量。尽管日本民众对核武器表现出明确而深深的反感，日本的原子经济还是不时在提醒亚洲的其他国家，如果政治条件允许，日本也是完全有可能成为核大国的。

尽管如此，尤其是东盟国家也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因素，特别是面对中国的全面崛起，日本无疑是一支平衡的力量。另一方面，人们同时也看到将日本长期纳人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同盟体系的必要性，这样不仅可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也可使其免受国家修正主义的侵害。

在所有世界霸权的潜在竞争者中，亚洲的第三大巨人印度，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沿岸属于印度的“势力范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印度的影响力都局限于这一区域，而促使印度加入东盟地区论坛的动因则主要源于印度国内商界的普遍要求，出于对经济利益和发展前景的考虑，印度的商界精英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自己的国家，不断加强与这个充满活力地区的广泛联系，但在一般的情况下，却很少有人提及

政治参与的要求。

90 年代初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给印度的经济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蓬勃发展。市场的普遍对外开放，使客观上千方百计对经济活动起阻碍作用的官僚主义得到了有效遏制。印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最近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达到了 5－7％的水平、同时，大量外国的资本也涌入印度进行投资。[①] 目前，这个国家最先进的领域是电脑软件业的开发和生产，最近十年其年出口增长率都在 50％左右。古杰拉尔总理执政期间，印度在加强国内改革的同时，对所有邻国都采取了旨在消除紧张状态的缓和政策：和中国开启了有关两国边界划分的谈判；和孟加拉国签署了共同利用恒河水资源的协议；和尼泊尔以及斯里兰卡缔结了新的贸易协定。和巴基斯坦也开始尝试进行对话，有消息说，印巴两国甚至会将敏感的克什米尔问题也纳入和谈内容。1997 年 5 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晤，标志着亚太各国达成地区谅解新纪元的开始。然而，最近十年以来，印度的社会、宗教和地区种族的分化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②]

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印度政治始终不能摆脱历史上社会等级划分制度的束缚，尽管在过去 100 年里它已有很大的改变。今天，“阶级”的加速分化整合不再只是在国大党的内部进行，整个社会都在“分化重组”。一部分享有特权的社会等级，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政治权利因为现行的普遍选举制度而受到“贱民”的侵袭，于是转向了印度教极端主义的人民党（BJP)；那些对国大党执政时期腐败行为深恶痛绝的社会底层民众，同时也

① Shalendra D. Sharma, India '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e Elephant Comes of Age, in: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1996, P 414－418

② Gyanendra Pandey (Hrsg.), Hindus and Others: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in India Today. India, Viking 1993

对印度教极端主义提出的政治参与等级化的主张，怀有极大的戒备和警惕，于是转而开始支持国大党的政治左翼，他们认为只有如此，自己的权益才可以得到有效保障，而矛盾不断、四分五裂的国大党才能得以新生，并且重整乾坤。这样，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冲突也因此而尖锐起来。印度教徒试图将那些因现代化受到利益侵害而变得茫然绝望的人们聚集起来，重新团结在好战的、有广泛宗教基础的民族主义旗帜下。1992 年 12 月攻击阿约德亚巴伯瑞清真寺的行动就是一个明确敌对对象的信号，印度的"敌人"是占印度人口 12% 的穆斯林以及他们在巴基斯坦的亲属。人民党（BJP）反对对"少数民族"做任何让步；也就是说，该党也坚决拒绝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一切"妥协"行为。此外，他们还反对经济开放，甚至反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却要求国家大规模发展核武器。和其他原教旨主义运动不同的是，他们在动员印度底层社会民众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他们的政治信条属于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范畴，即只有婆罗门和王公贵族才拥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特权，而排斥其他所谓的"贱民"阶层。①

人民党（BJP）是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感觉受到现代化侵害的人群的集合，他们利用了人们对穆斯林、中国人和"西方人"妄想狂式的恐惧心理；他们赞成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的扩军备战；他们主张拓展疆土、打击敌人。因此，人民党 BJP 具有欧洲法西斯所表现出来的许多性格特征。当然在印度——一个各派势力纷争的国家，客观上也有权利集中的要求，因为除了社

① Sanosh C. Saha, Religious Revivalism among the Hindus in India: Ideologies of fundamentalist movements in recent decades, in: Indi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Jg. 8/9, Nr. 1/2, 1995/96, P. 36－54

会和宗教的进一步分化之外，国家还受到地方分裂主义的威胁：在印度东部（那加兰邦和博多邦）、克什米尔地区、甚至在印度中部的扎康德邦，都存在少数民族要求独立建国的呼声。①

因此，印度和中国一样，正好处在历史转折的分界点：要么继续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为依托，通过有效的社会改革来减少贫困现象，并努力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通过谨慎的地方分权制度使分裂主义失去口舌；和邻国保持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政治上的某种“妥协”；继续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在日益扩大的多边贸易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或者印度走上人民党（BJP）所选择的道路：加强中央集权和内部压制；在经济上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实施强硬的对外政策和军备扩张政策。诚如此言，我们将不难预见到后一种情况将会给南亚地区、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局势带来的负面影响。1998年5月印度不顾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而进行核试验，就是一个阴郁的不祥之兆。

令人生畏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自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使它变得更具威胁性。在亚洲的这些大国中，中国是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它受到最专制集权的统治，确立了最广泛的民族主义目标。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1840－1949）所遭受的屈辱苦难，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

① Shekhar Gupta. India Redefines its Role, London, Adelphi Papers 293, 1995

中央帝国，而且曾经一直保持着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意识，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它却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和日本的侵略、蹂躏，甚至有被瓜分的危险。重新赢回人们认为历史上一直就属于自己领土主权范围的那些地方，这在中国是毋庸争辩的普遍要求。民族主义——而非毛泽东思想（或后毛泽东思想），或许可能搀杂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无疑会综合所有的社会离心力，使这个国家的社会合力趋于一致。这使得中国和它的大多数邻国产生了领土方面的争端。这些冲突中的绝大部分还有待于法律和历史论据来解决。但是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1988年和1994年与越南海军的交火、1995年占领菲律宾有领土要求的美济礁，所有这些行为都向它的邻国表明，中国完全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军事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要求。印度至今还能回忆起1962年的中印边界之争；俄罗斯则能想起1968年漠河沿岸的中苏军事冲突。(即发生在珍宝岛的自卫反击战——译者注)

中国将走向何方还不甚明了。自卑情结和权力要求、合作的意向和粗鲁的民族自我主义、飞速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示威混合在一起，多少让人联想到威廉大帝时代的德国。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那样，受到19世纪西方国际体系中强权政治原则的引导。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受到其战国时代（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21年）纵横捭阖之术的影响。此外，北京政府在遵循国际法准则方面也似乎显得不那么情愿，因为这些法则在没有它参与的情况下就已经制订完成。从贸易政策到海洋法、从军备检查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中国不断企图贯彻自己的规则模式。这种行为使得它的左邻右舍惴惴不安；当中国的国家力量足够强大时，是否会强迫周边地区接受自己的条件？中国对于亚洲果真会如威廉大帝的德国那样，走向大规模扩

张的道路吗?[1]

中国努力实现现代化的还有它的军队，它正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军械库，但这并不十分令人担忧，在有限的几个核大国中，只有中国会担心，在另一个核大国对其发动核打击之后，自己究竟是否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报复性反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核武器是微少而且易受伤害的。更多的安全考虑和对台湾走向独立的担忧，激起了中国在军队现代化诸多方面的不懈努力，即加强海军以及海空军人员协同作战的能力，可以在远离自己海岸的地方行动自如；此外，海陆两栖部队的作战能力也应该得到进一步提高。它从俄罗斯获得了可空中加油的 SU－27 战斗机、米格 29 轰炸机和公里级“低声纳”潜水艇，所有这些在日本、台湾和东盟各国引起了普遍担忧。因为解放军的这种扩军备战表明了如下意图：即在紧急情况下，北京也会借助于武力来实现它的领土要求。

另一方面，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也是相对而言的，目前它的年军费预算大约为 360 亿美元，少于日本，只是比东南亚各国的国防预算稍稍多一点，只相当于美国年度军费开支的七分之一左右。虽然最近几年以来，中国军费预算上升的幅度有所提高，每年增加 10% 以上，但是如果考虑到和通货膨胀率的相抵，增长的幅度也就并不算很多了。另外，我们也应该将中国的新式武器和其邻近的国家地区做一下比较，例如与台湾军队装备的 F－16 型战斗机、美国运往泰国和菲律宾的 F－16 和 F－18 战机相比。近期内，中国还不具备在远离自己海岸的地方和东盟国家的联合

---

① Kay Moeller，《推动中国外交政策的因素》，“动机和方法”，Ebenhausen 1997；更悲观的看法：Richard Bernstein /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1997

力量作战的能力，尤其是美国将在这场可能的冲突中不完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1]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一个航空母舰编队就可能牵制中国海军和空军的一大部分。但就东盟各国来说，它们自身国防力量的壮大也并非是毫无用处的，与此相反，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重要的。一个时期以来，东盟各国一直有意识地加强军备用以中和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主要表现在：它们战斗机的作战能力和海岸防御能力的提高；海军常规舰艇如鱼雷艇、驱逐舰、潜水艇等装备的现代化——在泰国甚至还有可以直升飞机和垂直起落飞机的小型航空母舰——这些先进装备使得东盟国家的海上防御能力得到很大增强。最近几年，东亚地区的常规武器进口呈现出急剧上升的势头。

尽管受到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抑制，但这一地区"扩军备战"的脚步仍然没有停止。与此同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多边和双边结盟关系：日本、韩国和美国分别签署了双边安全协议；美国承诺对台湾提供防卫保障（以美国国会1998年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为标志，该法案严重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译者注）；通过这几个条约分别确立了这三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全主体。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由于日美两国之间不断发生的贸易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名存实亡，但这种情况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时发生了改观。1997年北京不得不无奈地接受这样的事实——一份有关日美安全的新的军事协定，它确定了许多新的原则：在此之前，驻日美军的职责范围相对狭小，并没有承担包括保护日本群岛安全的责任，而从新条约生效之日

---

① John J. Schulz,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ese Power: More Smoke than Fire?,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Nr. 1, 1997

起，美军在日本的基地，将可以在更广阔区域的武装冲突中发挥作用，而日本在此类事件中则有责任进行军事上的合作；很显然，它也包括可能发生在台湾地区的冲突。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新的条款是针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一种回应。

在东南亚地区，由于美国被迫关闭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致使这一地区曾经一度出现了危险的权力真空现象。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军事方面的紧密联系不再像从前那样明显，但是却多元化了。算是作为对失去菲律宾基地的补偿，美国空军可以使用新加坡的机场，甚至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借助强调“亚洲性”或“不结盟”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后勤设备、维修和管理设施。此外，美国和泰国以及菲律宾的双边防护协定也继续发挥作用，1998 年 1 月，美国和菲律宾达成进行经常性的共同军事演习的约定。但是美国的愿望并非总是能够得以实现：它曾经希望在泰国和菲律宾的领海布置大量的军事设施，但被当地政府以过于具有挑衅性的理由而予以拒绝（1994 年）。[①] 不过，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共同的军事演习却在逐年不断增加。

文莱和英国之间签署有安全协议。此外，英国还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几个英联邦国家共同签署了《五国防御协定》——迄今为止亚太地区惟一正常运转的地区性多边防御组织。1995 年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太平洋列岛上的潜在军事对手宣布结成双边联盟。东盟各国都小心翼翼地规避军事联盟的嫌疑表象，对来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国内舆论充耳不闻，但是它们却加强了更加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双边军事演习、军队培训、军官之间的接

① Douglas T. Stuart / William T. Tow, A US Strategy for the Asia－Pacific, London, Adelphi Paper 299, 1995

触、武器生产和共同监视边界和海界。

在东亚和东南亚，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平衡中国的巨大潜能，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预言，这种潜能将会被用于何种目的。李光耀——这位现代新加坡的伟大缔造者——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曾经发出过警告，他的后任吴作栋，一个华人国家（新加坡华人约占总人口的75%）的总理则对“中国附属国”的模式表示了明确的否定。[①] 亚洲国家正努力寻求对中国潜在威胁的各种解决之道，即使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不能战胜强大的中国军队，也至少有实力可以给予其重创；这样人们也就取得了对这个威慑势力的胜利。美国必须保持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安全角色，没有人希望它完全撤军。但是它不应该占据地区安全的主导地位，人们并不希望美国对安全问题垄断式的大包大揽，这很可能会使它过度施加影响，并由此而引发英国和澳大利亚对该地区的介人，这样很可能导致该地区多样化的军备进口。除了涉及到军火价格问题的原因之外，我们应该明白：和中国抗衡的力量虽然应该是目标明确的，但是同时也应该是谨慎和不具挑衅性的。和这个“中央帝国”有关安全政治方面的合作之门，决不应该因为某些相互对峙的限制政策而砰然关闭。

相互依赖的逻辑：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40年代到60年代，民族解放的狂潮席卷了亚洲和非洲各地，在东南亚建立了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但同时也带来了无穷的领土争端（详见前而的论述）。这种边界冲突的危险性在6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该地区最强大

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 10. 1996, P. 78; 6. 1. 1997, P. 6

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在总统苏加诺执政时期和中国大陆关系异常密切，他试图通过以对抗政策来对付那些“敌对势力”。1963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就婆罗州某些地区的归属问题引发了边界争端，并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的破裂。当时，整个地区在中印战争之外又平添了另一个不稳定因素。苏加诺的后任苏哈托总统上台后，决定联合不直接参与中印战争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一个政治协商论坛，以便阻止边界争端的进一步升级：这就是后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雏型。和欧盟、欧安组织这些欧洲国际组织不同的是，东盟缺乏精简的常务办事机构和组织——前者除了每年例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之外，在东道国还设有大使级常任理事会和一系列的专门委员会。但是东盟的常任协商论坛每年不同级别的会谈却高达200次之多。它根本不能真正对已经存在的冲突进行有效调解，但是各成员国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信任却使得这些冲突从议事日程上逐渐消失了，并且不再对这个地区的政治现实产生影响。

东盟各国遵循共同的安全准则：即地区稳定、成员国之间加强内部联系与增进各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个被印度尼西亚奉为“国家和地区恢复力”之间的合理连结，最终发展成为东盟国家共同的思想哲学，成为决定该组织的行为、目标和进一步发展的行为基础。和欧洲共同体不同的是，东盟并非具有超越国家特征的经济合作组织，而是一个制定和改进政治框架条件的协调委员会，根据这些法则，各国的经济政策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①

东盟建立以后，在阻止国家相互间的冲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促使东盟在1976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时，东盟正致力于扩展自己的组织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建立了许多新的机

---

① Susanne Feske, ASEAN:《地区安全模式》, Baden－Baden 1991

制。在必要的情况下，各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可进行紧急磋商，召开峰会或部长级别的会议；而各成员国的经济部长要定期举行工作会议，并且东盟也拥有了自己小规模的秘书处。随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联盟主要的组织目标，即和平共处和相互协调，第一次明确地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它也使东盟掌握了将其他国家吸引到联盟的工具，因为这份协议也同样向非成员国开放，加入该条约是东盟接受候选人为正式成员的预备阶段。[①] 东盟的第一次扩展是 1984 年，文莱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五个创始会员国之后加入了该组织。

东盟各国在越南侵略柬埔寨的问题上始终保持了一致立场，这是东盟在那个年代的一项重要政治成就。20 世纪 90 年代初，确切地说，是在 1991 年柬埔寨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后，东盟决定吸纳越南为其成员国，以帮助最后仅存的五个共产主义国家（指中国、古巴、越南、朝鲜和老挝——译者注）之一的越南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越南在经过万日战争（指二战后自 1945 年越南宣布独立到 1976 年实现南北统一的 30 年，包括越法战争和反击美国干涉越南内战共计一万多个日日夜夜——译者注）、侵柬战争后，国家满目疮痍，其经济发展水平已远远落后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越南认识到，自己必须紧跟在邻国身后，尽快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于是，东盟成员国对这个在此之前不能和睦相处的邻居，运用了相互依赖和一体化的逻辑：一体化原则将推动越南走向市场经济的步伐。大家期望，这种推动将有助于把越南领导人的兴趣从意识形态和领土争端等问题转移到经济合作上，使他们抛弃原来奉行的对峙政策。同样，这个

① Alison Broinowsky (Hrsg.), Understanding ASEAN, London 1982

“天使之圈”也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敞开了大门，所有这些国家都因为内政的不佳状况，而成为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与欧盟不同的是：欧盟实行一体化是为了加强某些国家的民主化（如伊比利亚半岛和希腊），而在东盟内，各国则是希望通过一体化，促使联盟内部不断地进行磋商，来彼此消除对立情绪，同时对经济发展和政治信任感的建立起到促进作用。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面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东盟可以通过扩容使自身的相对实力得到加强，而中国和柬埔寨、缅甸曾经或者目前仍然保持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当然这种联系多半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而不是文化间的亲和力。这样，诸多原因共同作用，促使长期对扩容问题犹豫不决的泰国和菲律宾政府，最终还是不顾仰光令人震惊的人权记录，同意了缅甸的加盟。

东盟在实现这次扩容之前，各成员国重新探讨了这个地区性国家组织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那是在1992年的新加坡高峰会上。大家第一次锁定住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即在2008年之前建立一个东盟自由贸易区。另一个重要的决定是有关安全政策方面的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现在终于也正式提到了东盟的议事日程上来。此外，联盟的组织机构和体制也进一步得到强化，此前不定期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会晤，现在至少将每三年举行一次，同时在财政和人员配置上显著加强了东盟日常核心办事机构——秘书处的作用。[①]

在达到联盟内部一定程度的和谐统一后，现在理所当然地要涉及东盟国家和外部势力的关系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它们

---

① Susanne Nicolette Klein, Barbara Dreis,《地方主义和东盟在东南亚的合作》, in: Manfred Mols / Manfred Wilhelmy von Wolff, German Gutierrez (Hrsg.),《地方主义和拉丁美洲、东南亚的合作》,"政治学比较", Muenster 1993, P87 - 153, P. 105 - 109

的安全存在的隐患，日本当然不能被排除在外，更值得留意的是大陆中国。在后冷战时期，一方面通过美国和日本"拥抱在一起"（指美日安保条约维系的美日同盟关系——译者注），化解了昔日东亚武士的威胁；另一方面，东盟通过联盟方式和加强军备与中国大陆保持均衡状态；然而，以这种安全保障模式作为惟一的地区安全基础，在今天似乎已不具有牢靠的承载力。通过政治磋商建立起来的信任机制应该得以扩展到地区外，始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就是基于这种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这次会晤除东盟各国的外长之外，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中国、南朝鲜、老挝、柬埔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的外长也应邀参加了论坛。欧盟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随着论坛影响力的扩大，现在印度也应邀前来。从东盟各国的观点出发，东盟地区论坛的目标是：通过磋商方式，和平、稳妥并且有预见性地构筑战略层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将中国吸收到这个多边论坛，这之前中国在一些方面表现出霸权主义的倾向——在与邻国有争议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特别是双边冲突中，当然总是作为强者一方的中国占据优势。多边论坛的影响力首先于1995年12月显现出来，那时中国军队刚占领了美济礁，有鉴于论坛各方的要求，中国外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不得不允诺，中国在处理领土争端上，承认新海洋法的规则。这是中国首次同意在多边框架内讨论这个话题，真算得上一大进步。

期间在东盟地区论坛的工作会议中，各参与国商谈的问题涉及到了诸多领域，其中包括：如何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预防发生各类危机的处理方法；保持和平相处、贸易投资自由以及调节争端的和平手段。1997年中国第一次在其中的一个工作委员会担任了主席职位。尽管这种人事安排只是遵循传统的外交礼仪或惯例，但它却开辟了东盟地区论坛解决问题的"第二种途

径"。该工作委员会和来自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的一些机构合作举办一系列的研讨会，同时也邀请成员国的高级外交官和高级军官参加。这些会谈的非官方特征使得更具内容的实质性讨论成为可能，我本人对此就深有体会。东盟国家希望通过这种途径逐渐打消中国建立民族帝国的倾向，或者至少可以阻止目前有关领土争端方面的矛盾冲突的进一步激化，随着中国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上来，最终其民族权力扩张的欲望必然会被搁置一旁。①

这个想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领土冲突方面的刺激只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侧面，尤其在最近几年，中国正寻求与其邻国在安全政策等问题上的理解和信任。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只是多个步骤中的一项。1997 年 5 月，中国和俄罗斯就裁减边境驻军一事达成一致，这个被莫斯科固执地吹嘘为针对北约东扩的"新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看来，不过是和一个边界绵延几千公里的邻国，根据缓和政策达成宽容的一个步骤罢了，两国在东亚和中亚地区不再保持对抗的姿态，但是看来也没有多少缓解。至于和印度长达 3840 公里的边界划分问题，中印双方可能正在进行长期的秘密谈判。1996 年 11 月，根据双方的协议边界驻军已经得到削减，并且在边界地区司令之间设立了可以保持长期信息交流的专用电话线（红色电话）。同时，北京和日本也达成了谅解协议，双方同意经常性地就安全问题进行顾问性对话。考虑到日中两国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近几年来日本对中国核军备的公开批评态度，中国的这种让步实际上也并非微不足道。

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建立多边信任机制的政策和措施：中国领导人于 1996 年 4 月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①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London, Adelphi Paper 302, 1996

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四国元首在上海进行会晤，与会各方就减少中亚地区边境驻军的数量、靠近边境地区的军事演习应该限制人数，并且事先向邻国通报等诸多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涉及到的是中国在政治上最有争议的地区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是非中华民族的穆斯林聚居者。维吾尔族分裂集团已经通过在当地，甚至在中国首都的恐怖行动表明了独立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愿意放弃自己在这个地区军事上的灵活性，宁愿接受限制的规则，这一点多少令人有些吃惊，这是否表明中国在向地区性多边贸易转向？还是它想腾出手来对付其他的麻烦？①

除了东盟这个组织之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多边贸易的第二追求，它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建立一个环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区。除了东盟地区论坛的与会国（不包括欧洲国家）参加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年会，进行经济磋商之外，近几年中美和南美各国参加该组织年会的数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亚太经合组织表现出东亚各国希望加强和美洲彼岸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巨大兴趣：出口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40%的中国（其比例高于德国!），其出口产品的40%是输向美国。顺便提一下，中国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它的亚洲邻国，它们的商品在美国市场彼此排挤、相互竞争；这种情形使得反西方的亚洲经济联盟不太可能形成。另外，美国（也包括加拿大）也很有兴趣继续扩大自己在亚洲的利益。马来西亚关于建立一个排斥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而完全是“纯亚洲经济组织”的建议，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也由于其东南亚的

① May Moeller,《中国是安全合作伙伴吗?》,“冷战结束后中国参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Baden-Baden 1997

伙伴国家对这个提议缺乏兴趣，而最终只能胎死腹中。1997年12月，在没有美国的参与下，亚洲各国虽然坐到了一起，但是在会议上，马来西亚的外长却首先迫切地声明——“亚洲”根本没有建立亚洲经济联盟的计划。

亚洲风格的地方主义以及一体化与欧洲在许多方面是大相径庭的：它更注重形式，而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同时也较少法律定制，而更多非正式性。在地区多边政治经济关系的范围内，重点还是更侧重于双边对话，而发生的问题则往往会被向后拖延，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上罗列的所有这些不同点，它对我们透彻理解问题大有裨益。然而二者的动机和方式却是如此的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上的一致性：包括商业国家的基本愿望，尽量避免消耗社会集体利益的政治冲突，同时改善贸易和交通的框架条件；最好通过不断的地区和地区外磋商和一体化实现这些目标；关于经济和安全政策问题互相关联的认识；经济环境可以促进安全，但是只有在安全政治问题没有严重损害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亚洲和欧洲的地方主义完全别无二致。

社会世界的逻辑：亚洲国家内部的活力

亚洲的均衡政策反映出国家世界的运转规律。近几年来，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的国际合作趋势（主要在经济和安全政治方面）就是这种规律的直接反应。国际合作是商业国家的基本特征，商业国家关心的不再是权力的扩张，而是社会利益。但是，和欧洲一样，亚洲也要经历第三次浪潮的洗礼，即亚洲社会的自我发展进程。

巨大的变革推动数以亿计的民众从一个时代迈向另一个时

代。根据有关资料估计，目前印度的中产阶级数量已经达到约2亿之众、或者甚至更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76－1977）中国有多达8亿5千万的农村人口，他们大都生活在贫困之中，自从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后，这些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今天，中国至少有1亿2千万打工者奔忙于从乡村通往城市的途中，请注意，这个数字是德国人口的1.5倍；同样，在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这些“新移民”超然于共产党（中国、越南）机关干部或国家官僚（印度、印度尼西亚）的监护之外，原有的社会稳定机制正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新经济也给亿万民众带来了新的机会。中国改革的下一个步骤，即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将会引发下一轮巨大的社会变革，其后果难以逆料。原先的30万家国有企业，将精简到只有3000家继续接受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将有1亿1千万人因此而受到冲击。

有证据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央政府将逐步失去对社会各界的控制权，或是不再像从前掌握得那样牢靠、顺手。印度的中产阶层将从国家经济官僚的压迫统治中解放出来，争取到自身的权益；中国的经济特区也将进一步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获得一定的地方权力；人民解放军的企业经商行为也将不再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这对那些强烈希望对军备物资实施出口控制的西方国家来说，将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可怕结果！（这是作者对中国不甚了解所致，事实上，中国军队企业从产生之日起，始终受到政府的领导和监督，服从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从未有脱缰的可能。在2000年，所有的军队企业已经全部划归地方，中国军队企业将从此不复存在。作者这里显然是多虑了——译者注）

对经济活动还在实施政策限制的那些国家，如北朝鲜和缅甸，则正处于万丈深渊的边缘，他们很可能被自己的邻国远远抛

在后面，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一样，沦为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在亚洲，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府都在集中精力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的框架条件，并着手制订了适宜的新税收政策，以此来替代过去垄断性国企的收入，吸引外国投资者成为这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为了达到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系统的目的，它们开列了一系列优惠的条件，并彼此展开了竞争。所有这些活动都给我们西方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我们发现，亚洲经济奇迹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对外经济参数的控制之下的。它使得这种发展目前正受到一定的制约，人们不愿“得罪”西方的重要贸易伙伴，不想因为“不公的小事”而拿自己的经济成果冒险，从日本到中国都是如此。

经济增长是和一些必要的客观前提紧密相连的，和以往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同时也和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赶超型发展”模式不同，亚洲的市场经济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地区或国家的经济范围较之以前所受的限制要小得多。电子、传播和通讯技术是经济继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核心领域不再是诸如铁路、煤矿、钢铁、石油和电力这些相对集中的经济部门，而根据产业性质的划分则更应该是非集中性的生产技术和服务性部门。也就是说亚洲经济奇迹的前提是新经济和全球化。然而这些客观前提不可避免地会对新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形成产生影响。

社会后果非常显著。[1] 的确，社会阶层在社会性、地区性和

---

① Xuewe Gu，《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连锁效应》，in：Welttrends Nr. 12，1996 年秋，第 81－95 页；Christopher Lingle，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sian Century：False Starts on the Path to Global Millenium，Brookfield，Ashgate 1997

功能性方面不断进行分化，一个数量上占有优势地位的、受过良好教育并且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中产阶层正在逐渐形成。职业阶级——诸如自由职业者、企业经理、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在追求企业财富的同时，也发展了和国家统治阶级不同的政治思想。但是习惯于干涉"异端"的国家机器并没有采取行动，而是容忍了这种行为。这是因为官僚统治者认识到，如果要维持（这种关系国家命运的）经济的持续增长，任何行政的牵制都是有害的。正是这种东亚经济发展模式赋予了国家行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政府主要的任务还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框架条件、促进经济核心领域的发展和创新，彻底摒弃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计划制约。于是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政治和经济主体在对下属领域的决策上拥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同时，这种社会分化也推动民众将不同的思想意识不断转化为政治要求，职业联盟、地区联盟和行业联盟正在亚洲各地兴起，中国也不例外。与此相对应，目标截然不同的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然而，社会的这些发展决不是在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完美、和谐地相处下发生的；与此相反，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曾经感染的所有"儿科疾病"：大量的失业人口充斥着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物价紧缩；贫富分化严重；豪华宫殿式的高级住宅和住房严重短缺形成鲜明对比；最主要的是大量国家官员阶层的贪污受贿、大发横财，他们因为自己创造的毋庸置疑的成果而深信，自己有权收割经济丰收的果实。

另一方面，民众对政治的要求正在不断增强，今天的亚洲也同样不再接受传统的政治观念，即一味顾忌等级制度和所谓的国家尊严而保持意见的一致性，统治者的合法性要以政绩来进行衡量。这种对"好政府"的要求，首先表现在成功的经济政策上，

已经完全被各个国家的政府，包括中国的政府，作为衡量自身合法性的标准而接受。[1] 今天，与过去并没有太多变化的政府，已经无法彻底监视民众到底掌握知晓哪些有关“上层官员”政绩的信息。而在此期间，国家内部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变得多种多样，电子传媒的影响极其活跃，卫星电视提供的信息极易获得。即使在那些政府一如既往地严厉控制言论自由，压制不驯服传媒的地方，民众也至少可以获得来自独立渠道的部分信息。[2]1995年中国有10万上网者，199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0万，而2000年将会达到200万。在一些大城市里，网吧的数量也正在不断直线上升，审查机关变得无能为力，他们无法阻止第一本地下网上刊物（《隧道》）的产生，这本刊物不仅传播民主思想，而且大胆地对网上警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总而言之，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伴随着取得成功的、有自我意识的、具有独立色彩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形成，根据政府的政绩来考察其合法性的新政治观念的确立，独立性信息的存在和全球信息领域的通畅自由，所有这一切必将导致一个重要的后果：那些自认为有能力、有权利或者认为官方缺乏政绩的“精英分子”，产生了参政的要求，希望能够参与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参政的强烈愿望，不仅从亚洲社会阶层日益增多的社团比例可以窥见一斑，而且还表现在国家政治系统的改革上。

亚洲的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台湾，还有回归中国的香港，都跟随日本在最近十年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在菲律宾

---

① Mithia Alagappa (Hrsg.),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The Quest for Moral Authority, Stanford 1996

② June Teufel Dryer,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Needham, Mass. 1996

这个较为落后的国家，民主运动成功地推翻了马科斯独裁统治，现在他们正试图以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补回马科斯独裁统治所耽误的大好时光。在泰国，军方曾试图倒转民主进程的车轮，但终因遭到社会各阶层几乎一致的反对而被迫终止行动。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仅有形式上民主的各种重要基本特点，而且还有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相对独立地位的新闻媒体。印度尼西亚也是如此，许多观察家太快将它归结为纯军事独裁国家。实际上在印度尼西亚活跃着相当数量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毫无畏惧地、公开地维护自己的权益。1995－1996年间，印尼的"强权人物"苏哈托不能如愿以偿地将自己的亲信候选人推上共商会主席和最大的穆斯林组织那德拉图尔·乌拉玛的主席职位，以及1996年7月在雅加达举行的有利于反对党领导人梅加瓦第的大游行就是很好的明证。①1998年5月苏哈托被推翻这一事件也同样证明了印尼民主的进步。即使在中国，地方选举中也开始了多位候选人之间的竞选。那些以前权倾一方、贪污腐化的地方大员的权力受到了削弱，或是受到了严厉的惩处。地区和全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也从形式上的举手机关变成了认真讨论的团体，他们有时也能在人事决定方面进行和上层意愿不符的表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新刑法。被告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构的职能进行了彻底分离。最近，公民的权益如果受到行政部门的损害，也拥有了起诉的权力。②1995年有70000人行使了这项权利——一个创记录的数字。1997年吉林省省高级法院宣判一伙曾经参与天安门事件的人无罪释放，因为无法证明

---

① Jeffery A. Winters, Uncertainty in Suharto's Indonesia,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1996, P. 428－431

② Sebastian Heilmann,《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 Hamburg 1996

他们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所有这些现象都显著地表明，司法将进入独立性阶段，法制国家的雏型正在这个东方大国里逐渐演绎进化。

亚洲经济危机更加速了这种趋势。虽然一些政坛杰出人士转嫁攻击目标的尝试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特别是措辞强烈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他试图将民众的怒火转移到臆想出来的反对亚洲经济奇迹的“阴谋策划者”身上（包括美国、西方国家、犹太人、国际金融组织、乔治·索罗斯等），但是更可行的选择还是尽快深化改革，尤其当他所发表的见解加速了本国货币的进一步贬值之后。来自民众和来自国外的呼声如此相同：多一些民主监督，少一些裙带关系；对政治、金融和经济上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要花大力气彻底进行整顿。

然而，特别是在东南亚一些落后地区，如印度支那（老挝、越南、柬埔寨）和缅甸，还没有受到这种民主潮流的冲击。在柬埔寨，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迹象。[①] 当然，在缅甸，在坚强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下的民主运动也表现出参政和追求自由的愿望。但这些集权主义政权，包括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中国，还是主要采用高压的手段来实施其统治。[②]

亚洲价值观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曾经引起广泛争论的话题——“亚洲的价值观”。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

---

① Charles A. Thayer, Beyond Indochina, London, Adelphi Paper 297, 1995

② Juergen Rueland,《亚洲几乎没有民主吗?》in: Welttrands, Nr. 12, 1996 年秋，第 53－80 页；Rainald Simon,《中国的劳教所、监狱、国家压制和政治反对派》, Reinbek 1996

的社会精英们提出的，有时中国和日本也声称亚洲正在形成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价值体系。他们将古老工业国家的社会衰落以及衍生出的种种丑恶现象，诸如暴力倾向、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吸毒者的年轻化趋势和毫无节制的追求个人享受等等统统归咎于西方的价值观。根据亚洲批评家的观点，西方"价值弱点"的核心是个人权利的肆意膨胀，这种致命的缺陷在政治和法制上，通过过度的民主倾向表现出来。

与此相对，亚洲社会深受另一种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其表现为：对权威和等级制度的敬仰、强烈的家庭宗族观念、对父母和祖先的尊重、勤俭节约、好学上进、刻苦勤奋等等，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集体总是优先于个人"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和西方的价值观完全大相径庭，而且对亚洲经济的腾飞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并且因此而使亚洲社会成功地避免了走上西方国家"堕落之路"的可能。[①] 根据这些理由，人们对西方国家（包括非政府组织）针对亚洲某些国家缺乏人权和民主的批评进行了反驳。1997 年春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关于修改联合国人权宪章的要求，是这种排斥情绪的极端表现。

毋庸置疑，亚洲文化具有和西方文化相异的特性。尽管如此，90 年代"亚洲价值观"的发展趋势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非议。让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不解的是，在亚洲各国完全相异的文化背景下，却提出了"统一的亚洲价值观"的概念，并予以宣扬。马来西亚是世俗色彩较浓的伊斯兰教国家；而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是印度教和泛灵论因素特殊结合的产物。新

---

① Ruediger Machetzki,《东亚的挑战》in: Karl Kaiser / Hanns W. Maull (Hrsg.),《德国的新外交政策》第二部："挑战"，第 81 - 102 页，Munich Oldenbourg 1995

加坡的缔造者现任资政李光耀先生，原先极力否定中华儒教传统，而80年代以来却突然成为新儒教思想的倡导者。中国一向奉行具有自己特色的准毛泽东思想，最近却有些奇怪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而日本是一个神道教－佛教国家。如果说上述国家不同的价值观在历史文化的形成中已经确立下来，那么这些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社会又如何能够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呢？亚洲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背景，没有统一的字母，没有到处适用的乐谱或现代文化风格，如欧洲的哥特式建筑或文艺复兴运动。亚洲文化已经在国家和民族上进行了分界。[②]

有了这些认识，我们就会发现，亚洲价值观其实是一个大杂烩。在有些地方，它具有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特征；而在其他许多方面，它又近似于50年代倡导联邦共和制社会的某些思想；当然，孔夫子的儒教思想对亚洲社会的影响不但是巨大的，而且是深远的，但儒教思想也不是普遍的亚洲价值观。总而言之，准确地说，亚洲价值观就像是一部保守的价值法典，很可能今天还会被美国共和党的法官们轻而易举地签署生效。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它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亚洲的非政府组织和所谓的普遍的“亚洲价值观”，在社会等级制度的看法上并不一致。和西方通常的解释不同，事实上，在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观念里，集体价值虽然被明显地高估了，但是并没有被放置到个人核心价值之前，两者被放在同等的位置。而对于传统的人身保护价值的坚持程度，亚洲的非政府组织并不亚于他们的西方同行，他们坚决反对刑讯；反对随意拘捕；坚持私宅拥有不容侵犯

① Gunter Schubert，《中国与人权》，“关于可能性和界限的批评性对话”in：KAS Asulandsinformationen 4/1997，第50－63页

② Masakazu Yamazaki, Asia, a Civilization in the Making, in: Foreign Affairs, Jg. 75, Nr. 4, 1996年7/8，第16－118页

的权力等等。同时，非政府组织也决不像那些“亚洲价值观”的官方维护者那样，把“集体”和国家混为一谈。他们更多地是以社会和亚洲社会团体的名义指责所谓的“共同权利”，以保护自己不受国家的干涉。[1] 菲律宾在人权讨论方面更接近于“西方”；台湾和泰国不参与“价值讨论”；即使是大陆中国也没有公然以“亚洲价值观”的代表自居，人权的普遍性并没有得到一致的争论，因为大家考虑到这种发展状况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

目前亚洲所具有的一部分共同的文化特征是现代化在这一地区发展的必然，确切地说是在和西方文明不断接触和交流之中所形成的结果[2]。一位中国“民运领袖”在与亨廷顿的讨论中，曾客观地指出：“新儒教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根本无法和最近20年来西方思潮的影响相提并论。”[3]他认为今天西方所接触到的“亚洲价值观”不过是亚洲一些国家政府的艺术杰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文化的西方帝国主义”——即坚定的人权政治——持批评态度、提倡文化相对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们，却对上述贴有“亚洲价值观”标签的观点轻信不疑。80年代以来，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马来西亚的领导人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和来自亚洲其他文化背景的国家一起，建立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便对本国社会活跃分子的反对行为和来自西方的批评做出反应。

下面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有关“亚洲价值”内容所具备的多样化功能，只有在对此充分地了解之后，所发表的看法对它的创

---

① Tanja Stelzer，《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辩论》，硕士论文，第65页，Frankfurt a. M. 1997

② Yamazaki，P112/3

③ Liu Binyan，Civilization Grafting. No Culture is an Island，in：Foreign Affairs，Jg. 72，Nr. 4，1993年9/10，第19页

造者们来说，才算有公平可言。功能之一，由于亚洲在劳动力价格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特别是东南亚地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惊人的经济增长起关键作用的主导因素。因此为了保持这种“人力价格”的低位、即优势地位，在“亚洲价值观”中强调纪律、勤奋、吃苦耐劳和服从权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功能之二，所有这些东亚国家，从新加坡到中国，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而在国家内部，它们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突出。“亚洲价值观”的构想试图化解那些可能由分歧而导致的内部矛盾冲突，可以将社会各个阶层团结在一起。例如在马来西亚，它的大多数国民是穆斯林，此外较大的少数民族包括华裔移民（约占总人口的32%）；马来人的近亲部族（约占总人口的12%）；印度次大陆的移民（约占总人口的8%）；其余的是欧洲人和土著居民。华裔居民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马达，他们在经济上也是较为富裕的高收入阶层。政府长期以来所采取所遵循的机会平衡政策，其实是在特意为马来居民创造“特权”机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危机来临时，总是会沿着种族界限出现政治上的分化，种族差异无疑是首当其冲的矛盾焦点，而并非是亨廷顿强调的宗教因素。因此，马来西亚的领导者坚持把伊斯兰教文化放在优先发展地位，肯定是有利于马来人社会要求的一种手段，而并非会反向削弱他们的“特权”。所以，马来半岛的问题并不是穆斯林伊斯兰文化与华裔居民“儒教文化”之间发生了某种冲突。事实上，马来西亚的华裔居民大多是佛教徒，而不是通常被认为的儒教信徒。①

功能之三，强调“亚洲价值”的特性，可以在从来相互间存在极大差异并且不断受到矛盾冲突威胁的国家之间取得某种共

① Gurr/Harff 1994, P. 53 - 65

识。就反对西方的政治敌对意愿来说,"亚洲价值观"所标榜的与西方文化的对立,较之追求地区统一的目的,其意义可能要小得多。很可惜,或许他们还存在第四个动机:即有助于保证目前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统治者统治地位的安全,因为正是他们构建了"亚洲价值观"。毫无疑问,他们是最近十年亚洲经济发展中,获益最丰的既得利益者(只有新加坡没有受到贪污腐化的侵蚀!),很显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会竭尽全力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关于价值观的争论,将有助于对持不同政见者、人权卫士、工会、新闻自由、甚至合法的反对派采取专制措施进行"合理"的辩解,很遗憾,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讨论不能脱离这个阴暗的背面。民主在台湾的成功、缅甸的自由呼声以及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所谓"亚洲人民不够成熟、不愿意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论调,只不过是欺世骗人的借口和谎言。①

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蓄意挑起的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不过是亚洲走向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②那些真正了解亚洲哲学和宗教的有识之士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他们指出,亚洲也存在能够联系一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权和民主目标的因素。在人类包罗万象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中,亚洲同样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假如没有多样化(甚至包括自相矛盾的)的诠释,也就是说,假如不具备应有的适应力,那么亚洲的这些文

---

① David I. Hitchcock, Asia Valu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 Much Conflict,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4; Alan Dupont, Is There an <Asian Way>?, in: Survival, Jg. 38 Nr. 2, Summer 1996, P13-34; Stelzer 1997, P. 98

② Dieter Senghaas,《地理文化学》:"真实亦或虚构?——有关文明碰撞辩论的三篇论文", in: IIS-Arbeitspapier Nr. 1/96, Bremen 1996, 第4部分

化体系就不可能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在经历无数次剧变的扫荡震撼之后，而安然存活至今。[①]这种“联系能力”本身所包含的特质，将填平“亚洲”和“西方”价值观之间被夸大其词的鸿沟。

亚洲——将走向何方?

当然，亚洲社会的内部矛盾也逐渐会在现实中得以磨合。亚洲“勤奋蚂蚁”的传奇现在终于可以被搁置一旁了。1987 年，韩国工人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获得了组建自己工会的自由。从此，工资随着劳动强度的加大而增长的条例得以实施。当政府在 1996 年用劳动法试图压制并且结束这种发展趋势时，工人们通过举行大范围的总罢工，最终令人难忘地赢得了对政府斗争的胜利，甚至忠于政府的官方工会也觉得有必要支持这场运动。终于，结盟自由在韩国不再被禁止。同样在日本，消费社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提出了质疑；教导下一代严守纪律的教学体系，在青少年自杀和谋杀事件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正处于尴尬两难的境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发展正使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亚洲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分崩离析，走向解体。同时，社会和地区的差异也迫使各国在“统一价值阵线”上付出它们的代价。

亚洲主要被三个大的活跃于国家世界的行为逻辑所操纵。首先，为了适应国家世界的逻辑要求，就要对最有可能赢得地区霸权的国家采取均衡策略，这里指的就是中国。我们设想一下，假

① Gregor Paul，《中国传统哲学》：“普遍性人权的中国基础”，in KAS－Informationen 7/1997，第 4－17 页

如没有美国力量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平衡牵制，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国家世界的逻辑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来维系西方和亚洲之间有时不太和谐的关系。中国自我意识的膨胀越强烈，日本、东南亚和印度就越希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亚洲政治舞台的闪亮登场。反过来，如果中国表现出的威胁性逐渐减小，亚洲国家就会泰然坐视美国在亚洲事务中作用的减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中国变得更多边化、更民主化，换句话说，只有中国发展得更“西化”，它的威胁性才会变得更小。如此看来，假如未来是属于已经“西化”的中国，那么在亚洲和“西方”之间就不会有文明的冲突。因此，目前事态的发展，正使我们踏入在安全方面进退两难的境地！

其次，提倡在经济和安全政策领域加强更多的地区合作，使本地区国家和地区外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今天在亚洲这种合作的构想已经初露端倪，然而我们还无法预知，中国对这种商业国家逻辑要求的参与将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很显然，亚洲绝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正是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中，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保持某种意义的合作联盟。新近成立的地区金融组织，旨在制止 1997 年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并在经济恢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里，没有美国的参与将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假如没有西方（虽然不受欢迎）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的货币也不可能保持相对的稳定。同样受到西方控制的世界银行，通过社会福利计划使危机可能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降低到最小程度。与之相比，一个独立的亚洲组织所支持的“马来西亚项目”似乎并无机会可言。今天，亚洲正试图将平衡政策和机构化合作结合起来。

第三，社会世界的逻辑将把亚洲内部的发展引向何方，是我

们无法确定的。但是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上面提到的讨论内容，亚洲的发展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结局。第一种可能性，民主在这一地区逐渐得到发展，尽管这种民主还一直带有“亚洲的”特色，并且很可能同时会给社会的扭曲现象打开阀门。所谓的抑或是确实对“权威”的强烈需要，可以通过一个享有极大权力的领导职位，或者依靠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来实现。第二种可能性，民主遭到抑制，民众受到来自统治者不断加强的压制。处于上升阶层的一部分人得到了统治者的“补选”，加入了上层阶级。而更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努力以及对于尊重个人和公民权利的要求，都受到统治者变本加厉的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很可能是短暂的，因为这样的社会并不稳定，并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外国投资者也是毫无吸引力的。一个开放的社会对集权统治和专制政权的容忍期限，就像墓地可以真正保持肃静的时间那么短暂，事实上，亚洲各个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和难以控制的局面。第三种可能性，在好战和专制的民族主义旗号下的社会统一。这种选择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也包括印度、韩国、日本，可能还有越南，特别是大陆中国。

这种可能性应该得到所有人的足够重视，因为民族主义在亚洲最具现实意义，它蕴涵着危险的强权暴力意识。但是，它不会导致文化间的战争，而是直接将亚洲带回到 1914 年欧洲的状态——重新回到整个大陆战火连绵的毁灭境地，外国干涉也会接踵而来。我们希望，亚洲应极力避免这种“追赶式发展”模式的出现，而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两个促使“西方”不断取得进步的“法宝”上：多边主义和民主化，尽管亚洲的人们一般不敢直截了当地提出这种真知灼见。

3

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远征军
——伊斯兰的多重性

1997 年 3 月，欧盟国家五个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其中包括德国的联邦总理，在经过磋商后共同宣布，土耳其将不被吸纳为欧盟成员国，原因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太大。有趣的是，这个声明却引起了希腊外长潘格罗斯明确的反对，而他却恰恰是以不喜欢土耳其而著称的。这项决议显然表明：欧洲仍然对善于征服的“伊斯兰弯刀”怀有原始的恐惧，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亨廷顿思想在国际政治实践上最大的胜利——伊斯兰文化不相容于欧洲国家，因此，我们西方也不愿意接纳它。于是，在最简单、蒙昧的层面上，也正是这种相同的思维模式驱动了索林根（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译者注）和其他地区针对外国移民的纵火事件。当然，前面提到的这些党派领导人所关注和担忧的事情与那些暴徒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首先觉得伊斯兰和西方在世界观上的互不相容；接着对伊斯兰世界国家是否能够成功地行使民主形式产生怀疑，众所周知，西方的民主在穆斯林国家至今还没有移植嫁接成功的范例；同时，他们对这些国家在人权方面采取的粗暴践踏行径则经常予以谴责。这样，北约的伙伴土耳其理所当然地被欧盟拒之门外。

世界政坛不受重视的孩子

西方社会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伊斯兰世界正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然而这种危机并不是新近出现的，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初期，那个西方现代化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猛烈、血腥和充满毁坏性的扫荡时代。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是 1798 年，当拿破仑驱兵入侵埃及时。① 麦默洛克王朝（中世纪时期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王朝，都城在大马士革——译者注）根本无力抵抗法国入侵者的进攻，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名义上是埃及的最高统治者，其实徒有虚名，根本不能帮助他名义庇护下的臣民。这种束手无策的表现，引起了广大伊斯兰世界民众的巨大震惊。

侵略带来了西方世界对阿拉伯民族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压迫、折磨和剥削。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殖民国家，把伊斯兰世界经济成果的绝大部分占为己有。埃及成为"有计划"的负债国；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便是一宗巨额金融欺骗的经典杰作。当时的埃及国王相对来说算是个主张改革的君主，但他具有封建统治者的通病——好大喜功和偏听偏信。他领导下的政府制定的财政目标大都是不切实际的宏大计划，在人们无法实现那些虚拟的数字——向国家供奉大量的粮食、牲畜、布匹以及其他产品时，他们受到统治者的严厉处罚。作为加冕国王，他被英国掌握的运河管理机关拒绝过问苏伊士运河的一切事务，当埃及的国家银行出现破产时，整个国家不得不接受英国对其的财政强制统治。当埃及民众试图反抗时，他们遭到了镇压，甚至埃及国家的

① Ulrich Haarmann (Hrsg.)，《阿拉伯世界的历史》，第八—十章，Munich 1987

军事力量也受到监护。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变成了彻底意义上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尤其受到残酷和血腥的殖民统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近东腹地的阿拉伯各民族包括巴勒斯坦、黎巴嫩和从叙利亚到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的“可怕的半月”地区，在“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领导下，举行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起义，牵制了奥斯曼土耳其在帝国东方的军队，而处于欧洲中部的德国、奥匈帝国（它们都是一战中奥斯曼帝国的同盟国——译者注）则深陷于欧洲战场，对于远在西亚的事务鞭长莫及，根本不可能对其实施有效的干涉。阿拉伯民族起义和英国远征军的胜利迫使土耳其最先退出了战争。然而战后，大英帝国对它的阿拉伯盟友的所有承诺，却在凡尔赛和约中没有得到兑现，阿拉伯国家没有赢得独立和自由，却变成了英、法两国委任统治下的被保护国。民族自决的倡导者——美国总统威尔逊毫不犹豫地谴责了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摆脱委任统治的独立运动只是在勉强和无可奈何中才得以实现。然而阿拉伯世界却被人为地分割成条条块块，以便将来某个时候，帝国主义势力为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可以利用这种情况为借口任意进行某种干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年，年轻的阿拉伯军人发动的军事革命，才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政治上的依赖关系。

这段历史使我们对一个原本“不太容易理解”的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什么在许多阿拉伯人的思维中对“西方国家”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和普遍的观点正好相反，我认为这种仇恨绝对不是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穆斯林文化和西方启蒙运动之间的遗传性敌意基础上产生的。其更大程度上是源于一个最初充满自

信的伊斯兰世界，在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接触中，近百年来五代人经历了无穷的痛苦和屈辱之后所形成的。正如今天的以色列，假如没有希特勒第三帝国对犹太民族的毁灭性大屠杀的痛苦经历，我们简直无法理解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阿拉伯（以及更广意义上的伊斯兰世界）世界这种反西方的政治－文化精神气质，正是从殖民统治时期的创伤和苦难中逐步形成的。

东方阿拉伯世界曾经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在经历了辉煌之后，先是沦为土耳其的附庸，接着是西方殖民者的委任统治。他们不但丧失了最初的文化优势，而且失去了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现代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发展进程也有所不同，在独立建国后，他们没有理由陶醉于成功创建民族国家的喜悦之中，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文化和军事都具有很大优势的西方。然而，对于这种双重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情绪并没有得到深化加强。也就是说，没有形成一个同仇敌忾反对西方的穆斯林阵营，他们在与西方关系交往中，采取了不同的尝试方法，用以弥合 19 世纪和 20 世纪那些灾难性经历所带来的创伤。

伊斯兰世界对现代化的回应

面对西方的挑战，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回答是专制的民族主义。它试图在民事和军事领域引进欧洲成功的技术要素，却不允许原则意义上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这样，伊斯兰世界政治上的地方分治主义毫无保留地得到承认，但他们凝聚民众的基准点，却是以欧洲为学习榜样的民族国家。伊斯兰国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当然是以穆斯林世界世俗为基础的，而不是宗教层面上的。很显然，这种民族主义并没有将阿拉伯的民族国家作为它的

基础，而是和非阿拉伯的穆斯林传统一脉相承。第一次这样的尝试发生在19世纪前半叶，由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进行的改革运动，他对军队、财政和行政管理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希望使自己的国家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追求一种在地中海东部的霸权地位。同时，他试图消除英帝国主义在埃及的影响，英国把这种企图和印度结成轴心的行为，看做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最终，穆罕默德·阿里的尝试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暴力干涉下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第二次尝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的基马尔革命。然而这场革命在坚定的世俗主义方面走得过于遥远，基马尔·阿塔图克希望在政治、法律和教育领域消除伊斯兰教的巨大影响力，并且从统治阶级的"上层"开始将土耳其朝着欧洲世界的标准看齐。然而土耳其社会的统治结构和阶层划分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除了一个现代城市资产阶级的产生之外)，奥斯曼专制统治的许多要素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土耳其把自己当做一个完全统一的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都必须毫无异议地融入这个社会。在这个前提下，整个国家走完了通向现代化的一大段路程，然而专制的国家原则阻碍了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政治阶级的形成，事实证明这场革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试验更加有害于国家的发展。在土耳其，谨慎的民主开放和军事独裁之间的交替使得政治资产阶级保持了它的依赖性，因此，政治阶级有动力将所有受它保护的小羊羔都带到安全地带，只要他们还掌握着统治工具，但他们工作的效率是低下的。这样，土耳其出现了一个发展相对静止的冬眠阶段，期间军人政府曾拒绝发放给神职人员薪俸。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基马尔思想，禁止对库尔德人的解放要求采取实事求是、有人情味的解决方案。80年代初期，土耳其正处在经济和政治走向正轨的关键时刻，但是，和库尔德人的战争使政府的开支日益

增加，国民收入平均减少了20%，甚至相当于两倍公开财政赤字的开销，这种状况使社会现代化进程在非常紧要的关头出现了逆转。①

第三个例子是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政治革新，特别是最后一任沙阿（对伊朗国王的尊称——译者注）所进行的激进变革措施。得益于石油生产的大量收入，巴列维派策划了一起“自上而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和埃及以及土耳其一样，伊朗的现代化国家主义也和谋求地区优势地位的要求紧密相连。但是，在东西方长期进行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使得列扎·巴列维能够在不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来实现他的国家主义目标。这一点和不幸的穆罕默德·阿里有所不同。虽然他大量地扩充军备，并且毫无顾忌地追随自己的统治野心，例如用武力侵占了波斯湾尚有争议的阿拉伯岛屿，从那里他可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和阿拉伯半岛之间，连接波斯湾、包括阿拉伯湾和阿曼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译者注）；另外，当时伊朗的核武器计划显而易见地反映出他的军事野心，这些类似于今天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径足以令人大吃一惊。尽管如此，西方国家还是听之任之，保持了缄默，甚至还有人对此表达了谨慎支持的态度。因为在冷战期间，列扎·巴列维被看做是“我们西方人”的沙阿。不幸的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驱逐了这位末代皇帝，他在流亡中黯然去世。列扎·巴列维改革的失败之处在于，他对社会变革所释放的社会力量缺乏正确的疏导，反过来却打碎了他绝对君主制的国家政体。

---

① Udo Steinbach，《20世纪的土耳其，令欧洲头疼的伙伴》，Bergisch Gladenbach 1996

泛阿拉伯主义和近东冲突

泛阿拉伯主义是指阿拉伯各民族在共同追求政治解放的道路上，试图建立一个地域广阔、政治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思潮，它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观点脉络。①其原动力主要来自凡尔赛的不平等条约。巴黎和会中，西方殖民国家在阿拉伯事务上的背叛行为使这里的广大民众极度失望，他们只有依靠自己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这样泛阿拉伯主义便应运而生了，它的提出有助于反抗《凡尔赛和约》中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条款。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所占的比例表明，泛阿拉伯主义也为宗教少数派提供了保护的意识形态；与泛阿拉伯主义同样带来对社会冲击的还有也是建立于30年代的穆斯林兄弟友谊会，它是基于可供选择的宗教基础以及超越边界的政治思想之上的组织，它们对上述少数民族采取的是排斥的态度。

泛阿拉伯主义传播最有效的推动力，源于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以及接踵而来的第一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被西方当做一次尝试——看看自己是否可以继续统治阿拉伯世界，当然这次与以往有些不同，它们借助的是新殖民地的“特洛伊木马”，即以色列这个前沿桥头堡。但是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以色列人自己也是通过艰苦斗争才从英国的托管中取得独立的。此后，西方霸权，尤其是美国采取的有利于以色列的一边倒政策，在年轻一代阿拉伯人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① Paul Salem, Bitter Legacy.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ArabWorld, Syracuse 1994，第二章

我们不难发现，维系泛阿拉伯主义的基石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当苏联——尽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于以色列的强行建国也负有相当责任，表示愿意加入反对美国－以色列联盟，成为泛阿拉伯主义的盟友时，这种共产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结合处于更加有利的形势。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只在南也门扎下了根基，但是社会主义经济、贸易和外汇管制的原则、规模宏大的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等观念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在纳赛尔主义和巴蒂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特殊的思想体系——即追求一种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这种尝试最终在两个因素的影响下以失败告终。其一，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具有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大型国企的高度无效率和具有寄生性的国家官僚阶层的存在，他们把现代化的所有成果都当做租金从不堪重负的私有领域无情地卷走。这种趋势导致了社会的经济萧条和下层民众生活的日益贫困。

其二，建立一个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与阿拉伯世界不可克服的地方分治主义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反对以色列人”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非常蹩脚的口号，然而就是这种提法，也无法成为阿拉伯各个国家统一的政治纲领目标，并且对有效的军事协调提供号召力。1958 年，埃及－叙利亚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尝试，在三年之后就不得不宣告解体；利比亚独裁领袖卡扎菲提出的合并倡议没有得到任何一个邻国的响应，这些事实以一种带有悲剧性的讽刺意味表明：无论如何，泛阿拉伯主义终将徒劳无效。而“泛阿拉伯的”叙利亚社会党，也在叙利亚国家主义派和亲伊拉克派势不两立的派别斗争中分崩离析了。

改革派伊斯兰

正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并非天主教的固有属性、反动的电视布道也绝不是新教的特色一样，集权统治的原教旨主义也不是伊斯兰教的自然属性。与此相反，伊斯兰传统统治方式的宽容性是有口皆碑的，例如在历史上曾君临西班牙的艾米尔酋长。在和现代化的对峙中，伊斯兰政治宗教学上逐步形成了“改革派伊斯兰”的学说，并存在几个可供选择的分支，他们努力促使伊斯兰社会和现代化（包括与其中包含的西方文化要素）达成和解；相反，那些原教旨主义者所做的却是把一切有关现代化的东西，从《古兰经》经文以及伊斯兰教教规的可靠注释中彻底删除。[①]

“改革派伊斯兰”的学说是由阿尔·阿富干尼和他的学生穆罕默德·阿布杜在19世纪末最先创立的。它和原教旨主义者一样，蔑视所谓的西方文化优势，遵循伊斯兰至上原则。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从浩瀚的宗教典籍中努力寻找证据来证明：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化文明要素早已结合在伊斯兰教的源泉之中，甚至民主和人权这些西方文明的标志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只是剽窃了伊斯兰先哲们的最初教义。显然，改革派伊斯兰教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可能性：其一，在对教义不断进行纯粹和最符合原意的阐释下，明确转向伊斯兰政治改革；其二，把《古兰经》的经文当做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可以改变的教义，考虑到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革因素，将那些宗教必须遵循的要素赋予新的含义，重新予以诠释。

---

① Andreas Meier，《伊斯兰的政治任务，计划和原教旨主义和改革派之间的论战》，“伊斯兰世界的真实呼声”，Wuppertal 1994

其他的伊斯兰改革派的学说都是建立在阿尔·阿富干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它们在以下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即接受了宗教历史的观点，认为根本不可能从先哲们的话语中确认绝对的、完全真实的真理；人们在每一个时代必须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领悟能力，来重新诠释这些圣哲语录含义的多种可能性，为我所用。换句话说，处在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们，都有权力对《古兰经》提出各自的诠释。伊斯兰教具有很大的适应性，同样具有对现代化的适应性。这种思想的一个变种是霍梅尼在伊朗的竞争对手阿亚图拉（阿亚图拉，伊斯兰教的高级神职称谓，相当于基督教的主教——译者注）夏瑞特·马达日提出的，他对宗教和国家统治紧密联系的危险性发出了警告，因为政治交易的必要性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宗教的妥协，而这会给宗教的独立性和神圣感蒙上阴影；这种“寂静的”宗教哲学是伊斯兰教长期以来的传统，而在霍梅尼所提倡的伊斯兰活跃主义的宣传攻势下，却无法再继续传承下去，起码在伊朗情况就是如此。在埃及，被东正教神职人员从故里驱逐出境的阿布·赛义德是逊尼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大量的事实表明，改革派伊斯兰可能是伊斯兰社会和现代化达成和解的最大希望所在。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与西方的对立结论，是在30年代由穆斯林兄弟会的创立者哈桑·阿尔·巴拿得出的。他试图借助于伊斯兰信徒的力量改变世界，使伊斯兰教首先在社会上，同时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阿尔·巴拿的这些想法，一方面是针对西方殖民国家在阿拉伯世界毫无顾忌地扩张自身利益的行为做出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家获得独立以后，在年轻的阿拉伯国家中，掌握大权的自由派领

导人敷衍塞责民众、经常采取与西方合作的国家政策表示出的质疑。哈桑·阿尔·巴拿试图在社会各阶层重新激发宗教信仰的力量，借此来消除外来的、与伊斯兰教教义相悖的社会要素。但他的政治哲学是自相矛盾的：他首先提倡伊斯兰教教义里的民主观点（这是指先哲要求他的追随者对世俗的问题进行“磋商”），而另一方面，他又从自己的神学理论出发，毫不掩饰对多党制社会体系的厌恶情绪。他从绝对戒律中坦率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伊斯兰教信念也可以在政治上得以实现，两个党派中至少有一个所代表的观点必然是错误的。①

对于哈桑·阿尔·巴拿最初的言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是在广泛的政治生活还受到限制的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要求政治参与、对国家出路进行探求的一种尝试。至今，在一些阿拉伯国家里，这种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仍然还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主要是在一些较为温和的伊斯兰教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约旦等。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尖锐的、不断具有暴力倾向的转折点的开端。除阿尔·巴拿外，这种学说的思想之父还包括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徒阿尔·穆杜帝和埃及的撒伊德·库特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穆斯林国家目前文化中所有“非伊斯兰教观点”都进行了极端的抨击，然而他们批判的重点也并非西方文化本身，而是主要针对那些由伊斯兰教徒统治的政府和社会团体。他们认为这些机构早已背叛了伊斯兰的教义，成为事实上的异教统治。因此，他们——纯正的伊斯兰信徒认为自己处于和先哲同样的处境，先哲必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开始自己的使命，这是指穆罕默德被驱逐出麦加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只存在少数志同道合的正统派，为了实现理想而走到

① Salem 1994，第121页

了一起。其余的世界，特别是他们身处的社会和国家，则被他们称为邪恶的“战争帝国”。当然，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只是为了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理论形成，也为他们毫无顾忌地运用所有与戒律有关的方式创造了理由。在极端情况下，他们就会宣布：可以对所有不愿意服从伊斯兰教教义要求的教徒进行处决，而且这种杀害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举动，因为他们是背弃诺言的人，按照伊斯兰的教规应处以死刑。显然，阿尔及利亚的 GIA 组织就是遵循了这个极端的观点。

事实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从 20 世纪开始才走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的。瓦哈比教（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译者注）早在 18 世纪就已经在阿拉伯半岛上开始传播，20 世纪 20 年代它被沙特新王朝提升为国教。瓦哈比教较之霍梅尼的什叶派伊斯兰教起源要早得多，而且还更保守、更专制，没有任何现代民主的色彩，相比之下，伊朗社会至少还存在一个社会、政治进化的机会。由于沙特不太苛刻的石油价格政策，很好地迎合了西方社会的口味，于是那里迫害人权的行为、缺乏任何民主要素的社会机制、利雅得公开支持原教旨主义、甚至支持恐怖行动这些事实都被我们故意忽略了。这是西方对非民主国家双重道德标准所激发的矛盾之一，也正是这种明显的偏差，使那些穆斯林社会的有识之士，感到很难心甘情愿接受西方所鼓吹的价值观（因为它有失公正）。

现代化的进程不但引起了社会集体的普遍危机，而且也导致了个人生存的危机，而原教旨主义则为这些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的人们提供帮助并且进行引导。① 原教旨主义给人们指出了一个

① Bassam Tibi，《现代伊斯兰教的危机》，“科学技术时代里前工业文明”，Frankfurt a. M. 1991

看似明确的前进方向，它促进了个人和集体的认同感，因为它大量追溯共同的历史和人们还一直坚守的传统价值观念，而所有这些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它在动员民众方面就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并且很容易争取到合法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它是一种非常适合的统治技巧。几个世纪以来，它以瓦哈比方式巩固了沙特王朝的统治。巴基斯坦的独裁者齐雅哈克将军推动巴基斯坦内政的原教旨化，其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伊斯兰教极端保守的训诫，即强调逆来顺受、坚决服从以及严格遵守形式上的教条等等，都是使臣民保持恭顺服从的理想借口。[1] 于是，伊斯兰教采取了脱离西方文明的政策，以此来平息民众从历史上就建立起来的仇视西方的情绪。

和以前的集体主义、专制国家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原教旨主义在以阿拉伯国家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六日战争”（1967 年）之后，还没有因为“负面经历”而声名狼藉，相反，原教旨主义对这次战争的失败做出了自己积极的反应，甚至大有取代上述几种意识形态、成为阿拉伯世界思想主流的趋势。专制国家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都对现代化在阿拉伯世界的推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都不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一方面，社会差异不断增加，贫富分化加剧，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前景仍然没有保障，并且缺乏正确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贿赂公行，统治阶级贪污腐化、骄奢淫逸，并且为了贯彻自己的权力要求，对民众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所有这些都使旧的政治体制丧失了起码的信誉。阿拉伯世界

---

① Fred Middle East. London / New York 1996，第四和五章；Fatema Mernissi，《现代化恐惧》，“徘徊在伊斯兰教和民主之间的男人和女人”，Hamburg / Zurich 1992

政治阶级在独立之后的这种失败，可以从经济方面很容易观察到：80年代以来，阿拉伯中东国家（以色列除外）每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都是－2%左右。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来博取民众的好感，诸如提供医疗帮助、社会福利救济；建立幼儿园、学校、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设立研读《古兰经》的宗教学校；进行农业技术咨询、灾难救助，甚至在超级市场供给廉价的食品。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只是在履行一个福利国家应该履行的责任，而这正是伊斯兰国家结构臃肿、经常出现腐败行为的官僚体制所无力承担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社会的许多人都希望借助于伊斯兰教的复兴，来最终完成阿拉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跳跃。亨廷顿正是受到了这种美好幻觉的蒙骗，他以此为出发点推断，以为可以用任意的文化标签来解读一切，而恰恰忽视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展程度。尽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完成这项现代化的任务时，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①

我们当然有很多理由来反对这种寄托于伊斯兰教、空幻飘渺的所谓“最后的希望”。翻开人类的宗教史，我们就会发现，所有拥有经典典籍的宗教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神圣的教义以一种精炼语言的形式被流传下来，同时被赋予永恒的有效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它徘徊于严格合乎时代潮流的详细诠释和高度的跨越历史古今的普遍性之间。因此，除了具有多义性之外，它根本别无选择。而原教旨主义试图从先哲圣训中剖析出教义“本来”的含义，所以从一开始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即必然会遭

① 在1996年12月16日的辩论中，人们指责亨廷顿有关沙特阿拉伯政治和司法体制中陈旧因素的观点，这些陈腐的因素阻碍了克服现代生存危机所要求的合理化；一周之前一个沙特的法院刚把一名因为“涉嫌巫术”的男子判处死刑。而亨廷顿则反驳道，他在利雅得对许多现代化建筑印象深刻。

受不幸的失败结局。[1]“原本的”含义只可能产生于先哲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在当时相互产生影响的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中，不断地被显示出来。语言的意义反馈出的是历史的影子，而意义不可能脱离当时人们所生活的时代而被小心地剥离下来。经历了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毫无损伤地被保留至今，先哲们曾经生活过的时代早已不可挽回地流逝而去，因此所有今天后人的追述当然都会变得充满争议，试图根据合理的论据，从多种含义中筛选出一种能说服众人的解释。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所以，为了维护某种宗教的神圣性，就只有借助于非神学方式，即利用权力这个工具才能推行自已的主张。所以原教旨主义具有武装分裂的特性，善于利用警察和军队这些力量，来驾驭信徒和他们的神职人员。

伊斯兰教中，除了《古兰经》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典籍——《苏拿经》，它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起居录以及流传下来的语录，即现在成为《古兰经》补充的《穆罕默德言行录》。其中记载的绝大部分是有关对具体争执事件的处理情况，也包括遇到追随者向穆罕默德请教问题时，他所给予的对行为准则的建议。(这部书有类于儒家的经典文献——《论语》——译者注）穆罕默德发表的这些见解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状况是紧密相连的，假如把《苏拿经》当做今天“正宗”的真实教义和绝对标准来执行，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荒谬了，实际上，对《苏拿经》的合理解释比对《古兰经》的“正宗”诠释还要困难得多。

将伊斯兰教政治化的第三个渠道是被伊斯兰称为“圣律”的“舍利雅”（SCHARIA)，它是指那些从《古兰经》和《苏拿经》

---

① AzizAl－Azmeh，《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化》，“政治理论的虚构世界”，Frankfurt a. M. /New York 1996

里获得的法律原则中，所形成的传统法律教义和法律运用的集成。“舍利雅”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假如对它特殊的历史意义和与之有关的背景材料不甚了解的话，那么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11世纪时，“舍利雅”（SCHARIA）终于得以形成，也就是说，到这个时期为止，如果我们从当时正统的教义出发，并不能找到任何有助于解决可预见的困难情况的先例和规则，但也不迫切需要任何创新的理论，于是诞生了“舍利雅”，然而，这样仓促地和现实社会的结盟必然会存在许多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值得一提的事例是：伊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试图在“伊斯兰”正确的基础上设置银行：众所周知，《古兰经》明令禁止获取利息，然而为了能够在伊斯兰国家实施银行不可拒绝的贷款功能，于是银行作为债务人和教徒之间的“中间交易者”而出现。但是，由此相关的程序就变得颇为复杂，即使虔诚的穆斯林也更偏爱传统的、“非伊斯兰式”的银行业务。[①]

政治后果又是什么呢？原教旨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原则都建立在过去的真实性基础上，而这种所谓真实的过去，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可以得到明确的证实。当然有关真实性的争论总是难以避免的，除了较为普及的逊尼派教义之外，还有什叶派的教义，除此之外还有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或杜森派的解释，即使在看似统一的逊尼派内部，也分成四个重要的、拥有不同法理的派别。[②]

在东南亚、中亚和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通常也作黑

---

① Volker Nienhaus，《理想世界和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in：Kai Hafez（Hrsg.）“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对话的因由”，Frankfurt a. M. 1997，第94－108页

② Bassam Tibi，“生活在安拉的阴影中”，摘自《伊斯兰教与人权》，Munich / Zurich 1994

非洲)，伊斯兰和当地的传统宗教融合在了一起。在这些地方，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已经明显地偏离了“纯粹的教义”。正如阿尔·阿茨梅所认为的那样：“在这种相互联系中，人们不难发现，伊斯兰如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这样的微不足道；而作为一种宗教它又是何其强大。它可以存在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而以多种多样的形象出现在各个角落。”① 此外，改革派穆斯林、温和派原教旨主义者和好战派原教旨主义者也一直争论不休，而不同的好战派原教旨主义者集团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争斗。② 原教旨主义如果不想失去自己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必须严格遵守固定的、不可动摇的圣哲先贤的原本教义。这样，对教义不同的阐释要么被当做异端邪说而遭到禁止，要么被当做对圣教的恶意曲解而遭到打击。于是，在每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中，它的政治体系都不可避免地选择集权统治。

很显然，原教旨主义和现代化总是格格不入。集权主义只能在某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在重工业和基础建设的发展阶段，与社会总体前进的动力协调一致。但是集权主义产生了大量的“摩擦损失”，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在这个阶段得以克服，而不是等到尘埃仍未落定的以后。在这个异端、邪教、亵渎神明的批判帽子随时可能袭来，伊斯兰极端分离主义的死亡威胁像自然现象一样，随时可能对不识时务者开刀的现代经济社会中，合理的地方分权、发挥个体的创造力、灵活性、注重试验和富于冒险精神等等这些现代化必须的要求和必备的品质，又如何能被顺理成章地提出呢？成功的“部分项目”或许也可能在原教旨主义的统治下出现，然而，如果对于完成社

① Al-Azmeh 1996, P. 85

② Ibrahim A. Karawan, The Islamist Impasse, London, IISS, Adelphi Paper 314, P. 25

会功能性任务的每一个技术细节的讨论，最后都不可避免地会归结为对宗教教义真实性的神学争论，那些不同的声音总是被处以严厉的制裁，那么面对21世纪的严峻挑战，伊斯兰世界的回应很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

不可抗拒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世界中政治的原教旨化，有时几乎被看做是目前的自然法则。亨廷顿先生预言这种趋势一直会持续到21世纪，直到伊斯兰世界人口增长的狂潮逐渐平息下来，人口数量稳定在一个面定的水平上。尽管原教旨主义活跃分子的种种行为将对这种解释不断供给新的养分，使其看起来越来越符合情理，但是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理由对此提出质疑。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70年代初大规模出现以来，在党派政治中，直到如今仍然还只是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尽管在自由选举中，它所代表的政党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冲破了20%－25%的选票大关（这一点可以在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的大选结果中得到验证），阿尔及利亚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伊斯兰教党派（指伊斯兰拯救阵线——译者注）在一个相对公平的选举中赢得政权的国家。然而宗教活动在这个国家只是动员了选民中的一部分，支持获胜的伊斯兰政党的绝大多数选民，把这次选举看做是一次摆脱腐败、毫无作为而且专制的执政党军事政府的机会。这些反对派选民仍然会根据政绩来衡量新上台伊斯兰党政府的作为，而不会以他们对《古兰经》的忠诚程度为标准来进行评判。当然关键的问题在于，执政后的伊斯兰党是否会赋予他们重新选举的权利、再次选择的机会。

在土耳其，人们在政治上转向伊斯兰主义的事实，只能部分

解释艾巴emb领导的社会福利党的成功，对于大多数支持该党的选民来说，不过是希望借此给那个腐败透顶、无能的政治阶级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已。社会福利党是惟一没有因为腐败而被赶下台的政党，但是腐败的最初迹象已经在艾巴堪短暂的执政时期表现出来了。此外，在选举中，许多库尔德族的反对派选民也把选票投给了伊斯兰派，因为支持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抵制了那次选举。

在伊斯兰世界，尽管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仍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也并非无足轻重，然而，穆斯林的大多数还不准备投入极端伊斯兰教派的怀抱。这个事实表明：对于流行的、关于原教旨主义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宿命论来说，胜券仍未在握，结局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在伊斯兰世界仍然存在一个力量较大的、有益的平衡力量。

更重要的是，掌握政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府的许多行为以及对在野伊斯兰教反对派团体的暴力行动，都引发了广大民众的对抗情绪。假如这种论点需要明证的话，伊朗总统的选举结果恰好是个很好的佐证：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者有长达 18 年的时间可以对民众进行说教，培养出完全受霍梅尼思想影响的全新一代。为了使正统什叶派的候选人能够在选举中脱颖而出，事前统治者对选举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枉费心机的竞选准备并没有获得喜人的成果，即使在圣城库姆也无法把教徒们动员起来，说服他们选择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推举的候选人那特·诺瑞。“自由派”候选人哈达米赢得了大选，他对伊斯兰教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一成不变的教条，表示将进行谨慎的改革，这种承诺首先把妇女和较为年轻的选民吸引到了他这一边。在伊朗，年龄小于 25 岁的选民占到总人口的 2/3，于是原教旨主义当然没有可能在大选中取得有利的结果。

在阿富汗，人们可以从城镇居民的呼声中感受到，他们希望

在私人生活中保留自由生活方式的要素，反对塔利班政府倒行逆施的“石器时代的伊斯兰教”政策。很显然，在这个原教旨主义登峰造极的国家，某些消极反抗的行为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妇女也在其他的文化圈中寻求帮助，希望通过国际压力来改善自己难以忍受的生存状态。在土耳其，社会福利党的文化政策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广泛抗议，人们举行了示威游行。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的武力抗争成为孤立的现象，不管他们是否受到渗透到内部的秘密警察的支持，不断增长日趋激烈的反抗浪潮体现出，阿尔及利亚的民众不愿顺应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要求。在埃及，民众为了报复德施哈德军事团体的暗杀行为，不惜动用私刑。在苏丹，北部的伊斯兰反对派团体和南部的基督教－泛灵论派反叛者结成友好关系，甚至在喀土穆共同组成了反对原教旨主义统治的军事联盟。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城镇的年轻人起来反抗伊斯兰教严格的道德准则。在约旦和科威特，激进的伊斯兰派候选人在最近的选举中不断落败，失去了他们的议会席位。

当然，出现这些与原教旨主义“最终胜利论”相悖的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现代化浪潮已经涌入了这些国家，促进了全民自决、政治参与意识的普及，并激发了人们追求自由的愿望。当然，这些要求和愿望是在伊斯兰教的框架范围内提出的，但是它们在伊斯兰独裁统治的政治体系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必然会和这种体制产生冲突。总之，所有的迹象表明，原教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将在完成现代化的任务上无一例外地遭受挫折和失败。①

---

① Arnold Hottinger，《伊斯兰原教旨主义》，Paderborn 1993；Oliver Roy，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Cambridge，Mass. 1994

未来的希望正寄托于伊斯兰国家的广大妇女身上，她们日益成为世俗改革的极力倡导者。而在最初的时候，她们中的一些人也同样是伊斯兰主义的绝对拥护者，在她们看来，伊斯兰主义能够在现代社会众多的角色冲突中，提供“合理、明了、恰当”的解决方案，这些冲突是社会现代化强加在穆斯林妇女身上的两难抉择——妇女拥有独立自主人格的必要性（言行符合现代世俗标准）与男人从不涉足家务的传统要求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妇女必须在传统家庭主妇和现代女性之间进行选择。伊斯兰教以牺牲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为代价，将妇女又重新送回家庭的樊笼，并以此解决了棘手的角色冲突问题。这使得一些妇女感觉得到了解脱，[1]然而，这种状况并未持续时间太长，现在，事物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开始反向运动。今天，穆斯林世界的先进女性们敢于面对歧视、陋俗和一切清规戒律，她们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以及巴基斯坦的大学里稳稳地“定居”下来，甚至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学校里妇女任教执教的比例也介于教师总额的20%至30%之间，而在德国，与此相同的比例数字至今还不到20%。在伊朗，具有讽刺性的是，伊斯兰政府霍梅尼主义的改革成就恰恰与设定的目标背道而驰——妇女的扫盲率从沙阿（伊朗国王的称呼——译者注）时代的28%，提高到了90年代初的65%；而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字，则从7.2个降低到3.5个。现在，广大穆斯林妇女不断提高的自我意识使伊斯兰革命（女）战士和自由的女权运动者找到了共同利益之所在，并由此而结成了联盟。妇女杂志《ZANAN》发出的激烈呼声不会让人无动于衷，她们强烈批判了男性对《古兰经》教义一面之词的诠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姐妹”就是一个反对传统父权以及国家

① Birgit Cerha,《角色冲突的出路》, in: Der Ueberblick 4/1996 第 32 - 36 页

原教旨化的妇女组织。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不断蔓延的原教旨主义思潮遭遇的惟一对手就是来自埃及女权运动者的反对”。[①]她们新近赢得了对伊斯兰教士的一场巨大胜利，埃及宪法法院于 1998 年 1 月正式批准禁止对女性施行割礼。（女性割礼 Taharah，指对妇女生殖器敏感部位的切除，它并不是伊斯兰教的规定，但因其在部分伊斯兰国家盛行，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与宗教密切关联——译者注）

保罗·萨勒姆从 1920 年起，就开始着手研究伊斯兰世界的各种思想理论以及它们和伊斯兰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在经过对大量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研究后，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推定：在社会主流思潮新旧交替过程中，有规律的变换“节奏”存在于一种界于旧的失望和新的兴奋之间，具体的大约以 25 年为一个周期。据此推断，他预言 90 年代后期将出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的衰退，[②]他的主要论据来自最近一次伊朗总统大选中年轻一代的选举行为；在埃及，较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已逐渐转向被美化的“新纳赛尔主义”，即强烈反对以色列的观点和强烈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结合体；在较为年轻一代的推动下，阿尔·瓦萨特领导的自由伊斯兰党从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中分裂了出来。[③]对于今天的青年一代来说，伊斯兰教已经不再具有新鲜的旺盛活力，而是开始散发铜锈的气息。使亨廷顿担忧的穆斯林世

① Fateman Mernissi，《现代化恐惧》，“徘徊在伊斯兰教和民主之间的男人和女人”，Hamburg / Zurich 1992，第 223 页；Aladeh Khan，Des femmes islamistes contre le clerge，Le Monde Diplomatique，Nov. 1996，P8；Azuadeh Kian－Thiebaut，la revolution iranienne a l'heure des reformes，Le Monde Diplomatique，Jan. 1998，P. 20

② Salem 1994，第 273～276 页

③ Eric Rouleau，Les impasses des mouvements islamistes in Egypte，Le Monde Diplomatique，Jan. 1998，P. 22

界的“人口爆炸”，即他所认为的伊斯兰教还会不可阻挡地继续向外扩张，看来也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发展趋势不但趋缓，而且正试图反向运动。

重要的伊斯兰国家

对于伊斯兰地区认识最透彻的学者之一——巴撒姆·提比经过潜心研究，做出了许多大胆的假设和推论，他认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存在形态是欧洲模式移植到第三世界社会的产物，随时可能发生排异反应，而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民族国家在那里根本不具备合法性，只有真主保佑下的直接统治，才被伊斯兰社团认为是完整的、合法的统治方式。面对不断的反抗和绝食行动；面对海湾地区古老的执政形式；面对萨达姆·侯赛因、德黑兰以及喀土穆“上帝之国”的专制统治，人们可能从感情和理智上都愿意让国家世界的法则废除伊斯兰教的行动法律。

当然，或许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作为独立的政治团体，他们在某些方面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不断获得了反对“伊斯兰帝国”的胜利，并且保持了战斗的成果。这一点使我们得出一个推论，即“国家民族”和新近成立的民族国家（每个拥有独立国家武装的特殊领土界限）成为一体。首先我们要提到伊朗，它的国家可以追溯到古老久远的波斯帝国时代（约公元前6世纪）。和其他中东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伊朗的绝大多数人（伊朗居民的绝大多数属于古波斯人的后裔，面不属于阿拉伯种族——译者注）都遵循穆斯林什叶派教义。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土耳其与众不同的国家民族组成，土耳其人不属于阿拉伯人，也不是波斯人，他们是突厥人的后裔。土

耳其人没有信奉东正教的历史，而天主教也从未涉足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算是一个纯正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的最大弊病是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库尔德自治区问题，有限的自制权不能满足库尔德人独立的愿望，他们奋起反抗政府对独立运动的残酷镇压，库尔德问题就像长在土耳其身上的毒瘤，它严重阻碍了土耳其社会的发展和民主的进步。

很多人也许没有注意到，也门的政治体制也属于传统伊斯兰世界的国家构成。几百年来，这个国家以具有自我意识的种族团体组成松散联邦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在与麦加的穆罕默德的后裔们比邻而居的情形下，这着实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此后经历了邻国的瓦哈比运动；该运动的政治支持者——即沙特王朝的统治阶级——始终对也门的独立表现出巨大的反感情绪。只有当过于渴望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违背各种族自治的愿望时，也门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让我们再来看看阿拉伯世界的巨人埃及。它在众多阿拉伯国家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埃及文明比阿拉伯文化要久远得多，它也善于吸收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要素。当然，尽管埃及拥有重要的信奉科普特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但它还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然而，人们只要能感觉到埃及人相对于“其他阿拉伯人”所具有的优越感，就不难理解埃及文化不愿意溶入阿拉伯文化的抵触情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代（1958 年至 1961 年间埃及和叙利亚组建的联合国家）的合并，表面上看显然与上述解释有些矛盾。其实纳赛尔之所以同意这种合并，他的前提条件无疑是埃及将在新建立的国家中掌握领导权，这种设想当然不合叙利亚合伙人的心意，于是联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因为领导权的归属问题而宣告失败。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埃及人具有的这种特殊性格，不断地呈现在独立或追求独立的过程之中以及在政治组成领导地位的

争夺之中；无论是在9世纪至10世纪的法蒂玛（穆罕默德之女——译者注）王朝；还是12世纪至16世纪（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麦默洛克（也译作马木留克——译者注）王朝都是如此。而在麦默洛克王朝统治时期，埃及的强大力量表现得尤为令人瞩目。实际上，麦默洛克人大部分是从俄罗斯南部的可汗国运送过来的奴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竭力维护一个独立的埃及王国！19世纪，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后继者所进行的改革使埃及王朝重新得以复兴，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中最终赢得了独立。在埃及的近现代史上，已经前后变换了五种不同形式的政治统治方式，包括一个王朝政府，一个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政府，两个存在于适度专制政治体系框架之内的准文人政府。所有这些都表明，由埃及人组成的国家是一个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伊斯兰国家，当然也是一个伟大的阿拉伯国家，但它首先是属于埃及人自己的民族国家。

摩洛哥王国到现已拥有长达100年以上的历史。马格里布地区被伊斯兰征服之后一直分裂成三至四个部分，这些领土的准确疆界总是捉摸不定、不易分清，各个部分的大概轮廓显现出几百年来令人惊讶的连续性。在北非地区的各个国家中，摩洛哥不仅以其高度的历史稳定性而著名，而且还以其统治体制的较强合法性而著称。摩洛哥王朝的建立者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远房亲戚的后裔，这从宗教法统上确立了国家统治者的地位，然后它和实用主义的合法认证混合在一起，后者是随着一定的经济成果和最初较为朴素的民主因素而发展起来的。

与此相反，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意识是在反抗法国殖民者的叛乱中形成的，并且通过石油资源的开发生产得到巩固。然而，阿尔及利亚最终失去了这个天赐良机，并且在腐败和践踏人权的错误行为中没落，这对于曾经步人辉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来说，无

疑是永久性的耻辱。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伊斯兰的国家世界范围内，既有稳定的、持久的国家，也有一些基础不稳的国家，但是作为活跃分子它们还是需要被认真对待。[①]

从巴勒斯坦到美索布达米亚的这些“可怕的半月”国家，在伊斯兰国家世界中被确认合法性的问题最大。因为在殖民统治时代后期，殖民者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划定了他们的疆域，在一个圈定的国家里生活着具有高度差异性的不同民族。他们往往具有：不同的信仰方向（如黎巴嫩并存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的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和不同的宗教团体系（阿拉维派和杜森派）；所有这些统统都被挤进一个狭小的固定空间。甚至有些国家由少数民族执掌着国家政权，如阿拉维人统治着叙利亚，逊尼派的塔克瑞提家族的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着伊拉克，这一切都使他们内部的冲突从未间断。但是正是在这个地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发出了最为明确的民族主义呼声，尤其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那些模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建立起来的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大部分已经溶入了执政党集团。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曾经是，今天仍是服务于两个国家的地区性霸权的要求，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虽然同为穆斯林国家，它们之间的竞争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正是在这两个“可怕的半月”的统治下，国家武力垄断机构特别强调自身的立场取向，但归根结底它们的行为是为了保护少数派的统治。虽然这个“形成物”的合法性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国家机构的行为完全符合国家武力的通常惯例——尽管这些国家还只是处

---

① Theodor Hanf，《介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近东的社会和政治危机”，in：Juergen Schwarz (Hrsg.)，“政治化的伊斯兰世界”，Paderborn 1993，第155－175页

在前民主的阶段。

伊斯兰国家世界

国家世界的规律性在伊斯兰地区最为适用，也非常奏效，因为那里充满了权力竞争和各种平衡过程。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都要求掌握领导权，这种争论决不是纯粹象征意义上的，它在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就是亨廷顿所认为的："伊斯兰国际"试图在充满争议的地区大力传播其政治信仰。但是我们经过进一步分析后不难发现，所有这些行为只不过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其实质是国家之间围绕着政治影响的激烈争斗，并为此引发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血腥冲突。这些国家表面上借口宣传伊斯兰主义（可能在他们自己内心深处也对此深信不疑），但是隐藏在宗教名义背后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拓展自己的权力空间：在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发生了争夺战，而沙特阿拉伯作为第三方力量也加入了这场竞争。在中亚，土耳其作为又一个竞争者出现在这里，它试图利用土耳其民族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克曼斯坦和喀萨克斯坦的亲缘关系以及语言的亲缘性（同属突厥语系——译者注），来不断增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在高加索地区，伊朗和土耳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伊朗人毫无顾忌地和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保持着紧密关系。波斯尼亚战争被亨廷顿当做中和伊斯兰扩张战争的对抗事例，也成了土耳其和伊朗竞争影响力的活动中心，而沙特阿拉伯在这里再次成为得利的渔翁。

在阿拉伯世界，叙利亚和伊拉克试图问鼎地区霸权的企图，对强大的埃及发起了挑战。沙特阿拉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吉肖特·卡扎菲（今天已不像以前那样激进）领导下的利比亚，

都试图参与到这场争斗中。在阿拉伯世界，这些对抗常常导致极其危险的双边争端，也可能形成军事联盟，所有这些很容易使人联想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欧洲。长期以来，叙利亚和伊拉克始终是互为竞争关系的对手；目前的缓和阶段只是漫长冲突中的一个短暂插曲。在这种情形下，叙利亚当然非常乐意利用海湾战争的机会修理一下这个危险的竞争者。埃及也出于同样的理由做出相同的反应，以便将这个敌手从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排挤在外。

在伊斯兰世界，为了争夺土地和国家影响力的双边争端是不计其数的，苏丹和埃及之间、埃及和利比亚之间、利比亚和突尼斯之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当然还包括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宗教因素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即使是民族因素——毕竟参与者都是阿拉伯人——也退居到其他两个因素之后：1）狭隘的种属因素（在阿拉伯半岛）；2）（一个还没有受到民主和国际组织约束的、带有地区性的）国家世界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扩张意志。

面对着波斯湾占据统治地位的两个竞争对手——伊拉克和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势力较弱的海湾国家竭尽全力实施自卫。必要时它们也很乐于接受“非伊斯兰教信徒”的积极援助，例如 1961 年科威特的独立反击战和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伊朗此时也袖手旁观，没有动手反击“大撒旦”美国的“野蛮行径”，而是高兴地看着令人不悦的对手——伊拉克如何被势力强大的西方军队击溃。数目可观的阿拉伯国家（如沙特）和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也加入了“西方”联盟。

在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甚至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色列的帮助也表示了欢迎：当约旦在 1971 年

“黑九月”事件中，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的围攻而陷入困境时，以色列用空中打击的威胁阻止了已经整装待发的叙利亚军队。同样表现的还有土耳其，它和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水源使用上一直就存在争端，土耳其筑起的巨大拦水堤坝事实上完全掐断了这两个阿拉伯国家的水源，双方为此常起摩擦。自 1995 年开始，土耳其军队不断加强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甚至在伊斯兰政府艾巴堪（ERBANKAN）的统治时期，双方在第一个协议的基础上又签署了另外两份合作协议。以色列空军因此得到了从土耳其出发进行侦察飞行的允许，在可能发生冲突时，开辟打击叙利亚的第二战场，这对大马士革来说，无疑是处在一种非常难受的境况之中，而这正是它的伊斯兰兄弟国家给它带来的恶果。换句话说，伊斯兰世界对所谓的民族国家应该会产生排异反应，但是它在国家世界的权力竞争和平衡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却证明自己完全是一个典型例外。在这里，文化因素已经退居次席。

为什么在伊斯兰世界没有“中心国家”

在伊斯兰世界，绝对不会有一个核心国家，不管是在世俗化的伊斯兰世界里，还是在原教旨化的伊斯兰世界里，情况都会如此。历史表明，这个幅员广阔，民族、地理、经济和政治都相异的地区，绝对不会屈服于任何一种专一的统治。它成为疆土辽阔帝国的那些岁月，即穆罕默德出现后的大约 100 年建立的阿巴西登王朝，以及 15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所谓的统一要么有名无实（如提到的第一个阶段），要么有些地区事实上处于独立状态，或者干脆在法律上也是独立的。在所有的情况下，统一并不是因为文化的一致性而形成的，而是通过军事征服。即使在

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只有武力才能迫使充满相互厌恶、民族差异、信仰和教派对立的伊斯兰世界处于一种统治之下。但是今天不存在权力的真空，外部势力将会参与重新建立受到破坏的地区平衡；同时，现代化军事技术也使得征服战争和昔日相比，代价过于高昂并且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因此，伊斯兰文化的政治团结绝对不会这样建立起来。

伊斯兰世界不同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也同样无法提供促进该地区政治统一的选择可能性。作为纯粹的国家组织，它们要么只是反映出国家世界的共同点和矛盾焦点，如伊斯兰会议组织；或者它们只是充当了某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如沙特阿拉伯操纵的穆斯林世界联盟和世界清真寺委员会；或许它们只是名义上的联合，而每个国家实际的政治生活还是按照各自独立的精神运作，并且这个组织还是会不断分裂，如穆斯林兄弟组织。作为和西方八国集团（G－8）的一种抗衡表示，土耳其前总理曾策划的由八个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经济集团（D－8）[①]却发展前景渺茫，而土耳其本身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贸易额，只占它和欧盟贸易额的三分之一。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是一个典型的安全意义上的联盟，是参与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才不得不为了共同的防御目标而结成的临时联盟，所以在平常状态下，它并不具备足够的凝聚力。此外，所有这些组织还互相展开竞争，似乎很难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②]

原教旨主义也无法把所有的伊斯兰国家维系在一起。原教旨主义的政治使命源于建立一个纯粹的、单一的、政教合一社会的

① 土耳其、尼日利亚、埃及、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② Dale F. Eickelman / James Piscatori, Muslim Politics, Princeton 1996, P138－155

构想，这个新国家将是一种不存在争议的、建立在真主启示之上的统治。在两个国家的宗教－政治组织之间，当彼此之间只存在一种完全依赖关系的时候，如弱小的苏丹和相对强大的伊朗之间，才可能建立对等的神学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差异性才会被忽视。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由于双方都出于对自身绝对要求的考虑，宗教合法性的基础便会发生偏差。于是，在可以想象到的微小偏离上，彼此之间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敌意。只要有一个建立在不同宗教诠释基础上的伊斯兰国家的存在，对所有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行为提出怀疑，它就会马上被当作异端而受到谴责和打击。这就是为什么原教旨主义把教派分裂当作政治发展基本趋势的原因，即国家间将会产生宗教分裂。

另一方面，原教旨主义国家如阿富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相互间的敌视也耐人寻味。阿富汗于 1997 年 6 月关闭了在喀布尔的伊朗使馆；在巴基斯坦，1997 年冬天逊尼派狂热分子对伊朗的设施和侨民发动了三起血腥的暴力袭击事件。艾巴堪时期的土耳其于 1997 年 2 月将伊朗的外交官驱逐出境，理由是他试图干涉土耳其的司法政策。驻安卡拉的伊朗总领事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作为回击，1997 年 12 月土耳其总统德米艾尔不得不提前离开在德黑兰召开的伊斯兰会议，以使自己免遭阿拉伯教友对土耳其和以色列战略合作的尖锐批评。因此，一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战线，只能通过其他力量的不合适行为才可能得以实现。到目前为止，只有苏联在阿富汗差不多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技巧。(嘲讽的反话——译者注)

伊斯兰世界是一个“普通”的世界区域吗?

近代，伊斯兰国家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历史阶段。作为反动、

顽固、残酷剥削的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这些国家至今还缺少现代化的必要成就。它们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甚至那些石油生产国也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现代化的建设。古老的统治方式，特别是令人厌恶的专制统治阻碍了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殖民统治者把那些直接导致独立民族国家出现和发展的早期因子统统扼杀在萌芽状态下。1948 年巴勒斯坦分裂的创伤，使得阿拉伯国家独立后第一个十年的自由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此外，中东地区频繁不断的冲突给无能的政府提供了廉价的、减轻罪责的最佳借口。

然而，把伊斯兰国家世界或伊斯兰社会当做充满威胁的、正在沸腾的一锅热粥，也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伊斯兰国家世界具有差异性、分裂性并受到政治竞争的影响。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向我们表明，能够使这块打满补丁的地毯拼合在一起，现在该地区的国际组织不是影响力很弱，就是只代表了那些霸权国家的利益。假如经济世界的逻辑也开始降临到这个文化区域，那么很可能是以混合的方式（如东盟模式），使它在地中海范围内或中东和平进程上寻求与欧盟的合作。

穆斯林世界的社会团体也没有表现出统一的趋势，而对近百年来的政治挫折，面临现代化的巨大冲击，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也就不令人感到吃惊了。然而它在伊斯兰的所有政治思想体系中，并不占有统治地位。在伊斯兰社会中，现代化的适应者、温和的现代派信徒、投机的传统主义者、伊斯兰传统主义者以及原教旨主义者处于不同的混合关系之中。给大多数原教旨主义者带来希望的趋势还没有形成。相反，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失败、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极端原教旨主义者无理行为的清醒认识，从事实上对这一运动的传播起到了刹车作用。1997 年 12 月在德黑兰召开的伊斯兰会议，在伊朗的极力促成下，最后达成了一致的决议，

其内容包括不排斥西方的条例，表达了明确的、和解的对话愿望，同时也表明了伊斯兰世界未来的行动方向。

伊斯兰世界迫切需要的是现代化的成果，而这只有在合适的政策措施下才能获得，朝向这种努力的开端已经出现。对伊斯兰基本教义多种可能性的诠释，为这样的政治现代化已经打开了机会之门，因为伊斯兰“对自己”并不敌视民主和人权。[①] 西方国家，可以说伊斯兰国家之外的整个世界对这种成果都充满了巨大的期望。如果偏见、短期的经济利益以及强权政治的贪欲阻碍了人们对这种发展方向的认知，那将是令人悲哀的结果。

---

① Gudrun Kraemer 和 Udo Steinbach 登载在 Hafez 上的文章，1997；Tibi 的文章，1994

4

不稳定的核大国：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

俄罗斯的困境——苏联遗留的沉重负担

走向崩溃的苏联遗留给俄罗斯的历史包袱重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和政治危机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困难的自我身份认证问题。对于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转折可以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胜利，民族重获解放的机遇，因而得到广泛积极的肯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曾经因为国家制度的重大变革而给社会成员造成的巨大利益损失进行了某种辩解。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俄罗斯人的复杂心态，充其量只道出了一半的“天机”。虽然他们相信，为了大家不太熟悉的所谓“国际主义利益”，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他们——整整几代俄罗斯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灵魂和所有的物质幸福；另一方面，从某种角度来看，苏联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围绕着俄罗斯核心区域，以莫斯科为统治中心，包括相近文化辐射区、安全缓冲区，横跨欧亚的辽阔帝国，它是沙皇帝国留给后人的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解体并不是一种解放，而是巨大的财产损失；不是境遇的改善，而是俄罗斯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悄然退却。

这只会伤害俄罗斯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打击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集体认同感（身份）的努力，并且有可能给整个民族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

在亨廷顿的书中，俄罗斯被划定为“东正教文化的中心”，自苏联崩溃以来，它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从旧时代到新时期的脱胎换骨中，遭到过如此严重的创伤。今天，在这个国家出现了非常特别的发展现象：鼎盛时期的强盗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并存，声誉良好的企业家和犯法的黑手党成员之间的角色转换顺畅。一边是数目不断增加的新贵和暴发户；另一边是穷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贫穷和苦难，尤其是依靠退休金生活的那一部分人。除了新的自由思想之外，苏联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和行政结构也有幸得以保全下来，这也算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另外，地区之间和多样化的种族团体之间的差异——或者说对立——又造成了额外的冲突地带。

自由的新闻界以及其他无数的非政府组织，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就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当然，这里还一直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遗产”，包括秘密警察组织和武装力量。除了繁荣向上的企业界之外，在能源领域非私有化的“自然垄断企业”依然健在，1997年，改革派TUSCHUBAJS和雷蒙佐夫才开始就这个问题，向顽固的官僚统治者、经理人阶层和国家杜马的议员们开火。此外，大量的非私有化大企业仍然一如既往地遵循苏联时期的经济政策原则——国家应该无条件承担企业造成的大量亏损。无法解决的还有前苏联遗留的巨大生态领域的负担，从旧时代在各个经济领域都处于低效水平的能源应用，到裂开大口的“放射性大洞”（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露事件——译者注），都使试图寻找精神安慰，希冀在“和平核爆炸”中有所收

获的俄罗斯人（和哈萨克斯坦）无功而返，并且背上了沉重的生态包袱。今天的俄罗斯，一方面是令人忧虑的国家普遍贫困现象，而另一方面则是与此相对立的、不断畸形膨胀的私人财富；国企、军队、行政机关、社会福利（养老金、退休金……）等等都需要国家定期的财政支出，然而政府在这方面却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公众期望从国家那里得到的效力，现在要么一无所获、要么勉勉强强。于是，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受到人民的质疑。

俄罗斯必须做的工作将会是极其艰巨的，即同时收拾好几个"烂摊子"：1）经济体制改革首当其冲，也就是说，要从无到有建立起崭新的私有制经济结构，并相应确立保障这些私有经济存在健康发展的外部框架条件，并在新的基础上和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和金融关系；2）彻底改变政治体制，中央和地方省份的关系以一种全新的、联邦方式重新结合，但同时也不能破坏这个大国必要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为专横、自私的地方诸侯开辟无法控制的致富通道，从而损害正当的联邦权益；3）将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体系改变成独立的、不可贿赂的、可靠的和有效的新法治体系；4）进一步拓宽个性自由空间，但同时要对由于过度自由化倾向而带来的社会阴暗面有所警惕，防止引发犯罪，并强迫公众遵守法制国家的一切现行法律条文。

庞大臃肿的军队系统是寄生在前苏联身上的一个恶性肿瘤，它曾经困扰苏联经济多年而使之裹足不前，因此，必须对其予以健康的吸收、缩减和改组；应该注意使军官团保持良好的情绪，在技术上和政治上控制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管怎样，应该加强现行俄罗斯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对处于困境中的俄罗斯民众进行必要和有效的帮助，尽可能挽救或者重新树立俄罗斯人的民族自信心。我们德国人几年来对于东西德的统一后果，一直喋喋不休、满腹牢骚，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面对俄罗斯今天所面临的这

些艰巨、复杂的任务，他们该会陷入怎样绝望的境地！

进步和不断出现的问题：政治改革

俄罗斯在这条道路上所做出的努力很值得人们钦佩。现在，新体制的运转大约已历经五年的光景（从 1993 年算起到作者著书的 1998 年——译者注），执政者可能对议会发动政变的危险时刻已经过去。① 俄罗斯顺利完成了议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从一般意义上讲，世界舆论的普遍评价都认为这些选举是相对公平的，闪耀着民主精神的光芒，以至于连共产党这样的基本反对派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选举模式，即使他们在选举中遭受了挫折。如叶利钦在 1993 年后重新进行选举时，共产党也接受了选举产生的结果。现在，无论有无必要，乐意与否，共产党人都必须努力去适应民主的新游戏规则。相反，对于总统来说，也很难再次使用像 1993 年对付议会那样的武力手段了，今天的议会已经罩在民主合法化的大伞之下。随着前保镖科沙可夫和副总理索斯科维兹领导集团的消亡，总统独裁的追随者基本上大势已去。

从选举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的选民们对典型的总统制民主形式表现出极大的偏好。和美国经常发生的情况类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果大权独揽的总统府和多数反对派组成的杜马（议会）之间形成对峙，且势力均衡，那么人民拥有最后的投票表决权。今天在俄罗斯，改革派总统和多半对过去还恋恋不舍的议会之间达成妥协的方式不同以往，乍看起来颇觉异样，但是

① Wolfgang Leonhard，《改革释放了父亲们》，"俄罗斯通向现代化的崎岖之路"，第 270－299 页，Stuttgart 1994

无论如何，它们还是在法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况且，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杜马中的表现，和美国国会中有些共和党右翼分子的表现相比，也并非异乎寻常；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由温和的改革派领袖鲁金领导，他比在华盛顿的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右翼极端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要理智得多，眼界也更为开阔。

在中央和总共89个联邦主体之间也开始需要协调相互关系，和过去人们普遍所担心的不同，现在看来，在和同样强烈追求自治的鞑靼斯坦通过协议方式确定关系之后，外高加索的车臣似乎成为一个例外——尽管后果可能非常残忍血腥。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或许1996年9月的地方省长选举具有特殊意义，从此，各地方政府的行政首脑不再需要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任命，而是由各地方自己选举产生；同时在 联邦参议院中，各省省长和地方议会主席也参与了国家法律的制定。所有这些无疑加强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们的利益（当然也包括由共产党执政的地方政府），首先在于掌握对地方的统治权，其他当然还包括为自己的地区尽可能地谋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至于成为主要的反对派，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因此，只有当国家杜马中共产党和极端民族主义多数派各自都表现出极端的本能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才会对杜马形成抗衡力量。

当然，在俄罗斯各个地方省的统治方式也各不相同，除了在尼舍涅夫·诺夫高洛德（NISCHNIJ－NOWGOROD）推行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化改革之外，其他一些省份在结构上依然延续了过去的旧体制，在这些地方，各省的地方首脑都首先忙于扩张自己的（统治）势力范围，尽可能从自己所管辖的区域为自己和自己的委托人捞取更多的利益。出于这些原因，大变革以来，由于各省份之间收入差异的不断扩大，从而也导致了它们相互之间矛盾的

再次激化。①

假如今天我们把俄罗斯的民主描绘成非常稳定的状态，那似乎还有些夸张，但是可以肯定地说，1993 年以后它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今天的俄罗斯，旧的国家网络系统和利益集团仍然掌握着相当的势力，而一小部分成功的企业家和富裕的“暴发户”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两种势力集合起来都赋予新政治体制一定的寡头政治的色彩。另外，俄罗斯总统体制的执行体系也异常强大，由于缺乏一个强大的议会，更不消说党派政治的基础，在通常情况下，总统采取的政治策略往往具有很大的伸缩空间，他有时也不畏惧用与法律相抵触的政令来实施统治。当然，大选之后通过对总统办公室的有效“清理”，完全违背宪法操作的“波拿巴主义”的危险，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了；同时，杜马在行使自己的立法权时，也不是总是遵循宪法的标准。总之，一个较弱的、有时带有政治投机色彩的宪法审批模式是目前俄罗斯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最主要障碍，也就是说，宪法的原则经常受到某种侵害。尽管如此，毫无疑问，俄罗斯构建这套政治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的确确是完全取自西方的“真经”。②

经济改革

从 1991 年开始，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坠入了深渊。五年之内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一半；工业总产值降低了 55%；农业总产

① Eberhard Schneider，“俄罗斯的联邦主义：限制权力协定与州长选举”，Cologne，Berichte des Bundesinstituts fuer Ost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21 / 1997

② Boris I. Makarenko：“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改革还是重建？”，in：Hans-Joachim Spanger（Hrsg.），《俄罗斯与西方：从战略性伙伴关系到伙伴关系战略》，Frankfurt a. M. / New York 1998

值则减少了三分之一。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的最低谷之后，可以预见到一定的复苏前景。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1995年以来，政府和中央银行一致实施的紧缩财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低，外贸出口盈余有所增加。在不断增长的服务业领域甚至可以发现某种程度的活跃态势，在这里新的就业机会不断出现。

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俄罗斯形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他们由来自不同社会团体、阶层的人们组成，其中包括在苏联时期游荡在社会之外，现在又回到市场经济中寻找机会的人；从前"影子经济"的代表人物；试图将自己的才能转化为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专家；那些懂得将自己的特权"变成资本"的前经济部门的官员。至于部分党内精英很早就把国有企业（尤其在各地方省份）占为己有的行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慨，然而这些插曲并不能阻止私有化在这个国家的进程。①

在私有化浪潮席卷了整个经济领域的同时，经济规则也得到进一步的自由化。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地位被废除，保护性关税也被降低，资本市场也被谨慎地自由化了。货币经济代替了前苏联体制下普遍的"等价交换"，尽管目前交换业务还是存在于少数企业之间，或者作为工资替代品我们还能见到。在城市，只有少数行业的部分大企业还是由国家垄断经营；在农村，不论集体农庄干部和共产党员怎样顽固地反对，所有制形式还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这些老干部，也包括一部分现在已经实现部分私有化的国营大企业的"红色厂长"，还是一如既往地被看做是改革发展的障碍，他们是旧体制的维护者，他们试图在今天的经

① Igor M. Bunin,"俄罗斯现代化的代理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中坚力量"，同上

济生活中，仍然尽可能地保持遗留下来的经营原则，尤其是在出现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他们总是指望国家出面予以必要的资助。

但是，短时期内，这种总体看来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发展却只使少数人获得了利益，国家财政的危机使俄罗斯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行政开支急需更高的税收收入才能得以维持，才可以使政府有能力解决目前的混乱局面，更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若要彻底改造整个社会，使大多数人感受到变革的成就，大约需要整整一代人的艰苦努力。和 1991 年的收入水平相比，俄罗斯民众的实际收入减少了 45%，因此许多俄罗斯人只能通过其他经济行为来补充微薄的工资收入。同时，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日益扩大：从 1993 年到 1995 年，最富有的 10% 的人和最贫穷的 10%的人的收入差额从 11 倍增加到了 16 倍。最富有地区和最贫困地区的差距从 1:8 扩展到 1:25。[①]

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外国投资者会因为（不能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不稳定的经济政策而止步不前，同时地方官僚机构对经济生活的行政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也让许多人感到前途渺茫。法律的不确定性无疑是市场经济的一剂毒药，它的流毒甚广，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是索回贷（债）款的难度非常之大。由于企业领导还停留在旧体制的“网络系统”中，为确保自身的财务安全，企业间互相拖欠债务的情况十分普遍，往往形成三角或多角债务。尽管货币经济已经出现，但它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扫荡这些流弊。因为在旧有的“网络系统”中，企业间存在的相互信任（同为国家企业）对缺乏法律保障起到了补充工具的作用。从这个范围内看，法律的不确定性促使遗留下

① Hans-Hermann Hoehmann，“俄罗斯经济状况与经济体制转型现状”，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30-31 /1997，第 13-22 页

来的、阻碍改革的体制结构更加坚不可摧。

更为困难的是如何使生效的法令得到很好的执行，尤其是面对违法行为的巨大权威时。在俄罗斯，企业追索巨额债务成为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活动范围。众所周知，这个国家的有组织犯罪不断滋生，并且愈演愈烈。但是目前很难识别，产生这种现象是属于功能欠缺还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原始积累”所要走的必经之路。在欧洲和美国，原始资本形成的历史也充满了罪恶的经验（早期的海盗行为）、违法的权力滥用（16至18世纪新贵族对农民采取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对竞争对手和工人进行的压榨和武力压制（19世纪美国在农业、铁路筑造、早期工业中出现的所谓“强盗大王”）。在苏联时期，已经显示出“影子经济”在国家总体经济中令人震惊的高份额，（“影子经济”指非法的经济活动——译者注）。今天，“经济犯罪”覆盖了更为广泛和多样化的贸易领域，从未获准的（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外贸业务的简单逃税，到走私军火、勒索保护费，一直到洗钱和毒品犯罪，发展成一系列“快而合法”的有组织的严重犯罪体系。对俄罗斯的经济来说，特别合法的资本积累是“上帝的惩罚”，还是“额外的祝福”，我们不得而知。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我们也同样无法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无论如何，鉴于“西方”过去的教训，轻率而断然的评判还是以谨慎为妙。

俄罗斯的身份确认——抉择及其前景

社会对这种创伤性经验将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和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它可以追溯到传统的、促成身份确认的世界观。在俄罗斯，关于“身份认同”特别标记的讨论有着非常宽泛的内容基础：宗教－文化（东正教）的定位、国家、民族（斯拉夫种

族）的划分、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乡愁）以及西方文化。

虽然东正教教会拥有众多的信徒，并且各种教派的发展都蒸蒸日上，但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会倾向于宗教复辟。占俄罗斯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民众号称自己信教，同样多的人认为自己用某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虔诚（迷信或者深信星象学）；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无神论者，或者干脆反对宗教信仰。在信教的三分之一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妇女、老人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而在这些人当中，实际上只有5%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正教徒，他们定期去做礼拜。[①] 而其他大多数人的表现似乎有些漠不关心的意味，他们必须为日常的生存问题而需要四处奔波。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由于社会的危机将产生无视传统道德规范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状态下，总会逐渐形成价值的转变，但这绝不是宗教所能带来的改变，而是受世界潮流的影响。尤其是40岁以下的那一代人，他们摆脱了在苏联体制下的突出集体、国家，忽视个人的“工作”伦理道德观，完全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年轻的俄罗斯人不再把工作看成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他们更关心在经济上的机会，而不是收入的均等，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相比，他们以明显积极的态度来对待现在的生存竞争，尽管他们对市场经济的巨大热情因为90年代的痛苦经历而备受打击。有一个调查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在俄罗斯总人口中，选择今天的“自由”还是昨日的“平等”的比例数字

① Kimmo Kaekkinen, Moral Crises or Immoral Society? Russian Valu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Berichte des Bundesinstituts fue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 第26－29页, Cologne 1997

发生了改变：1991年的时候，有42%的人优先选择“平等”；而只有40%的人更看重“自由”。相反，到1996年，两者的价值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结果是33%比43%，对“自由”的青睐无疑已经占有了优势。这种转变使得回到“美好的”共产主义旧时光的梦想成为泡影。①

相对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烦恼琐事，在政治精英们之间进行的激烈辩论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参与这场争论的正方包括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如盖达、亚夫林斯基和内姆佐夫等人；较为谨慎的中间派，如像切尔诺梅尔金这样的类型；但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于中间派来说，重返旧体制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坚持市场经济道路、发扬民主（虽然附带有非常强大的行政执行权）和加入世界经济组织等在俄罗斯国家事务中必须享有绝对优先权，在这一点上，他们早已达成共识，当然也就毫无争议。而站在对立面的反方主要包括共产党人，但是他们的立场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有所不同，他们甚至拒绝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此外反方还包括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政治上不断脱离社会发展进程的极端分子，如谢林诺夫斯基等人。这些敌视西方文化的反对派将把人们引向何方，目前还不得而知。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至少有一半成分是要回到旧的苏维埃统治时期。民族爱国主义者首先愿意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究竟希望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目前还不太清楚。此外还存在一个在西方和亚洲之间充当欧亚桥梁的美好憧憬——不过是一个俄罗斯式特殊道路的古老梦想；东正教教会和泛斯拉夫主义者则充满怀旧之情，

---

① Kimmo Kaekkinen, Moral Crises or Immoral Society? Russian Valu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Berichte des Bundesinstituts fue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第15－25页，Cologne 1997

他们希望回到1917年之前的美好时光。综上所述，今天的俄罗斯人正同时经历四个一定程度上的原教旨主义的回潮：一个怀旧的共产主义；一个民族主义；一个建立在地缘政治学和种族基础上的思想体系；还有一个与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同的混合体。在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反对派暴露出的弱点显而易见，那么在这个“东正教核心大国”，就不太可能形成一个可以与西方文化抗衡的、有吸引力的特殊选择，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对国家政治起到决定作用。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由于反对派不能明确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这使他们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不能和以改革派为主流的进步力量抗衡。然而这种状况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归根结底还是改革派提出了能将俄罗斯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惟一明确可行的计划。尽管这条道路曲折漫长、充满艰辛，但其中最难逾越的障碍无疑是俄罗斯的“大国情结”，对于西方的过分依赖将“剥落”俄罗斯在世界舞台的特殊影响力，掩盖它作为世界大国的耀眼光芒。

大国梦想和无情现实

俄罗斯的精英分子关于俄罗斯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激烈争论，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上几乎完全一致的思路，即所有的人都要求为俄罗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到一个特权角色。俄罗斯的政治阶层，无论属于什么派别，都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国家看做是一个世界强国。然而，这种观点却把他们推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目前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弱势，不允许俄罗斯一方面在西方面前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另一方面又可以顺畅地继续发展与他们的经贸联系，获得经济援助，并由此把握住西方世界提供的经济起飞的良机。也正是这一

点致使俄罗斯的强国政治目标丧失了其应有的基础。[①]

俄罗斯的国际政治兴趣带有非常复杂的情感。很显然，它仍然怀有继续作为大国出现的勃勃野心，因此面对美国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俄罗斯表现出的仇视情绪也就不足为奇了。它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新秩序，用以代替美国的单极霸权，使俄罗斯也能平等地参与对国际事务的决策。这一战略构想促使俄罗斯和其他同样对美国持保留或敌视态度的国家走到了一起：这里主要是指中国，有时也包括“西方”的法国。此外，俄罗斯和伊朗——这个在高加索和里海地区的重要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的关系，有时也会引起与华盛顿之间的摩擦。但是这种纸牌游戏有一定的界限制约，它会止于与西方的关系真正遭到威胁的临界点。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对于由来已久、极易引发争端的边界问题，双方通过谈判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签署了建立相互信任的理解备忘录，特别是在大幅度削减边界驻军的问题上，取得了最为重大的进展。此外，两个国家都在努力改善双边的经贸合作，俄罗斯成为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商；但同时，两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发生潜在冲突的基础。俄罗斯和中国在争夺中亚和东亚的影响力方面已经展开了竞争；大量中国移民涌入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事实使得俄罗斯人大伤脑筋，同样，东西伯利亚各州的地方政府经常发表尖锐的反华言辞。基于这些原因，俄罗斯不可能直接使用和中国建立“战略联盟”这个概念。和美国以及北约相比，中国拥有的对世界事务的

① RogerE. Kanet / Alexander V. Kozhemiakin (Hrsg.),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1997; Neil Malcolm et. al., Internal Factor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96

"实权"虽然较为少些，但对俄罗斯来说，它却同样具有一种更具威胁的潜力。

俄罗斯和伊朗之间也加强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尤其是在民用核技术方面的合作，美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并要求俄罗斯终止与德黑兰的这种合作。然而，俄罗斯方面似乎并不买账，仍然向伊朗提供大量的先进武器，虽然在美国的强烈抗议下，近期这种武器贸易有所收敛。当然，自称为伊斯兰领袖国家的伊朗，也同样使俄罗斯产生了某种疑惧，因为自己国家境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可能很容易受到宗教－政治宣传的蛊惑，塔吉克斯坦出现的政局不稳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创伤还让人们记忆犹新。从另外的角度看，伊朗毕竟是该地区有影响的大国，而能源丰富的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在管道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出方面暗藏着某种竞争关系，伊朗实际上也是这一地区俄罗斯的潜在对手。因此，在和伊朗的关系上，俄罗斯也充满着矛盾复杂的心情，这使它与伊朗建立"战略联盟"的可能性降到了低点。

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伊拉克的萨达姆独裁政权无疑是妨碍美国世界利益的一块绊脚石，而前苏联曾与它保持了多年的良好关系，尤其在武器贸易方面。因此，联合国是否取消对巴格达严厉的制裁，关系到俄罗斯国家十分重要的物质利益：只有允许伊拉克扩大石油的出口，对于莫斯科来说，才存在偿还武器贸易债务的前景，这笔欠款应该有80亿美元之巨。莫斯科在1997年和1998年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进行的大量外交干预，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以投否决票相威胁，反对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双重目的：俄罗斯试图通过这一行为，博取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好感，并借此恢复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重返中东政治舞台；同时，惟有如此，离它用伊拉克还款填补亏空国库的愿望才更近一些。这样，我们看到，一些共产党议员在杜马中大声疾

呼，希望政府重新恢复前苏联时代和伊拉克独裁者的亲密关系。

然而，与西方能否进行密切合作，将关系到俄罗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即俄罗斯是否可以成功地进行经济转型，平稳发展。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俄罗斯充满钦佩羡慕之情。面对来自东方"经济起飞"的诱惑，俄罗斯经济的繁荣还是将首先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成功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俄罗斯才不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上采取与"西方"过于对立的政策，这样它就不可能加入长期的"反西方联盟"。

对于俄罗斯生死攸关的对外利益还是集中在自己的周边地区：在所谓的"近邻外国"——也就是说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那些新邻邦。俄罗斯在这些地区所要求的特殊影响力，在一般情况下是通过经济一体化和安全防卫方面的合作来得到加强的，当然，有时为了保障这些利益的顺利实现，俄罗斯也会采取强硬的措施。格鲁吉亚政府在内战期间，迫于俄罗斯的压力不得不加入独联体的安全体系，接受俄罗斯军队作为"维和部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活动。假如没有俄罗斯的介入，谢瓦尔德纳泽可能很难战胜他的对手甘沙楚第。此外，俄罗斯通过稍加施压就迫使阿塞拜疆将自己的原油出口通过俄罗斯的领土向外销售，而拒绝了其他的可能选择。显然，俄罗斯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确立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至少在同属前苏联的这些邻国圈子里是这样的。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最大可能性在于，当它发现这个"势力范围"受到了某种威胁。

北约的东扩

在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发展中，最大的麻烦就是北约的不断

东扩。西方联盟的这个决定遭到了俄罗斯政治派别中大多数人的反对，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导致这种一致的反对态度的原因却是各不相同的。

对于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来说，事情真是再简单不过了，北约成立的初衷就是一个反对前苏联的军事联盟，现在它的针对性并没有完全改变，因此它的东扩从根本意义上说，产生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非常不利的极大负面影响，尽管现在还不能断言这是直接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军队的首脑机关——总参谋部也从军事力量平衡的角度出发，对这种状况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因为他们看到北约联盟的边界正在不断向东推进，北约潜在新成员国的武装力量也在不断壮大。

相反，对于政治中间派来说，北约的东扩使俄罗斯有重新被排除在欧洲和西方世界之外的危险。他们不愿意看着自己引导国家融入西方社会的尝试、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标准移植到俄国社会的艰苦努力，因为北约的东扩而得到不应有的回报，从而致使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力量朝对自己不利的方向转变，进而失去广大民众的支持。即便在自由改革派中间，有些人也持有此种观点，而他们中的另外一些人则对西方联盟的这种扩张持冷静的观望态度。

对所有的政治团体来说，当然也包括中间派别，北约东扩最主要的直接后果是：这种行为威胁到了俄罗斯固有的传统“势力范围”。人们忍受着巨大的失落情绪，眼睁睁地看着前华沙条约国逐次向西方阵营的过渡，然而这一点或许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假如有一天，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如波罗地海沿岸三国或者甚至乌克兰成为北约盟国的缔约国，那么这种结果无疑是无法让俄罗斯人接受的。由于北约东扩的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欧洲持久的安全问题，因此，导致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

发源地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下去。

双方都在努力缩小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种努力的核心是西方联盟和俄罗斯之间签署的一些基本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该协议中，西方承诺不在新缔约国内设置核武器，表示愿意和俄罗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关系。在布鲁塞尔新近成立的新北约－俄罗斯委员会，就是为这个目标而设立的常设机构。此外，通过对欧洲常规军队（KSE）协议的修改，也将考虑到俄罗斯对双方日益扩大的军备不平衡而产生的某些顾虑。

通过这些卓有成效的措施，近期内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减小，尽管从根本上说，双方发生冲突的策源仍然一直存在。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欧洲安全组织所有国家进行自由结盟选择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虽然没有人迫切地要在近期内将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纳到北约组织里来，但就这点而言，也并不代表西方国家承认了俄罗斯的所谓“特权势力范围”。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只要它还继续坚持认为自己是国际政坛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就不会轻言放弃这种要求。西方和莫斯科的这种关系，完全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机智而谨慎地斡旋，以达到某种微妙的均衡状态。[①]

东正教帝国——一种幻觉

亨廷顿把俄罗斯对势力范围的要求披上了文化的外衣：俄罗斯应该通过建立众多“东正教”卫星国围绕在自己这个中心国家周围的战略布局，来形成与西方世界抗衡的均势。结聚在俄罗斯

① Vladimir Baranovsky (Hrsg.), Russia anf Europe. The Emerging Security Agenda, Oxford 1997

周围的东正教世界所追求的目标，是一幅现实和未来发展可能性交汇在一起的奇特漫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经历了十分艰难的过渡时期，在剥夺了旧势力掌握着的国家大权之后，他们都进行了剧烈的社会和政治改革，那些年轻的民主斗士响亮地表达了自己希望加入西方组织的愿望，于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脱离了“东正教的轨道”，向西方世界慢慢滑去。

乌克兰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这种跳跃，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这个除了俄罗斯之外最大的“东正教”国家里，始终存在着很深的裂痕。在乌克兰西部，掌握大权的是属于单一天主教徒的乌克兰族，这里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在乌克兰东部则集中居住着俄罗斯族的居民。而在中部地区居住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一样）也是东正教徒，但是他们并不承认俄罗斯主教的权威。由于东部矿区的经济不断恶化，回归俄罗斯的呼声渐渐高涨，如果在俄罗斯族定居的东乌克兰地区进行独立表决的话，其结果必然会很快导致乌克兰西部和东部的局势紧张，那么中部地区也会被夹在中间，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乌克兰在库什马总理的领导下，俄罗斯族居民和乌克兰族居民之间的对立，得到一定的有效控制。俄罗斯族聚居的克里米亚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乌克兰给予这个地区以很高的自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要求与莫斯科加强联系的愿望，俄罗斯有不少杜马议员并不很乐意看到这种归并。这个内部的裂痕会一直成为乌克兰国家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因此乌克兰政治上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国家的统一。应该尽量避免和莫斯科发生直接对抗，这样才能不使境内的俄罗斯族居民产生疏远感。但是基辅也不能对俄罗斯表示得过于亲近，那样就会激怒西乌克兰人。因此，乌克兰政府在保卫国家独立性的同时，还要保障自己

的统治能力。面对俄罗斯不时利用乌克兰的内部问题所进行的"小动作"，乌克兰对俄罗斯原先就一直持有的保留态度有所加强。

对这个强大邻邦的不信任感，使得基辅政府在考虑是否把从原苏联那里继承过来的核武器移交给俄罗斯的问题时，长期处于犹豫不决的境地。来自西方的强大政治压力和书面的安全保证，才促使基辅的议会拉达表决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同样的芥蒂也从关于黑海舰队归属的旷日持久的谈判中表现出来；这场艰难的马拉松式的谈判结束以后，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到了俄罗斯所要求得到的黑海重要港口——塞瓦斯托波尔。1997 年夏天，两国终于就该城市划归乌克兰管辖达成了一致，但同时保留了俄罗斯对港口的使用权。

今天，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保持着有限的、一定距离感的合作关系，它们遵循各自的经济利益要求，但是必须在独联体框架内认真地加以履行，绝对不会逾越两国政府仔细确定的合作界限。与俄罗斯签署的一份友好协议规定了双方的这种合作关系，而和北约签署的一份特殊协定又强调了乌克兰的独立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基辅渴望重新回到"俄罗斯－东正教"霸权统治的羽翼之下。①

摩尔多瓦执行的也是小心翼翼的路线，避免和俄罗斯以及近邻罗马尼亚发生冲突。它必须谨慎留意，由于外第聂叶斯特共和国的背叛，莫斯科手边一直准备着高压手段。格鲁吉亚只是非常不情愿地被拉入了独联体组织，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内战期间施加的军事压力，以及俄罗斯维和部队的强硬立场，使得倾向于西方

①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 New York 1997

的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终于做出让步，满足了俄罗斯要求格鲁吉亚成为独联体会员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他则以更大的热情保持着和西方的联系。格鲁吉亚问题的本身也反映出东正教的分裂状态：政府和信奉东正教的阿卜塞斯和南奥赛梯常常会发生纠纷，这两个地区都有各自的语言；相反，和掌握格鲁吉亚语的穆斯林阿德撒人，就没有任何问题。[①]

在巴尔干半岛，"东正教"世界大厦的摇摇欲坠，表现在棘手的塞尔维亚、马其顿、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冲突四重奏中。希腊早已成为西方组织的成员，现在正在完成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巨大转变，它的政治文化也逐渐接近西方的标准。在东正教阵营内部，除了亚美尼亚的贝拉鲁斯外，只有塞尔维亚还对俄罗斯表示了完全的同情。只要代顿（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译者注）协定还一直被遵守，塞尔维亚阵营内的裂痕就表现得越明显，因为班加·鲁卡的领导层现在似乎更加乐意满足西方的价值标准。亚美尼亚的东正教教会是由他们自己的主教领导，在和阿塞拜疆有关被包围的领土纳高尼·喀拉巴赫的争端中，它指望得到俄罗斯的大力援助。而贝尔格莱德和明斯克的两个极其过时、正陷入失败绝境的政权，也正是俄罗斯所不愿意接受和不需要的老朋友。

今天所谓的"东正教文明"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想象之物，大多数拥有东正教－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投奔了西方世界。对于俄罗斯的发展而言，选择同样的出路可能是惟一有成功保障的战略抉择，俄罗斯对西方的回避，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文化的迥异，因为无论是共产主义理论，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教条，它的起源都是 19 世纪的民族国家。如果俄罗斯不顾自

① 感谢我的同事 Rexane Dehdashdi 此处的指点

己真实的利益，在这条道路上一意孤行，那么它将相当孤独，最终不会有一个顺从的、有益的“东正教追随者”陪伴其左右。

俄罗斯的政治领导阶层、经济活跃分子以及社会精英都努力和西方建立紧密的联系，他们希望在国际社会，为俄罗斯争取尽可能多的权力和尊严的强烈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目前看来，各种迹象的发展完全有利于俄罗斯选择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只有在西方国家主动排斥俄罗斯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失败才可以想象；而在这种合作的关系中，西方处于较强的优势地位，因此，未来关系的责任也主要取决于西方。从这个观点出发，北约东扩看来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它对中欧和东欧的民主进程并没有特别的影响，今天也无法吸纳这些国家加入西方联盟。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利益损失，西方和俄罗斯必须在有利于双方的基础上加强合作。

5

国际政治的边缘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扮演着配角，虽然非洲在最近几年因为大量的流血冲突事件而引起了人们的较多关注。[1]这些争端导致了对武装冲突的多次外部干涉，但对于这些干预所取得的成果，人们却莫衷一是。进行干涉的政府通过"CNN效应"满足了使公众大吃一惊的愿望，但是：国际政治的决策者们并没有把非洲，也没有把拉丁美洲放在自己日程表的显著位置。而在15年前的冷战后期，情况却与现在截然不同，当时西方社会还把这两个大洲看做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重点区域，为了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天平向有利于自己的一边倾斜，双方在这两个大洲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而如今，这两个地区已经成为考察社会团体、公共机构以及个人适应能力和变化能力的实验地。

---

① Rolf Hofmeier/Volker Matthies (Hrsg)，《非洲被遗忘的战争》，Goettingen 1992

殖民主义的遗产——中央集权国家和对地方分权国家

非洲从战略上被划分为五个地区：1）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马格里布；2）非洲之角；3）中非腹地，即从大湖至刚果与大西洋之间的地区；4）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非；5）南部非洲。这些地区在地理上当然是紧密相连的，比如说苏丹是北非的组成国家，但同时也属于非洲之角；扎伊尔地处中部非洲的中心地带，但是它在其邻近地区，如南部非洲、非洲之角和西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中非共和国既是中部非洲的北部边沿，又是西部非洲的东部边缘。

所有非洲国家都是人口稠密的聚居地，境内居民可以被划分为许多部落单位，分别属于多数派种族和少数民族。所有非洲国家都继承了殖民时代划定的国界，而这些人为的边界并不符合传统的民族的地理分界。事实上，殖民统治者到处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些四分五裂的状况，以便根据古罗马的座右铭——“分而治之”，来降低统治的成本。今天导致非洲大陆冲突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种族认同问题，而这一切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埋下了祸根。[①]

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冲突中，各个国家对立的党派作为当事人，在互相敌对的阵营中寻求庇护，而苏联和西方也在这些国家的政治派别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彼此争夺对抗。所有这些使得原有的分割状态有进一步走向加剧的态势。此外，法国政府

① Renate Kreile，“非洲种族的政治化”，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9/1997，第12-18页

一直奉行的非洲政策，也是引起非洲政局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德高望重的非洲红衣主教杰克斯·福卡特的主持下，法国政府一直到90年代初期，都把击退和遏制英语在非洲大陆的“扩张”（指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和第二母语的可能趋势——译者注），促进法语作为法国－非洲语言和文化的结盟，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和政策目标。这不仅将巴黎和荒诞的政治暴徒（如中非“皇帝”博卡萨）联系在一起，而且扛着社会主义旗帜的总统密特朗甚至打着“维护和平”的幌子，执行了所谓的“绿宝石行动”，以此为逃亡到扎伊尔的卢旺达胡图族民兵提供保护，这里日后将成为他们对自己国家发动军事进攻的基地。法国的政客们借助于这些手段，控制住了乌干达的穆塞维尼和卢旺达的卡戈马，他们都被认为有严重的“亲美”倾向。很显然，法国反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非洲政策，对非洲各国国内和国际的分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文化”的出现并非总是有益的和带有和平色彩的，尤其是当它坚信必须首先完成国家使命的时候。①

殖民统治机构建立了一个脆弱的、组织上没有和非洲社会融为一体的政权组织形式，这种结构在殖民统治结束后被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任何大的变化。非洲的统治阶层试图接管从殖民霸权者手中遗留下来的“既定国家”，并借此控制人为划定界限的疆土及其范围内的人民。在殖民统治崩溃后，非洲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国家事实上是惟一能够促进社会统一的政治形式，因为只有国家能够分配资源、生存机会和权力份额，这样，

① Guy Martin, Francophone Africa in the Context of Franco－African Relations, in Harbeson/Rothschild, 第147－162页; Raymond W. Copson, Africa's Wars and Prosepects for Peace, Armonk, New York / London 1994; David Thoup, The Colonial Legacy, in: Oliver Furley, Conflict in Africa, London / New York 1995, 第237－272页

对于同一国家的敌对种族、政见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有时也包括）信仰不同的宗教团体来说，对国家的控制权变得极为重要，于是，产生了对非洲经济极具灾难性后果的原动力——对国家权力不顾一切地疯狂追逐。由于国家同时也是惟一能够保证获得机会和权力的行政部门，人们不断地将更多的资源供给国家，而以牺牲社会团体、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人口的利益为代价。①

当权者指示首都的权势阶层和民众支持自己的行为，或者至少对统治政策表示缄默和容忍。由国家进行补贴的食品、住房和汽油都是为了使首都的居民保持稳定的情绪。国家收入，特别是来自国际援助的发展资金和出口的外汇收入，也必须大部分用于满足既得利益集团的要求，当然也包括使当权者大发横财。由国家集中控制下的经济体制产生出一个寄生阶层，自独立以来，他们的骄奢淫逸耗尽了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在非洲，“假社会主义”占有上风，在那些所谓的“亲西方”国家里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畸形的经济形式较少受他们标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更多取决于统治阶级的臆想命令。在其背后隐藏的是种族团体、社会精英或者甚至是个人追随者对确保统治地位的坚强决心。②

国家危机和民主运动

最近 30 年来，对非洲来说，国际贸易的条款在不断“恶化”，这是指和其他物品的交换关系及原材料而言，也就是他们

① Jean－Francois Bayart，L' Etat en Afrique. La politique du ventre，Paris 1989

② Copson，第三章；Christopher Clapham，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Politics of State Survival，Cambridge 1996

经常提到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非洲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他们的发展模式因此而遭到广泛谴责。近20年来，世界上只有非洲总体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在不断恶化：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减退；大量的资本外逃替代了投资；债务达到了整个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110%。[1] 80年代以来，由于债权国和国际发展援助组织开始介入债务国的内政和国民经济，这些国家的统治体制变得不再稳定。对“结构性适应”的要求导致国民经济的非国有化进程；对“好政府”的要求损害了独裁统治和一党专制的原则，而且破坏了国家稳定完整的基础。[2]这个过程使得非洲的统治体系失去了满足其支持者的可能性。蛋糕变得越来越小，因而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民主化的呼声、保障人权的呐喊响彻整个非洲大陆。独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中坚力量，即那些受过学校和大学教育的人，在实现“西方”价值观的过程中，终于认识到自己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民主、自由和人权。同时，那些需要为自己的权力斗争、被排除在权力和物质分配之外的团体中的一部分人，也对民主化的思想表示赞同，他们从中察觉到分享权利和获得（迄今为止）仍被隐藏的财富的机会。非洲独裁政体和一党专制国家的传统主义者们，则以民主模式完全不适合非洲为理由，对这种变革要求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引进“西方的民主模式”无疑会使非洲大陆的国家四分五裂。当然这种论点不过是老生常谈，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予以驳斥，与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西方的民主可能正是治愈非洲顽症的神丹妙药，或许正是对于这样的种族矛盾

---

① Thomas M. Callaghy, Africa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Still Caught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in: John W. Harbeson / Donald Rothschild (Hrsg.),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Post-Cold War Challenges, Boulder 1995, 第41-68页

② Clapham. 1996, 第七章

激化的国家，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尤其是它在联邦体制中具有的宽容和分配原则，通过各政治派别的妥协，可能会给有关各方提供摆脱长期武装冲突的解决之道。[①]

民主运动并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取得成功，在尼日利亚和扎伊尔——这两个最重要的非洲国家里，这场运动最初以失败而告终。在肯尼亚和尼日尔，民主运动被狡猾的独裁者所操纵利用。在利比里亚和索马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国家和社会毫无希望地崩溃，而在索马里北部出现了一个不被任何人承认的、分裂出去的"新国家"，它将民主结构和解决冲突的传统方法联系在一起。[②]在卢旺达，西方要求恢复民主选举的政府，然而1994年它却演变成有利于对图西族少数民族进行大屠杀的工具。与此相对，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成功的案例：博茨瓦纳自从独立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稳定而繁荣的民主国家；在塞内加尔和毛里求斯，民主政体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自己的平稳。此外，纳米比亚、南非、赞比亚、马里、马达加斯加、加纳、贝宁、莱索托、佛得角、圣多美、塞舌尔等，现在还包括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或许还包括塞拉利昂和冈比亚，上述国家也完成了向人民民主政权的艰难过渡。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尚且年轻，但却大有前途的民主政体，但是经受考验的关键阶段还没有完全结束。当然，鉴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我们不能保证这个民主化过程能够毫无挫折、毫无反复地在这些地方得到执行。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传统的、带有穆斯林或是基督教印记的非洲国家里，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强大民主运动都表明，西方民主的价值

---

① Clapham，1996，第八章

② Gerard Brunier, Somaliland, le pays qui n'existe pas, Le Monde Diplomatique，1997年10月，第18页

观已经深深扎根于非洲大陆。①

地区

非洲的最北部地区，历史上被我们称作马格里布，属于伊斯兰世界，但它对非洲的意义却非常特别。几百年来阿拉伯的势力从北部地中海沿岸不断向次撒哈拉南部地区延伸，伊斯兰教也因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但这种文化的侵袭在有些地方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在那些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泛阿拉伯主义和非阿拉伯主义发生激烈碰撞的地区，如发生在乍得和苏丹的事件，应该算是非洲出现的最为血腥，也是最为持久的冲突。在其他地区，宗教因素同样激化了压抑已久的种族紧张关系，人们早就对过去的分配原则“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假借宗教得以发泄这种不满情绪，如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情形。在索马里，尽管所有种族具有共同的伊斯兰文化背景，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个国家的分裂，索马里在非洲大陆最激烈的动荡中分崩离析了。而在其他一些地区，情况却有所不同，如塞内加尔，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毫无怨言地在20年中，听任一个基督教总统的统治，而今天，他们同样可以容忍一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第一夫人站在穆斯林教的国家元首身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非洲所具有的极度多样化，使得我们不可能获得该地区宗教、种族和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致图像；在这块古老的大陆，经济状况、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始终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

① Hermann J. Cohe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ecurity, in: Harbson / Rothschild, 第278－294页

西非

这种现象在西非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在那里，所有国家实际上都包含有一部分穆斯林人口，他们分布在一定的部落和民族地区。在塞内加尔、象牙海岸以及贝宁这样的国度里，这种情形并没有带来负面的政治后果。这些国家虽然也经历了内乱，然而获胜的社会中坚力量没有按照宗教的界限，独断分配经济资源和拒绝给予人民政治权力，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相比，这几个国家的政府堪称“有为”，机制运转良好，因此职能也得以发挥。

在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以及中非共和国，情况便有所不同。在这些地方，内部的紧张局势遭遇到了特别恶劣的“外部环境”：气候条件、在贫瘠的热带稀树草原上过度的放牧，引起了严重的土地沙漠化，这种后果激化了游牧民族、定居的牧场主和不断增长的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过度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官僚体系和专制体制、军事独裁和完全喜怒无常的、具有偏执狂性格的领袖（如中非皇帝博卡萨一世），这些国家的政府（统治者）被证明是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通过对本国（除了尼日利亚）有限资源的合理调配，来履行统治职责。国内的紧张局势、经济贫困化、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以及发财致富的政治中坚力量（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所有这一切形成的恶性循环导致了各种危机的全面爆发。于是，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开始出现，而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影响了接受移民的国家，致使它们的政局不稳。

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这样的国家里，国力在“暴徒集团”之间的争斗中渐渐损耗，对立的政治派别为了把国家变成服从于自身利益的私有财产，不择手段地相互倾轧，一群毫无希望的、

失去前进方向的年轻人成为这些帮派招募的新兵。作为这种新变化的标志，那里出现了国家职能的私有化，为重新赢得稳定，政府进行了最后的尝试：在塞拉利昂，私人企业可以代替政府职能部门，征收税赋；南部非洲的雇佣兵企业“Executive Outcomes”甚至被委以保证公共安全的重任。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将这些国家功效从种族权力集团的争斗中收归中央的惟一可能性。①

尼日利亚表现出整顿地区权力的过人天赋，拥有9千万人口的石油大国理所当然地成为地区性霸权国家。尼日利亚的军队对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内战进行了干涉；拉各斯在军事上支持乍得；在冈比亚，它也派遣了军事顾问。当然，这个黑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权还是被掌握在只为谋求个人私利的军阀手里，因此从根本上说仍然存在着崩溃的危险，就像在60年代国内的种族团体——浩萨人、伊博人（尼日利亚东南部）和约鲁巴人之间的武力混战导致国家解体一样。此外，尼日利亚的霸权野心也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其邻邦的衷心赞同，尤其不能得到法语国家的认同。②

整个西非地区似乎预感到了自己在使用暴力的混乱中，有走向沉沦的危险，在这里，只有较为成功的国家如加纳、塞内加尔以及因丰富的石油资源而获得利益的加蓬共和国还拥有希望，但它们对于目前存在的严重状况根本无力改变。至于是否存在能将国家权力私有化，或是建立一个地区性霸权的办法来寻找到一条

---

① Paul Richards, Rebellion in Liberia and Sierr Leone: A Crises of Youth, in: Furley 1995，第134－171页；WilliamReno,《国际贸易、军阀首脑及非洲国家的》，摘自”Welttrends Nr. 14，1997年春季刊，第3－30页；Werner Korte，“利比亚国家崩溃的过程”，同上，第55－80页

② Richard Joseph, Nigeria: Inside the Dismal Tunnel, in: Current History，1996年5月刊，第193－200页

摆脱困境的出路，可能还只是打着问号的设想。因为在几个夺标呼声最高的团体中，对于能够取得各方一致同意、公正分配权力和资源的这个根本性问题，还没有被上述“解决方案”所涉及。

非洲之角、苏丹和中非

非洲之角①属于全世界最贫穷、处于严重分裂状态和受到战争创伤最多的一个地区。在东西方冲突的最后阶段，这一地区因为占有红海通道的制高点以及靠近波斯湾的重要地理位置，而一度成为“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埃塞俄比亚在皇帝海伊勒·塞拉斯的统治时期是美国的忠实朋友，而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裁者孟吉斯图则加入了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索马里的专制君主塞阿德·巴瑞最初是苏联的拥护者，后来却突然转而成为美国的盟友。这种不断变换的、与超级大国结成联盟的行为，致使武器在这些国家里泛滥成灾，并且增加了因为内战而遭受的损失。

这两个独裁政权如今都已成为历史，尤其通过索马里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和分散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是怎样致使一个在种族和宗教上都具有很大程度的统一的国家，一步一步走向灾难的。索马里的社会权利一直被部落和党派所瓜分，即权力完全是分散的。塞阿德·巴瑞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实行国家权力，同时他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和发展自己的派系，开始利用新的资源。然而这一切必然会以失败告终，反对巴

---

① John W. Harbeson, Post－Cold War Politics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Quest for Political Indentity Indentified, in: Harbeson/Rothschild，第127－146页；Christopher Clapham, The Horn of Africa: A Conflict Zone, in: Furley 1995，第72－92页

瑞政权的党派成功地进行了联盟，并很快瓦解了他的统治。紧随而来的结果是——首都摩加迪沙的执政党派系之间至今仍在进行的争夺国家大权的激烈争斗，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结构分散的部族统治卷土重来。位于索马里北部的索马里兰地区以前曾是英属殖民地，而今天却早已完全和摩加迪沙脱离了关系。①

新独立的国家厄立特里亚曾经隶属埃塞俄比亚帝国的东北部版图，20 世纪 30 年代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那里的人民在反抗亚的斯亚贝巴的孟吉斯图独裁统治时，意外地形成了民族认同感。这场武装抵抗运动最初是从穆斯林居民聚居的西北部地区开始的，但是很快和厄立特里亚大部分地区的民族独立斗争联系在了一起，尽管该地区的居民主要是由信奉埃塞俄比亚东正教的、和埃塞俄比亚的提格瑞叶人相近的部族所组成。厄立特里亚解放运动的节节胜利也推动了埃塞俄比亚国内反抗孟吉斯图政权的运动，这场运动从提格瑞叶民众组织不太健全的奥若默地区一直蔓延到阿姆哈拉的“统治部落”，孟吉斯图的命运由此而注定。独裁统治，对权力和资源贪得无厌的中央集权，糟糕的、毫无成效的经济政策以及执政者毫无顾忌的敛财行为，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对革命性变革的迫切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和种族认同感只能算是动员的辅助手段，而并非它的前提条件。

在这两个国家，人们都在努力争取建立一个使中央和地方的权利达到平衡关系的机制，以便在所有重要部落的参与下、在一定的民主形式下，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同时，这两个邻国也努力帮助调解伊萨人和阿法人在小吉布提的潜在冲突，并且防止索马里的混乱局面扩散开来。他们的经济政策更接近一种温和

① Michael Maren, Somalia: whose Failure? Current History, 1996 年 5 月，第 201－205 页。

的自由主义方式，指引早先解放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早已被彻底抛弃了。

根据目前的实际状况，值得注意的首先应该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所处的周边环境不能说是良好。它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邻国苏丹对极端伊斯兰组织的支持。他们采取的对抗措施是帮助苏丹南部的非阿拉伯和非伊斯兰民族反抗苏丹原教旨主义政体的分裂运动，而原教旨主义也试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向南传播。但是，宗教的清晰界限已经被渗透浸泡而变得模糊不清了。苏丹今天正在支持乌干达的基督教武装派别，并且也在埃塞俄比亚寻找非穆斯林的同盟者。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乌干达政府一样，帮助苏丹西北部的穆斯林进行反对喀什穆政权压制政策的抗争。而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边境之战又抛开了双方利益的共同点。

苏丹拙劣的扩张企图，很可能导致在非洲之角以及大湖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利益组合。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卢旺达以及布隆迪的共同愿望，都是限制苏丹阿尔·巴谢尔政权的扩张活动，扎伊尔的新一届政府一开始也遵循同样的目标。出于对这一地区安全政策的兴趣，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合作，它们甚至可以将索马里兰包括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而对于索马里南部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短期内解决目前混乱局面的希望。

这种利益的共同点，可以使那些在大湖周边以及扎伊尔地区因为相互间的种族冲突而释放出来的暴力倾向，得到有效的限制，而这些暴力冲突所具有的潜力，足以使整个地区陷入部落联盟和中央政府之间、各个部落互相之间的血腥混战之中。为了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仅靠东部邻邦各国表现出来的利益共同点还是不够的。扎伊尔必须在中央政权与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地方政

权之间找到·种平衡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国家的稳定。只有当金沙萨追求更多的协调关系和均衡的分配原则，而较少留意统治欲望时，这个目标才可能实现。假如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国际组织必须出面帮助其邻国有效地限制扎伊尔内乱所产生的后果。[①]

南部非洲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之中，南部非洲国家饱受国际争端和内战之苦，整个社会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和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相比，非洲南部却被看成是承载未来希望的使者。[②]南非共和国处于本地区的中心位置，虽然它的犯罪率居高不下，为整个非洲大陆之首，但它同时也是该地区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其所有邻国加总的四倍左右，在南非四周围绕着一群大的前沿国家：原材料丰富的纳米比亚，在经过多年的战乱之后，目前的所有状况表明它正在向民主和和解过渡；在这里，占人口多数的奥望波人和很久以来与白人少数民族联合在一起的赫雷罗人之间的对立似乎没有留下长期有害的影响。在贫穷的莫桑比克，内战各党派之间也进一步实现了大范围的和解，达成了某种状态下的一致。出产石油的安哥拉，开始通过重新分配权力来消除两个党派——也是发生在种族基础之上的政治分歧——之间的对立。虽然要在短期内使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① Winrich Kuehne，《东非和中非危机地区的损伤局限》，摘自“Der Ueberblick”，1/1996，第88－94页

② Ben Schiff，Virginia Curtin Knight in：Current History，1996年5月，第216－227页；Harvey Glickman，Antoinette Handley / Jeffrey Herbst in：Current History，1997年5月，第217－225页

放弃一党专制和社会主义中央经济体制还比较困难，但是它们各自还是做出了一些努力。原先作为非洲发展思想模范学生的坦桑尼亚，现在必须排除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这两个泥沼里的浑水。最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令人惊奇的博茨瓦纳，一个仅仅依靠大自然赐予的钻石宝藏而达到人均收入2800美元的国家，对于整个非洲来说，这简直是令人无法置信的成果，只有蕴藏丰富石油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以及被称为旅游明珠的毛里求斯才可能达到如此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在种族和宗教上具有多样性的博茨瓦纳的成功向世人表明，假如避免人为的严重错误，可以取得怎样的经济成就。在这个国家，没有过分的中央集权；拥有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多党制统治机制，拥有上下两院议会，其中一个保留传统的“首脑”，即部落头领成为议员参政议政；同时，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足够的权限范围。博茨瓦纳从未崇尚过国家经济，而总是推行一种相对开放的市场经济策略。它没有把自己内部的种族宗教问题演变为内战，并且从邻国的战争中成功地摆脱出来。博茨瓦纳人掌握了这种置身事外的高超技巧，并且和非洲国民大会以及南非政府保持了可以接受的关系。

博茨瓦纳的成功之路清楚显示了非洲南部的希望和机会，在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之后，这一地区曾经陷入灾难性的地区冲突而不能自拔，种族隔离政策又使这种状况雪上加霜。然而这一切已经一去不返，今天，所有的国家都走上了同样的发展之路，当然它们的信心、机会和速度或多或少会有所不同。它们都试图通过采用广泛参与的民主机制、联邦式的政治体制，来和平地解决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化解潜在的种族－宗教冲突的因素。同时，这些国家必须通过实行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措施，来促使经济得到发展，走向繁荣。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非洲已经出现了三种跨越边界的合作

模式：1）在西非，它是以一个地区霸权国家为核心，通过西非国家经济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作为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工具，它并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成功，到目前为止，它们的主要活动还仅仅局限于对利比里亚的干涉行动。2）在东非中部以及非洲之角，地区性合作是建立在政治利益组合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地区八个国家一致旗帜鲜明地支持原扎伊尔的卡比拉政权的态度，向世人第一次表明，在这个地区可以建立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阵营。3）最后，出于对生态进步的共同利益，南部非洲各国围绕着南非这个经济增长的马达，可以创造出一个使南部非洲发展组织（SADC）复苏的基地。其他地区的亚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OAU）的境况一样，对他们来说，能够加强会员国有效合作的希望似乎很渺茫。①这些组织的主要贡献存在于过去的岁月，它们曾经维护了领土完整和殖民统治后的国界不受破坏的原则。然而，这些原则现在早已因为新近发生的事件而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此外，非洲统一组织也为非洲国家首脑之间的会晤和交谈创造了一个有利的论坛，在它的推动下，非统各国签署了《佩林达巴协议》，倡导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非洲"。除了这些，这个组织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就。因此，合作的更大希望寄托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三个地区。②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的问题和非洲的大不相同。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

---

① Carol lancaster, The Lagos Three: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Sub - Saharan African, in: Harbeson / Rothschild, 第189－208页

② Clapham, 第五章

早在150多年前就获得了独立，但是它们直到二战后，才逐渐并且是部分地从所谓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后院”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后院”这个概念的应用并不突兀，“门罗主义”实际上强调的是“美洲是美国人保护下的美洲”这个理念。作为美国霸权的对象，拉丁美洲始终在美国的阴影下生存，照目前的情形看，其结果无疑是弊大于利。

文化同质和阶级分裂

和西欧以外所有世界上其他的地区不同的是，拉丁美洲在文化上与西方世界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从地理上，它由四个区域组成，即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其中南部包括许多重要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智利。它的人口构成主要是罗曼人和当地土著人长期融合的混血后裔，在加勒比海岛屿也居住着盎格鲁人和法裔欧洲移民和土著人的混血后裔。此外，大多数国家有较高比例（如加勒比地区）或较低比例（南美洲）的黑人居民。在宗教信仰上，罗马－天主教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在最近几年新教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在巴西。这种迅速发展急剧改变了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当然情况并不都是向好的方面转变。

然而，相对同质并不等同于完全同质，白种人、黑白混血的穆拉塔人、白种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所有这些不同种族的人们组成了一个“种族阶级”，在这里，“白种人”的遗传基因成分越少，社会地位低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美洲大陆各国的“颜色”也各不相同，阿根廷人和智利人所含有的白人遗传成分较高，而在巴西和加勒比岛屿国家，居民的大多数是有色人种或黑人。属于英联邦的加勒比海国家的统治

文化区别于那些受伊比利亚传统影响的国家，前者往往在管理结构上更加完美一些。此外，作为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可能主要是出于自尊心的结果，它在处理事务上，往往表现出与其他受西班牙文化影响的邻邦不同的方式方法。但是相对于非美洲的势力，拉丁美洲拥有的相互认同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害，尤其是在处理和来自美国的“老外”的关系上。[1]

与其他大洲相比，在过去的岁月里，南美洲发生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要少得多。相反，很久以来发生在它们国内的暴力事件却处于一个令人惊骇的高水平，消灭“敌人”的残酷暴行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残暴的事例相“媲美”。这里所指的常常是“国家的暴力行为”，如智利和阿根廷军事独裁期间的严刑拷打、对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进行的暗杀行动等等，这些罪恶行径如今在这些国家还时有发生。由安全部队成员或前警察组成的“准国家”组织，正越来越多地实施暗杀行动，如活跃在萨尔瓦多、里约热内卢的“死亡中队”。在那些内部发生激烈对抗的国家，反政府游击队的许多行径也表现出对人权的极端藐视，如发生在秘鲁的“光明之路”大屠杀事件。至1985年，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地区举办的军官学校总共毕业了50000名培训学员，其中大量的毕业生充当了雇佣军。如此看来，“美国的后院”事实上也并非世外桃源。

导致这种内部暴力冲突的根源在于拉丁美洲社会阶层的极端垂直分布。从伊比利亚征服者那里获得大量财富的大地主和矿场主阶级，自始至终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在很多方面甚至还和军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势力竭尽全力、想尽办法来维护

① G. Pope Atkins, Latin America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1995，第二章

自己的既得特权。相反，在拉丁美洲，市民阶层从传统上一直就处于过于弱小的位置，无法完成国家和社会自由化的“历史使命”。这样，在美洲大陆 150 年的历史中，理想的时候，各国政权会由保守的军事独裁向平民化的福利国家转换，但是这种有限的民粹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专制主义的阴影下进行统治的。这两种体制形式是由国家的统治角色和寄生在社会上、吸食养分的国家统治阶级共同决定的，在这一点上，拉美与在其他方面迥然相异的非洲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国家权力的重压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叛和压迫之间的摇摆不定耗尽了社会的财富。国家主义体制带来的大量铺张浪费和上层阶级的资本外逃，使得美洲大陆的一些大国集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开债务国。这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意味着一个恶性的遗传毒瘤。[①]

起步：调停争端、自由化、民主化

在过去的 15 年中，美洲大陆经济经历了艰难的起步阶段。持续的暴力冲突得到了有效调解，国民经济实现了自由化，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在中美洲地区，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相互交错进行的十余年内战，通过谈判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虽然游击队的活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大大减少了。

在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西（圣保罗地区）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心地带，它们和东南亚的经济腾飞相比也并

① Hans－Juergen Puhle，《北美洲与南美洲的独立、国家结构及社会发展》，摘自 Detlef Junker，Dieter Nohlen，Hartmut Sangmeister，《20 世纪末的拉丁美洲》，第 27－48 页，Munich 1994

不逊色多少。在其他国家，市场也逐渐从国家官僚的铁掌中解放出来，中层阶级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而得到提高，军队和大庄园主的势力开始有所减弱。这种社会权力均势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拉丁美洲是近几年来，除了东欧之外掀起民主浪潮最有成就的地区之一。几乎所有国家如今都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尽管在相隔不远的20年前，整个大陆还是军事独裁者的天堂和乐园。这些民主国家中的大多数，在此期间已经经历了一次或多次正常的权力更迭，但它们都毫无例外地保持了民主的稳定性。①

等级社会的极端化：对民主的威胁

俗话说，发光的不全都是金子。和非洲一样，美洲国民经济的自由化往往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使它的结构要完全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因而这个政策很少能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得失，其结果是使美洲大陆上的社会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贫富分化问题愈来愈严重，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同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民众所占人口的比例还在不断增加，目前在大多数国家，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30%－40%之间。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福利计划继续成为经济和预算原则改组的牺牲品，使得贫困人口的数额不断扩大，在这一点上，只有玻利维亚是值得称赞的，甚至相对来说可以算是成功的例外。为了生存而不断增加的暴力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组织正在不断扩大其招募范围，这种情况给社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严重后果。

① Carl Kaysen / Robert A. Pastor / Laura W. Reed, Collective Responses to Regional Problems: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Colection of Essays from a Project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AAAS 1994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引起了更高层次的社会暴力倾向。[1]

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就像寒冷的冬天，使民主这棵娇弱的“温室之花”有凋零的危险。在拉美社会，“政治”这个词汇常常让人联想到营私舞弊、裙带关系、习以为常的肥缺和官官相护这些令人憎恶的事情，人们对这种腐败政治的疏远程度也因此而越来越大。于是，许诺内部安全和社会福利计划并存的民粹主义得到了走上前台的机会，但是到最后，人们就会发现，他们既没有真正实现前者，也没有认真落实后者，秘鲁总统藤森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旧秩序下被人敌视的、代表暴力的警察和军队，在大多数民众眼中——尤其在社会的弱势群体中——还是得不到信任，而且不断引起新的猜疑。警察往往从对“左派”的迫害很快过渡到对穷人的折磨，这样，紧随在针对臆想的共产主义威胁之后的，是经常出现的、有计划地杀害街头流浪儿和小犯罪分子的行动。而黑手党头目们则很少受到打搅，除非他们直接对国家的统治者提出挑战，如哥伦比亚的梅德林挑战书。此外，国家武装部门对民主机构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智利，或者巴西这些国家，人们甚至开始怀疑，完全的民选文人政府是否能够控制军队和警察机构。相反，阿根廷似乎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过去的血腥历史遗留下的深深伤痕还隐约可见。[2]

就这样，南美大陆生活在希望和担忧之间，市场经济和民主精神正处于试验阶段，然而它还并没有通过这次严峻的考验，尽管在钢丝绳上，社会阶层和政治体制暂时达到了平衡。坦率地说，这个地区的问题并非文化的冲突，而是阶级斗争。风险来自

---

① Hartmut Sangmeister, Bernhard Thibaut and Klaus Esser in: Junker, 1994; Albert Berry (Hrsg.) Poverty, Economic Refor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merica, Boulder 1997

② Latinamerika - Jahrbuch 1996, 第 9 - 91 页

尖锐的阶级矛盾，因为保守派社会中坚力量与底层的种族阶级之间很难达成有效的妥协。至于他们之间的阻力究竟有多大，我们从拉美地区的农村改革中就可窥见一斑，这种尝试可能是从北到南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了，它的目的在于消除社会不安定的大部分主要因素，给农民——穷人中最贫困的人群——创造一个光明的前景。但是，由于地主的顽固态度、以及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的对政策和军队的影响力，这项改革几乎到处受挫，停滞不前。①

国家间的合作

当然，上面提到的问题还是主要存在于社会阶层之间，而在国家之间，改革推进了民主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能够像南美洲那样，国家间进行的地区性合作是如此的活跃和频繁。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发展自由贸易区、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南美洲，地区性合作组织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许多组织的成员交叠在一起，这种混乱的局面可能会使人们担忧地发问——它们是否多得有些过分？或者怀疑政治家们在如此频繁的会晤和协调而前，是否还能将这些组织的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②相互依赖的强烈要求对拉丁美洲产生的作用十分巨大：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或者愿意摆脱这种一体化的束缚。

一个最新的杰作、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创意当属 NAF-

---

① John Peeler, Building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1998

② Manfred Mols / Manfred Wilhelmy von Wolff / Hernan Gutierrez, "地方主义与拉丁美洲及东南亚的合作",《政治学比较》, Muenster 1993; Lateinamerika – Jahrbuch 1996, 第 142 页

TA，即建立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成员国、智利为参加候选人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个组织在美洲大陆的北部“西方国家”和南部的拉丁美洲国家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它最初的构想源于美国希望通过南部邻邦（指墨西哥）经济的稳定发展，一劳永逸地解决不断加剧的边境问题（指通过墨西哥向美国输送非法移民的边界走廊——译者注）的动机。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事实：即“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两者所具有的文化亲缘性。墨西哥同时也是另一个地区性组织的成员，即包括中美地峡国家、加勒比海岛国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在内的加勒比海国家联盟（ACS）。值得注意的是古巴也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1994 年建立的这个加勒比海国家联盟旨在促进各成员国之间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合作，在经济方面，重点是旅游和交通。

包括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在内的“安第斯公约”组织，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萧条之后，自 1989 年以来又逐渐恢复了活力。在此期间，虽然厄瓜多尔和秘鲁于 1995 年发生的短期战争，致使该组织的努力遭受到挫折，但它还是经受住了考验。1996 年以来，这些国家走上了经济共同化的道路，对于安第斯地区的国家来说，重要的也同样是共同市场的优势。但是，在经济上资金最为雄厚、纯拉丁美洲的组织还得算 1991 年成立的 MERCOSUR 即南美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加入这个组织的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智利也和这个组织发生了某种联系。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智利同时也在向北美自由贸易区频抛媚眼。在这个组织中，玻利维亚则处于观察员的位置。南美经济共同体（MERCOSUR）1994 年以来使用一个共同的对外关税协定，这是通向经济一体化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自从成立以来，MERCOSUR 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相比，前者扩大的速度要快得多，这是该组织一个显著的

成就。

这里提到的只是总共九个地区性经济组织中的四个，除此之外还有南北美洲的政治联合会，即 OAS，它是一个政治和国防联盟；然而，由于美国在该组织的巨大影响力，这个组织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方遇到了许多政府的有保留的抵制。在政治上与之相对的一个地区性组织是 1986 年成立的“RIO－GROUP”（里约集团），它是在拉丁美洲的和平进程中产生的，由 12 个重要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组成，其宗旨在于协调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上能够更有效地代表南美次大陆的利益。

非洲和拉丁美洲——它们究竟属于哪个阵营?

尽管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两个大陆差异非常之大，但是两者之间的共同点还是能够显露出来。两者都因为现代化的“冲击”而使原有的社会支离破碎。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分裂主要沿着虚构的种族断层线；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由社会界限，例如阶级划分决定的。无论在非洲还是在拉丁美洲，它们的政治体制都被证明是没有能力解决这场危机的，两方面都是一定社会“碎片”的代表，统治阶级都忙于把国家当做“战利品”或分配机器，可以顺手牵羊地攫取财物。其后果是：坏政府（“BAD GOVERNMENT”）更加剧了这种社会危机、加深了种族之间的裂痕、推动了最残酷暴力行为的发生。然而在这两个大陆，博茨瓦纳和哥斯达黎加都属于特殊的例外，廉正明洁的“好政府”向人们表明，情况也可以有所不同：这两个国家以相对较高的国民收入、较低的犯罪率和令人满意的人权记录而被国际社会所称道。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目前也显露出认真探索克服危机的一定迹象，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希望都在于民主化、自由化和地区合作的结

合之中，但是对于这种希望的实现可能，我们还远远不能确定。

在这两个大陆，最近20年来，“西方的价值观”都深深扎下了根。对于非洲来说，完成这种根本的转变比较困难，发展中出现的财政赤字相当沉重。拉丁美洲在这条发展的道路上要顺利得多，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处于领先位置的拉丁美洲国家有意识地在政治上向西方国家靠拢。阿根廷早在几年前就脱离了不结盟运动；智利在这个运动中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带头人；阿根廷和巴西同属于受西方工业国家控制的出口管制国家。拉丁美洲也可能会遭受失败而成为全球化压力的牺牲品，但也很有可能在20年后，大多数拉美国家完全融入了“西方社会”，成为它的有机组成。到那时，我们所指的进步绝不是它们的寡头政治对美国霸权进行的机会主义的适应政策，在更多意义上，这种“西化”表达的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在价值观上的一种稳定的定位。

第四部分　展　　望

1
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对未来的展望

如果我们还一直将西方世界看做国际政治的核心，这决不是批评家们所说的“种族优越感”或“文化帝国主义”。现在，西方不仅仅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雄厚物质基础和先进性，而且它在社会制度上也比任何一个其他的国际政治地区更为稳固。与发生在伊斯兰世界、亚洲或非洲的局势紧张状况相比，西方世界内部的冲突和危机简直不值得一提。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全球化的新挑战时，西方世界作为开放的社会所具有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是其他文明根本无法比拟的。

这个论断可能会令许多人大吃一惊，毕竟目前在许多西方国家里，我们常常听到的还总是一些抱怨社会和体制僵化的声音。这些抱怨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但是我们在观察分析问题时，必须把西方的情况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相比较，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可信的。假如还需要一个什么证据的话，那么1997年秋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明证。那里的金融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经济和政客交媾在一起的产物，政坛中坚分子们所支持的这种内部组织结构，早已被“亚洲价值观”的先驱们所拥护并用以反对西方的“旧体制”，并以此来展示自己所谓“亚洲模式”的优越性。被卷入这种三角关系的客户关系和裙带关系，现在被证明恰恰是亚洲经济奇迹惟一致命的弱

点。[①]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关于西方国家内部危机的说法也并非无稽之谈。对于同时实现效率、团结和法律精神，我们也（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好办法。但是，对这一目标的追求，由于我们社会宪法对多样性的有效保障而变得更容易一些，因为多样化是创造力的前提，而只有制度的创造性才符合21世纪的行为逻辑。

西方国家的团结一致

西方国家的团结一致是对国际政治进行和平改革的基本前提，这个出发条件绝对是必要的，“看起来不坏”。和悲观主义者的预料有所不同，北约在自己的公开敌人消失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解散，反而重新有机地组织起来。它在组织问题上甚至克服了老一套的、但具有强大分裂力量的冲突因素的干扰，如在成员国之间如何分配业已减少的军事领导职位上，各成员国达成了谅解和一致。中欧和东欧国家希望尽快加入北约的事实表明，西方联盟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虽然北约内部不断地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例如法国和美国之间就那布勒斯驻军指挥权的争执，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事实上这种状况自1949年以来就是如此；即使在冷战时期，强大的敌对阵营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北约的“占卜官们”也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冲突。但是如果把这些引起争端的地理战略利益差异和矛盾双方重要的共同利益，以及保护民主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政体的共同决心相比，那些令人不快的

---

① Christopher Lingl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sian Century: False Starts on the Path to Global Millenium, Brookfield 1997

矛盾还是不值一提的。

今天，西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强。虽然国际贸易的一部分从大西洋彼岸地区转移到了太平洋西岸地区，并因此而在西方和亚洲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投资状况，就不难发现西方国家之间无与伦比的紧密联系：美国和西欧相互间在对方地区投入的资金要远远高于其他虽然具有很大吸引力、但在西方文化圈以外的市场和地区。此外，在西方国家的文化圈内，欧盟内部国家之间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又展现出了另一幅突出的、密集型的长长画卷。人们抱怨最多的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竞争关系，然而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是经济密切联系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一点却被那些目光短浅的分析家们，包括那些具有浓厚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们完全忽视了，实际上，没有竞争也就根本没有相互间需要保护的共同利益！

在整个西方，国家世界和经济世界产生的联系作用多于分裂效果，社会世界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差别。那些非常有影响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大赦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禁止布雷运动，——当然也存在不能产生积极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它们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如基督教科学会（SCIENTOLOGY）。目前，所有这些国际组织的重心都在西方。此外，西方世界各国之间的通讯密度也是最高的，在因特网上情况也是如此。

结论：西方国家团结一致的前景看来是美好的，但是这种团结不会自动地产生结合，而是需要我们不断地予以重新确证，来促进这种团结的形成。然而，西方文明的结构和体制是如此牢固，因此，若想彻底打碎西方集团，那将是一个愚不可及、无法实现的妄想，必将导致始作俑者的悲惨结局。

此外，西方阵营也在进一步扩大，在未来 15 年内，西方机

构，如北约和欧盟将吸纳十个左右的新成员国。毫无疑问，这个事实本身就成为西方现代化模式令人称羡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明证。我们再来看一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个“资本主义俱乐部”，迟早所有选择市场经济的社会和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都将加入其中。那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世界其他地区文化最先进的代表，在达到一定发展阶段之后，也希望参加最具西方认同感的国际机构。现在日本、韩国和阿根廷都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也极具代表性。

西方及其边缘地带

对于拉丁美洲来说，回归西方可能是预先确定的发展方向。那里本来就存在着对西方文化的亲合性。那些把所有的、尤其是独立150年以来的社会不良状况都归罪于对西方帝国主义“依赖性”的知识分子，早已被经济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软化。智利正准备从不结盟运动中脱离出来；阿根廷和巴西都加入了主要由出口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该组织是一个倾向于西方的协调出口控制的联盟。墨西哥虽然还维持着它作为不结盟裁军方面问题的领导角色，但是它首先要扮演的是更重要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角色。在美国和英国关于南美共同市场（MERCOSUR）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优先权的争论上，问题的焦点不再是不同的发展模式，而聚焦在南美洲是把自己看做是美国的经济政治伙伴，还是按照欧盟的模式，在紧密联系的西方经济之内形成另一个新的中心。

我们对此不应该夸大其辞。事实上，从拉丁美洲内部，我们时常会听到对西方模式发出严厉批判的声音，当然不仅仅是古巴在操心这件事。在南美次大陆的一些国家里，现在还一如既往地

凝聚着一股反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那里的人们明确指出了我们社会的过错，我们必须以特别明确的方式迫使自己面对我们经济方式产生的某些不利后果。而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制度上和文化上和我们靠得越近，这种极端的表现可能对我们在思考和实验方面的帮助就越多。

当拉丁美洲越来越多地被西方“补选为成员”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还是完全处于国际政治的边缘地带。这并不是说，在这个地区发生的轰动事件没有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并且可以给不断而来的外部干涉制造某种理由。相反，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将来某一天，也可能会出现令世界震惊的突变和恶化，促使霸权国家和联合国去着手解决那里的问题。然而，黑非洲如果想成为整个国际政治联盟的伙伴，还是过于分裂和弱小了。最好的情况是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使自己成为可以自助的可信候选人。

早些时候，南非共和国赢得了一个超越该地区的角色。第二候选人尼日利亚和第三候选人刚果一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这个职位还是显得过于弱小，它们的政治制度也太腐化和令人讨厌。相反，南非却拥有成为地区强国的潜力，当然，为此那里的民主也必须得到加强，经济必须得到持续的稳定增长。惟有如此，那些对于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事件——即大量失业和由此产生的贫困——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目前南非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是建立在尼尔森·曼德拉稳固的道德位置上的。作为在非洲南部、被四个五个或更多国家追随的经济增长中心，南非应该有能力在曼德拉之后的时代，保住这个特殊的位置，甚至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如果南非果真能成为该地区的领袖力量，就会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出现一个完全更能履行权利和享受义务的伙伴。它会按具体

情况认清形势，并努力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曼德拉不顾美国的竭力劝阻访问了古巴和利比亚，这种坚决的态度表明，南非并没有把自己看做“从属人”的角色，而是更注重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关系。尽管如此，南非还是存在着对西方政治相对更强烈的亲合性，在那里施行的也是市场经济、民主和人权。因此，亨廷顿认为的南非有可能成为一个反西方的亚洲同盟的观点，无疑是非常有局限的，它充其量会在某些具体事件上成为亚洲的一个同盟伙伴罢了。

俄罗斯、中国和伊斯兰：没有看见反对西方的阴谋

一个非常充满矛盾心理的事例是俄罗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它的内政和社会状况不能达到更加稳定的状态，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就会继续存在下去。俄罗斯对世界强国角色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国的对立。然而在目前的状况下，俄罗斯如果希望继续展示自己的世界强国角色，那么它就必须做出某些妥协，至少首先解决和美国在一定范围内的冲突和对立，以便在第三者面前清楚表明自己的独立性。北约东扩的事实以及莫斯科的外汇需求促进了这种趋势，军备出口为填补紧缺的外汇需求状况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当然这也常常使美国感到非常的不悦。

俄罗斯和中国达成长期联盟的可能性，由于各种不同原因的作用和影响，到目前看来其可能性也变得不是很大。[①] 我们在观

① Jennifer Anderson, The Limits of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London, Adelphi Paper 315, 1997

察它们的双边关系时，应该先注意到这样的前提，即俄罗斯将继续在已经开始的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还将继续坚持自己温和的专制统治方式，同时它的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国家的控制。那么俄罗斯会继续地需要西方国家作为它的经济发展的合作伙伴，这种与西方结合产生的潜力才能使它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对中国的优势。俄罗斯在制度上将继续和西方保持高度的一致，甚至这种关系还将不断地得到发展。毕竟一个专制的中国对莫斯科意味着潜在的巨大威胁，在这个舞台上，不会发生超越和西方非常有限的冲突事件，也不会发生超越和中国逐点相交的事件。

现在我们来假设一下第一种情况，如果俄罗斯又回到一个“红色”的专制体制，而中国维持现状不变。我们必须意识到，俄罗斯－中国的紧张关系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在俄罗斯的失败和苏联解体所造成的产物。在强调民族主义复兴的旗帜下，俄罗斯复辟专制统治对北京来说，必然是一件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事件。另一方面，对莫斯科来说，中国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挑战，可能会变成一种重要的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潜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世界的活力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可能会重新处于一种和冷战时相似的处境，即成为三角座的顶端，也就是说，它们可能会成为中俄两个对手中每一方都渴望的联盟伙伴。

假如俄罗斯又重新回到专制统治时期，而中国在完成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实现了民主化，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矛盾将得到缓和，一个密切的网络将会出现，中国作为地区领袖的位置也会被西方所接受。相反，我们也可以假设，中国和俄罗斯的矛盾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在中国方面尽可能地克制下，以一种解压政治的方式得到消

除。中国和西方国家有可能建立一种紧密的安全政策方面的合作。

当然，最完美的世界还是中俄这两个世界大国都实现了民主化，并且经济都得到稳定的发展，这是它们建立一种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密切联系的前提条件。果真如此，国家世界的活力可能会停顿下来，而经济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活力则有可能还会得到拓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和跨国网络将有助于缓和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在安全上的两难处境，同时它们和西方的主要矛盾也将自动消失。诚如此，建立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国际安全共同体的机会将是可以设想的。

然而，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并非到处充满着自由飞翔的和平之鸽，未来之途蕴藏着许多不同的、破坏性极强的“烈性炸药”。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可能结成一个互信的战略性反西方联盟，尽管不能排除点状局部意义上的“挑衅联盟”。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也不会与此有所不同，我们已经明确地分析了，伊斯兰地区的政治结构绝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因此，俄罗斯在必要时，会有机会和地区性子群，诸如伊朗及其盟友、埃及及其盟友等结成反对西方的同盟。然而，这个同盟的势力范围，要根据俄罗斯及其伊斯兰盟友如何处理俄罗斯境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情况面定。此外，两者关系的紧密程度还受到莫斯科在其边缘地区，包括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和霸权要求的限制。这些要求肯定只能在与伊斯兰世界不同的领导候选人之间的合作中部分地得到履行，在另一方面，它们也必然会导致和伊斯兰世界一定程度上的竞争。莫斯科推行的政策越具有民族特征、越具有追求权力的狂热性，这种竞争就会变得更加激烈。俄罗斯发展得越不民主，并因此面越反对西方，它也就会更加坚定地表明对周边地区的霸权目

标，它和伊斯兰邻国的关系也就会变得更加具有冲突性。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利益越一致，对莫斯科来说，俄罗斯和伊斯兰联盟就显得越发不合情理，就多少有些多此一举的味道。

儒教－伊斯兰教联盟：一种妄想

在亚洲，我们西方的利益至少和对国际政治具有影响力的四派力量有关：中国、日本、印度和东盟，而东盟很有可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安全防御上逐步加强一体化进程。然而这种情况并不适合在亚洲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中国潜在的霸权地位将促使其他地区大国结成某种形式的平衡联盟，或者和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结成同盟。中国的政策越温和，这种联盟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小；并且西方国家和北京的关系也就越没有精神负担。

印度在印美关系和印中关系上，受到复杂的情绪和怨恨情感的双重折磨。但同时它又对被美国当做战略伙伴、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而怀有浓厚的兴趣。而迄今为止，华盛顿在亚洲政策上，还在手里玩弄着根本让人琢磨不透的秘密杠杆。今天美国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愿意和美国在军事上加强合作，甚至同意共同进行海军军事演习，这些态度暗示着未来的许多合作可能性。在过去十年中，印度经历了巨大的改革过程，通过这些变革使更多的民众趋向于西化。尽管有人民党（BJP）的原教旨民族主义的阻挠，追求和西方的紧密关系还是成为社会主流。人民党（BJP）的胜利将使印度驻足不前，并且使它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变得复杂化，但是这种停滞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对印度的经济也颇具吸引力。然而，从政治上看，印度和中国争夺亚洲领导权的竞争又限制了两国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微妙的关系又使西方，主要是美国

稳居这种权力三角的顶端而坐收渔利，因为和对领土毫无兴趣的远方“来客”相比，这两个处于敌对状态的亚洲国家中的每一方都会感觉到对方具有的威胁性相对更大。如果这两个国家都进一步开放和加强交流，那么印度和中国的对立就会不断减弱，甚至逐渐转向相互间富有成果的、不受安全困境方面的因素损害的合作关系。因此，中国的民主化和地方分权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前提，而不被人民党（BJP）统治的印度则是另一个前提条件。同样可以预见到的是：诚如此言，那么这两个国家和西方的矛盾也会趋于缓和，反对西方的联盟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文明的冲突》所宣扬的最耸人听闻的内容：穆罕默德和成吉思汗的联盟，伊斯兰和儒教的战友关系；这样的组合将使我们在回顾整个西方历史时，重温对“来自亚洲草原的入侵”和“穆罕默德之剑”所怀有的根深蒂固的原始恐惧感。

其实，这两个阵营在其内部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裂变过程。但决定每种分裂程度的因素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同时也受文化联合的机会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内部权力中心对领袖位置的要求越强烈，对伊斯兰的周边地区，如东南亚的布道就会越起劲，那里的政府就会越早在自己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之间明确地划清界限。同时，某些传统要素会被当做对宗教敏感人群的宽容而得到格外强调，温和的伊斯兰教徒可能甚至会参与国家权力的分配，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则会进行更加顽固的抗争。假如中国和一个伊斯兰世界中自以为了不起的霸权主义者结成了同盟，那么这些东南亚国家，更有可能的是所有的非伊斯兰国家对继续加强和外部势力的联盟感到兴趣，以便平衡这种双重的威胁。如此一来，“儒教”阵营的裂痕只有可能继续加深。

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也会出现非常类似的一幕。一个领头的伊斯兰国家及其追随者如果为了扩展权力，和中国建立了联盟，那

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种情形无疑加强了来自伊斯兰世界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威胁，这一点所有的非极端伊斯兰国家都会敏锐地感觉到。甚至那些与中国的同盟伙伴宗教方向相同的伊斯兰国家也可能受到危害。假如伊朗和中国结盟，就会更加强烈地促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埃及在其他地区寻求帮助，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面临的不是一个敌视西方文明的强大阵营，而是两个最危险的分裂地区。在这两种情况下，处于极其担忧境地的国家就会比今天更加乐意地充当“桥头阵地”，因为它们自身的稳定、甚至生存都将会受到极大的危害。

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形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即 1）中国在中亚地区谋求国家利益；2）它对波斯湾地区石油的日益增长的需求；3）新疆（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自治省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独立要求。在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政策和对立的穆斯林势力（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及俄罗斯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这个地区的原教旨化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很有可能蔓延到中国境内穆斯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1996 年和 1997 年曾在这个地区发生了不断升级的动乱；1997 年 3 月维吾尔族分裂主义者在北京引爆了两枚炸弹；6 月份中国中央政府免去了 260 名地方干部的官职；禁止 133 座清真寺的非法兴建和扩建；关闭了 105 所未经批准的《古兰经》学院。[1] 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地区显示出了一种对温和的、世俗地方政府的青睐。此外，它还必须支持那些国外的有影响的穆斯林势力，那些和土耳其一样，已经尊崇世俗化国家思想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坚定地和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国或集团建立联盟的政策，肯定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和限制。

---

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7, 1997, P. 1

中国对石油供给的兴趣促使情形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所有这些都对形成“儒教－伊斯兰”阵营非常不利。中国可以和波斯湾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的一个结成联盟，并通过不断增加的海上交流巩固这种联盟。然而这恰恰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推向了美国的怀抱，假如这些国家还没有在那里找到合适的应对办法的话。或者中国可以作为美国的副手参与到海湾地区的维护秩序政策中去，这可能是最合理的选择，因为任何一个和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国家的联盟，对于非伊斯兰国家都是不可预测并且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在本国存在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的国家。但是，中美合作又将中国和一个伊斯兰大国建立反美联盟的可能性降到了零点。

穆罕默德和成吉思汗的结合只是一种无聊的妄想。伊斯兰教会继续保持它的多元性，亚洲也是如此。如果它们之间结成反对西方的联盟，那只会是有目的的、在具体事物上的和暂时的。在危机时期，一个目的性联盟可能会显得具有威胁，但是绝对不可能从中产生一个持续性的国际政治形式。这些国家联盟（和文化同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表现得越顽固不化，在亚洲和中东地区受到这些联盟威胁的地区性国家，就越会在绝望中寻求西方国家的帮助。

21世纪国际政治的6种可能发展趋势

这种对不同文化未来关系的估计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只不过是我们对国际政治“运动规律”的一种判断，即我们是如何预见21世纪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和走向的。现在总结如下：

第一种可能：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处理现代化危机方面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有些国家里，宗教原教旨主义会取

得胜利，其结果是将产生专制、集权主义政体，它们会竭尽全力利用一切可能，包括武力手段向外传播自己的国家理念。面对不同的国家及其生活在那里、部分生活在交叠的边界上的部族，这种政治上被迫的结合和大力推行霸权主义的运动是惟一可能形成亨廷顿所预言的文化联盟（壁垒）的方式。

第二种可能：现在，上述的这种极端政策，在各个不同的文化圈内部已经招致了强大的反向对抗力，所有这些地区都具有领土国家的结构形式，至于现代化国家的概念是否已深深融入当地社会，或者只是生搬硬套地被从外部引进，其实这些都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这些地区按照领土划分的权力机器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那些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及其利益集团、家族、王朝、派系能继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将竭尽全力延长自己的统治寿命。这些政府绝不会愿意被它们的“恶邻”彻底改变，而那些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部族、民族或种族形成的团体也不愿意被外族所统治，即使所谓的外族和它们信奉同样的宗教。因此，各个文化圈内部在政治上将出现更深的分裂，比目前的状况更甚。

第三种可能：原教旨主义在本国的地位越是稳固，其政府对其传播推动得就越有力，在各自的文化圈中追求霸权的意图也就越明显，国家世界的运动活力产生的影响就会更长远。一个自称为一种文化核心的国家越是强烈地推行其原教旨主义政策，它的组织就会越强烈地倾向于去完成这项使命，自然对那些不愿追随它的邻国的威胁就更大。对国家核心、主权以及武力垄断的挑战，比任何其他一种威胁更能唤醒国家权力抵御的原始自然力，于是，压迫、军备和联盟，防御和势力均衡政策便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可能期待的反应。

第四种可能：在面临内部强权的强烈威胁下，地区邻国更愿意和外部力量结成联盟，而不愿意乖顺地俯首臣服。西方国家虽

然提出了自己的所谓“统一标准”模式，但是它们没有显露出对领土的扩张野心，因此被当作“较小的祸害”而成为完全合适的结盟伙伴。在一个文化圈内部，霸权的危险性越大，也就越能促进西方大国抵御孤立主义的蛊惑人心，维护远方地区的平衡均势：因为一个敌对势力可能统治亚洲彼岸或波斯湾地区的设想，足以促使西方的政治意志转向这样的平衡政策。一个文化霸权所要求的世界模式在许多方面和冷战时期的世界非常相似：联盟关系将横跨地区之间的一切界限。而阻止帝国主义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将成为超越文化界限的、特别重要的战略取向。

第五种可能：与上述的相反，经济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发展势头越是强劲，非西方文化的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就会有所减弱。只有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国家群体才可能互相更加紧密地联合并且完成一体化进程。只有这样才会形成与“文化联盟”略微相似的组合。但是，现在这种地区性合作，恰好不处在对其他文化生硬的敌视状态，而是更像全球化网络中的各个枝节。这种地区性的合作组织和其他文化的地区和国家的联系不是被疏远了，而是变得非常密切，并且还在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增强。然而，其前提条件是国家和经济能从其政治体制中得到彻底的解放，也就是说，形成一种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以及死板的等级儒教制度互不相融的非中央集权体制，使政治走向民主化，经济引入多元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在改革联盟将西方政治和社会模式与自己国家文化的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文明集团”的形成才是有利的。但是，这种改革过程将使得这些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距离有所缩小，而“文明的冲突”则将变得遥遥无期。经济竞争和经济合作的配合替代了政治、军事的对抗主义。

第六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文明间的联系将会高速增

强，这种联系当然促进不受政治影响的对话的增多，在这种不同文化的沟通过程中，社会力量得到了充分释放。这种社会世界之间跨越文化的联系将由冲突和联合的混合体组成。跨国运动将形成，共同价值观的交集将不断增加。

干扰因素

上述六点是正常情况下所描述的情形，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系列危险的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很可能引起国际政治的不良后果。首当其冲的是恐怖主义行为，我们在这里假设一下，如果霸权国家在“自己”所属的地区对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推广也是失败的，并且原教旨主义运动在大多数国家受到限制和压制，那么我们必须想到，恐怖主义活动很可能反而会因此而变得猖獗和活跃，而这种恐怖主义还将进行跨国界的活动。它会把矛头指向对自己实施镇压政策的政府，因为在反对派的激进分子看来，他们的政府已经背叛了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同时，恐怖活动还会将目光投向这些“背叛者”的“盟友”身上，不管这些联盟伙伴是来自自己文化圈的内部还是外部。在那些恐怖主义活跃的国家里，当然能发现首当其冲的目标（和多数牺牲品），在国外则会有“协作损失”。阿尔及利亚内部的恐怖分子和1996年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暗杀行动之间的关系，使得两者间的这种关联变得十分明显。

恐怖主义往往把目标设定在废除目前的国家秩序上，在西方国家，它是一个非主流现象，只是阶段性地通过引人注目的公开事件和相应的媒体传播才能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至少从对未来预测的角度看，这里对权力问题也提出了认真的课题。虽然我们不断对由此而涉及的那些牺牲品抱以惋惜，因为在任何情况下，

这都是一个悲剧，但事实上，内部的安全机构完全有能力将恐怖主义遏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恐怖分子的力量在一代又一代的内部疲劳战中被不停地消耗、合并，最终难逃正义的追捕和审判。当然，我们还无法最终彻底消灭这种危险，因为恐怖主义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九头怪蛇一样，不断地会长出新的脑袋。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估计恐怖势力不会真正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在我们的民主政体中，即使在经济情况困难的时候，社会也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

对此会出现两种判断，第一种是国家面对恐怖主义所做出的过度反应，很可能会危及民主政体，导致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的复活。正因为恐怖主义针对的是国家机器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武力就会以特有的自卫直觉对其进行有力的反击。原西德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对国家安全措施和国家管制的倾向，但是在对待红色旅（RAF）行动的反应上，也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执行判决以及安全力量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变革。许多自由派法学家都对此深表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自由民主精神可能会在抵制恐怖主义的战斗中逐步被削弱，甚至被废除。当然这种结果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其他还有受到政治体制的“管制阶层”所保护的另一种相反的趋势：70 年代开始终于出现了个人资料保护的蓬勃发展势头。但是，民主有可能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自我废除，并由此而在这个讽刺性的转折之后，自己完成恐怖主义分子对国家安全的打击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如同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选择自杀一样，这种危险性现在已经得到明确的、更经常的强调。[1]

① Walter Laqueur，“落入错误之手的新式武器”，“未来的恐怖主义”，摘自“Internationale Politik”，1996 年 1 月，第 19－22 页

第二种判断涉及到恐怖分子的武器装备问题。现在已经根本无法阻止他们获得和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与此观点相左，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恐怖分子对大屠杀不感兴趣；况且获得此类武器也并非易事。这种观点以前就被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今天就更站不住脚了。那些对几百名死者无动于衷的人——这如今已经成了恐怖活动的“标准”，也会利用可能的机会去谋害成千或者上万的人。假如致使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崩塌的炸药包里的氰化物没有被燃烧，而是泄露了出去，那就会有几千人为此而丧命。犯罪分子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恐怖分子的行为显然是有预谋的，也是故意的。此外，假如炸药的威力使世贸中心坠毁在华尔街上，那将引起持续的多米诺效应。倘如此，在曼哈顿南区就可能出现与长崎原子弹爆炸相媲美的巨大劫难。

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曾投入大量资金研制生物化学武器，试图生产出威力无比的生化武器。令人庆幸的是，直到在东京地铁施放毒气时，他们还没有成功地研制出制造大规模杀伤性生化武器的方法。他们的生化武器研究计划还只是停留在最初的实验阶段，没有发展到可以投入使用的成熟阶段。这些经验证明，对于恐怖分子来说，生产“小人物的原子弹”也不是“平常的任务”。但是也有可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基因技术的进步，使得这项技术变得容易掌握。在这个问题上，被武器的生产可以被排除在外，①因为技术障碍还是很高，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由于技术要求要低得多，因而对恐怖主义分子也就非常具有吸引力。

生化武器如果掌握在恐怖主义分子手中，那将是对我们未来最大的威胁之一。因为它们可以在小范围内生产，并且利用商业

① Karl－Heinz Kamp 的清醒分析，“核恐怖——神经质担忧还是真实的危险？”摘自 Aussenpolitik III/1995，第 211－219 页

化的方式得到它们。这时候可能会出现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这些生化武器可以被轻易地秘密运输，而在某些“有利的”环境条件下，达到只有核武器才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是非常可能的。①

如果恐怖主义分子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究竟会对国际政治层面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目前我们还无法预料。因为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数据。有可能，尽管不是十分肯定，文明世界或许会在恐怖主义面前退缩，甚至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府有可能和那些愿意为自己的目标效力的恐怖分子结成联盟。希冀依靠恐怖主义来颠覆国家并不是新鲜的事，即便是红色旅这样的恐怖组织，也曾得到前东德的援助。如果把这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颠覆国家的恐怖主义毕竟还应该算是一个新生现象。给恐怖主义提供援助的国家自身可能遭到被害者的报复而受到损害，因为第二种更可能的反应是：超越地区和文化界限的多数国家将联合起来对抗恐怖行为，并将它们的“正式”援助者孤立起来，如果可能，还会进行适当的惩罚。除此之外，利用恐怖分子的武力支持促进文化极端主义传播的行为，事先应该可以预料到，这种倒行逆施会引起全球性反对联盟的谴责，因为那些属于受到牵连的文化圈的国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毫无良知的大屠杀刽子手的手中。尽管拥有占据优势的防御能力，这种反应可能造成的损失还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种可能性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过激反应，即受到危害的国家放弃了民主，从民主国家转变成警察国家。因此，这种后果会更加致命，因为这会使民主国家和定位于社会福利的民事

① U. 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ies Underly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ashington, D. C. 1993, 第113页

权力对国际关系产生的有益影响陷入停顿状态。强权国家之间的这种生存竞争，可能在这样一个丧失民主的世界里更加激烈。通过资助跨国恐怖分子，如“Freedom Fighter” （自由战士）、“Contras”或诸如此类的组织以达到扩张自己的权力或削弱对手的目的，可能会更加流行起来。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不友好和不和平的世界里，文明集团的建立还是一种非常不可信的发展趋势。对权力的兴趣可能会促使世界强权位置新的候选人在遥远的地区，也就是说横穿文化圈去寻找结盟伙伴，而受到挑战的强国也会做出相同的举动。

我们从三方面描述了国际政治舞台的这些变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估计到的效应，也是文化原教旨主义能够达到的效应。当然这些变化没有给“真正的信徒”带来狂热激进分子所追求的最后胜利，而只是达到了纯粹的毁灭性效果，其产生的国际政治后果是偶然而无意的。

环境的压力

另一个扣人心弦的场景设计是以一个完全“非政治”的设想为出发点的：对自然环境不断加剧的毁坏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由于这种毁坏，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被攫取一空，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濒临丧失。我们对不同地区发展的趋势以及资本流动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后，所得结论都是如此。目前，人类只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控制了这个问题，破坏环境的行为才不会给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造成额外的负面影响。

这是一种大胆的设想，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那些在不同地区，首先促使政治力量对民主开放的经济发展，是在事先没有对自然资源的损害进行必要考虑的情况下推进的。虽然这

种发展模式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明智的要求和准则。但不管怎样，这种行为到目前为止还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的。引起悲观主义者担忧的原因还包括发展中国家愚蠢地坚持这样的观点：环境妥协政策必须由发达的工业国家遵守，而自己则不愿承担任何义务，对它们来说，经济发展绝对是头等大事，较之环境保护具有更大的优先发展权。当它们盲目地模仿我们西方灾难性的发展道路时，它们自己却丧失了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立即吸收到自己的经济体系中去的机会。如此下去，它们将重蹈西方和东方发达工业国家的覆辙，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不得不进行昂贵的而且常常是徒劳无益的修补工作。东盟国家因为拒绝签署一项义务的、经营热带雨林的生态协议，在 1992 年的里约会议上将它们的愚蠢永久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 1997 年和 1998 年苏门达腊岛毁灭性的大火期间，它们不得不喝下自己酿造的苦酒：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旅游业及其他行业的间接损失。

但是发达工业国家的表现也并不令人乐观。欧盟只是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审慎的、实际上还是相当保守的建议，但却被夸张地誉为全球气候政策实施的革命先驱。由此可见，国际环境政策是处于多么可悲的境地。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气候问题上也表现得如同一个“无赖国家”，它对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进行的“恶性而愚蠢”的捍卫，可以从极端的共和党人对京都议定书的强烈反对中得到佐证。这种行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决不亚于伊拉克的生物武器、利比亚的化学武器或是北朝鲜的原子武器。

环境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被称为北南模式：一方面，北方拒绝承担所要求的环境保护特别会费，而另一方面，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做出了不可动摇的决

定，不同意为了“持续发展”的全球利益，而限制对环境特别有害的那些经济活动。双方都把造成可预见不良后果的责任归咎于对方，于是，形成了两个极端相反的政治同盟，两个集团都在环境政策的借口之下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北方坚决地禁止南部移民的进入，在南部用军事干涉的手段，以武力来结束特别有害的经济活动（如对热带雨林地滥砍滥伐）；作为回应，出现了针对北方的石油禁运以及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原材料的出口限制。北方为了确保石油供给安全所采取的军事措施，反过来又迫使南方以涉及面广泛的恐怖主义对其加以回击。

出于种种原因，这个过程似乎不太可能发生。“南部”的个体过于分散，差异也太大，因此缺乏凝聚力，无法建立所要求的统一战线。所以它们在环境问题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立场：例如，石油生产国希望对石化燃料的消耗根本不进行任何限制；一些小的岛国则希望对所有消费者立即采取迅速减少使用的积极措施；面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则打算让发达工业国家来承担所有的负担。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第三世界已经开始出现了理智的思考，毕竟继续滥采滥伐最终将会牺牲它们自己的利益。南部的社会世界发展得越快，在那里人们就会更早地认识到：环境保护是成功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不允许和北方发生极端的破裂，所以很多人可能会不失时机地利用北南关系的恶化，来建立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特权关系。相反，北方也不会持久地遵守联合国固执的路线，有些工业国家恰恰成为先驱，而另一些国家则遵循一条中庸路线，它们试图努力和南方较温和的国家建立沟通的桥梁。果真如此，那么世界对于一个新的双极化模式来说，是过于变化多端、过于复杂和不同了。

因此我们将一种近乎矛盾的可能性收入眼帘：无政府状态模

式，即环境压力使世界处于不断的分裂状态。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又使人们回到了自己生活的疆土，他们更倾向于在更小范围内，而不是在更抽象的、更广阔的共同体中寻求认同感。自己生活的空间应该在外敌面前受到保护，这种推动力又会因为不断增加的移民运动而得到加强，而根据经验，移民潮正是环境压力的促动因素。所以，摆在我们议事日程的问题不是“大的”文化圈的冲突，而是“小的”种族文化的分裂，包括分离主义、不断增加的内战和国家危机、极端的排外情绪，所有这些很可能导致种族大屠杀的出现。弱小的国家可能会在这种压力下土崩瓦解，类似索马里的情况将会进一步扩散。为了争夺日渐短缺的资源，如耕地、饮用水，或出于对海洋捕鱼的异议而引发激烈的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战争，所有这一切将会频繁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对于那些有能力防御国家分裂威胁的较为强大的地区大国，则由此出现了使用军事手段追求地区霸权的新的可能性。于是，受到威胁的国家将环顾四周，寻求保护者。接着，国家世界的势力均衡游戏又开始了，生态危机的煽动更加促使了它的快速运转。欧洲内部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准确地说可能是整个“西方世界”靠得更近，目的在于阻止无政府主义对自己边界的威胁。这种合作的形成比西方内部不断增加的差异将更有可能得到实施。我们在前半部提到的“正常发展”的国家，会因为经常性的政权更迭和更具威胁的移民潮的影响而改弦更张。当然，我们还能虚构出更加具有戏剧性的情节，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约翰启示录》中的“四骑士”（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饿和死亡，是恐怖、不祥的代名词——译者注）迅速地横扫世界，瘟疫和饥饿也将葬送北方国家的内部稳定；大规模逃亡和迁徙浪潮将席卷国家边界，而最终消灭主权。在这样一个毫无生气的无政府主义世界里，将不会再有幸存的文明，也没有了国际政治，存在的只有发生在越来越

小的团体之间的，为最致命的界限而进行的、绝望的生存之战。

但是，一个更具积极意义的发展模式也是可以想象的：通过“中度”灾难，如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森林大火或大气中臭氧层窟窿的不断加大，人们开始重新考虑环境保护问题，进而增强全球环保的意识。这里我们涉及到的环境保护问题，是来自任何文化圈的非政府组织都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环境保护运动已经在世界上所有地区都开展起来，此外，它还成为非民主国家中一个参与性较强的进步政治力量。非政府组织、破坏环境的经济利益集团、提供环保技术的工业部门和官僚机构的负责部门之间组成的联盟将有助于完成臭氧保护协定及其后果议定书，以及其他一些海洋保护协定签署。尽管目前在全球气候政策方面存在着许多分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种联盟方式的形成，将取代“南方”与局限于美国和其他一些非自愿国家的“北方”之间的僵化对立，而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即使在美国，民意调查也显示，大多数人愿意在环保政策上采取妥协的态度，而不支持目前政府所采取的强硬政策，尤其是国会中共和党极端派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所表明的顽固立场。

那么环境政策的转向会成为不同文化圈相互接近的出发点吗？这种想法乍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在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中，都存在对大自然（客观物质世界）的非凡想象力，例如天地万物都被当做上帝创造之物或者甚至当做圣人的化身，要求人们承担维护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才能形成一致，我们当然不可能对此期待太多。然而，“南方”人口的急剧增长、工业化的浪潮与“北方”根深蒂固的利益惯性以及生活习惯，将使这种转变的实现比实际情况所要求的更为缓慢。全球环境条件在未来几十年还将继续恶化，地区性灾难几乎也会如此。但是我们也存在这样的机会：有可能将上述的负面事件转化

为超越国界和文化界限的合作能量。

统计学的发展和变迁

没有任何一种其他方式对文明之间的撞击可以和“移民”现象所带来的后果相比。“移民们”为了生存，从自己的出生地，迁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的、同时也是充满威胁性的新环境中去。另一方面，它使接纳这些移民的国家的原住民不得不面对外来的挑战。这种挑战对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来说，尽管不能说是无关紧要或是微不足道，但起码还算是温和的和不具威胁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几乎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影响。如果他们在教育方面对过于受外来影响感到讨厌的话，他们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地区的学校或是私立学校去读书。除了移民自己之外，必须承受移民带来“负担”的首先是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他们不得不和新来的居民竞争工作岗位、便宜的政府出租屋以及专业培训机会。正是在这种处于最低生活水平边缘的竞争状态下，有可能形成激发右翼极端分子蛊惑人心的宣传的土壤。

大规模移民潮的绝大部分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接纳了全世界注册难民总数的30%，而那里的常住居民人数却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0%，大多数难民、被驱逐者以及移民只是暂居于此，这里只是寻找下一个避难所的中间跳板，但是他们缺乏继续完成通向北方“美好国度”的必要资金。对于那些较为贫困的难民接收国来说，所面临的问题远比我们这些较为富裕的、一体化程度较高、体制上适应能力也非常强的国家要大得多。

但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移民问题的

困扰，人们普遍认为的“我们的退休金”的安全保障，将因此而受到损害的问题，倒并不像人们经常争论的那么严重，因为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从对全球性预测的角度来看，导致大规模移民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

——贫富国家之间收入差异的不断加大；

——环境破坏严重；

——战争、内战和暴政；

——全球越来越密集的便利交通网络。

阿拉伯国家大量的人口增长，加剧了该地区由现代化进程引发的社会危机，对于大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快速变幻的世界不能给他们提供“银根”、安全的场所，无论是工作、住所还是文化的认同感，统统都失去了必要的保障。亨廷顿从中看到了可能发生尖锐冲突的基础，他预言伊斯兰世界有可能与西方国家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阿拉伯国家人口增长的浪潮，像世界上除了中非以外的其他地区一样，已经开始慢慢平息下来。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虽然目前还达到2.5%以上，但是与前几年相比，这个增长率还是略有下降。其他地区，如东南亚、中国或拉丁美洲，它们在此期间的人口增长率都低于2%，并且正在靠近1%。而在那些发达的工业国家，人口增长率则几乎是零，或者是负增长。

这种在生态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着重要意义的趋势需要得到我们坚定的支持，但是其重点不应该是直接控制人口的出生率，而值得推荐的方法是一些间接的、不易引起争议的手段：帮助经济发展、建立保障生存质量的社会养老体系，最重要的是加强妇女的权益，使她们适应职业生涯和社会经济生活。当然，仅仅通过依靠采取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消除移民带来的社会压

力，但是它毕竟可以起到某种缓解作用，并且受到移民潮冲击的国家也会因此而得到某种程度的解脱。

结论

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主流的思潮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矛盾心理，就如同人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一样：它一方面促使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它又前所未有地刺激了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合作。全球化使得空间距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大大方便了跨越国界的协作。

这些论断对于那些仍处于传统统治的国际政治区域——即那些秩序井然的、古老的国家世界——影响最小。在这些地区，安全的两难境地给彼此间的合作制造了最大的障碍。在这里，空间距离的远和近相对来说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冲突首先具有地方性和地区性的特质；相邻的国家以及其他政治单位隐藏着相互产生争端的最大危险性。正是这种国家世界的体系，成为那些试图点亮未来之路的知名预言家们关注的重点：这些预言家包括亨利·基辛格、兹别格尼夫·布热津斯基、保罗·肯尼迪，还有阿诺尔夫·巴林。所有这些人都倾向于用 19 世纪的眼光去观察人类的下一个世纪，并且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其他推动力。[①] 因此他们的预测也肯定是不完整、并且有局限性的。

与这些先生们有所不同，塞缪尔·亨廷顿在展望未来时，总是会把有关文明的观点补充进去，准确地套进传统政治的旧外套

① Henry Kissinger，《国家的理智：外交的本质》，Berlin 1994；Zbigniew Brzezinski，Out of Control：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1993；Paul Kennedy，《迎接 21 世纪》，Frankfurt a. M. 1993

里，但是他用“核心国家领导的文化圈”替代了“民族国家的文化圈”。否则他就会像别人一样，陷在实证政治分析的罗网中不能自拔。在他的设想里，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合作推动力将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强迫推入的、早已过时的、重商主义的旧框框，根据这种理念，一人的获利必然是建立在他人失利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必然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此外，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和国际化，使得它附属于民族国家的固有属性变得越来越过时。跨国经营的企业对它们所投资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根本毫无兴趣，对它们而言，重要的是给全球竞争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而只有通过国际间的密切合作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一国独立建成的“私有机构”，面对强大经济大国把握的最低限度的控制力量，其他成员国应该努力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使这个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毕竟各国政府都有庄严的一票。

从这个具体情况出发，两个地区之间建立战略同盟的设想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只有如此，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这个联盟是西方和东亚/东南亚的联合。值得强调的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将是这个合作联盟的组成部分；而一个危险的、闭关自守的中国则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拉丁美洲、非洲南部、东欧（包括俄罗斯），也许还有南亚那些较为成功的地区将勉强地被这个联盟吸纳进来。假如伊斯兰国家能够完成通向现代化的飞跃，它们也同样将挤入这个圈子。这个联盟将强大到足以对国际政治的动荡进行有效控制，或许甚至可能在形势不太乐观的地区，如非洲和近东，建立更为有利的框架条件，以促进那里的发展。

亚洲和西方的联盟，是通过非政府机构的网络组织形式建立

起来的，并进而在国家中得以确立。这些团体组织的活动和经济世界的活动并不一定总是一致，有时甚至可能和它们的利益相左，例如在环保方面、人权问题上和消费者保护与劳动保护方面。这些组织将对经济世界的优势建立起一种平衡力量。其他的跨国联系将增强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合作，如志趣相投的党派组成的“国际组织”。

不利的跨国影响，包括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移民浪潮等，也同样表现出所谓的矛盾现象：恐怖主义一方面可以对部族联盟的团结一致产生巨大的作用；但它同时也给坚决的、共同的斗争提供了必要而合理的理由。那些把首要兴趣放在经济发展上的国家，肯定不喜欢恐怖主义引起的不稳定状态，这里很可能会成为亚洲和西方之间联盟的又一个结晶点。同样，在环保问题和处理规模浩大的移民运动上，这条规律也是适用的。

那么在这个分析的末尾，我们来谈谈，究竟文化因素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结论是：它加剧了已经存在的矛盾冲突，这无疑是它的不利影响。首先，这一点可以表现在接受移民的那些国家里，因为在这些国家，文化因素主要具有内政上的意义。此外，文化的纷争又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额外的温床；它虽然不会直接产生出恐怖主义，但是却为恐怖主义的动机创造了新的源泉。第三，它主要会激起地方和地区性的争端：那些为教义的真谛争论不休的原教旨主义的邻邦之间；原教旨主义者和“异教徒”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都会产生国家和种族之间的冲突。有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文化背景相同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假如它们的国家利益恰好相同的话，而文化上的共同点可能使得这种联盟变得更加容易。但是，总体上的原则是，对于那些主要考虑到增加权力的政治组织来说，空间上的接近更可能引起彼此之间的反感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上的相似性和文化的差异性——

样，也同样可能激化争端。参与争端或维护合作的单位规模越大——从国家集团到地区联盟直至共同的世界体系——文化因素被其他因素限制和破坏的机会就越多。至于它是否真的产生了最不利的影响，或者与此相反，它在经济、环境、移民和交流等问题上转化成为了积极的推动力。无论怎样，它都不会听从于命运力量的安排，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家和政治对待文化因素的态度。

2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如何才能使加强联系的促进力、促使合作的推动力强于分离的动力呢?当有相当数量的人们感到惴惴不安、并且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变得充满暴力倾向的时候,面对可能出现的暴力冲突,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必要的步骤,以促进和平的进程?如果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那就必须从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这几点在地区分析过程中已经不断地被注意到,并且多次被提及,它们是国家、经济和社会。

国家世界的处方

对于国家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是:杜绝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或国家内部的种族屠杀,使那些排除在民族共同体之外的重要角色不必感到恐惧。在民族和种族之间,培养相互之间的信任感远比恐吓更重要,虽然面对可能出现的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不能完全放弃依赖后者。这种明确的认识便是基于“握手言和政策”和限制政策有机结合的“缓和政策”。

信任关系的建立有许多尺度。它以在所有层面上的外交往来、对话和谈判为开端,其中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首脑会谈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确定各自国家大政方针、决定战争与和平的

领导者，他们之间的会晤是无法以其他任何方式替代的。同时，在军事领域扩大信任关系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在西方和其他国家可能产生暴力冲突的地区，西方应该首先开放地建立这种信任关系，可能的话也包括控制军备的数量和质量。在这个方面，美国在亚洲从事了一项先驱工作，它和中国、印度初步建立了军事合作的意向，并使之付诸实施。和伊斯兰世界那些虽然对西方抱有不信任感、但是可能不是完全怀有敌意的国家，如伊朗和叙利亚，我们希望最好也能建立这样的合作方式。

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国际组织中更能加强彼此间信任感的培养了。联合国和地区性组织一直受到大家的批评指责，因为它们的“活动”经常被认为是不够充分的。当然，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那些掌握其命脉的成员国的，但是这些国际组织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安全问题，并努力摆脱安全方面的困境。目前在美国右翼党派中流行的狂傲、轻视情绪，将被支持和拓展所代替。因此，联合国正在进行旨在使该组织有可能更好地完成多种多样的、艰巨的任务的改革，这是促进国家间和地区间理解与合作的首要任务。[①]

俄罗斯的一体化进程

俄罗斯继续实行一体化具有根本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假如北约东扩的进程在原则上不受限制的话，这将意味着，在适当的条件下俄罗斯也有可能加入北约。这些条件包括俄罗斯国家彻底的

① Ernst-otto Czempiel，《联合国的改革》，“可能性与误解”，Munich 1994；Volker Rittberger/Martin Mogler/Bernhard Zangl，《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对国际政治文明化的贡献吗？》Opladen 1997

民主化、经济稳定发展、人权保障得以贯彻、与其所有邻国保持协调、和睦的关系。然而目前在俄罗斯，这些条件还没有以一种西方可以信任和接受的方式得到加强。在外部，声称俄罗斯因为是过于强大的世界大国而不能隶属于北约联盟的论调，只不过是一个过于牵强的借口，假如这个论据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把美国也从北约组织中轰出去！在可以展望的未来前景中，明确显示出俄罗斯是可能在将来某一时刻加入北约这个西方政治的中心组织的，只要俄罗斯自己怀有这个愿望，这种设想无疑也是政治理智的需要。假如俄罗斯想做出其他的选择，那是俄罗斯自己的事情。然而事情还是充满了矛盾，我们一方面希望、甚至要求俄罗斯不断继续地“西化”，这是符合逻辑的结论，即加快一体化进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认为它的加入是无法想象的。

处理和这个大国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人们必须尊重它业已透支的世界强国形象，忍受它对其邻国所施加的压力。只有这样高加索地区和中亚的国家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它们地下资源的调配，而不必因为俄罗斯的兴趣而将国家资源的出售和使用权力交由它控制支配。

对边缘地区的帮助

从外部不断帮助并促进非洲的安定和发展，这项任务也超出了西方的能力范围，这里所指的是我们帮助边缘地区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在自己的国民面前维护“好政府”的形象。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在欧盟和曼德拉的谈判中，南非希望被吸收加入“77 国集团”组织，而欧盟却欲置南非于该组织之外。属于该组织的非洲国家和欧盟具有特殊的经济贸易关系，并且具有通向欧洲市场的优先渠道，由于对南非的一些经济部门可能在某些方面

具有竞争能力的担忧，导致了欧盟理事会在决策上长期的犹豫不决。例如，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德国农业部面对南非的竞争者，“英勇地”捍卫了德国那些种植芦笋菜农的利益。对于拉丁美洲，首位的任务是促进它们获得自助的能力，在这方面，西方国家还可以再向前迈进一步，并且应该是有助于加快这一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步，表现在具体行动上，是尽快将它们吸纳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

亚洲的“钢丝绳”行为

在亚洲出现了促进该地区国家之间合作的趋势，地区性组织和一体化的开端被认为应该得到支持，形成了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以及南亚经济合作理事会（SARC），后者逐渐摆脱了毫无结果的僵化形式，开始着手地区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实际工作。美国和欧盟必须忍受这样的事实可能，即亚洲的地区大国有时也会在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情况下集会。也许超级大国不总是一起坐在会谈桌上的时候，某些问题可能更容易处理一些。我们完全可以信赖亚洲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基点，它们将被敦促进一步深化和西方的结合。我们不应该将人权的话题略过不提，而是应该以适当的方式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东盟接受新成员国的条件确实不应该是西方国家的职责范围。对接收缅甸加入东盟的强烈抗议只是加深了东盟国家和西方之间的矛盾，并促使专制的和民主的成员国走到一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对东盟内部事务的干涉。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保有敏锐的洞察力更为适宜。当亚洲国家发表与我们的关系的批评意见时，西方国家也应该认真地聆听。人权对话作为单行道是不可能起作用的，我们西方国家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找到不足。

在国家之间的接近有利于该地区发展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时刻关注中国的发展趋势。只有当亚洲的各个国家不必对中国产生畏惧心理的时候，亚洲政治的自由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当中国优先致力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是注重于它的统治欲望或霸权主义时，才能落实这个前提。但是假如中国选择了这个方向，那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必须伸出援助之手，在亚洲建立一种平衡均势，直到中国逐渐适应和其他国家以及各民族和平相处的环境。

此外，西方国家必须和对它持不信任态度的三个亚洲大国——中国、印度和日本，也维护彼此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双边关系。这种行为并不是只为了收集有利于西方利益的积分，从而在亚洲大国之间的相互争斗中坐收渔利。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取得它们的理解和信任，为在所有层面建立一种持久的、多样化的对话机制打开机会之门。同时，应该能够通过这种对话，改善交流方式，以防止出现地区冲突，并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与伊斯兰世界的和解

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像面对伊斯兰世界那样，需要我们具有冷静的观察力和保持客观的对话态度。许多穆斯林通过移民已经在我们西方的社会中持久地安定下来，在公民权利自由化的进程中，他们将来很可能和我们欧洲人的纽带关系变得更强。伊斯兰国家属于我们直接的地区性邻邦，因此，对它的摒弃将在双重方式上对我们产生影响，因为我们相互之间已经存在太多的试图划清界限的努力。

首先西方必须通过批评的一致性，来支持那些努力促使伊斯

兰社会实现现代化，并且寻求与西方政治文化要素一体化的国家，尽管它们的这种努力还不完善。这些国家包括土耳其、约旦、突尼斯和埃及，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国家符合“我们”对民主体制的要求，人权在这些国家里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经济没有完全摆脱官僚主义的束缚，腐败问题也急需得到抑制，所有这些谴责都不无道理。但是：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政府相比，如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或苏丹，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它们和我们靠得有多近。我们总是习惯于为它们和我们之间的不同而耿耿于怀，却不承认它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也同样低估了这些国家反对原教旨主义的决心和为此做出的努力，尤其在处理和土耳其的关系上，西方的错误行为表现得十分明显。当然，对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少数民族受到压迫（他们本身也有过错）、监狱里实施酷刑以及军队施加对民主政体有害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受到我们坦率的批评，所有这三个问题都必须在土耳其完全实现和欧盟一体化之前进行深刻的改变。然而，欧盟早就有必要给土耳其一个明确的加入前景，把条件清晰而具体地放到桌面上，并且提出一个谈判的时间表。欧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或者说厚颜无耻地拒绝了土耳其的加入请求，欧盟国家每一季度都要对土耳其政治上的缺陷横加指责，或者保持缄默；另一方面，欧盟非常慷慨地向土耳其军队提供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武器装备；我们还能发出比这更错误的信号吗？所有这些行为无疑对土耳其表明：我们把你当做有用的军事前沿国家，并且准备不考虑你们的内政而一直支持你扮演的这个角色。但是从经济上和社会上，你不属于我们的圈子。所以，土耳其那些完全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坚力量，把这些信号看做是对他们的排斥和一脚踢开，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盟对土耳其的政策可以参考先前的那些范例：坦率地使希

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年轻而不稳定的民主政体加入到西方的民族共同体之中。

而对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欧盟和北约的地中海政策提供了合适的论坛。摩洛哥受到鼓励的开放政策应该得到更为持久的支持；突尼斯受到限制的民主，如受到压制的媒体自由、封锁立场、对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实行的出境限制等，也同样应该受到我们明确的批评；在埃及，应该鼓励其政府构筑联合所有反对党的共同平台，包括共产党和穆斯林兄弟组织。卢克苏尔大屠杀，不应该成为继续维持政党禁令的理由，而应该成为认真对话的契机。所有这三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都必须在其债务问题上得到西方的援助，以帮助它们对付经济管理上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在埃及这种援助显得非常必要。当然，欧盟必须采取不同于目前的联合条约的形式，这个条约只是迫使马格里布国家撤消了它们的工业保护性关税，而对其农产品却关闭了欧洲市场，受到欧盟内部农业团体游说影响的错误政策还在不断地得到执行。

就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对话来说，发生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一直是政治上、但同时也是道德上的结晶点。穆斯林谴责西方及其带头人美国的片面性和双重标准，这种谴责显然是有道理的。为了避免产生这样的误解，西方国家必须无条件地、在必要时运用一切手段来维护以色列的存在。因为历史不允许出现另一个合理的选择，但是西方对以色列破坏国际法、侵占他国领土、藐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破坏巴勒斯坦地区经济建设的行径所采取的几乎沉默或者最多有气无力地抱以警告性的容忍态度，这完全是无法让人理解、更无法得到大家原谅的行为。而当以色列的部长谈及“吞并”、同意以色列最高法院采取“加重审讯”的措施，也就是说对阿拉伯囚犯进行严刑拷打时，西方国家对此几乎就没有发表过什么评论。同样，对以色列的安全部队采取的株连措施，

即把恐怖分子的亲属从自己的家园中驱逐出去、把这些房屋、葡萄园和果园用推土机碾平的行动，西方也同样佯作不知。在美国国防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继续扩散的研究报告中，以色列这个核大国从来就没有出现在其视野中。西方坚决地支持以色列的要求，认为巴勒斯坦政府应该彻底消灭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基础。而同时，以色列那些和巴勒斯坦对立者相比并不逊色的极端原教旨主义移民，却可以全副武装地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招摇过市。1994年2月移民医生巴鲁赫·戈德斯坦在希伯伦对29名做礼拜的穆斯林发动了恐怖袭击，直至今日戈德斯坦还被很多移民尊为英雄和殉道者。当以色列移民在他们的定居点边缘实施“边界修正”行动时，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巴勒斯坦耕地据为己有时，面对愤怒的巴勒斯坦抗议者，以色列军队马上将他们保护起来。而在西方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西方甚至没有坚决要求执行奥斯陆协议签署的停止在被占领土上建立以色列定居点的明确规定，那么，假如伊斯兰世界将此认识看做是进行一次新的、间接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又有谁会感到惊讶呢？西方国家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无疑是完全失败的。最具讽刺意味和最具悲剧色彩的可能是：受到这种无限制的宽容态度支持的那些以色列政治势力，恰好并不是那些坚信西方价值观的人。这些在宗教的幌子下从事政治活动、希望重新建立一个古老的以色列王国的极端主义势力和他们的伊斯兰对手一样，也根本不重视人权、自由和民主。假如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因为男女一起祷告，保守的东正教以色列人和改革派犹太人在哭墙旁祈祷时就可以大声辱骂；因为祷告者的行为违背了东正教－犹太教的行为准则①，警察就可以驱逐他们；那么这些和西方文化就毫无关系可言，这是东方的原教旨主义，正如人们或

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13, 1997, 第1、6页

许可以在阿富汗、伊朗和苏丹遇到的一样。①

假如我们没有开诚布公地对此表示批评，那么西方采取的就不仅是一种“视而不见”的政策了，而且已经破坏了一个通常的禁忌，我们给许多希望他们的国家重新回到和平谈判之路的以色列人帮了倒忙。正是这些以色列人，真正希望对他们自己的政府实施彻底的西方政策，希望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进行坦率的对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西方的片面性对这种对话会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也可以说是多么致命的负担。假如不对这种片面的态度进行修正，西方的立场将不可能在穆斯林中赢得信任，这种机会产生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对于那些亲西方的埃及政府和约旦政府，这将可能关系到它们的生存问题。

我们再来谈一谈和伊朗的关系。伊朗一直受到美国病态的反感情绪的折磨，这是1979年德黑兰人质危机的后遗症。即使在霍梅尼执政时期，这个国家也从未像它的邻国伊拉克那样，被专制、独裁的集权所残暴统治。自1997年以来，“多元论”这株娇嫩的新生事物在古老的波斯大地茁壮地成长起来，早在伊朗总统大选之前，对情侣的习俗检查已经有所放宽，同时，长期以来那些被习俗捍卫者所严格遵循的规则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如私自接收卫星电视或者走私进口录像带、CD等行为也越来越得到宽容而变得无足轻重。改革派总统候选人哈塔米在竞选活动中，提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也给予思想自由、对反对派和其他宗教信徒实行保护、新闻自由和妇女就业自由等纲领。在1997年12月伊斯兰大会开幕之际，他又不畏风险，公开与“喷射毒汁”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发生对抗，反对他的教条主义说教，提出平民社会和

① MosheZimmermann,《以色列的转折点》,“介于国家和宗教之间”,Berlin 1996

少数民族保护的主张，他甚至提出伊斯兰世界必须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理念。不久之后，哈塔米又提出和美国开始对话的建议，同时，以色列农业专家也悄悄地被允许入境。他们和伊朗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会谈，并且受到农业部副部长的接见和欢迎，伊朗方面对继续进行这种接触采取了积极的鼓励态度。①尽管发生了米可诺暗杀事件，欧洲所持的“批评性对话”政策还是相当正确的，就像在冷战时代，尽管苏联支持某些恐怖主义组织，对它实行缓和政策也同样正确一样，因此应该坚持继续推行之中的对话政策。或许最终能成功地使美国相信，在处理伊朗的问题上，今天所采取的所有措施对于改善和德黑兰的关系是卓有成效的并且是明智的。

在和伊斯兰世界的对话中，如同和亚洲的对话伙伴有争论一样，西方没有理由不强烈地维护自己的价值观，有一点可以肯定，西方的价值理念必然会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寻求到支持。这些支持来自那些从根本上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希望将宗教从政治中脱离出来的先进分子。这些支持也来自那些改革派伊斯兰的代表，他们利用自己对《古兰经》及其传说的诠释能力，把这些思想或近似的价值观从书中筛选出来。巴桑姆·提比创造了“欧洲伊斯兰”的概念，他宣扬一种宗教世界对开放、现代化的新观点，在他看来，伊斯兰国家具有完全融入欧洲国家世界的能力，它也是欧洲共同文化丰富的一部分。在和愿意进行改革穆斯林的对话中，促进这种文化观念的过程对我们西方国家本身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可惜，这项重要任务被湮没在难民问题、对土耳其移

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0, 1997, 第1、10页

民的恐惧和多元文化的高度宽容性等问题里了。[1]这种观点我们不仅仅可以在处理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上得到印证，而且也包括面对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穆斯林的态度上。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体化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只会把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推向原教旨主义者的怀抱。[2]只有给他们提供生活的前景，我们才能期望：宗教差异退居到价值观的共同性之后，正如欧洲的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一样。

经济交流的框架条件

这种对话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事情，只要政治因素不阻止经济的发展，经济原本就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推进。国民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联网，已经在令人震惊的程度上走向经济政策的趋同现象，自由贸易计划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得以向前发展，在这个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功不可没。在有些国家，政府自己也从错误的国家导向中迷途知返。因此，目前主导世界经济的跨国企业家们正以从未有过的自由心态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当然，这种情形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在很多地方，人们几十年来编织起来的社会网络开始摇摇欲坠。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积极的后果，来自不同文化圈的许多国家中的一部分重要的中坚力量，即那些经济活动家，开始用同一种语言、以同样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跨国企业家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日益

---

① Bassam Tibi，"生活在安拉的阴影中"，摘自《伊斯兰教与人权》，Munich/Zurich 1994，第十二章

② Wilhelm Heitmeyer，《非一体化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论德国的土耳其青年的生活状况、日常经验以及他们的处理方式》摘自"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7－8／98，第17－31页

密切的经济活动中不断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经济活动的一致性是促进不同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许甚至是决定性的推动力。政治体制最终已经没有能力单独操纵这些势力的走向，相应的努力不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代价非常高昂。因而，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实施有利的框架条件。

这些框架条件，并不要求各国或地区组织完全放弃各自的现行规章制度，如一些康采恩大老板所希望看到的那样。长期的目标应该是将社会和生态原则，引入那些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跨国企业家们的经济活动中。在经过长期的努力之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成为第一批签署禁止雇佣童工国际公约的亚洲国家，这无疑向世人表明，持之以恒的劝导和努力，完全可以将那些在歧路上徘徊的人们引向目标。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严重践踏人权或毫无顾忌地破坏环境中获得竞争的优势，在这样一个秩序的框架内，遍及全球的竞争可以在没有国家强烈干预的情况下出现。

与那些内部经济发展被证明是特别困难的伊斯兰地区国家相比，经济交往中的障碍，只会出现在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严重威胁的区域。这种原则当然也适用于所有其他地区，否则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将是有利的，不会出现弱者对强者的恐惧。在近东和中东地区，这种关系会加强那些对合作、增加社会福利感兴趣的进步组织的力量。但在一定情况下，那些不受欢迎的政权，其经济力量也会因此而得到加强，对于这种社会现实来说，从长期看它只具有极小的战略意义。帮助伊斯兰贸易国家建立经济发展的根基，支持那里拥有自信心、开放型的企业家的行动才是我们更重要的目标。

社会联网：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仅仅依靠经济作为文化间的纽带还是不够的，文化的对话首先属于社会活动家的活动范畴，涉及到科学界、艺术界、各党派、工会和协会、宗教社团以及非政府机构。这些机构和组织在社会团体的联网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些社团的数量明显地增加了，它们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越来越响亮的声音，成为20世纪晚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这种创新反映出社会团体相对于政治体制地位的加强。因此，非政府组织主要扎根在那些社会解放运动进行得非常彻底的地方——整个西方世界。它们又从那里向全世界进行辐射，在那些政治局势只允许极小回旋余地的地方，就会出现非政府组织的身影。各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差异越大，它的活动余地就越广阔。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那些非政府、非经济主流社会的公民、少数族裔以及处于社会边缘团体的利益，而且它们跨越国界，和其他国家和文化圈的伙伴结成联网。因此，作为文化间对话的承载者，非政府组织比政府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它们不必强迫自己考虑什么协议、条约和议定书以及重要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也不必考虑内政的压力和限制性利益的核算。在这个层面上的文化间对话可能导致两种结果：首先，它较易引起争议，因为人们不再顾忌外交隐忍，坦率地表达和研究彼此间存在的差异；但同时它又富有建设性，因为权力和安全问题不再作为制造分离、引起不信任的要素夹在中间。

非政府组织的成就最初体现在环境保护政策上，渐渐地它们的影响力也扩展到"高层"国际政治领域。它们在各种冲突中进行斡旋调停，如活跃在莫桑比克和阿尔及利亚的天主教士组织

“St. Egidio”就是其中之一。它们也对发生在自己国家内部的冲突和纷争进行调解。例如在马里，合作社、合作储蓄银行、工会、商会和职业组织等成功地促成了国家重返 Taureg 组织；同时，由于它们的共同努力，使得军队在军备控制上的优先权得到限制；同样它们也在反对禁止私人开采矿产的运动中取得了胜利。非政府组织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活跃的政治新生力量，它们在那些通过外交手段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充当了在国家、地区和文化之间构筑桥梁的理想使者。

期间，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发现了非官方外交给国家间关系提供的不可替代的优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经常地在融洽的相处中，进人所谓的“双轨制”阶段，这是指那些或多或少就某些问题举行的定期会谈，例如有关军事安全问题、裁军问题等等，越来越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或国际民间组织应邀参加这样的会谈，有关国家的外交官也以“个人”身份，即非官方身份参加这样的会议。非政府组织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或者提出在其他场合被列为禁忌的某些建议。在“双轨制”的会议中，这些观点都可以和外交官们探讨，而不会因为某一组织或某人所发表的具有冒犯性的意见，就马上把罪责归咎于它们的政府。这种方式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打破陷入僵局的谈判环境，给那些原本处于死胡同内的争端以重现“解决的生机”，显然，这种会议也可以使与会者心平气和地商议文化差异、探讨其政治意义和协调之路，而不会导致直接的外交后果。

在其他任何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都可能没有比在人权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权在“文化差异”的借口之下被践踏，就好像缅甸人比瑞士人更愿意忍受酷刑，或那些被职业生涯和教育培训拒之门外的阿富汗妇女和挪威的同性相比不够聪明、不够能干和不能发挥才智似的。国际性

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组织）或国内人权组织，共同消除了这些恶劣统治神话的可信性。如果长期内一个普及的人权宪章在全世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而且在实际上也得以执行，那么这要归功于这些民间组织的共同协作和努力。

在文化交流和全球民主化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它们也应该得到政策上无条件（不试图篡改内容和施加影响）的支持。当然，也有很多人对这些团体的所作所为大为恼怒，尤其是那些官方的政府代表，的确，它们的有些行为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我们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政府组织的桥梁作用以及它们的对话机制远比那些衍生的不利因素更重要、更有价值。

妇女地位的提高

许多人，尤其是男性，听到我对未来积极发展的关键问题的看法时，可能都会感到诧异，妇女地位的改善真的如此重要，难道通过这个因素，在很多领域预期的变化都能如愿以偿?[①]

首先，这关系到走近人权理想极其重要的一个步骤；毕竟女性占据了地球上人口总量的一半。妇女权益的加强比增加任何其他团体的权益都更能有效地促进人权和民主的进程。当妇女们强烈地共同争取她们的权益时，如伊朗的“伊斯兰自由派妇女联合会”或以前的厄立特里亚的“前线女战士解放运动”，她们完全可以在扩大自己的权益之后，为其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开拓一条光明之路。

其次，针对妇女的经济活动正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来达到那

① Georgina Waylen, Gender in Third World Politics, Boulder 1996

些改善最贫困人口阶层社会状况的目标。格瑞米银行（Grameen－Bank）取得的成就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家合作银行一开始只是活跃在孟加拉国，如今却已发展到了 58 个国家和地区，它的主要业务是给妇女经营的企业发放小额贷款。在孟加拉国接受该银行贷款的客户有 94% 是妇女，女性贷款人被证明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债务人，她们的经济活动改善了各自家庭的社会处境，其中三分之一的家庭脱离了贫困线，走上了小康之路；另外三分之二的家庭则达到了“贫困线”的标准。这些家庭的儿童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这些家庭曾经失业的男人也经常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①

第三，只有妇女得到更多的权益、更持续地融人经济生活，人口增长才会稳定下来。反过来，随着妇女权益的增加，非政府组织的境况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引人注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阶层中，妇女所占比例甚至高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和行政管理领导层中的女性比例。假如通过妇女不断增加的参与意识而使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得到壮大，那么在环境保护、民主思想的传播、深化以及人权方面，将因此而出现更多的良好局面。

最后：妇女可能也是最容易跨越文化界限、构筑友谊桥梁的力量。当然，对于这样的文化对话，我们目前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文化的界限也有可能在妇女之间引起隔阂。但是，几乎在所有文化圈中，妇女相对于男性总是受到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剥夺妇女的大量权力，一直到我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所经历的一些细微的方式和惯例，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尽管我们今天也开始努力运用平等权利的规则着手改善这种

① Muhammad yunus / Alan Jolis, Vers un monde sans pauvrete, Paris 1997

状况。正是这种改善妇女地位的意向，将那些根据各自文化的游戏规则，追求不同理想角色的妇女联系在了一起。正如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可以求同存异，使基于文化差异产生的分歧得到建设性的引导，而不忽视共同关心的问题。

西方的改革

我在这里从西方的观点描述了所有这些有待处理的问题，其原因已经在第六章得到阐述。我们还是有必要再重复一下那里提到的警示：西方文明并不能开具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处方。历史的发展还远未结束，生活在西方体制中的人们也还没有找到最终的间歇点；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名句（要是我对这个瞬间说：）"停留一下吧，你是多么的美妙呀！"所表露的，这个观点并非是最终胜利的瞬间，相反却可能是最终失败的瞬间。

西方国家的手中并未掌握智慧之钥，但是其开放的社会、民主的政治体制，为全世界提供了推动探求的最佳前提条件。全球化、国家意义的相对丧失、不同文化间空前深入的碰撞、技术创新的惊人速度、遍布全球的通讯网络，所有这些无疑会给人类的发展注入活力。但另一方面，移民的巨大压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毁灭危险、全球环境恶化可能导致的生态灾害，都要求我们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或组合性解决措施，而这些只有通过多种多样的实验才能找到答案。只有那些能够像实验室一样组织和表现的国家，即能够容忍并且积极促进多样性的国家，才有希望找到通向未来之路。这种相对开放的特质其实正是西方的强项，没有另外任何一种选择可以给个人提供如此高度的自由和发挥空间，而在其他地区则需要斗争才能获得这种开放性和进行实验的

能力。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在目前严酷的现实中，西方文化的成就也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顺从的”掘墓人已经在我们的社会内部做好了准备。我们在抵御对开放社会的攻击时，必须同时面对来自三个方向的挑战：1）首先是面对我们自己僵硬的机构，就这一点，执政党派和劳资伙伴给我们提供了印象深刻的事例；2）其次，面对以文化、种族的纯洁为目标、希望再一次掀起法西斯主义的右翼势力；3）最后，面对“善良的人们”对多元文化的随意性，他们以自己无限的宽容容忍了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实质上对民主和人权彻底否定的行为，因为它披上了文化的外衣，识别起来很是不易。

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化的对话！

稳定和开放是破译未来之门密码的关键。这首先是指全球范围内综合竞争能力的普遍提高，而不是把社会上处于不太有利地位的成员推入被社会遗弃的角色。不毁灭社会国家，而是以低成本将其有效地转化为新的动力源泉，这自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但也是不可拒绝的前提，惟有如此，西方国家才能真正履行我们这里赋予它们的领导职责。如果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生活在不断受到生存恐惧折磨的社会制度中，我们所说的这个目标也就根本无法实现。①坦率首先是指交流的判断能力，但前提是必须保障自身的安全，才能容忍陌生事物、感受它的刺激、并且理解它、与之交流。除了社会安全感还包括自信地、积极地对待内部的社会秩序。在我们国家内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很不令人满

① Anthony Giddens，《超然于左派和右派之外》，Frankfurt 1997；Ulrich Beck，《何为全球化?》，“全球主义的错误——对全球化的回答”，Frankfurt 1997，第四部分

意，怎么能要求外部的讨论能够理智地进行呢？

我们必须学会从其他的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事实上，我们对有关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事情一向知之甚少，至于儒教或日本的神道教，可能大多数西方人还根本没有听说过。这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共产主义的挑战，正是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对这种所谓的“异端”有一定的基本了解。对强烈的对抗状态所适用的那些规律，对建设性的对话也同样重要：假如人们对未知的事物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它对于我们就不再是那么陌生的了，对话也就变得容易起来。在教学计划和教育计划中，应用少量的手段就能取得一些可喜有益的变动，教会在这方面也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如果它们乐于让世界上其他宗教也有机会发表意见的话。[1]

我们这部书是从人类的恐惧感说起的，但是恐惧多半不会是个好的顾问。闭关自守决非良策，开放搞活才是对待陌生事物的灵丹妙药。在烦恼和恐惧面前，我们这些西方国家本身其实比我们表现的还要坚强得多。在其他地区的人们眼里，我们简直坚不可摧，因为强者可以毫不怀有生存恐惧地接近弱者，今天对西方世界提出的正是这一点要求。全球的发展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共同点会更广泛地得以扩大，而不是缩小，只要我们努力寻求，就能在世界各地找到对话的伙伴和合作的意向。

在21世纪，人类将会走向何方，文化的差异是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都取决于我

① Hans Kueng，《宗教世界伦理反对仇恨和暴力》摘自 Norbert Sommer (Hrag.)，《到处是仇恨、危机、战争和暴力——起因与出路》，Berlin 1994，第400－407页

们西方国家对待文化的态度。美国作为西方的领头羊，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在此只能对美国抱以极大的期望，保佑它可以履行这项责任。就目前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信号都接近这种希望。认识到我们具有的优势、保护我们成就的必要性、并且以适当的方式，即在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继续发展这种成果，应该是着手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至于21世纪是否会和20世纪一样，到处充满着血腥的战争和暴力冲突事件，或是这些争端成为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的世界新秩序的边缘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情况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挑战”、日本的威胁或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而是首先取决于我们——沐浴在民主、自由空气中的、开放的西方多元文明社会。

译者后记

翻译本书之前，作为国际关系问题的“爱好者”，我曾拜读过亨廷顿先生的大作《文明的冲突》——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记得我是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把它读完的，那感觉就仿佛一个茫然无知的虔诚学子，突然受到名师的指点而茅塞顿开。的确，《文明的冲突》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新视角，我的一位朋友甚至将它与天文学上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相提并论。然而，当我阅读这本《文化的共存》时，我发现了可以看得更遥远、更细致的一架“望远镜”，在它的折射下，亨氏“镜片”上的瑕疵也显露出来。

本书的作者哈拉尔德·米勒是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他的一些看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欧洲对于国际政治的见解。在书中，他不但对亨氏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提出了对未来世界格局的构想——西方和东亚的联合，但前提是东亚加快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和中国坚定地继续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本书的作者虽然主张以“文化的共存”替代亨氏的“文明的冲突”，但如果你仔细研读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其实并无二致，他们的目标相同，只是在如何达到目的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分歧，作为同一阵营有着密切联系的伙伴，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有着非常一致的看法，而在有关中国的论述中，他们的偏颇看法竟如出一辙，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偏见是

多么的根深蒂固！

一种错误认识的形成，往往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最大的可能却是出于彼此间的不了解。正如本书作者所提到的，对于儒家文化，大部分西方人不要说了解，甚至根本从未听说过。对于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会，在大学的时候，系里曾接待过一个美国大学生访问团，这些大洋彼岸的年轻人，在来北京之前根本不知道它是中国的首都，至于中国其他的城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则完全没有概念，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件事发生在1992年的冬天。而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知道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和“五月花”号轮船了，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对他的美国同行所说的戏言——我们在某些时候甚至比你们更了解你们自己。

西方不了解我们或是对我们知之甚少，那么我们究竟对自己的文化又有多少了解呢？20世纪的100年中，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真正反思不过仅有的两次。一次是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在西方文化近百年一次强过一次的猛烈撞击下，传统文化的大厦终于倾覆了，在它的废墟上，我们建立起也是起源于西方并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新摩天大楼，这是我们在那种民族危亡时刻的惟一正确选择。传统的儒家文化遭到了无情彻底的批判，并被社会主流思潮所摒弃，他们的正宗传人要么放浪于形骸之外，如辜鸿铭的传奇故事；要么无畏地进行某种形式的抗争，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投水自尽便是一个例证。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传统文化仅存的影响力也逐渐被荡涤殆尽。60年代初，随着中苏交恶和国际风云的变幻，共产主义大厦的裂痕也慢慢清晰起来，为了修补这道裂痕，我们又拿起了反传统的工具，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名为“文化革命”实为“文化浩劫”的运动将传统文化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在经历了1978—1988十

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才终于迎来了对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反思，所不同的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现代化的挑战，正像80年前我们不能选择“完全西化”一样，今天它也同样不是我们的选择。1989—200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表明，即使在非西方体制的社会中，也同样存在着实现现代化的其他选择，在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之后，我们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得到了有效印证，而它力量的源泉则是来自我们文化的深层底蕴，被中国先进阶级赋予新意的传统文化的复苏，使我们对于现代化的适应性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当然，中国的继续繁荣稳定将有赖于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包括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先进文化方向的正确引导。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知之甚少使他们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苏联等同起来，2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30年代的党内清洗、40年代的对外扩张，所有这些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污点也同样甚至是添油加醋地赋予了中国；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了西方人眼里我们的“体貌特征”。事实上，中国革命不但是共产主义革命，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序言），正是有赖于它的成果，使得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步伐，否则一切都根本无从谈起。在这里，西方不但忽视了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因素的重要作用，而且背叛了历史的基本现实，将一个曾经沦为半殖民地、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地位的、有着严重民族生存危机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与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完全等同起来，很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遮住了事物的本来色彩。

对于西方的普通百姓来说，对中国人的直接认识首先来自于身边的华人社区——“唐人街”，在那里，中国人的“丑陋”之处暴露无遗，这一点在一位台湾知名学者的著作里，有非常精彩

的描述。我的一位朋友身高不过172公分，当他去加拿大的一个中等城市读书时，却总是被认为是日本人或韩国人，因为在当地人眼里，中国人的身高决不会如此。而在我们自己的观念里，日本人和韩国人是矮过我们的"矬子"。在这里，我绝对没有贬低矮个子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究竟停留在一个怎样的水平上！（从这一点来说，加快发展我国旅游业有着特殊的意义。）而西方知识界对我们的了解也并不比他们的普通民众强过多少，像本书的作者以及亨廷顿这些国际问题的专家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有色眼镜的度数也就可想而知了。

前些日子，我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顺手翻看了几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这些书大都是1993年之前出版的，书中对传统文化的论述可谓精辟，但却大多雷同、缺乏新意，使读者难免对此产生老生常谈的感觉。由此使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在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偏见问题上，他们固然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但在如何去掉西方世界有色眼镜的问题上，我们的努力是否得当，着力点是否正确无误呢？在这上面，丝毫的偏差就将导致事倍功半的结果。我们是否可以用西方人容易接受的方法，改变他们对我们的错误认识，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中国渴望和平友好的人民。这对我们的学者来说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也是不可推卸的现实责任。

2000年8月